


马克思主义研究译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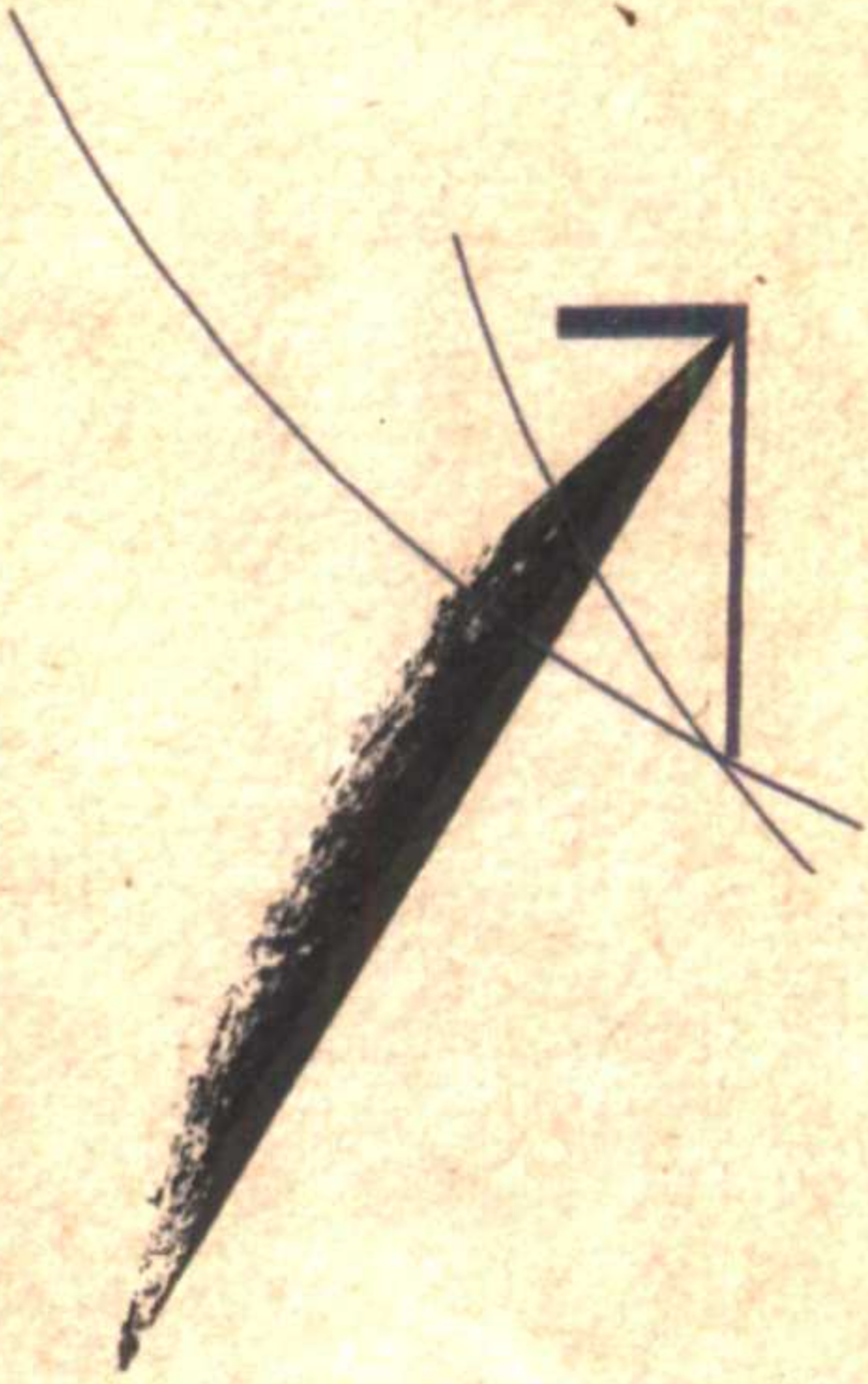
马克思以后的 马克思主义

(第3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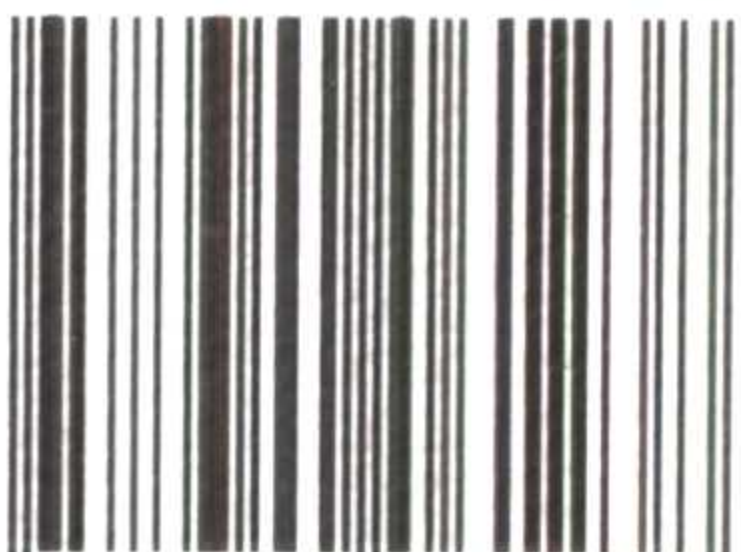
[英] 戴维·麦克莱伦 (David McLellan) 著
李智译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01-2003-2864 号



ISBN 7-300-06123-0



9 787300 061238 >

ISBN 7-300-06123-0/D · 114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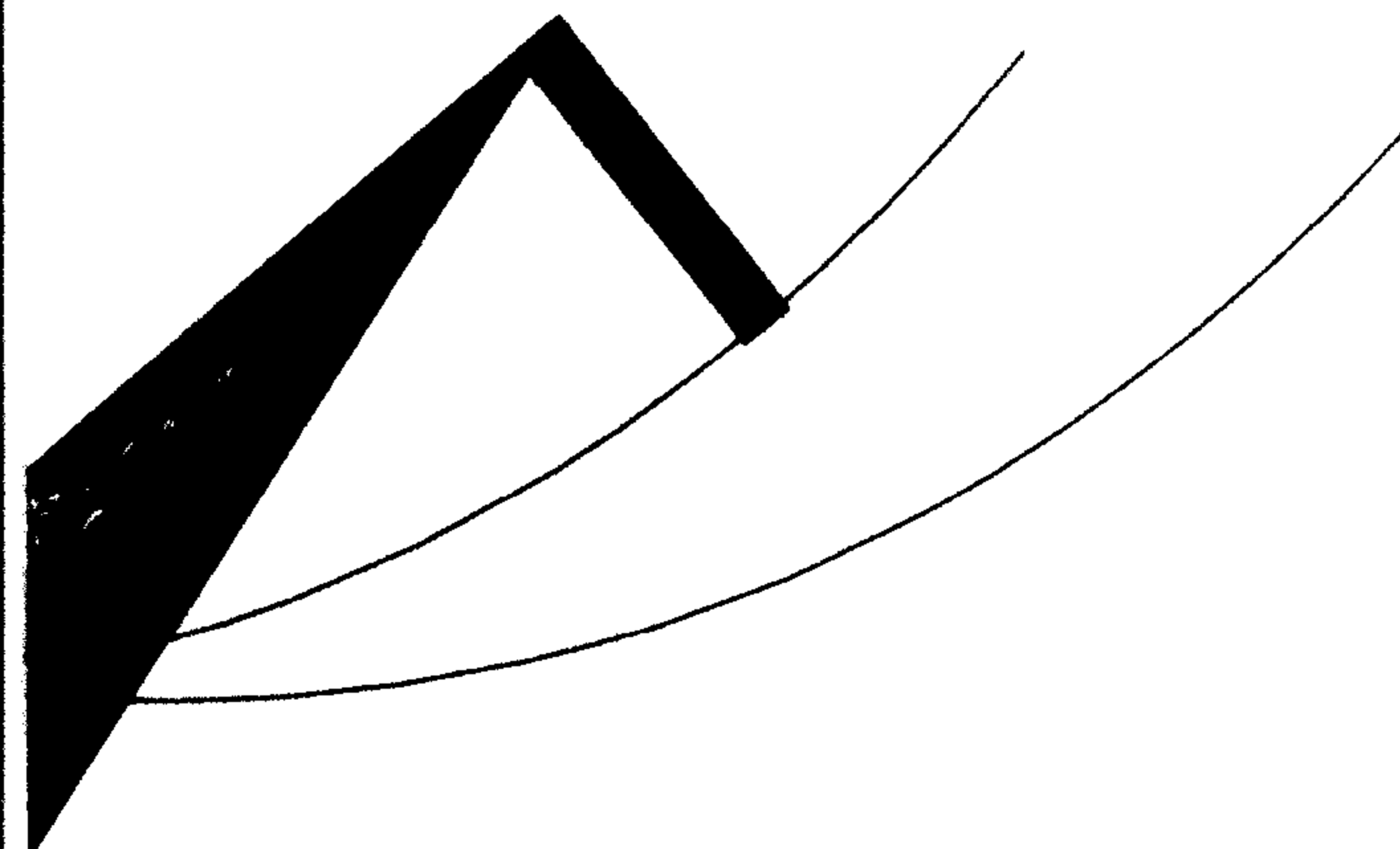
定价: 38.00 元

马克思以后的 马克思主义

(第3版)

[英] 戴维·麦克莱伦 (David McLellan) 著

李智译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马克思以后的马克思主义：第3版 / [英] 戴维·麦克莱伦著；李智译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
(马克思主义研究译丛)
ISBN 7-300-06123-0

I. 马…
II. ①麦…②李…
III. 马克思主义-研究
IV. A8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113053 号

马克思主义研究译丛

马克思以后的马克思主义 (第3版)

[英] 戴维·麦克莱伦 (David McLellan) 著
李智 译

出版发行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中关村大街 31 号	邮政编码	100080
电 话	010-62511242 (总编室)	010-62511239 (出版部)	
	010-82501766 (邮购部)	010-62514148 (门市部)	
	010-62515195 (发行公司)	010-62515275 (盗版举报)	
网 址	http://www.crup.com.cn http://www.ttrnet.com (人大教研网)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雅艺彩印有限公司		
开 本	720×1000 毫米 1/16	版 次	2004 年 11 月第 1 版
印 张	25 插页 2	印 次	2004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字 数	414 000	定 价	38.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马克思主义研究译丛

总 序

马克思主义产生之后便对全人类的历史进程发生了重大的影响，这种影响不仅表现在共产党执政的社会主义国家，也表现在非共产党执政的资本主义国家；不仅表现在经济文化落后的发展中国家，也表现在经济文化先进的发达国家。其实，在发达的西方国家，马克思主义始终是最有影响的社会思潮之一。在这里我仅想谈谈马克思主义对当代西方社会科学的巨大影响。

一个令人深思的现象是，不少在世界范围内影响卓著的社会科学家都与马克思主义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其中有一些直接就被冠以“马克思主义者”的称号。美国的马尔库塞、法国的萨特和意大利的葛兰西，都曾经是西方世界最有影响

的学者和知识分子，而他们都被认为是“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法国的解构主义大师德里达、德国“最有影响的思想家”哈贝马斯、英国首相布莱尔的“精神导师”吉登斯和美国后现代主义代表人物詹姆逊等，都是现今公认的在国际上最有影响的著名学者，他们在各自的领域中执掌着社会科学的牛耳，而他们对马克思的思想在相当程度上持肯定的态度，其中有一些则被认为是西方的“马克思主义者”。

除了造就一批声誉卓著的国际著名学者外，马克思主义对当代西方社会科学的影响还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促成了新的学术流派的诞生；二是开拓了新的社会科学分支学科。

20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发达国家的社会科学盛行过许多思潮，其中影响最大的有三种，即新自由主义、新保守主义和新马克思主义。所谓新马克思主义，就是西方学者试图按照他们所理解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对当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现实作出新的理论解释。新马克思主义是在经典马克思主义的直接影响下产生的，是经典马克思主义在当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变种，这最集中地反映了马克思主义对当代西方社会科学理论的巨大影响。这种影响几乎体现在人文社会科学的各个主要领域，例如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历史学、人类学、哲学、文学等，例如有所谓的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新马克思主义政治学、新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等。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方社会科学出现了许多新兴的分支学科，其中有一些分支学科与马克思主义直接有关。例如，新政治经济学和政治社会学，这是两门极为重要并有深远影响的新兴学科，它们的产生与马克思主义有着深刻的渊源关系。以政治社会学为例，它有两大理论来源，其一是马克思的理论，其二是韦伯的理论。美国著名的政治社会学家安·奥勒姆曾这样说：“马克思可以说是政治社会学之父，正如奥古斯特·孔德可以称为社会学之父一样。毫无疑问，由于种种原因，马克思轻视了这个题目，但是，显而易见，马克思创立了许多比任何热衷于政治研究的社会学家——活着的和死去的——都更富有挑战性和更富有成果的思想。”^①

马克思主义之所以对当代西方社会科学具有如此深刻的影响，主要有三个原因。一是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如辩证法、唯物史观、阶级分析方法等本身对自然界和社会发展具有极强的解释力，至今仍有着很强的生命力。二

^① [美]安·奥勒姆：《政治社会学导论》，14页，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9。

是马克思主义的价值观，即消灭剥削和压迫，充分发展人的个性，解放全人类，最终实现“自由人的联合体”，仍然是许多进步的和正直的学者所憧憬的理想。三是不少杰出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不是死抠书本，而是始终站在时代和学术的前沿，对新出现的现实问题及时作出理论概括。

国外马克思主义者的许多观点是我们所不能赞同的，但他们当中的有些人终生研读马克思主义的经典文本，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本身多有独到的发现；有些人则将着眼点放在重大的现实问题和学术前沿问题上，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提出了富有时代意义的新解释；有些人则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对当代资本主义作出了深刻的分析性批判，所有这些都非常值得称道，也值得我们借鉴。

马克思主义理论要与时俱进，一方面必须将马克思主义与现实紧密结合，在实践中推进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另一方面，必须充分吸纳人类一切优秀文明成果，其中当然包括国外学者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成果。中央编译局当代马克思主义研究所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处的同志们，与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合作，经过艰苦的努力，陆续推出“马克思主义研究译丛”，所希望的也正是为国内有志于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学者提供一些可资借鉴的新视角、新观点和新方法。中国的学者如果要无愧于“当代马克思主义学者”这个称号，就必须在真正读懂马克思主义原著的基础上，始终站在时代和科学的前沿，善于吸收一切优秀的学术成果，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和价值观，而不是用它的个别条条或个别理论，去观察和分析当代世界，特别是当代中国的重大现实问题。

俞可平

2002年7月29日晚

于北京新风南里寓所



马克思主义研究译丛

第一版前言

近百年来，形形色色的马克思主义如此繁杂，有时竟难以捉摸，想要对它作出很全面的把握，必定会流于肤浅。我要力图做的是，把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发展脉络描摹出来。为了让这一思想历程清晰可辨，多少有必要论及其政治、社会和经济背景；但我也并不想搞出一部马克思主义的运动史来。当然，无论是那些对马克思主义整个理论演进过程感兴趣、还是那些对其中某些特定的观点——如葛兰西或阿尔都塞的观点——感兴趣的读者，但愿我都能够为他们提供出基本的知识内容来。基于我的著作只是介绍性和概述性的，我在每一章的后面都附上了一份分量不轻的深入阅读书目，它分为两类：一类是评注、解说

式的（为读者提供出有关各参考读物内容的一些引导——尽管在选材上多少有些主观）；另一类是纯粹的参考文献目录。

盖伊·夏普（Gay Sharp）实际上在本书的每一页上都予以润色，改进了本书的风格；托尼·特里维利（Tony Trivelli）在“葛兰西”一章中给了我实质性的帮助；尼克·卡斯韦尔（Nick Caswell）和杰奎·鲍威尔（Jacqui Powell）为参考文献的开列提供了基础性的工作；乔伊斯·麦克雷（Joyce Macrae）和玛丽·纳什（Mary Nash）出色地准备了本书的付印稿。

戴维·麦克莱伦
1978年9月于坎特伯雷



马克思主义研究译丛

第三版前言

我在本书的每一章后面都补充了大量的参考资料，对最后一章和结论的内容也作了扩充。

戴维·麦克莱伦
1998年5月于坎特伯雷



马克思主义研究译丛

目 录

导论 马克思的遗产..... 1

第一编 德国社会民主党人

第一章 恩格斯的贡献..... 9

第二章 与修正主义的论战 21

第三章 激进派 45

第四章 奥地利马克思主义 64

第二编 俄国的马克思主义

第五章 起源 71

第六章	托洛茨基	85
第七章	列宁	95
第八章	20世纪20年代俄国的马克思主义	127
第九章	斯大林主义	145
第十章	斯大林以后的共产主义	160

第三编 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欧洲马克思主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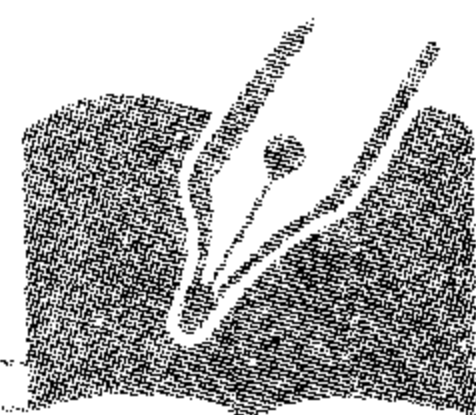
第十一章	卢卡奇	175
第十二章	科尔施	186
第十三章	委员会共产主义	191
第十四章	葛兰西	196

第四编 中国和第三世界

第十五章	中国革命的形成	223
第十六章	掌握政权的毛主义	239
第十七章	拉丁美洲	265
第十八章	马克思主义与不发达现象	276

第五编 欧洲和美国的当代马克思主义

第十九章	法兰克福学派	283
第二十章	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	309
第二十一章	德拉-沃尔佩学派	328
第二十二章	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	331
第二十三章	英国的马克思主义	342
第二十四章	马克思主义在美国	349
结论		373



马克思主义研究译丛

导论 马克思的遗产

乍看起来，马克思似乎给他的追随者们留下了一整套牢固的理论体系。在马克思称之为其研究工作的“主导线索”中，他认为自己已经表明：生产关系的总和，即人类组织社会生产及使用工具的方式，构成了社会的真正基础；在此基础上，出现了法律和政治上层建筑，并形成了与此基础相适应的一定的意识形态。因此，人类进行基本生活资料生产的方式决定了人类整个社会的、政治的和精神的生活。但是，在人类发展的一定阶段，生产力的发展会超过生产关系。这时，生产关系就会成为生产力发展的桎梏。这样的阶段就会开创一个社会革命的时期。这些生产力只有在现存生产关系下发展到了尽可能充分的

程度，旧的社会秩序才会崩溃。我们可以列举出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四种生产方式，作为社会经济形态渐进的四个时代。资产阶级生产关系是造成社会分裂、对抗的最后一种生产关系。这种生产关系一解体，人类社会的史前史也就宣告结束了。这是因为，资产阶级社会将随着革命时期的到来而终结；而无产阶级将在革命中崛起，通过自己的政党夺取政权，并经过一段专政时期，创立一个无阶级的共产主义社会。

然而，随着岁月的流逝，马克思的思想也暴露出一些严重含混不清的地方。一个显而易见的原因就是，马克思逝世后留下的手稿混乱不堪。他的著作不仅没有完成，而且那些为数超过实际发表著作的未刊草稿还表明，他已对自己的学说全盘作了一番新的评价——至少很多人是这样认为的。马克思逝世时，人们对其思想的了解，主要是通过过于简要的《共产党宣言》和艰深的《资本论》这两部书获取的。1930年前后，马克思早期著作的出版以及1941年《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Grundrisse*）的问世，这两件事是马克思未发表的手稿产生影响的最突出的例证。实际上，马克思主义思想发展史几乎可以从马克思的观念重新发现的角度来书写。而这些可以重新发现的观念多年来要么为人所忽略，要么无人知晓——至少就西方马克思主义来说是这样的。

马克思的遗产自相矛盾的另一个多少有些必然的原因是，他的思想方法不容许把自身概括为几个简单的公式。既然马克思在年轻时曾发觉他的导师黑格尔有自相矛盾之处，那么这种矛盾也出现在这位弟子自己身上就不足为奇了。这是因为他们两人都是辩证的思想家，而马克思的辩证法更是开放性的，没有止境：只要主观因素是与客观因素相统一的，理论便总是与实践不断地相互影响，并不断发展。马克思本人生前就曾改变，并发展了自己的政治观和经济观。

第三个原因是，马克思要求其追随者们不是去解释世界，而是要改造世界。但是，他们在这方面的成就越卓著，马克思主义就越倾向于成为一种群众运动的学说。群众性政党是19世纪后半叶开始出现的，其中最为激进者倡导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对所有被排除在新工业社会成就之外或不能从中充分受益的人具有号召力。在这种情形下，马克思主义那种把革命的热情和变革的要求同历史的视角与对科学性的宣称联系起来的罕见能力，使它显得与众不同。然而正是这样，马克思遗留下来的思想就几乎不可避免地被简单化、僵硬化和教条化了。马克思主义成了千百万信奉者的简单信念，给他们



灌输了最后胜利的信心。这就必然造成这样一种后果，它们离马克思最初的思想越来越远，并成为一种教条主义的意识形态，与之相对应的一种异端观念，即常说的“修正主义”。

最后一点，也最明显的一点是：世界发生了如此大的变化，而且发生在马克思极少留意到的地方，因此，指望马克思著作中的许多具体观点在今天仍然适用，便毫无道理了。诚然，马克思对德国社会主义政策的性质谈过一些看法，甚至在他生命的最后时刻，还考虑过俄国革命的可能性。但还是不可思议的是，作为维多利亚时代的思想家，马克思把欧洲、北美视为世界舞台的中心和未来革命的战场；而现在，这位思想家却明显地被第三世界各国人民广为尊崇，被尊为导师。在这方面，最为重要的是，我们必须牢记：马克思所设想的共产主义革命是发生在这样的国家：经济福利达到了一定的水平，足以保证革命以后人民享有很大的政治自由。然而结果却是，马克思主义的学说在这样一些国家中取得了最大的成功，在那里，资源的匮乏意味着政治自由是件无法获取的奢侈品。因此，在很多发展中国家，某种同民族主义相结合的马克思主义就充当了群众参与现代化进程的一种意识形态。

在此，我们想简要概述一下马克思在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和哲学这些关键领域中的观点的自相矛盾之处，以此来表明马克思遗产中所包含的一些难题——至少是这份遗产的承继者们心目中的难题。

在经济学方面，马克思逝世时，其基本原理还不清晰。劳动价值理论是否可作为分析现实经济活动的有益工具，还有待于马克思的遗作《资本论》第三卷的出版，有待于马克思对于价值转化为价格这一问题的解答。但对他的许多追随者来说，马克思的答案是不能令人满意的。在一些较为直接的实际问题上，马克思虽然确信资本主义制度的崩溃不可避免，但确切的（崩溃）机制是什么，他则并不很清楚。是在利润率下降的趋势中可以找到关键性的线索，还是生产过剩问题和随之而来的消费不足问题，抑或是二者兼而有之？马克思远未解决这个问题，以至于时至今日，这仍是个颇具争议的主题。再者，马克思对于经济学的研究主要涉及的是资本主义的竞争阶段。虽然他正确地预言了垄断的增长，但并未分析垄断的运动规律，更不用说帝国主义的运动规律了。当时，这个问题才刚刚进入马克思的研究视野，而今早已成为大多数现代马克思主义者论述世界经济体系的中心问题了。

在社会学方面，《共产党宣言》曾经把阶级对立加以简单化，宣称“整个社会日益分裂为两大敌对阵营，分裂为两大相互直接对立的阶级：资产阶

级和无产阶级”^[1]。然而在《剩余价值理论》中，马克思对中产阶级和非生产性服务业的增长所进行的研究，似乎提出了一个更为微妙、甚至连伯恩斯坦也会感到意气相投的观点。这些问题尚未得到澄清，因为众所周知，马克思打算界定阶级的尝试在《资本论》第三卷的结尾仍未完成。马克思在这个方面留下的一大空白则是关于农民的论述。鉴于西欧农民普遍持保守态度，马克思不无沮丧地谈到“农村生活中的白痴状态”，并认为农民在任何革命运动中充其量只能起一种从属的作用，也就不足为奇了。十分明显，随着马克思主义重心的东移，随着以农民为基础的中国革命的胜利（这一革命从任何意义上来说，都不是无产阶级革命），显然，马克思本人的思想观念同这种现实之间的联系就日益微乎其微了。

但是，马克思著作中最大的缺陷在政治学上。民族主义的持续存在及其实际增长，显然是马克思远未注意到的一种现象。尽管马克思曾对当时的一些政治事件作过有力的分析（如《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法兰西阶级斗争》、《法兰西内战》），但他并没有留下系统的国家理论。本来，他是要就这个专题写一部专著的。在马克思的理论遗产中，据他自己说，这本是他（也惟有他）能够圆满完成的惟一部分。基于这个原因，直至最近几年，马克思主义者才在关于资本主义国家的研究方面大大超过马克思本人。尤为重要的是，从实践的角度去看，马克思用不着去处理领袖、政党、群众这三者之间的关系问题，因为马克思在其中积极从事活动的组织，只有共产主义者同盟和第一国际，前者是一个只有几百个成员的宣传团体，后者是由各种政治派别和工会组织组成的松散联盟。群众性政党的时代是在马克思逝世之后出现的。虽然马克思曾宣称工人阶级的解放要由自己来实现，但事实却清楚地表明：从马克思本人起，工人阶级的领袖几乎无一例外地都是资产阶级出身。因此，任何人——不管是主张建立高度集权的“先锋队党”以领导工人（否则工人就会对政治抱有极不成熟的想法）的列宁主义者也好，还是主张政权应由工人大会直接授予的自由主义社会党人也好，都可以有恃无恐地宣称自己继承的是马克思主义的真正传统。

最后，还有马克思的哲学遗产问题。马克思在他的早期著作中，曾谈到要扬弃哲学。他的意思是说，基于哲学所提出的是理念原则和本质，而社会主义革命将会把这些理念原则或本质体现在社会一经济的现实中，因而在社会主义革命之后，哲学将失去其作用。然而，由于这一革命为期尚远，人们还不得不研究这些“给柏拉图作的脚注”，何况各个马克思主义政党人数不



断增加，也需要有一种作为具有融贯性原则体系的“哲学”，对宇宙作出全面的解释。鉴于19世纪末的文化风气，这种哲学不得不用科学的、甚至实证主义的术语来表述。虽然晚期马克思在其著作中已带有这种态度的一些痕迹，但使之成为一种体系形态的是恩格斯；而使之发挥到登峰造极地步的，则是共产党正统派所宣扬的辩证唯物主义哲学。卢卡奇率先重申了马克思思想中那些黑格尔的（因而是赤裸裸反科学的）因素，而马克思早期著作的出版则为此提供了可靠的依据。1930年以后，许多马克思主义者异乎寻常地突出了人道主义与异化这两个概念，接着又就“青年”马克思与“老年”马克思谁是真正的马克思的问题，展开了一场旷日持久的论战。如今，在西方马克思主义中，这一分歧又表现在法兰克福学派同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者之间的对立上。

[注释]

[1] K. Marx, *Selected Writings*, ed. D. McLellan (Oxford and New York, 1997) p. 222.

深入阅读材料

有关马克思的著作和第二手文献，相当详尽的关键性参考文献可见于麦克莱伦所著的《卡尔·马克思的生平和思想》(*Karl Marx: His Life and Thought*) (London and New York, 1995), 469~489页。



第一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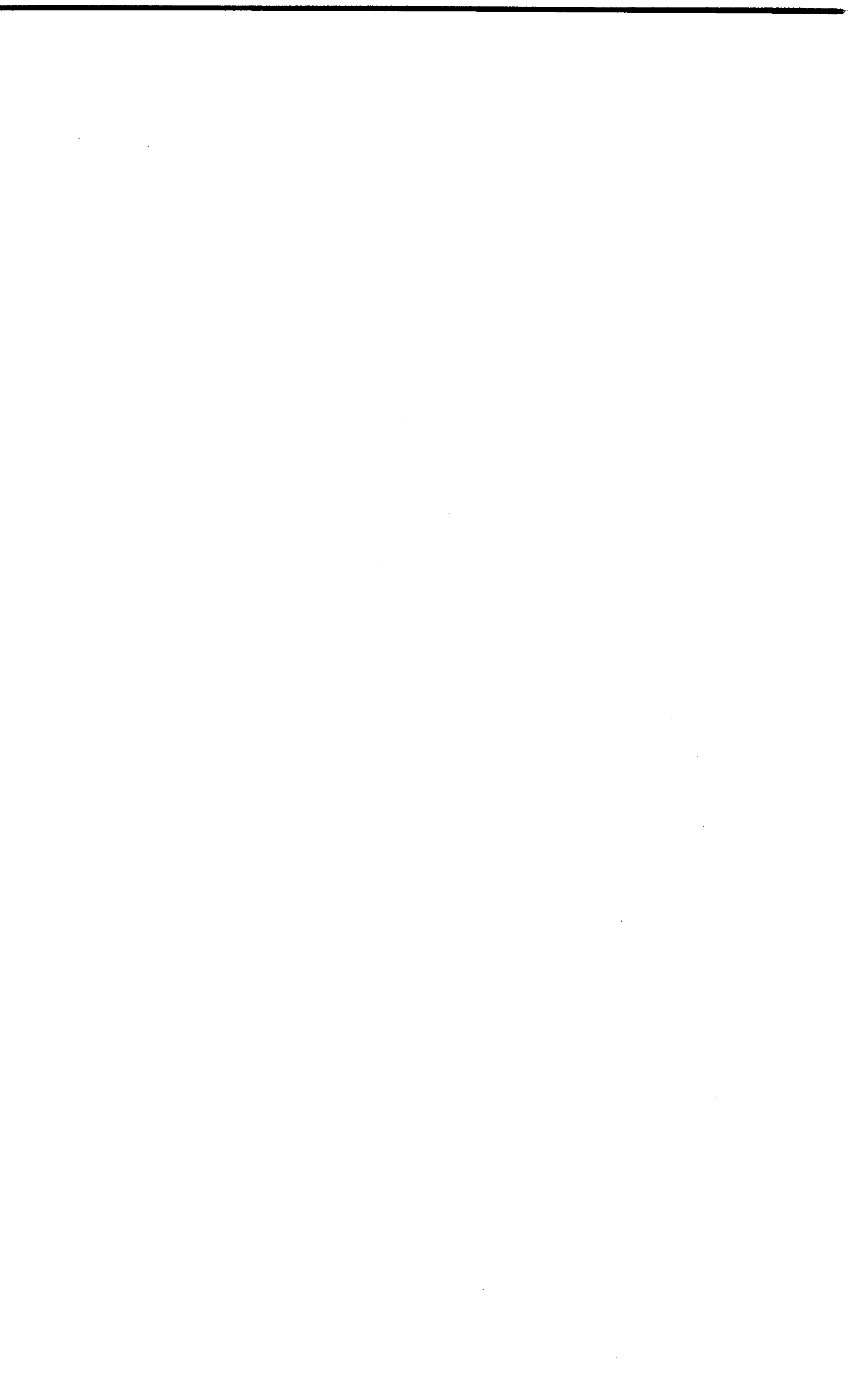
德国社会民主党人

正统的观念有一种伸缩性，能适应迥然不同的社会集团，并把它们统一在同一套术语内。但是，由不同的社会集团所持的正统观念的具体形态必然会有所不同，因为它们分别融入了这些集团各自的视点。

——奈杰尔·哈里斯 (Nigel Harris):
《社会中的信仰》 (*Beliefs in Society*)



马克思以后的马克思主义





第一章 恩格斯的贡献

马克思逝世以后，在解释他的思想方面，最有影响力的无疑是弗里德里希·恩格斯。人们认为，作为马克思的挚友和同事，他对马克思著作的意义和重要性有着权威性的独特见解。通过热忱的书信往来，他充任了新生的社会主义政党的忠实顾问，把惊人的渊博学识奉献给了整个社会主义运动。一般而论，恩格斯在两个不同方面发展了马克思的思想，这两个方面显然都与马克思原来的思路很不相同：第一，马克思主义最终被描绘成苏联（及其他国家）的辩证唯物主义教科书所体现的那种教条主义形而上学体系，这条道上最初几步是由恩格斯迈出的；第二，面对以革命党著称的德国社会民主党在议会民主中获得越

来越大的成功，恩格斯不得不作出了妥协、予以承认。

当然，马克思主义学说中的这些倾向在马克思逝世前就已有所滋长。尤其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之间曾有意识地实行过“脑力劳动分工”（马克思注重研究历史和经济学，恩格斯则侧重军事战略和自然科学）：自相识起，他们在方法论上就一直有着细微的差异。恩格斯是自学成才的，在德国古典哲学上缺乏深厚的学院式训练，而且他的工作生涯主要是在非常实际的工厂管理中度过的。甚至在他们分别为《共产党宣言》撰写的初稿中，比起马克思来，恩格斯更略微倾向于进化论和决定论^[1]；后来，恩格斯独特的兴趣领域又必然带来他在方法论上不同的侧重面^[2]。然而，必须牢记的是，在恩格斯阐发他的哲学观点的三部主要著作中，有两部是在马克思生前写成的。《自然辩证法》虽然到1925年才最终出版，但初稿在1873年就开始撰写了。《反杜林论》在德国社会民主党的《人民国家报》（*Volkstaat*）上连载前，恩格斯实际上把每一期都念给马克思听过^[3]。只有《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才是在马克思逝世以后写成的。

哲 学

大体有两个因素影响了恩格斯，使他形成了强烈倾向于科学的总的世界观。社会主义运动开展得越广泛，就越需要有一种明确的哲学表述来指导党员——尤其是在这个领域已并存有相互匹敌的体系之下。而且，很自然地，当时英国和德国越来越注重科学的方法论，这种趋势强烈地影响了恩格斯所提出的系统的哲学指导方针。另一个事实是，恩格斯曾把他生命中最后二十年的大部分时间用来钻研自然科学。恩格斯写道：自1870年退出商界以后，“我尽可能地使自己在数学和自然科学方面来一次彻底的——像李比希（Liebig）所说的——‘脱毛’。八年当中，我把大部分时间用在这上面。”^[4]这项研究是在同曼彻斯特化学教授卡尔·肖莱马（Karl Schorlemmer）这样的科学界朋友密切接触中进行的。这其中，以其特殊重大的意义触动了恩格斯的是：能量转化的发现、作为基本的生物转化单位的细胞的发现以及达尔文的进化论。这些兴奋点必然影响恩格斯对自己“世界观”的表述，使他特别强调唯物主义的自然观，而不是唯物主义的历史观。尤其值得指出的是，达尔文的发现给恩格斯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5]，使他遭到同代的马克思



主义者相当大的批评，指责他把生物学中的概念运用于社会。^[6]由此看来，恩格斯某些著作的阅读对象必然不仅是工人阶级中受过教育的成员，同样有科学家。的确，他深信“科学越是毫无顾忌和大公无私，它就越符合工人的利益和愿望”^[7]。除了受这种一般性影响外，恩格斯还不由自主地（背谬地）采纳了他的论敌的某些观点，特别在他的《反杜林论》中（虽然《自然辩证法》最初也是作为《反毕希纳论》而构思的）。杜林（Dühring）和毕希纳（Büchner）都是十足的——或者不妨说是极端粗陋的——唯物主义者。恩格斯尽管鄙弃杜林的“创造体系”，但在《反杜林论》的序言中仍宣称：“论战转变为……辩证方法和共产主义世界观的比较连贯的阐述”。^[8]鉴于杜林、毕希纳、福格特（Vogt）和海克尔（Haeckel）这类思想家提出的朴素唯物主义进化论观念在社会主义者中日益流行〔杜林的著作在出版时曾受到伯恩斯坦（Bernstein）和倍倍尔（Bebel）的热烈欢迎〕，恩格斯“为了不在……党内造成派别分裂和混乱局面的新的可能”^[9]，很想技高一筹，驳倒这种进化论，于是就只好提出了一种“更高级”形式的唯物主义一元论。

可以表明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方法论上的差异的，是恩格斯经常使用的“物质”这一概念，对马克思的著作来说，这一概念完全是“异己”的。^[10]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曾谈及“所有存在的物质性”，并说“物质及其存在的方式即运动都是不能创造的……因此是它们自己的终极原因”^[11]。然而同时，恩格斯又宣称他的唯物主义不同于“18世纪的纯粹形而上学的、完全机械的唯物主义……同这种自然观相反，现代唯物主义概括了自然科学的新近的进步……”^[12]。在《自然辩证法》中，恩格斯进一步努力将自己与机械唯物主义区别开来，并附和了一种与谢林（Schelling）及其同时代的“生命力”论者那样的德国浪漫派哲学家有密切关系的物质观。这种观点给物质蒙上一层看似隐蔽的精神化色彩之类的东西。因为，虽然恩格斯说他的观点“根本不再是什么哲学，而只是一种必须在实际科学中确立和证实自身的世界观（Weltanschauung）”，但由于他宣称发展出能思维的生物是物质的本性，因而，他还是把某种深刻的目的论因素引入到自己的思想中了。^[13]

对恩格斯的唯物主义而言，最核心的一点是他对黑格尔的理解。恩格斯晚年认为，黑格尔是一位“最伟大的天才”思想家，他“对自觉的辩证的自然科学的关系，同空想主义者对现代共产主义的关系是一样的”^[14]。的确，在老年黑格尔创造体系的做法与恩格斯在自然科学的基础上使马克思主义体

系化的倾向之间有某些类似之处。恩格斯像马克思一样把黑格尔“倒转过来”，但得出的结果却不是对于哲学的扬弃加实现（abolition-plusrealisation），而这种扬弃加实现正是他们在19世纪40年代的思想特征。在恩格斯那里，哲学可以有实现和付诸实践的内容这一观念是不存在的，因为恩格斯预期有一天，“在以往的全部哲学中仍然独立存在的，就只有关于思维及其规律的学说——形式逻辑和辩证法。其他一切都归到关于自然和历史的实证科学中去了”^[15]。恩格斯的目标是要建立一门像黑格尔体系那样包罗万象的、自成体系的唯物主义。如果说恩格斯的体系主要是以“物质”代替“精神”作为绝对物，这恐怕不能说是过分简单化的评价。

恩格斯认为，黑格尔最重大的贡献在于，他是第一个明确阐明辩证法基本规律的思想家。这些规律基本上可以归结为三条：“量转化为质和质转化为量的规律；对立面的相互渗透的规律；否定的否定规律。”^[16]显然，只有在极含糊的意义上，这些才可以称作“规律”。（值得注意的是，它们并不是用阐述规律的典型格式表达的，即“一切量若增加到足够程度，就会发生质的变化”。）例如，要识别什么是正题、什么是反题，就很困难。^[17]而对这些规律的启发、指导性，恩格斯的理解也是模棱两可。有时，他给人的印象是，辩证思维不过是对于自然界不存在严格的、不可逾越的分界线的一种意识。^[18]恩格斯为马克思辩护，对杜林指责马克思是借助辩证法规律推论出资本主义的起源和命运的说法进行了驳斥。他说：“相反地，他在历史地证明了这一过程部分地实际上已经实现、部分地还一定会实现以后，才又指出，这是一个按一定的辩证规律完成的过程。”^[19]但与此同时，恩格斯会谈论这些规律的“证明”（他似乎是指“例证”），并且把辩证法描绘成“探寻新结果的方法”^[20]，而不简单地是对自然科学结果的一套极其一般性的（据此，有人会说，这几乎是多此一举）概括。^[21]

恩格斯的认识论是他的唯物自然观的组成部分。在恩格斯看来，人对外部世界的认识是“映象”^[22]，或是“对现实的事物和过程或多或少抽象的反映”^[23]，概念“只是现实世界的辩证运动的自觉的反映”^[24]。同时，恩格斯绝不愿完全舍弃理论与实践统一的原理。的确，似乎有点背谬的是，这个原理最精辟的表述——马克思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是由恩格斯作为他自己的《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一书的附录首次发表的；然而，恩格斯关于“实践”到底包含些什么内容的思想有时却显得很贫乏，例如他曾把它概括为“实验和工业”^[25]。

历史

恩格斯对马克思主义思想发展的第二个主要贡献，是他对历史唯物主义的解释和他对历史的研究。像大多数第二国际的理论家一样，恩格斯在历史方面比在哲学方面强一些。如果说马克思想要改变世界，而恩格斯旨在解释世界，这种说法虽有过于简单之嫌，但还是包含了某些真理。恩格斯对历史的研究不同于马克思，不大直接涉及政治。诚然，马克思在晚年确实对原始社会发生了兴趣，并从路易斯·摩尔根（Lewis Morgan）的《古代社会》一书中作了大量的摘录，但正是恩格斯把这些笔记变成一本完整的著作——《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26]

恩格斯这本书引人注目的独到之处是，它使社会主义者注意到，在原始社会里两性关系和生产关系在某些方面有可能更优越一些。这本书尤其对妇女解放的研究作出了重大的贡献，并得到了倍倍尔的大力辅助。后来，倍倍尔就相关课题展开了进一步的研究，写出了颇为流行的著作——《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妇女》（1883年）。然而，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因过分依赖摩尔根而大为逊色，摩尔根的那种达尔文主义的进化观使恩格斯提出了一种过于一般化（普遍化）的进化图式（尤其是考虑到他几乎完全忽略了亚洲和非洲的情况）。而且，既然摩尔根关于原始杂交、群婚以及母系氏族先于父系氏族的观点都是极其可疑的，那么，据此论述家庭的一节成为这本书最薄弱的一部分，就不足为奇了。更难以理解的是，恩格斯对种的生产（人类的繁衍）与生存资料的生产这两个方面提出了严格的二分法划分。这表现在，他认为一夫一妻制是不以自然条件、而以经济条件为基础的第一种家庭形式；还表现在，他把蒙昧和野蛮社会的自然选择与后来才出现的新的社会力量加以对比——这一切似乎对经济现象和社会现象作出了最为非马克思主义的划分。^[27]于是，恩格斯似乎认为，原始社会不像文明社会那样在同样的意义上受着经济因素的影响，并且显然比马克思更单线性地描述社会的发展。

当然，恩格斯在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表述中，如果有什么问题的话，确实是对经济因素的作用强调得不够。这里，部分的原因是：他写作的对象是这样一些马克思主义者，他们把对马克思的过于简单化的解释应用于历史而

陷入困境，因此，他力图反驳当时非马克思主义者对这个理论的这种粗糙表述所提出的尖锐批评。

恩格斯承认，“青年们有时过分看重经济方面，这有一部分是马克思和我应当负责的。”^[28]他本人的立场是：

根据唯物史观，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无论马克思或我都从来没有肯定过比这更多的东西。如果有人在这里加以歪曲，说经济因素是惟一决定性的因素，那么他就是把这个命题变成毫无内容的、抽象的、荒诞无稽的空话……这里表现出这一切因素间的相互作用，而在这种相互作用中归根到底是经济运动作为必然的东西通过无穷无尽的偶然事件（即这样一些事物和事变，它们的内部联系是如此疏远或者是如此难于确定，以致我们可以认为这种联系并不存在，忘掉这种联系）向前发展。^[29]

总的说来，恩格斯的论述可归结如下：上层建筑是从经济基础中产生的，偶尔是与经济基础平行发展的；上层建筑能够有相对独立性以及它自己特有的结构和规律；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之间存在着交互作用；在某些情况下和一定时期内，上层建筑甚至能决定经济基础的发展；但是归根到底，上层建筑是由经济基础决定的。恩格斯的表述中的新颖之处是交互作用的理论。这个理论是用类似于化学分子相互作用的说法表达的，与《自然辩证法》中的一些段落有着有趣的相似之处。^[30]恩格斯认为：“到目前为止的历史总是像一种自然过程一样地进行，而且实质上也是服从于同一运动规律的。”^[31]他把经济“因素”与其他因素对立起来的说法，有可能把社会过程分割成几个彼此独立的部分，并为以后关于修正主义的论战准备了理论框架。

政 治 学

这种较少辩证法色彩的理论研究方法，所带来的必然是更多地从实际问题中推导出来的结论。恩格斯的《论权威》一文便是把某种技术性的方法发挥到极致的一个典型例子。他在该文中把革命后社会的必要的纪律与当时工



厂通行的纪律作了比较。起码从 1847 年写《共产主义原理》以来，他在思想上就存在着倚重非主观因素的倾向，从而使他常常对资产阶级国家采取比较温和的态度。他倾向于避免强调国家机器必须打碎的思想，而认为共和国是“无产阶级将来进行统治的现成的政治形式”^[32]。在此，他关于向共产主义过渡的观点很值得予以详尽引证：

当不再有需要加以镇压的社会阶级的时候，当阶级统治和根源于至今的生产无政府状态的个体生存斗争已被消除，而由此二者产生的冲突和极端行动也随着被消除了的时候，就不再有什么需要镇压了，也就不再需要国家这种特殊的镇压力量了。国家真正作为整个社会的代表所采取的第一个行动，即以社会的名义占有生产资料，同时也是它作为国家所采取的最后一个独立行动。那时，国家政权对社会关系的干预在各个领域中将先后成为多余的事情而自行停止下来。那时，对人的统治将由对物的管理和对生产过程的领导所代替。国家不是“被废除”的，它是自行消亡的。^[33]

这个关于国家“消亡”的观点，纯粹是从生物学中借用的一种比喻说法——连同它的一切内涵。^[34]

恩格斯对科学研究的一般倾向，产生出把科学和政治这两者对立起来的二分法：“你是‘科学家’，你就没有理想，你就去研究出科学的结论，如果你又是个有信念的人，你就为实现这些科学结论而战斗。但是，如果你有理想，你就不能成为科学家……”^[35]恩格斯被迫在一种与德国社会民主党的领袖们彼此深深的隔绝中生活，这种环境使他不能施展他那作为一个实践的政治家的卓越非凡的才能。到了晚年，社会民主党人在选举中节节获胜，使得恩格斯更多地偏重于马克思主义的改良方面、而不是其革命的方面；并且，他宣布，1848 年的策略在各方面都已过时了。就在 1895 年他逝世前不久，在为马克思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重版所写的“导言”中，他还声明，社会民主党的成长“是自发地发生的，经常不断地发生的，不可抑制地发生的，并且是安然自在地发生的，正如自然界中发生的某种过程一样”。接着，他写道：

我们在现在就已能指望拥有 225 万选民。如果这样继续下去，我们

在本世纪末就能夺得社会中等阶层的大部分，小资产阶级和小农，发展成为国内的一个决定力量，其他一切势力不管愿意与否，都得向它低头。我们的主要任务就是毫不停手地促使这种力量增长到超出政府统治制度所能支配的范围，不是要把这个日益增强的突击队在前哨战中消灭掉，而是要把它好好地保存到决战的那一天。只有一种手段才能把德国社会主义战斗力量的不断增长过程暂时阻止住，甚至使它在一个时期内倒退——这就是使它跟军队发生大规模冲突，像1871年那样在巴黎流血。这终究也会被征服的。要把一个人数以数百万计的政党从地面上消灭是不可能的，即使用欧洲和美洲所有的连发枪都是做不到的。但是这会阻碍正常的发展进程，我们临到危急关头时也许就会没有突击队，决定性的搏战就会延迟、拖远并且要求付出更大的牺牲。^[36]

这些话被看作是恩格斯的“政治遗嘱”，无疑对德国社会民主党的领导人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尽管应当指出的是，恩格斯曾在当时柏林统治者的压力下，也（极其勉强地）同意删去一些较革命的段落。^[37]不过，无论如何可以这样讲：在就马克思的政治学说是否需要根据情况的变化加以修正而展开的那场大论战中，恩格斯这种颇为矛盾的立场为交战双方都提供了弹药。

〔注释〕

[1] 参见 H. Bollnow, 'Engels' Auffassung von Revolution und Entwicklung in seinen "Grundsätzen des Kommunismus", 1847', *Marxismusstudien* (Tübingen, 1954)。

[2] 关于马克思与恩格斯之间差异的探讨，参见 D. Hodges, 'Engels's Contribution to Marxism', *Socialist Register*, ed. R. Miliband and J. Savile (London, 1965); A. Gamble and P. Walton, *From Alienation to Surplus Value* (London, 1971) pp. 51ff.; I. Fetscher, *Marx and Marxism* (New York, 1971) pp. 162ff.; R. DeGeorge, *Patterns of Soviet Thought* (Ann Arbor, 1966) pp. 77f; 尤其可参阅 M. Rubel 为 K. Marx, *Oeuvres*, vol. 3 (Paris, 1975) 所写的导言。

[3] 这方面的证据来自 1885 年马克思逝世后出版的《反杜林论》第 2 版序言。

[4] F. Engels, *Anti-Dühring* (Moscow, 1954) p. 15.

[5] 参见 E. Lucas, 'Marx' und Engels' Auseinandersetzung mit Darwin',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Social History*, vol. 9, 1964.

[6] 参见 L. Krader, 'The Works of Marx and Engels in Ethnology Compared', *In-*

ternational Review of Social History, 1973, p. 243.

[7] F. Engels, *Ludwig Feuerbach*... (Moscow, 1946) p. 60.

[8] F. Engels, *Anti-Dühring* (Moscow, 1954) p. 13.

[9] *Ibid.*, p. 99.

[10] 但对约瑟夫·狄慈根的著作来说,并非如此;“辩证唯物主义”这个术语最早就源自于他,恩格斯对他的著作也表示了极大的赞许。

[11] F. Engels, *Anti-Dühring* (Moscow, 1954) pp. 71ff.

[12] *Ibid.*, p. 31.

[13] 参见 F. Engels, *Dialectics of Nature* (Moscow, 1954) p. 209。恩格斯还认为,当太阳逐渐冷却时,所有的行星都要落回到太阳中去,这个过程是循环的。但这并非宇宙的末日,因为物质将再次开放出最美的花朵——“思维着的理性”(同上书,39页)。

[14] *Ibid.*, p. 17.

[15] *Ibid.*, p. 32.

[16] *Ibid.*, p. 62.

[17] 参见 R. Cooper, *The Logical Influence of Hegel on Marx* (Washington, 1925) pp. 103ff。该书从历史的角度对这个问题作了评价不足的探讨。

[18] 例如,参见 F. Engels, *Anti-Dühring*, p. 19。还可参阅: G. Stedman Jones, 'Engels and the End of Classical German Philosophy', *New Left Review*, 79 (1973) pp. 28ff。

[19] F. Engels, *Anti-Dühring*, p. 152.

[20] *Ibid.*, p. 153.

[21] 对恩格斯辩证法的含义和潜在的重要性的详细分析,参见 S. Hook, *Reason, Social Myths and Democracy* (New York, 1940) pp. 183ff。就捍卫、并应用恩格斯的方法所作出的尝试,见 M. Kosok, 'Dialectics of Nature', in *Towards a New Marxism*, ed. B. Grahl and P. Piccone (St Louis, 1973)。

[22] F. Engels, *Anti-Dühring*, p. 30.

[23] *Ibid.*, p. 47.

[24] F. Engels, *Ludwig Feuerbach*... (Moscow, 1946), p. 54。另参见,例如, Engels to C. Schmidt, K. Marx, F. Engels, *Selected Correspondence* (往后缩略为 MESC) (Moscow, 1965)。

[25] F. Engels, *Ludwig Feuerbach*... (Moscow, 1946), p. 24。另一颇为不同的版本,见 *Dialectics of Nature*, p. 231。

[26] 马克思对原始社会的政治方面更感兴趣的证据,参见 E. Lucas, 'Die Rezeption Lewis H. Morgans durch Marx and Engels', *Saeculum*, 1964。而相关的、更为概括

性的证据, 见 L. Krader, Introduction to *The Ethnological Notebooks of Karl Marx* (Assen, 1972)。

[27] 一般情况可参见 E. Leacock 为该书 (New York, 1973) 写的导言。关于恩格斯的国家观的不良影响, 参见 L. Colletti, *From Rousseau to Lenin* (London and New York, 1972) pp. 105ff。

[28] Engels to Bloch, *MESC*, P. 418.

[29] Engels to Bloch, *MESC*, P. 417.

[30] F. Engels, *Dialectics of Nature* (Moscow, 1972) p. 231. 在此, 他说: “相互作用是我们从现代自然科学的观点考察整个运动着的物质时首先遇到的东西……相互作用是事物的真正的终极原因。”

[31] Engels to Bloch, *MESC*, P. 418.

[32] Engels to Lafargue, *MESC*, P. 472. 同时可参见 Engels to von Patten, *MESC*, P. 363, 在此, 恩格斯特别提到《共产党宣言》第二章末尾的一段话, 而他和马克思在 1872 年德文第二版序言中已宣布那段话过时了。

[33] F. Engels, *Anti-Dühring* (Moscow, 1954) p. 315.

[34] 马克思从未用过这一表述 (absterben), 宁愿用更直接的“废除” (abschaffen)。

[35] F. Engels, *Correspondence with Paul and Laura Lafargue* (Moscow, 1959) vol. 1, p. 234.

[36] F. Engels, in *Karl Marx-Frederick Engels: Selected Works (MESC)* (Moscow, 1962) vol. 1, pp. 135f.

[37] 请进一步参阅 H.-J. Steinberg, ‘Revolution und Legalität. Ein unueröffentlicher Brief Engels an Richard Fischer’,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Social History* (1967) 与 C. Elliot, ‘*Quis custodiet sacra? Problems of Marxist Revisionism*’,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Ideas*, 28 (1967) pp. 73ff.

深入阅读材料

原著

一部英文版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正在编辑中, 将由伦敦的劳伦斯与威沙特公司 (Lawrence & Wishart) 和纽约的国际出版商公司同时出版发行。这部著作总共要出 50 卷。迄今, 已出版到 19 世纪 40 年代末以前的各卷。全部出齐尚需 10 年。

惟一一部英文版恩格斯著作选集是由 W. O. 亨德森 (W. O. Henderson) 编辑的《恩格斯著作选》。有数种马克思和恩格斯著作合编本, 其中最常见的也许要数莫斯科版的

《选集》。该《选集》的优点是选录完整，包括《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和《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的全文以及《反杜林论》的重要章节。另外较为简短的摘编分别有费尔（Feuer）和塔克尔（Tucker）的选本。莫斯科还出版了马克思与恩格斯《论宗教》、《论爱尔兰》、《论英国》与《论文学与艺术》等诸多的专辑。

劳伦斯与威沙特公司和纽约的国际出版商公司分别翻译、出版了《反杜林论》，《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自然辩证法》与《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的单行本。后者的版本还载有由埃莉诺·利科克（Eleanor Leacock）所写的重要导言。恩格斯有关1848—1849年德国革命的文章已由埃莉诺·马克思所编辑出版，标题为“1848年德国的革命与反革命”。恩格斯关于军事题材的论述《军事批评家恩格斯》由W.O. 亨德森和O. 查洛纳（O. Chaloner）合编。这两位编者还编辑出版了《英国工人阶级的状况》的新译本。该版本的评注对恩格斯持严厉的批评态度。与此相反的态度，请参见潘瑟（Panther）的版本，它附有霍布斯鲍姆（Hobsbawm）写的“导言”。

评论

S. 马库斯（Marcus）从文学和心理学的角度，撰写了一篇关于恩格斯的《英国工人阶级的状况》一书的评论——《恩格斯、曼彻斯特与工人阶级》。在各种传记中，有古斯塔夫·迈耶尔（Gustav Mayer）所著的《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缩写本，与他所著的德文版两卷本的传记相形见绌，这个两卷本是迄今所能见到的最好的传记版本。相比而言，格雷斯·卡尔顿（Grace Carlton）的《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幽灵般的预言家》就显得很单薄。俄国出的英文版《弗里德里希·恩格斯传》内容详尽，但却是一个极端偶像化的典型，东德出版的《弗里德里希·恩格斯传》也是如此。最近，有W.O. 亨德森的两卷本《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生平》面世，这部传记以个人事迹和史实见长，但通篇对恩格斯缺乏同情，实际上并没有把他作为一个理论家来评价。关于恩格斯晚年的个人生活，也可参见Y. 卡普（Y. Kapp）的《埃莉诺·马克思：多事之秋》。麦克莱伦的“现代名人录”系列里有一个短篇——《恩格斯》。克里斯特·阿瑟（Christ Arthur）有关恩格斯的世纪巨卷是上乘之作。

参考文献

Texts

Karl Marx-Frederick Engels: Collected Works (London, 1975).

Karl Marx-Frederick Engels: Selected Works, 2 vols (Moscow, 196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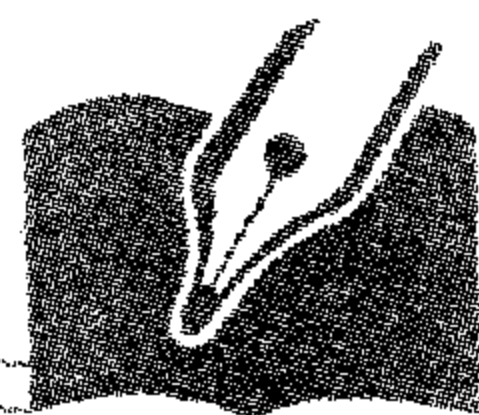
Marx and Engels: Basic Writings on Politics and Philosophy, ed. L. Feuer (New York, 1959).

Marx-Engels Reader, ed. R. Tucker (New York, 1972).

- Engels: Selected Writings*, ed. W. O. Henderson (London, 1967).
Engels as Military Critic, ed. W. O. Henderson and O. Chaloner (London, 1959)
Frederick Engels, *Anti-Dühring* (Moscow, 1954).
—*The Condition of the Working Class in England*, ed. W. O. Henderson and O. Chaloner (Oxford, 1958).
—*The Condition of the Working Class in England*, Introduction by Eric Hobsbawm (London, 1969).
—*Dialectics of Nature* (Moscow, 1972).
—*Ludwig Feuerbach and the End of Classical German Philosophy* (Moscow, 1946).
—*The Origin of the Family, Private Property and the State*, ed. With an Introduction by Eleanor Burke Leacock (London, 1972).
—*The Peasant War in Germany* (Moscow, 1965).
—*Revolution and Counter-Revolution in Germany in 1848*, ed. Eleanor Marx (London, 1971).

Commentaries

- Chris Arthur, *Engels Today: A Centenary Appreciation* (London, 1996).
Grace Carlton, *Friedrich Engels: The Shadow Prophet* (London, 1965).
Heinrich Gemkow et al., *Friedrich Engels: A Biography* (Dresden, 1972).
W. O. Henderson, *The Life of Friedrich Engels*, 2 vols (London, 1976).
L. F. Ilyichov et al., *Friedrich Engels: A Biography*, trans V. Schneierson (Moscow, 1974).
Yvonne Kapp, *Eleanor Marx*, vol. 2, *The Crowded Years* (London, 1976).
David McLellan, *Engels* (London and New York, 1977).
Steven Marcus, *Engels, Manchester and the Working Class* (New York, 1974).
Gustav Mayer, *Friedrich Engels: A Biography*, trans. G. and H. Highet and ed. R. H. S. Crossman (London, 1936).
Fritz Nova, *Friedrich Engels: His Contribution to Political Theory* (London, 1967).
John Plamenatz, *German Marxism and Russian Communism* (London, 1954).
Gareth Stedman Jones, 'Engels and the End of Classical German Philosophy', *New Left Review*, 79 (1973).
— 'Engels and the Genesis of Marxism', *New Left Review*, 106 (1977).



第二章 与修正主义的论战

马克思主义在德国以外的传播

与修正主义的论战的范围是由马克思主义传播的范围所限定的。因此，这场论战主要是在德国展开的，其次是在奥地利和俄国。考茨基对比利时社会党领袖王德威尔德（Vandervelde）的如下评论，也同样适用于法国和意大利：

对于他们搞修正主义的说法，我却不以为然。他们并没有修正什么，因为他们本来就没有什么理论。修正主义者想要把马克思主义归结为某种折中的、庸俗的社会主义，

而连这种社会主义，离他们（比利时人）也很远，甚至他们还没开始提出来呢。普鲁东（Proudhon）、谢夫莱（Schäffle）、马克思——在他们看来都一样；情况一向如此，在理论上，他们谈不上有什么倒退，那我也没有什么可指责他们的了。^[1]

19世纪60年代以来，意大利的工人运动基本上处于无政府状态。只是到了19世纪90年代，随着一个不断壮大的社会主义政党的形成，马克思主义才开始产生影响。不过，这个党仍“十分软弱，观点十分混乱”^[2]，缺少牢固的工业基础，且不断受到无政府工团主义者的威胁。在19世纪90年代，该党设法吸引了几位知识分子，其中有一位哲学教授安东尼奥·拉布里奥拉（Antonio Labriola），他在经历了青年黑格尔主义时期后，于1894年成为一位马克思主义者。尽管拉布里奥拉倾向于把马克思主义仅仅视为一种方法（因此，马克思主义似乎可以与其他哲学流派兼容、并存），但在恩格斯逝世不久的那些年，他仍可算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各国诠释者中最好的一位了。^[3]在他的经典著作《唯物史观论丛》中，他反对对马克思主义作实利主义（注重物质利益、追求物质享受的哲学——译者注）的解释；并作为葛兰西和卢卡奇的前驱，使一种反实证主义的和历史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在意大利受到欢迎。但他是孤独的。另一位惟一享有国际声誉的意大利社会主义者贝内德托·克罗齐（Benedetto Croce）其实根本就不是社会主义者，他终生都是个自由主义的黑格尔派。克罗齐感兴趣的是他所认为的马克思主义的洞见，而并不把马克思主义视为一种可以预见既定的社会发展道路的理论。因此，他拒绝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观念，他批评马克思的经济学、尤其是他的价值学说，转而强调社会主义的伦理方面。^[4]

在法国，有三大因素阻碍了修正主义运动的出现。首先，关键性的对立是发生在社会主义与工团主义之间，而不是发生在各种不同的马克思主义之间。在德国，工会在1878—1890年“反社会党人法案”期间遭到镇压，党反倒被许可通过选举发挥作用，并由此成为左右局势的力量；在法国，工会则逃脱了这种政治的控制。其次，总的来说，法国运动的领导集团从来就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法国同意大利、西班牙一样，只有经济的缓慢增长，缺少德国特色的那种现代产业工人阶级的基础。第三，法国的马克思主义者无人真正关心经济学，而经济学恰恰是与修正主义的论战的焦点之一。



惟一有组织的马克思主义者们是朱尔·盖德 (Jules Guesde) 的追随者，他们聚集在小小的法国工人党内。虽然最初他们强调革命的原则，但在理论上却很薄弱，以至于不得不在很大程度上依靠拉法格 (Lafargue)，用一种异常肤浅的方式去宣传马克思的思想。^[5] 马克思关于他本人不是马克思主义者的名言，^[6] 就是受到法国那些自称是他的追随者们的启发。无疑，在那里，很少有人读过马克思的著作，不要说原著，就连译本也少有人问津。在 1893 年选举中当选的 37 名社会主义代表里，盖德的法国工人党只有 6 人，其余的代表分属于另外 4 个拥有相当数量独立分子的党派。但随着 1893 年议会选举的成功，法国工人党立即成了“修正主义者”。它致力于与其他社会主义政党在议会中的合作，致力于通过和平方式实现社会主义，甚至（为了竭力争取选票）修改了自己的纲领，使之为中农所接受。1905 年统一的工人国际法国支部 (SFIO) 成立后，所有“马克思主义的”领袖们都成了改良主义的社会主义者。阻碍正统派与修正主义者之间发生争论的另一原因，是让·饶勒斯 (Jean Jaurès) 所起的作用。他在 1914 年遇刺前，控制法国左派政治力量长达 20 年之久。饶勒斯倾向于使理论服从于一时的策略需要。把他描绘成一位革命民主派是最恰当不过的了，因为无疑，他几乎比他所有同时代的“马克思主义者”更具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精神”。不过从思想倾向上说，饶勒斯却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他的思想与特定的阶级无关，而充其量是要建立一个共和政体，它脱胎于唯心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他仅指法国 18 世纪的唯物主义）在伦理基础上的统一。

德国修正主义的起源

可以明确地说，19 世纪 80 年代，即便在德国，马克思主义思想的传播也并不十分广泛。1875 年，两个党派在哥达联合组成了德国社会民主党 (*Sozialistische Partei Deutschlands*, SPD)，其中一派强烈坚持由其缔造者斐迪南·拉萨尔 (Ferdinand Lassalle) 所倡导的国家社会主义（在 19 世纪七八十年代，拉萨尔思想在德国社会主义者的圈子中仍然发挥着支配性的影响）；另一派，即马克思的追随者李卜克内西 (Liebknecht) 和倍倍尔 (Bebel) 领导的所谓爱森纳赫派 (Eisenach)，则几乎没有什么马克思主义的成分，尽管相反地，马克思本人对它持乐观态度。起初，马克思思想的传

播进度如此缓慢，以至于曾有人统计说，直到1880年，德国也才有五个人深刻地理解了马克思的经济学。^[7]也许，姑且除了埃卡利斯（Eccarius）和狄慈根（Dietzgen），《资本论》在德国工人阶级中并没有留下什么印象。直到19世纪80年代末，马克思主义才最终成为德国社会民主党中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这得力于两个因素。首先，1879—1890年的“反社会党人法案”不可避免地激化了左翼反政府的活动，同时，它看来也揭穿了拉萨尔式社会主义的虚伪性，后者显然没有得到其社会主义方案中所信赖的国家的支持。相反，19世纪80年代的经验似乎确证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是统治阶级的工具的观点。其次，日益壮大的党需要一种意识形态，而除了马克思主义之外，简直就没有别的自成体系的替代理论了。马克思主义者在党的理论斗争中也占据了核心位置。伯恩斯坦（Bernstein）自1881年起就担任党报《社会民主党人》（*Sozialdemokrat*）的编辑，而考茨基（Kautsky）于马克思逝世的那年——1883年——创办的《新时代》（*Die Neue Zeit*），也始终不渝地在涉及党的利害关系的一切问题上发表马克思主义者的见解；作为帝国议会（Reichstag）的议员，倍倍尔则以其实践型政治家和组织者的杰出天才，施展了相当重大的影响力。到19世纪80年代末，人们愈来愈达成共识，拉萨尔主义及早先的洛贝尔图斯（Rodbertus）的通俗经济学在马克思主义批评者的批判声中已经名声扫地了。1887年右翼脱党，这就敞开了一条道路，使得1891年（“反社会党人法案”废止后）在爱尔福特召开的第一次党代表大会上，有可能把马克思主义的一种简单化了的形式尊为党的官方意识形态。“爱尔福特纲领”分为两个极不统一的部分，它预示了党在方针上将要发生分裂。纲领的一部分是理论，由考茨基负责制定；另一个关于实践的部分，则由伯恩斯坦起草。前一部分重申了垄断的趋势、中产阶级的衰落、无产阶级的贫困化，以及无产阶级社会内生产资料社会化的必然性等传统学说；后一部分则包括这样一些近期目标和要求，诸如普选权、言论自由、免费教育和累进所得税。但这种过于简单化的马克思主义刚刚在德国社会民主党内获胜，需要修正它的建议就提出了。正如奥托·鲍尔（Otto Bauer）所言：“修正主义理论不是别的，而是对庸俗马克思主义的一种补充，是马克思的学说在首次深入到对它还没有准备的越来越广泛的阶层时所必然表现出的贫困化。”^[8]这个修正主义的领头辩护士就是爱德华·伯恩斯坦。

伯恩斯坦是柏林一位铁路工程师的儿子，1872年入党，并随即成为党报的主要撰稿人之一。“反社会党人法案”迫使他侨居英国，以便能够继续

从事活动。伯恩斯坦侨居英国的那段时期对其马克思主义观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9]虽然伯恩斯坦本人表示，认为他受费边社影响的观点是“完全错误的”^[10]，但几乎所有德国社会民主党的领导人——包括恩格斯和倍倍尔在内——都认为，不言自明的是，诚如罗莎·卢森堡（Rosa Luxemburg）所言：“伯恩斯坦是依据在英国所得出的各种关系而构筑起他的理论的，他是戴着英国眼镜看世界的。”^[11]而且，费边派自身也认同这样一种看法。伯恩斯坦初去英国时，确曾批评过费边派的许多理论，但到19世纪90年代，他的观点就非常接近后者了。

从1891年到1893年期间，伯恩斯坦明显地向某种修正主义的方向演变，但直到恩格斯逝世，这场争论才爆发起来。1895年，伯恩斯坦写了一篇论1849年法国革命的文章。（当时的社会主义者们像当代马克思主义者对待1917年革命那样，习惯于对1848年革命作出评论，并置身于其中）伯恩斯坦的观点同马克思在《法兰西阶级斗争》中的观点几乎截然相反。在伯恩斯坦看来，六月的日子搞的是毫无必要的冒险主义，他宁愿要路易·勃朗（Louis Blanc），不要布朗基（Blanqui）；而且，这两人观点的对照蕴涵了1895年的一些教训。伯恩斯坦在1896—1898年间的《新时代》上写了题为《社会主义问题》（*Probleme des Sozialismus*）的一组文章，系统地来阐述这些教训。这些文章后来便扩展为伯恩斯坦最重要的一部著作，它于1899年出版，并冠以冗长的书名——《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Die Voraussetzungen des Sozialismus und die Aufgabe der Sozialdemokratie*）。当然，早在伯恩斯坦开始产生这些思想以前，德国社会民主党内就已产生出了改良主义倾向，它是由福尔马尔（Vollmar）和大卫（David）这样一些著作家表述出来的。在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知识领导层中引起反对的是这样一个事实：伯恩斯坦的修正主义是自己声称的、系统的和带有根本性的——至少在主观意图上是如此。^[12]伯恩斯坦（同考茨基一起）也被看作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继承者，捍卫传统的重任就落在了他的肩上（他曾与倍倍尔一同是恩格斯指定的遗嘱执行者）。因此，对伯恩斯坦的新潮观点回应如此之慢，太令人不可思议了。考茨基出于对伯恩斯坦个人的忠诚，直到1898年夏天才肯公开地批评他。其实，考茨基本人也同意某些形式的修正是必要的，甚至鼓动伯恩斯坦对之加以补充：“你已推翻了我们的策略、我们的价值理论、我们的哲学；现在就全靠你构思的新思想去取代旧思想了。”^[13]只是在伯恩斯坦的意图是如此偏激这一点真正暴露以后，对立交才开

始尖锐起来。此外还有一个事实，尽管伯恩施坦希求的是体系化，但他基本上是个折中主义思想家。1895年，他写道：“我们都或多或少地是社会主义的折中主义者。”^[14]这一评语用之于他是再合适不过的了。他还写道：“系统的思想和逻辑的推演对我来说不堪重任”^[15]，而这一点使人难以连贯地勾勒出他整个思想的轮廓。

在详细地考察这些见解之前，有必要简短地说明一下与修正主义者激烈论战借以发生的社会政治背景。伯恩施坦的著作的标题很重要，因为他自认为在重新制定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理论前提，并使之符合已改造过的实践。在他看来，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策略多少是改良主义的，在此，他认为可以求助于恩格斯1895年为《法兰西阶级斗争》所写的“导言”，以获得支持，而他的任务就是使理论与实践中的这种改良主义协调起来。当德国社会民主党更为强大时，行政的和官僚主义的成分也在严重增长，直至最终成为决定性的因素。^[16]虽然令人惊奇的是，党员仍保持着清一色的无产阶级成分，但代表们（主要是律师和新闻记者）却大都是积极分子的右翼，而且他们过多地代表了较保守的农村地区；而最重要的是，把大量的精力投注到表决机器的极大成功上，必定使党偏离更为革命的目标。工会没有直接参加修正主义论战（它们没有时间关心任何一种理论），但它们无疑同情修正主义者的渐进主义。从这一角度来看，德国社会民主党从来就不是一个地道的“马克思主义的”政党，而理论上的争论也往往只限于其知识分子领导层的范围之内。

在这种情况下，伯恩施坦的观点能获得相当广泛的支持就不足为奇了。这些观点的主要批评者是卡尔·考茨基。考茨基1854年出生于布拉格，他认识马克思。人们普遍认为，他和伯恩施坦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直接“继承人”。伯恩施坦一背叛，就轮到考茨基起来捍卫马克思主义的正统观念了。被人不无讥讽地称作“马克思主义教皇”的考茨基，在1914年以前的20年间，是最有影响的社会主义思想家。卢森堡、列宁、托洛茨基，乃至斯大林都仰仗于他。作为党的理论月刊《新时代》长达30多年的编辑，他在全体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中占有核心的、支配性的位置。考茨基与伯恩施坦尽管存在着明显的分歧，但他们的世界观还是有许多相似之处的。在进一步论述激进派（特别是罗莎·卢森堡）之前，把伯恩施坦和考茨基两人各自的观点加以比较和对照，应该是件有意义的事情。

经 济 学

也许，伯恩施坦想要修正的马克思学说中最根本的东西，就是其价值理论。伯恩施坦从诸如肖（Shaw）和韦伯（Webb）等费边派那里学到了有关杰文斯（Jevons）边际学说的好多东西。后者要把价值与效用等同起来，并使之取决于个人的需要和供求关系。伯恩施坦对《资本论》第三卷感到失望，以至于他对马克思的整个价值理论产生了怀疑。当时批评马克思的最有影响的著作，是奥地利边际主义者欧根·庞姆·巴维克（Eugen Böhm Bawerk）的《卡尔·马克思及其封闭体系》（*Zum Abschluss des Marx-schen Systems*）。巴维克认为，价值概念不像马克思所说的那样，它并非一个客观的存在物，而只是各种使用价值之间的一种数量关系，是使用价值的一种抽象。这就使得伯恩施坦也把马克思的理论看成是某种抽象的假说——而这里他在某种程度上不过是追随了恩格斯而已。^[17]按伯恩施坦的说法，马克思的价值理论是“一个纯抽象概念”^[18]，而劳动价值学说“只有作为一个纯思辨的公式或一种科学假说才能要求被接受”^[19]。他还认为这种理论不能说明社会产品的总价值，因此，不适宜作为研究的出发点。这使折中主义的伯恩施坦试图把马克思主义的价值概念与边际主义的价值概念综合起来。

大致说来，伯恩施坦是位密切关注时代趋势的观察家。正因为他对系统的理论缺乏兴趣，便愈显得他能够比许多同时代的“马克思主义者”更清楚地洞察到这些趋势。至于他能否准确地解释这些趋势，则不是那么显而易见了。伯恩施坦敏锐地把握到自1895年起开始出现的经济福利主义的新含义：在上世纪（19世纪——译者注）最后几年，实际工资大幅度提高，并产生了“工人贵族”，他们在革命运动中可能丧失掉不少东西。伯恩施坦观察到，卡特尔、托拉斯和垄断资本的增长，就像伴随而来的生产的社会化和所有权与管理权的分离一样，都是些有重大意义的现象。根据这些因素，再加上信贷工具的增加和通讯与信息服务的巨大改善，伯恩施坦断定，资本主义获得了一种自我调节的能力。但他并没有得出资本的所有权正在集中这样的推论。相反，他相信（并用大量统计数据来支持自己的观点），像联合股份公司这样一些机构正在使财产分散，而这意味着资本家比以前多了。此外，中小企业也并未被消灭，而是一如既往地遍地开花般繁荣。由此，带来如下的

政治后果：

如果认定，当前的社会发展状况表明占有者阶级的成员数量已相对或确实绝对地减少，那就大错特错了。他们的数量相对地和绝对地都增加了。如果社会民主党的活动和前途有赖于“有产者”的减少，那也许真该躺下睡大觉了。但事情恰恰相反，社会主义的前途不依赖于社会财富的减少而是有赖于增多。^[20]

可见，伯恩施坦根本就不认为危机是不可避免的，相反，他相信托斯拉、卡特尔等的存在能够使资本主义近乎无限期地存活下去。确实，他甚至说过，资本主义的这种和谐发展将使它不被打断地走向社会主义。

但是，考茨基却认为这些思想是危险的错误观念。特别是，他认为伯恩施坦对马克思资本集中学说所作的批评是其修正主义的要害。考茨基不同意伯恩施坦从统计数据中得出的结论，他坚持认为，虽然小企业的数量未必减少，但它们经济活动的范围却缩小了，因为它们通常只不过是成为濒于无产阶级化的下层中产阶级的最后的避难所。考茨基相信，周期性的萧条将最终挤垮小业主——由于再投资必须有不断追加的资源，因此，只有最富有者才能生存下去。伯恩施坦把卡特尔之类视为资本主义自我调节的工具，而在考茨基看来，它们恰恰是这个制度最终衰落、“自由”竞争终结与社会崩溃迫近的明证。虽然考茨基在答复伯恩施坦的批评时，否认马克思持有“崩溃”论，但“爱尔福特纲领”似乎真的持有这种看法。与此同时，考茨基本人还认为，危机将比以往更加严重；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周期性的萧条是不可避免的。到后来（反对罗莎·卢森堡时），他才承认国内的消费能够吸纳不断增加的产品。但在与伯恩施坦的争论中，他还是坚持认为，虽然更多地使用机器必然带来生产的增长，然而由于这种制度倾向于尽可能地压低工资，工人阶级的消费力却不会随之增长——结果是，资本家不能吸收剩余产品，而不得不越来越多地再行投资，最后的崩溃便是不可避免的了。

虽然与修正主义的论战并未直接牵涉帝国主义问题，但这个问题显然与考茨基的消费不足论有关，这也说明了他为什么不指望资本主义向自由主义的、合作社的方向演进。伯恩施坦有时陷入为德国的殖民扩张作辩护的境地，而对帝国主义的分析却是考茨基对马克思主义学说的主要理论创新之一。^[21]早在19世纪80年代中期，考茨基就把对海外领土的兼并与他的消费不



足论观点联系起来，认为国内市场不足，迫切需要到殖民地去寻找新市场。后来，他强调殖民扩张对工业资本家之外的集团——军队、官僚，当然首先是金融资本家——的重要性，这种扩张不仅能出口剩余商品，还能输出购买剩余商品的资本。在他的《社会主义与殖民政策》（*Sozialismus und Kolonialpolitik*）一书（倍倍尔认为这是考茨基最好的著作）中，他论证说，资本输出现已成为限制生产能力和巩固社会制度的一种努力。考茨基还强调指出了世界市场中工业部门和农业部门扩张中的不平衡，后者扩张得慢，从而不能为前者提供充分的市场和原料。他最早提出战争是帝国主义的必然产物。但到了1912年，在更趋合作的国际气氛影响下，加上希法亭（Hilferding）的《金融资本》（*Finanzkapital*）^[22]问世，考茨基宣称，从长远的观点来看，殖民地甚至对资本主义制度也是有害的。资本主义需要和平以图发展，因此，充分认识到他们自身利益所在的资本家能够开创出一个“超帝国主义”的阶段来阻止军备竞赛和战争。这样，帝国主义既不是不可避免的，也不是资本主义的“最后”阶段——这一观点曾遭到了列宁的激烈抨击。

社 会 学

经济学方面的根本分歧，对伯恩施坦和考茨基在社会发展道路、特别在无产阶级贫困化和阶级的两极分化问题上各自所持的观点，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伯恩施坦抛弃了已在“爱尔福特纲领”中阐述得十分清楚的贫困化观念。在这一点上，他恰恰（具有讽刺意味地）步了恩格斯的后尘。^[23]伯恩施坦深为德国19世纪90年代后期的繁荣所触动（也许太过分了），而断然否认实际工资正在下降——尽管马克思就这种趋势不可避免的观点也远未明确赞同过。^[24]无疑，在19世纪90年代期间，实际工资、尤其是工人贵族中的实际工资确实有所提高，但同样毫无疑问的是，这个过程是短暂的；并且到20世纪初，相对贫困化成了一个事实。考茨基从未持有绝对贫困化的理论^[25]，但他的确认为，资本主义所生产的剩余价值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同时认为，无论工人怎样可能迫使雇主和国家提供较好的条件，但技术的增进必然意味着剥削的增加，因而在国民生产总值中为工人阶级所享用的比例必然下降。

伯恩施坦的中心思想所推导出的第二个必然结论是，尽管资本的控制也

许在集中，但随之而来的是所有权的分散。伯恩斯坦关于阶级的定义比马克思的定义要模糊得多。他只是把它当做一种社会阶层，其构成主要取决于相似的生活条件。他认为，中产阶级将会壮大，这有收入方面的统计数据等可资验证。他以下述发问的方式来支持自己的观点：“如此大量的、不是被大亨及其代理人消费掉的商品到哪儿去了呢？”他回答（忽视了一个显而易见的答案，即剩余价值已用于再投资了）说：“如果它们不是以这种或那种方式流到无产者手中去了，那么肯定是被其他阶级吸收掉了。要么资本家的数量相对减少、而无产者的财富在增加，要么中产阶级数量在增多——只有这两者是生产力持续增长所容许的惟一可能的选择。”^[26]不过，在伯恩斯坦看来，中产阶级的数量不仅正在增加，而且随着日益增长的工业康采恩和政府官僚机器雇佣的白领工人的出现，其构成成分也发生了变化。根据对非对抗性政治发展的可能性的乐观见解，伯恩斯坦认为，这个中产阶级将最终站在工人一边——但只是当工人已成为资产阶级社会（从一个秩序化的和文明化的社会制度这个意义来说的）的成员时才是这样。考茨基也意识到一个“新中产阶级”正在产生，但他总是坚持认为，即便这个阶级的生活方式是资产阶级的，他们却终究要无产阶级化、并加入到阶级斗争中去。因为他们的经济地位基本上是无产阶级的，其政治态度必然要受到影响，从而会反映出这种经济地位来。虽然考茨基有时也意识到，德国许多中产阶级的群体具有潜在的反动因素，但无论他还是伯恩斯坦，在对这个阶级最终采取的政治态度所持的信念上，都犯了悲剧性的错误。

通常，在阶级两极分化问题上，农民问题是个难题。伯恩斯坦只限于泛泛地议论说：“在整个西欧……小农和中等的农户数量正在增长。同时，大农户或超大农户正在减少。”^[27]像爱德华·大卫（Eduard David）这样一些南德意志的改良主义者，从倡导与农民合作中得出了明确的政治结论，在那些地区，农民的选票对德国社会民主党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党为了吸引小农的选票而在修改其政策方面能走多远，是与修正主义论战背后的核心政治问题。考茨基在1899年出版的、并为列宁大加称赞的《农民问题》（*Die Agrarfrage*）一书中争辩说：农民的利益——特别是保护关税和维护私有制——与无产阶级的利益是直接对立的。因此农民决不能成为社会主义者——至少在德国是如此，因为考茨基对俄国的农民则更为乐观。他进一步确认说，农民阶级注定要绝迹，这由于他们缺乏必要的资金投入和适应性，他们对小块土地的经营没有经济活力；而且，事实上他们正在被消灭。他指出：“小农户



在数量上的增长不过是无产者家庭数量增长的一个特殊形式，后者同大资本家在工业、有时乃至在农业中不断加重的剥削是联系在一起的。”^[28]在统计数据面前，这个农民无产阶级化的论题是难以成立的，考茨基后来也放弃了这种看法。但他既坚持反对同农民合作，也坚持认为，为了农业进步，必须废除小土地；为了社会主义，必须创造剩余产品。

政 治 学

修正主义的论辩给人的印象往往是纯理论性的，但事实上，上述理论问题的讨论有着深刻的现实意义。对考茨基这样的正统马克思主义者来说，他们关于劳动价值论、贫困化和两极分化的解释意味着，资本（家）与劳动（者）的利益毫不相容，没有什么“全民利益”可言，无产阶级在政治领域中必须保持孤立。另一方面，对于想放弃劳动价值论的修正主义者来说，他们不再相信资本主义的崩溃；并且提出，中产阶级的成长是非两极分化的明证，资本主义已显示出自身足够的适应性，因为它有希望渐进地向社会主义过渡。社会主义被看作充分发达的资本主义的一种或多或少和平的继承者。

伯恩施坦在 1898 年《社会主义问题》（*Probleme des Sozialismus*）一书中写道：“虽然社会灾难无疑能够、也无疑会极大地加速发展过程，但它们决不能在一夜之间创造出同质性的关系，这种关系的同质性对于经济的同步改造是必要的，但至少到今天还不具备。”^[29]就这样，伯恩施坦拒绝采取任何革命手段来解决政治问题：既然实现社会主义的经济先决条件还没有真正具备，那么政治斗争应当是为开创民主而展开的一种渐进的斗争（“民主”，在伯恩施坦看来，是这样一种社会，“在那个社会中，没有一个阶级享有与全社会相对抗的政治特权”^[30]），一种阶级均衡的制度。这种民主是“实现社会主义的形式”，它将“把工人的社会地位从无产者提高到有产者”^[31]或市民。基于这种连续性，社会民主党内就根本没有必要恶意攻击自由主义了。由于社会民主党不仅在年代上、而且在思想上是自由主义的继承者，所以“实际上真正的自由概念无不是社会主义思想的要素”^[32]。由此，产生了伯恩施坦的政治渐进主义：社会主义正在实现。1898 年，他在概括其《信条》的内容时宣称：

我坚信，今天这一代人必将看到，社会主义即使不是在正式的形式上，至少也是在内容上已经大部分实现了。各种社会义务的持续扩大，即个人对社会的义务及其相应权利和社会对个人的义务的持续扩大、在民族或国家内部已组织起来的社会对经济生活的监督权力的扩大，以及村、区和省各级民主自治政府的建设，这些社团、组织的工作任务的拓展——这一切在我看来都是向社会主义发展。

把经济企业从私人手里转交给公众管理当然伴随这一发展而来，但这只能缓慢地进行……一部好的工厂法比把一批工厂全都国有化可能更能体现出社会主义。我坦率地承认，我对通常称作‘社会主义最终目标’的东西极少有热情和兴趣。这个目标无论怎样，在我看来都是微不足道的，运动就是一切。^[33]

考茨基与伯恩斯坦分歧的焦点在于，他坚持阶级冲突的现实性，以及由此而来的与资产阶级建立关系的不可能性。考茨基正确地认识到，资产阶级的各阶层事实上正变得更加反动，他甚至始终拒斥与农民联盟的思想。他认为，改良不能触动阶级冲突的根本现实，而赋予民主权利决不能代替革命，以至于他认为，议会民主连同其选举大战只是强化了阶级意识，并加剧了阶级冲突。

无产阶级孤立的方针，部分地是出于19世纪90年代许多社会民主党人普遍相信资本主义崩溃已经迫近的结果。早在1881年，倍倍尔就曾写道：统治阶级投降的条件是，“发展能够达到成熟，而不被一场意外的中断所破坏，也不被过早地推向爆发”^[34]。1897年，他仍相信，“用数学的精确性”计算资本主义的末日是可能的。^[35]同样，恩格斯在1895年预见了资本主义“到世纪末”垮台的可能性，而且据《每日纪事报》（*Daily Chronicle*）载，恩格斯曾有一个预见德国社会民主党何时能夺取政权的日程表。^[36]因此，要把重点放在组织上，以便党能够利用革命形势，当然，这种形势不会自行到来。

于是产生了自相矛盾：既然条件永远别想“成熟”到足以介入的程度，德国社会民主党一般所采取的宿命论态度与无产阶级必然胜利的信念便成为它无所作为的借口。当然，考茨基常常强调组织、宣传和最终夺取政权的必要性，但这些原则在实践生活中往往被磨去了锋芒。在如下一次答复伯恩斯坦的一段话中，考茨基的基本立场确实得到了很好的概括：“社会民主党的

任务不是引起不可避免的灾难，而是尽可能地延迟这种灾难，也就是说，要小心谨慎地避免任何类似挑衅、或引发挑衅的事件。”^[37]在考茨基看来，德国社会民主党虽然是一个革命的党，却不是一个正在准备实行革命的党。甚至在他1909年那本最为激进、而当时备受赞扬的著作《取得政权的道路》(Der Weg zur Macht)中，也存在着一种深层次的消极感——尽管奇怪的是，德国社会民主党执委会曾认为该书太激进，并曾试图对它进行审查。德国社会民主党由于不惜一切代价地强调统一，而竭力掩饰意识形态方面的分歧，党的领导人也注重加强党的组织，结果在1907年以后导致党内的官僚主义成分滋长起来。^[38]足以说明考茨基那种潜藏的消极感的例证是其对群众罢工的看法。考茨基自称是最拥护群众罢工这种策略的人，是其热烈的捍卫者，尤其在1905—1906年间更是如此。但他从不提倡某一特定情境下的群众罢工，相反，却附加上一长串罢工成功所必须具备的先决条件：全体工人参与、所有社会成员普遍感到不满、软弱的政府，等等。与罗莎·卢森堡不同，在考茨基看来，群众罢工从来只是一种防卫武器，只是在工人阶级所享有的民主权利遭到侵犯时才能使用的最后手段。由于顾忌到普鲁士国家控制着无限的权力——包括世界上最强大的军队，考茨基的这种消极态度进一步强化了。

但考茨基的政治观绝不是机械论的。他总是强调阶级意识的重要性，而且甚至在列宁之前，就预示在列宁的“从外部灌输阶级意识”理论中包含的一些东西。早在1901年，他就写道：“知识在今天仍然是有产者阶级的特权。无产阶级不能从自身中创造出强大的、生气勃勃的社会主义，无产阶级必须由别人给它带来知识才能走进社会主义。”^[39]因为科学社会主义是一种来自观察、并被一些熟练的学者以一种社会技术的形式加以运用的理论，所以一个组织完备的党的经常性责任就是去传播阶级意识，并向无产阶级提供一种连贯的政治理论；而零敲碎打的改良主义主张是永远不够的。考茨基持经典马克思主义的国家观，即国家是阶级统治的工具，并且否认国家是拯救工人阶级的可能的资源。因此，工会本身的斗争就完全不够了。他像列宁一样坚决否定“经济主义”。他的目标一向是（这是他与伯恩施坦的根本分歧所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并随即对国家实行根本的改造。不过，当谈论国家时，考茨基总是想到德国的军事专制政体，它最多是个半民主的国家。无产阶级革命的任务之一就是在德国实现完全的民主。因此，考茨基所说的“无产阶级专政”，指的不是令伯恩施坦那般恐惧的阶级战争形势或“雅各宾

派的无政府状态”^[40]，而仅仅是指无产阶级在充分民主的（和议会的）制度下实行多数人的统治。^[41]虽然只是当他批评布尔什维克革命时，这种观点才明确起来，但这无疑是包含在他早期著作中的思想。

哲学和历史唯物主义

伯恩斯坦在阐述他对历史唯物主义的见解时，总是很认同地引证恩格斯在1890年致布洛赫（Bloch）的信。^[42]在他看来，恩格斯的评论暗含着这样一层意思：唯物史观“事实上并非纯粹唯物主义的，更非纯粹经济的”^[43]。伯恩斯坦认为，他那个时代的马克思主义是太唯物主义、也太决定论了。因此，他把唯物主义者讥称为“不信上帝的加尔文教徒”^[44]。他宣称：

要揭露各因素之间的关系，而这些关系是那么确切地存在，以致人们能够有把握地确定，在某些情况下，应当到哪里去寻找最强大的动力，这绝非总是易事。纯粹的经济原因首先只是产生接受某些思想的意向，但是这些思想怎样兴起和传播以及采取什么形式，取决于一系列影响的协同作用。如果一开始人们就把不强调纯粹经济性影响而强调其他影响、不考虑生产技术及其可预见的发展而考虑其他经济因素视为折中主义而加以抛弃的话，那么这对于历史唯物主义是十分有害的。折中主义（它从对各种现象的不同解释和处理方式中进行选择）往往只是对于企图从一物引出万物、并以独一无二的方法处理万物这种教条主义企图的自然而然的反作用。每当这种企图膨胀过度，折中精神总是要以强大的自发力量再度起作用。这是清醒的理智对每一种禁锢思想的学说所固有的倾向的反叛。^[45]

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差别被划分得异常严格。因为理性认识和道德理想也对行为起着重要的促进作用，所以伯恩斯坦希望给予“意识形态因素、特别是伦理因素以比从前更为广阔的独立活动的余地”^[46]。“爱尔福特纲领”却过分强调资本主义规律的普遍有效性，近乎于自然规律，所以伯恩斯坦批评考茨基有“把只具相对力量的事物说成绝对的习惯”^[47]。

对历史唯物主义的这些解释起源于根本性的哲学偏差，这种偏差关涉

唯物主义的含义、辩证法的重要性，以及马克思主义中已增长的康德哲学的影响。后来，伯恩斯坦宣称，他本人成了“实证主义的哲学和社会学学派的拥护者”^[48]。他还用心否定“唯物主义”——他所说的唯物主义是指这样的看法，即“从某一时刻起，此后的一切现象都是由已存在的物质的总和和它的各部分的力量关系预先决定的”^[49]。这种看法与18世纪的机械唯物论一样，同马克思毫无关系。当然，伯恩斯坦受达尔文的影响，但却是以一种完全类似于他的经济学和社会学观点的方式表现出来的。在未发表的1898年手稿中，他写道：“生物学研究得出一个命题：一种有机体愈发达，即愈复杂、功能愈分化，它的进化就愈不是由整个有机体的绝对对立的变化实现的。在一定范围内，人类社会同样也是这样。”在同一手稿的后面，他还写道：“显而易见，政治革命对工业社会化来说，是最不合时宜了。”^[50]进化能够与革命彻底地对立。伯恩斯坦的唯物主义世界观之所以不成熟，乃在于他否定了（且全然不懂）黑格尔和厌恶辩证法。他在《渐进的社会主义》一书中写道：“每当我们看到以经济作为社会发展基础为出发点的理论在过分强调暴力崇拜的理论面前投降时，我们都会碰到黑格尔式的原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一切伟大成就都不是依靠、而是不顾黑格尔的辩证法而取得的。”^[51]而且，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布朗基主义恰应归咎于他们对黑格尔辩证法的倚重。

然而，尽管伯恩斯坦否定唯物主义，否定马克思主义是科学，但他的思想中还是有一种极端经验论的倾向——这主要是因他否定黑格尔和探究事物的任何辩证方法所致。正是他那贫乏的实证主义方法使他为其社会主义寻找另一种道德基础，而他关于经济力量本身不会带来社会主义的信念也使他寻求其他可能的动力。他在新康德主义的复兴中找到了一种现成的动力。自19世纪60年代以来，新康德主义成为德国各大学所讲授的占统治地位的哲学，它使整整一代马克思主义者对辩证方法不能有充分的估价。F. H. 朗格（Lange）的《唯物主义史》（1866年）是一部基本的教科书。而伯恩斯坦还受到施米特（Schmidt）、福伦德（Vorländer）、科恩（Cohen）和沃尔特曼（Woltmann）的强烈影响，他们都是居于领导地位的社会民主党人，又是新康德主义者。^[52]康德主义的观点在两点上具有吸引力：首先，康德的学说认为，“自在之物”是不可认识的；我们不能摆脱我们的思想强加于世界的种种范畴，这便使得任何唯物主义都带上了极端唯心主义的色彩。其次，也更重要的是，康德在事实陈述与价值陈述之间所作的区分，意味着他的伦理学

既然被人们公认为独立于任何描述性的陈述之外，那就是要自成一体，从而能够合乎逻辑地与一种恐怕没有任何价值判断的庸俗马克思主义共存。正是在这个领域里，伯恩施坦的折中主义陷入了一场纯粹的混乱中。

但在此，伯恩施坦并不是孤立的，连考茨基也受到新康德主义的吸引。1898年，考茨基（完全正确地）承认“哲学非我所长”，但他仍然认为，“如有必要，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经济观与历史观甚至能与新康德主义相结合”^[53]。但考茨基并未坚持这一思想路线。他比伯恩施坦更为系统地受到达尔文的影响，因为考茨基在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之前曾是达尔文主义者，甚至，从某种程度上说，他终其一生都是达尔文主义者。他的社会发展观总是与其自然进化观联系在一起，因此，他过分强调生产力和客观必然性。考茨基在1907年著的《伦理学与历史唯物主义》（*Ethik und materialistische Geschichtsauffassung*）中，用一种受达尔文进化论影响的、相当直露的方式，试图论证伦理观念依阶级的不同而不同。相比之下，他的《基督教的起源》（*Ursprung des Christentums*）一书倒是唯物史观对那个时代最早的、也给人以最深刻印象的运用。^[54]考茨基提不起对黑格尔的任何热情，他对黑格尔一无所知；对他来说，黑格尔是一名带着可悲的思辨色彩和保守倾向的进化宿命论者。1899年汉诺威代表大会上修正主义者康拉德·施米特的惊人宣言引发了考茨基的共鸣：“在鼓动工作中，我们宁愿用准确得多、也丰富得多的‘进化’概念取代‘辩证法’。对工人们来说，‘进化’概念是更明白易懂的。倍倍尔诉求于伟大的达尔文的精神，我们离达尔文比离黑格尔更近。”^[55]考茨基不同于伯恩施坦之处在于，他强调自然界中对立面的斗争，并把这种斗争直接而无情地应用于阶级斗争。然而，尽管考茨基几乎不断地重申“自然的必然性”，但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从伦理学来看，却也无法避免处于与某些修正主义者实际上同样的地位。他在论伦理学的那本书的结尾处宣称：

社会民主党作为无产阶级在阶级斗争中的组织，不能没有道德理想，不能不在道德上憎恶剥削和阶级统治。但是，这种理想不可能从科学社会主义那里得到支持……当然，研究社会主义的人是战士……所以，例如在一位马克思主义者那里，道德理想的作用突破了他的科学研究，他就总是竭力把它从著作中消除掉，而且他理所当然地会这样做……科学只与对必然性的认识有关。^[56]

结 论

在许多问题上，伯恩斯坦和考茨基的观点是相同的，他们的分歧只是逐渐产生的，其论战是在进展中尖锐起来的。在公开自己的信仰宣言中，考茨基写道：

一旦放弃唯物史观和无产阶级是即将到来的社会革命的动力的观念，我就不得不承认我完蛋了，我的生命就不再有任何意义。^[57]

考茨基通常被描绘成具有一种可以为任何策略性妥协作粉饰的空洞理论的人。这种评价也许适用于他 20 世纪 20 年代一些比较杂乱的著作，但并不完全公正。早年的考茨基以他关于阶级意识、关于帝国主义和关于马克思主义原理在特殊历史领域的运用等方面的思想，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作出了重要贡献——且不说他在对“爱尔福特纲领”所作的评论和在《卡尔·马克思的经济学说》中所显示出的作为一个鼓动家的非凡才能。说考茨基越来越保守，也不符合事实，因为他的思想至少在 1914 年以前是始终一致的。他的理论的确维持了党许多年的团结——虽然这不应看成是其主要的作用。^[58]在关涉重大的原则问题时，考茨基是毫不顾忌党可能发生分裂的。把考茨基的理论与实践对立起来，也不对。从根本上讲，他的理论决不比实践更革命。总的说来，德国社会民主党从来没有——即使其初创时期也没有——像它通常被想像的那么激进，这倒是事实。党最关心的是如何去实现 1848 年未能赢得的纯粹民主的理想。所以，从许多方面讲，伯恩斯坦和考茨基都处于同一个世界。不论他们在无产阶级孤立的问题上有多大的分歧，他们都完全投身于议会策略中。正如精通那段历史的一位最卓越的历史学家所说：“争论双方之间的分歧在很大程度上是主观上的。这种分歧是对现实作出估量的观念上的分歧，而不是行动领域中的分歧。”^[59]在对黑格尔的无知和热中于达尔文这两点上，伯恩斯坦与考茨基也是一样的，这使他们产生了一种共同的简单化的方法，而这种方法不可能给予观察社会现实以任何辩证的尺度。这样，伯恩斯坦的思想就不过是当时僵化的马克思主义的一种折射而已。不过，20 世纪初，欧洲摒弃实证主义的理性思潮已在日益

兴起^[60]，而在马克思主义中，这一趋势是在罗莎·卢森堡那样一些激进派的著作中得到了最初的表现。

[注释]

[1] Kautsky to Victor Adler, in the latter's *Briefwechsel* (Vienna, 1954) p. 401.

[2] Engels to Sorge, in *Marx, Engels, Werke* (MEW, Berlin, 1957), vol. 39, p. 213.

[3] 关于拉布里奥拉最好的英文介绍是：L. Kolakowski, *Main Currents of Marxism* (Oxford, 1978) vol. 2, pp. 175ff.

[4] 详见 H. Stuart Hughes, *Consciousness and Society* (London, 1959) ch. 2, and A. Davidson, *Antonio Gramsci* (London, 1977) pp. 94ff.

[5] 详见 N. MacInnes, 'Les débuts du Marxisme théorique en France et en Italie (1880—1897)', *Cahiers de l'ISEA*, vol. 102, 1960.

[6] 引自 Engels to Bernstein, *MEW*, vol. 35, p. 388。另见 Marx's reservations on Longuet and Lafargue in *MEW*, vol. 35, p. 110.

[7] 参见 H.-J. Steinberg, *Sozialismus und deutsche Sozialdemokratie*, 3rd edn (Bonn, 1972) p. 16.

[8] 引自 Y. Bourdet in his Introduction to R. Hilferding, *Le Capital financier* (Paris, 1970)。

[9] 有关可靠的文献证据，参见 B. Gustaffsson, *Marxismus und Revisionismus* (Frankfurt, 1972) vol. 1, pp. 129ff.

[10] 参见 *Ibid.*, p. 128.

[11] R. Luxemburg, *Gesammelte Werke* (Berlin, 1925) vol. 3, pp. 104f.

[12] 参见党的书记 I. 奥艾尔 (Ignaz Auer) 对伯恩施坦的劝告：“人可以那样做，但不要那样说！” E. Bernstein, *Entwicklungsgang eines Sozialisten* (Leipzig, 1925) p. 35.

[13] 考茨基致伯恩施坦，引自 H.-J. Steinberg, *Sozialismus und deutsche Sozialdemokratie*, 3rd edn (Bonn, 1972) p. 78.

[14] E. Bernstein, *Die Neue Zeit*, vol. 13, p. 103.

[15] 引自 J. P. Nettl, *Rosa Luxemburg* (Oxford, 1966) vol. 1, p. 204.

[16] 参见 J. P. Nettl, 'The German Social-Democratic Party 1890—1914 as a Political Model', *Past and Present*, 30 (1965)。

[17] 恩格斯给他所整理的《资本论》第3卷写的“序言” (Moscow, 1971) pp. 8ff.

- [18] E. Bernstein, *Evolutionary Socialism* (New York, 1961) p. 29.
- [19] Ibid., p. 30.
- [20] Ibid., p. 48.
- [21] 进一步参见 H.-C. Schröder, *Sozialismus und Imperialismus* (Hanover, 1968)。
- [22] 见该译本下文, pp. 63ff.
- [23] F. Engels, 'Zur Kritik des sozialdemokratischen Programmentwurfs 1891', *MEW*, vol. 22, p. 231.
- [24] 见 T. Sowell, 'Marx's "Increasing Misery" Doctrin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60.
- [25] 见 G. Herre, *Verelendung und Proletariat bei Karl Marx* (Düsseldorf, 1973) pp. 14f.
- [26] E. Bernstein, op. cit., p. 50.
- [27] Ibid., p. 71.
- [28] K. Kautsky, *Die Agrarfrage* (Stuttgart, 1899) p. 174.
- [29] E. Bernstein, 'Allgemeines über Utopismus und Eklektizismus', *Die Neue Zeit*, vol. 15, p. 167.
- [30] E. Bernstein, *Evolutionary Socialism* (New York, 1961) p. 142.
- [31] Ibid., pp. 147f.
- [32] Ibid., p. 151.
- [33] E. Bernstein, 'Die Zusammenbruchstheorie und die Kolonialpolitik', *Die Neue Zeit*, vol. 16, pp. 555f.
- [34] A. Bebel, *Briefwechsel mit F. Engels* (The Hague, 1965) p. 106.
- [35] *Protokoll über die Verhandlungen des Parteitages zu Hamburg* (Berlin, 1897) p. 125.
- [36] 参见恩格斯对该记者的谈话, *MEW*, vol. 22, p. 547.
- [37] K. Kautsky, *Le Marxisme et son critique Bernstein* (Paris, 1900) p. xii.
- [38] 关于群众运动的官僚机构导致群众运动实行寡头政治和倾向于保守的论断, 见 R. Michels, *Political Parties* (New York, 1959)。米歇尔本人是德国社会民主党内一名充满幻灭感的前党员。另见 J. P. Nettl, *Past and Present*, 30 (1965), p. 16.
- [39] K. Kautsky, *Die Neue Zeit*, vol. 19, p. 90. 在这个问题上, 对考茨基的观点的更积极的评价, 见 R. Larsson, *Theories of Revolution* (Stockholm, 1970) pp. 49ff., and 256ff.
- [40] 伯恩施坦致考茨基 1898 年 2 月 20 日, 引自 H.-J. Steinberg, *Sozialismus und deutsche Sozialdemokratie*, 3rd edn (Bonn, 1972) p. 4, 另参见 *Evolutionary Socialism*,

pp. 145f.

[41] 参见 K. Kautsky, *The Dictatorship of the Proletariat* (Ann Arbor, 1964)。该书处处都突出了考茨基关于布尔什维克的统治是凌驾于社会和无产阶级之上的专政的观点，并且指出，它产生于超越社会发展规律的错误企图。

[42] 参见该译本上文，p. 14。

[43] E. Bernstein, *Evolutionary Socialism* (New York, 1961) p. 17.

[44] Ibid., p. 7.

[45] Ibid., pp. 13f.

[46] Ibid., p. 15.

[47] 伯恩斯坦致考茨基 1898 年 1 月 22 日，引自 H.-J. Steinberg, *Sozialismus und deutsche Sozialdemokratie*, 3rd edn (Bonn, 1972) p. 60。

[48] E. Bernstein, 'Entwicklungsgang eines Sozialisten', *Die Volkswirtschaftslehre der Gegenwart in Selbstdarstellungen* (Leipzig, 1925), p. 40。

[49] E. Bernstein, *Evolutionary Socialism* (New York, 1961) p. 7.

[50] 引自 B. Gustafsson, *Marxismus und Revisionismus* (Frankfurt, 1972) vol. 2, p. 389。

[51] E. Bernstein, *Die Voraussetzungen des Sozialismus*, Rowohlt edition (Hamburg, 1972) pp. 62f. 有关马克思主义和黑格尔辩证法的整章内容在英译本中被不负责任地漏掉了。

[52] 关于康德主义对修正主义运动的影响，基本的描述来自 K. Vorländer, *Kant und Marx* (Tübingen, 1926)。

[53] 考茨基致普列汉诺夫，见 *Der Kampf*, vol. 18 (1925) p. 1。

[54] 参见下文最后一章的再评价 D. Mckown, *The Classical Marxist Critique of Religion* (The Hague, 1975)。

[55] *Protokoll über die Verhandlungen des Parteitag zu Hannover* (Berlin, 1899) p. 148.

[56] K. Kautsky, *Ethik und Materialistische Geschichtsauffassung* (Stuttgart, 1906) p. 141. 更极端的说法，参见希法亭为其《金融资本》写的“序言”。

[57] 考茨基致伯恩斯坦 1897 年 8 月 30 日，引自 H.-J. Steinberg, *Sozialismus und deutsche Sozialdemokratie*, 3rd edn (Bonn, 1972) p. 77。

[58] 参见 E. Matthias, 'Kautsky und der Kautskyanismus', *Marxismusstudien* (Tübingen, 1957)。该书有影响的、也有见地的评说肯定得有点过头了。

[59] C. Schorske, *German Social Democracy, 1905—1917* (Cambridge, Mass., 1955) p. 29.

[60] 参见 H. Stuart Hughes, *Consciousness and Society* (London, 1959) ch. 2。

深入阅读材料

关于本时期的通论性著作

有一部论述了第二国际期间欧洲思想状况的优秀著作，它是 H·斯图亚特·休斯 (H. Stuart Hughes) 的《意识与社会》。有关德国社会民主党的起源，见利特克 (Lidtkke) 的《被取缔的党》。吉尔里 (Geary) 的文章很好地论述了党的群众基础，内特尔 (Nettl) 的短篇研究具有当代政治分析的洞察力。亨特 (Hunt) 的书也是可信度高的综述，但最为基础的文本还是肖尔斯克 (Schorske) 的优秀著作《德国社会民主党》。

关于第二国际，作为一个整体而言，乔尔 (Joll) 作了很好的介绍。对此，科尔 (Cole) 写的《社会主义思想史》第三卷与布朗撒尔 (Braunthal) 写的该书的第一卷稍加详尽一些。豪普特 (Haupt) 对导致第二国际于 1914 年解散的一系列事件作了相当好的研究。另参见皮尔逊 (Pierson) 的学术著作《1887—1912 德国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与工人阶级精神状况》和霍华德 (Howard) 及金 (King) 的著作《马克思的经济学说史》第四章。

与修正主义的论战

伯恩施坦的最重要著作已被译成英文——尽管是以节译本的形式，被冠以“渐进的社会主义”的标题。惟一的一本英文本长篇评论是彼得·盖伊 (Peter Gay) 的《民主社会主义的困境》，该书还有格诺伊斯 (Geuss) 与埃利奥特 (Elliot) 所写的两篇文章作补充。

考茨基的主要著作也译过来了。关于他的政治学，见《取得政权之路》；关于对布尔什维克革命的见解，见《无产阶级专政》；就他作为一个史学家的优势，见《基督教的基础》。利希特海姆 (Lichtheim) 的《马克思主义》中有一个短小精悍地论述考茨基的章节。另外，可参见克拉科夫斯基 (Kolakowski) 的《马克思主义主要流派》中第二卷第二章，以及萨尔瓦多利 (Salvadori) 的长篇研究。最后，要指出的是，还有图多兄弟 (Tudor and Tudor) 所编辑的一个很好的作品集，吉尔里 (Geary) 为该集子写了一个可信度极高的“导论”。

参考文献

General Books on the Period

Evelyn Anderson, *Hammer or Anvil: The Story of the German Working-class Movement* (London, 1945).

A. Bebel, *My Life* (London, 1912)

Max Beer, *Fifty Years of International Socialism* (London, 1935).

A. Joseph Berlau, *The German Social Democratic Party: 1914—1921* (New York, 1950).

- Julius Braunthal, *History of the International* vol. I, 1864—1914 (London, 1966).
- G. D. H. Cole, *The Second International: 1889—1914* vol. III of *A History of Socialist Thought* (London, 1956).
- B. Croce, *Historical Materialism and the Economics of Karl Marx* (London, 1966).
- R. Palme Dutt, *The Internationale* (London, 1964).
- Richard Geary, 'The German Labour Movement: 1848—1919', *European Studies Review*, 6 (1976).
- H. Goldberg, *Jean Jaurès* (Madison, 1966).
- Georges Haupt, *Socialism and the Great War: The Collapse of the Second International* (Oxford, 1972).
- M. C. Howard and J. E. King, *A History of Marxian Economics*, vol. I, 1883—1929 (Princeton, N. J., 1989).
- H. Stuart Hughes, *Consciousness and Society: The Reorientation of European Social Thought, 1890—1930* (London, 1959).
- Richard N. Hunt, *German Social Democracy: 1918—1933* (London, 1964).
- James Joll, *The Second International* (London, 1955).
- L. Kolakowski, *Main Currents of Marxism* (Oxford, 1978), vol. 2.
- A. Labriola, *Essays on the Materialist Conception of History* (London, 1966).
—*Socialism and Philosophy* (St Louis, Miss., 1978).
- Veron L. Lidtke, 'German Social Democracy and German State Socialism',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Social History*, 9 (1964).
—*The Outlawed Party: Social Democracy in Germany, 1878—1890* (Princeton, N. J., 1966).
- William H. Maehl, 'August Bebel and the Development of a Responsible German Socialist Foreign Policy', *Journal of European Studies*, I. 6 (1976).
- Harry J. Marks, 'Sources of Reformism in the Social Democratic Party of Germany: 1890—1914', *Journal of Modern History*, XI, 3 (1939).
- J. P. Nettl, 'The German Social-Democratic Party 1890—1914 as a Political Model', *Past and Present*, 30 (1965).
- Gerhart Niemeyer, 'The Second International: 1889—1914', in M. M. Drachkovitch (ed.), *The Revolutionary Internationals* (Stanford, 1964).
- Stanley Pierson, *Marxist Intellectuals and the Working Class Mentality in Germany 1887—1912* (Cambridge, 1993).

Günter Roth, *The Social Democrats in Imperial Germany* (Totowa, N.J., 1963).

Bertrand Russell, *German Social Democracy* (London, 1965).

Carl K. Schorske, *German Social Democracy, 1905—1917: The Development of the Great Schism* (Cambridge, Mass., 1955).

J. Stanley (ed.), *From Georges Sorel: Essays in Socialism and Philosophy* (Oxford, 1977).

Hans-Josef Steinberg, *Sozialismus und deutsche Sozialdemokratie: zur Ideologie der Partei vor dem Weltkrieg* (2nd edn, Hanover, 1969; 3rd edn, Bonn, 1972).

Bernstein: Texts

Edward Bernstein, *Cromwell and Communism* (London, 1930).

—*Evolutionary Socialism: A Criticism and Affirmation*, introduced by Sidney Hook (New York, 1961).

—*Ferdinand Lassalle as a Social Reformer* (London, 1893).

—*My Years of Exile: Reminiscences of a Socialist* (London, 1921).

H. Tudor and J. M. Tudor (eds), *Marxism and Social Democracy: The Revisionist Debate, 1890—1896* (London, 1988).

Bernstein: Commentaries

Sydney D. Bailey, 'The Revision of Marxism', *The Review of Politics*, 16 (1954).

Charles F. Elliot, 'Quis custodiet sacra? Problems of Marxist Revisionism',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Ideas*, 28 (1967).

Peter Gay, *The Dilemma of Democratic Socialism: Edward Bernstein's Challenge to Marx* (New York, 1962).

Christian Gneuss, 'The Precursor: Edward Bernstein', in L. Labedz (ed.), *Revisionism: Essays in the History of Marxist Ideas* (London, 1962).

Kautsky: Texts

Karl Kautsky, *Bolshevism at a Deadlock* (London, 1931).

—*The Class Struggle* (Chicago, 1910).

—*Communism in Central Europe in the Time of the Reformation* (London, 1897).

—*The Dictatorship of the Proletariat*, introduced by John H. Kautsky (Ann Arbor, 1964).

—*The Economic Doctrines of Karl Marx* (London, 1925)

—*Ethics and the Materialist Conception of History* (Chicago, 1907).

—*The Foundations of Christianity: A Study in Christian Origins* (London, 1925).

—*Ireland* (Belfast, 1974).

—*The Road to Power* (Chicago, 1909).

—*Socialism and Colonial Policy: An Analysis* (Belfast, 1975).

—*Terrorism and Communism* (London, 1920).

—*Thomas More and His Utopia* (London, 1927).

Kautsky: Commentaries

R. Geary, *Karl Kautsky* (Manchester, 1987).

L. Kolakowski, *Main Currents of Marxism* (Oxford, 1978) vol. 2, ch. 2.

G. Lichtheim, *Marxism* (London, 1964) part 5, section 5.

M. Salvadori, *Kautsky and the Socialist Revolution* (New York, 1979).



马克思主义研究译丛

第三章 激进派

引言

到 1905 年，修正主义的论争实际上已经结束。在这场论争中，那些后来以“左翼激进派”面目出现的人所持的观点，与考茨基的观点并无多大差别。真正的决裂发生在 1910 年，当时党所经历的渐变过程开始明朗化了。关于这一过程，有如下精彩的描述：

意识形态，即日益外向的老一套革命意识形态，越来越成为专门维持内部团结的手段了。由于各级组织继续推行“务实”的政

策（参加各种选举、工会活动、企图在德国国会内与资产阶级政党结成集团），理论与实践之间的鸿沟不可避免地扩大了。因此，越来越有必要吹嘘意识形态的坚定性，来粉饰毫无价值的实际政治活动（这些无价值的政治活动都是经允许的）。党的工作的下级组织反而成了发迹之所、进身之阶，而不是生死斗争的基地；党的代表大会不再是制定法律和政策的最大大会，而变成了一年一度的仪式，在这种仪式上，意识形态受到推崇，与会者从中得到了充分的精神满足而离去，足以使他们的同志们相应地也心里亮堂起来。除了让执行人员及官僚主义蔓延外，这种组织结构一仍其久，只是其职能以及连同滋生的权力集中却发生了巨大的变化。^[1]

然而，直到1918年底，在共产党建立时，激进派才开始形成一个独立的政党，此前仅仅是德国社会民主党内一个压力集团而已。而且，当时激进派大多数是外乡人，主要是犹太人的血统，他们不安地徘徊在德国内外的各种社会主义运动之间。仅有两位著名的了解内幕的“本地人”（insider），他们是梅林（Mehring）和李卜克内西（Liebknecht）。弗兰茨·梅林是一位才华横溢的政治记者，他把历史唯物主义原理运用于德国——尤其用于德国社会民主党和普鲁士的研究中。他在文艺批评领域内是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开拓者。他注重作家们的伟大成就与其阶级抱负之间的关系，认为最佳的文学出自新兴的阶级。他对18世纪和19世纪德国文学的研究，特别是他1893年写的《莱辛传奇》（*Lessing Legende*），受到了恩格斯的颂扬。梅林还编辑了几部马克思的早期著作，并著有经典的《马克思传》。卡尔·李卜克内西是德国社会民主党于1914年惟一投票反对战争预算的代表。他尤以其《军国主义和反军国主义》一书驰名于世，该书也是第二国际分析资产阶级国家机器职能的最佳著作之一。除外乡人外，激进派的力量来自非德国人。帕尔乌斯（Parvus，真名为伊斯雷尔·赫尔普汉德 Israel Helphand）是党内批判修正主义最严厉的批评家，也是“机会主义”一词的首创者，他是出生于敖德萨的俄国犹太人。^[2]安东尼·潘涅库克（Anton Pannekoek）是一位荷兰天文学家，他经常为德国党报撰稿参加论战。^[3]卡尔·拉狄克（Karl Radek）出生于加利西亚，在1914年定居俄国以前，是德国社会民主党左翼的一位积极活动的记者。^[4]最后，激进派中的最杰出者是出生于波兰东南部的罗莎·卢森堡（Rosa Luxemburg）。



卢森堡：社会改良还是革命

自然地，激进派大声疾呼地反对伯恩施坦，尽管他们在那个阶段的思想与考茨基并无殊异。帕尔乌斯在1898年1月至3月的《萨克森工人报》(*Sächsische Arbeiterzeitung*)上，首先对伯恩施坦发起了抨击。他的主要论点是：“从社会主义工人运动内部一切机会主义错误的根源中，可以发现一个共同的特征：不能按一种有机的计划把党的当前工作同它的社会革命目标结合起来。在他们的心目中，这是互相分离的两个方面：这里是‘目标’；那里是当前的任务。他们至多只承认一种平行论：为社会革命而鼓动和在资本主义国家内部从事活动。”^[5]但是，对伯恩施坦抨击得最猛烈的是罗莎·卢森堡，她于同年在《莱比锡人民报》(*Leipziger Volkszeitung*)上发表文章，这些文章在1899年以《社会改良还是革命?》为题再版成书。这篇文笔精练而有力的论战文章已成为激进马克思主义的少数经典著作之一。卢森堡最初的论点是，“在社会改良和革命之间存在着密不可分的联系”^[6]。她还说，伯恩施坦承认他只注重手段（社会改良），不注重目的（革命）。但是，伯恩施坦所理解的“改良”意味着放弃资本主义崩溃论这一“科学社会主义的基石”。“如果同伯恩施坦一样承认资本主义的发展不走向其自身的灭亡，那么社会主义将不再是客观必然的了。”^[7]

更为具体地，卢森堡对伯恩施坦在经济学、社会学和政治学这三个相互关联的领域中所得出的一些结论进行了抨击。她宣称，在经济学领域内，伯恩施坦所说的稳定资本主义的信贷和卡特尔化，产生了相反的效果：信贷使生产和所有权分离的现象加剧，从而扩大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卡特尔化则加剧了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有组织的资本与工人阶级之间、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国际性与资本主义国家的民族性之间的矛盾。由此可见，尽管当时处于平静时期，但严重的危机仍将在所难免。

关于伯恩施坦的社会学说，卢森堡宣称，他的错误在于否认中产阶级的消失。中等企业的表面复苏并不能削弱马克思的崩溃理论：

中等企业反对大资本的斗争，不能被视为实力较弱的部队持续被直接和大量歼灭的一场常规战争，而应视为小资本的定期被摧毁又迅速再

生，而再为大工业所摧毁。这两种趋势君临着中等资产阶级各个阶层，而与工人阶级的发展相反，其下降趋势终将取胜。下降趋势取胜本身并不必然表现为中等企业的绝对数减少，却表现为：首先是旧生产部门企业运转所必需的最小量资本逐渐增加，其次是小资本家剥削新生产部门的机会的间隔时间在不断缩短。就小资本家而言，其结果是经济生命逐渐缩短，生产和投资的方法变化得更快；就整个阶级而言，社会新陈代谢的加速度愈来愈快。^[8]

联合股份公司造成资本的大量集中，从而恰恰使生产和所有权分离了。在也许是整个论战中关键性的段落中，卢森堡写道：

伯恩施坦把“资本家”这一概念从生产关系中搬到财产关系中，把“企业家”称为“人”而不称为企业家。这样，他就把社会主义问题从生产领域转到财富关系领域，即从劳资关系转到贫富关系。^[9]

卢森堡还驳斥了伯恩施坦把希望寄托到合作社和工会上的想法。在她看来，合作社只不过是资本主义中的一种混合形式。至于工会，由于遭遇到不断增长的失业威胁的中产阶级的无产阶级化和劳动生产率的增长这两个相伴相生的过程，它那种能扩大惠及工人阶级的社会财富比重的作用是注定要受挫的。工会斗争便成了“一种西西弗斯的劳作（徒劳无功）”^[10]。就因为这一说法，罗莎·卢森堡招致了工会领导人直接而长久的憎恨。

第三，卢森堡宣称，伯恩施坦对政治民主的信念是一种错误，这有两个原因：首先，民主制度“大体上已丧失促进资本主义发展的作用”^[11]。她并不否认议会斗争的重要性，但确切地说，她的理由是从反面提出的：正是议会斗争的无效才使无产阶级确信，要进行任何根本的变革，就必须夺取政权。更重要的是，卢森堡坚持认为，“资本主义的财产结构和资本主义国家是向截然不同的方向发展”^[12]。资本主义社会的特征表现在这样一个事实上，即雇佣劳动不是一种法律关系，而仅仅是一种经济关系：“在我们的整个司法体系中，没有一条法律条文规定现存的阶级统治。”^[13]而这就是说，伯恩施坦所鼓吹的那种政治改良和法律改良不可能解决问题。

总之，卢森堡的结论是，伯恩施坦的观点是机械论的、不合乎辩证

法的：

合法改良和革命是历史进程中不同的方法，并不像挑选冷热香肠那样，可以在历史的柜台上任意拿取。它们是阶级社会发展的不同环节，互相制约、互相补充，同时又互相排斥。这种关系就像南极和北极、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关系一样。^[14]

卢森堡的这本小册子绝非什么创新——或许她关于资产阶级统治是超法律的思想是个例外。^[15]恰恰相反，她宣称要捍卫德国社会民主党的传统策略，反对伯恩施坦的革新。她捍卫历史唯物主义的传统命题和革命的客观必然性，这与考茨基并无二致——尽管她很快地起来抨击伯恩施坦，而考茨基起初则顾及友情而踌躇不前。在支持议会斗争中，她仍然想把改良主义的做法同革命的理论统一起来。当时，只有列宁一人主张另一条途径。

卢森堡：意识与活动

虽然《社会改良还是革命?》这篇著作并不表明罗莎·卢森堡脱离了德国社会民主党的领导层，但她紧靠1905年俄国革命前后所写的著作，却显示出某种明确的倾向性。那些年，生活费用上涨和市场紧缩，使工人阶级的抗议活动大大加剧。正是在这种背景下，罗莎·卢森堡开始阐发她关于阶级意识的思想。在《社会改良还是革命?》中，她就已经谈到了工会活动和政治斗争的重要性，因为，“通过这些活动和斗争，无产阶级的觉悟即意识就成为社会主义的，无产阶级就被组织成一个阶级了”^[16]。正是从这一观点出发，她于1904年刊载在《新时代》上的《俄国社会民主党的组织问题》一文，就批评了列宁的《进一步，退两步》。在该文中，她竭力强调了领袖与群众之间的“辩证”关系，以反对被她视为中央委员会的机械控制现象。在她看来，列宁的思想是“把布朗基式密谋集团运动的组织原则机械地搬到工人群众的社会民主党运动中来”^[17]。卢森堡赞扬了后来几年俄国工人阶级示威运动的“自发”性。在她看来，中央集权制“无非是工人阶级中有觉悟的和战斗的先锋队的意志的强制性综合（与它的各个集团和成员相对而言）。这也可以说是，无产阶级领导层的‘自我集中制’，是无产阶级在自己的党

组织内部的多数人统治”^[18]。在德国，分权确实助长了修正主义运动——但这并不是俄国推行中央集权制的理由。卢森堡倾向于把列宁的观点看成伯恩施坦的左翼写照，即一种宗派主义。正如伯恩施坦把运动和其目的隔离开来一样，这种宗派主义把党和群众隔离开来。列宁颂扬工厂的纪律对无产阶级的影响，这也是不正确的，因为俄国下一次革命是资产阶级革命，而官僚主义的纪律只能很快地有利于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剥削。最后，卢森堡坚持认为，机会主义不可能被一份精致的党章（不论它有多么完备）所根除。她总结说：

然而，在一部分俄国社会民主党人中，这样迫切地试图通过无所不知和无所不在的中央委员会的监管，以防止充满希望的、生气勃勃的俄国工人运动出现失误，我们知道这就是一再同俄国社会主义运动开玩笑的主观主义……但是现在，这位俄国革命家的“自我”迅速把事情颠倒过来，再一次宣布自己是历史的全能舵手——这一次是以社会民主工人运动中央委员会主宰者的身份出现。但是，机敏善变的政客却没有看到，起这种舵手作用的真正主体是工人阶级这个集体的“我”；这个集体的“我”坚决要求有自己犯错误的权利，有自己学习历史辩证法的权利。最后，我们自己还必须坦率地承认，真正革命的工人运动所犯的错误同可能是最好的、一贯正确的“中央委员会”相比，在历史上要有成效得多、有价值得多。^[19]

当然，卢森堡强调党作为鼓动者而不是作为组织者一面，多半是出自她在德国形势下的经历，当时，她认为群众要比领导激进一些。^[20]

卢森堡革命观的核心是“自发性”概念。这一概念后来在正统共产党人使用时成了一个被滥用的术语：因为如果革命是由资本主义发展进程自行产生的，如果工人起义是自发的，那么就没有“先锋党”的用武之地了。^[21]从另一种角度来看，“自发性”概念与19世纪40年代马克思关于意识与革命的思想（宿命论在其中不起作用）多么惊人地相似。还应当指出的是，卢森堡关于“自发性”的思想越明确，她对德国社会民主党就越感到不满意。当然，“自发性”指的是行动上的自发性，而不是理论上的自发性。^[22]她从来不否认必须有创造性的领导。

在卢森堡看来，自发性的具体表现是群众罢工。以前，德国社会民主党

人对群众罢工持怀疑态度，认为它源自无政府主义。但是，1903—1904年工人罢工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就（特别在比利时），从而使人们日益注重这一“自发性”观念；甚至伯恩斯坦也倡导群众罢工，把它当做对侵犯普选权的一种可能的回击。考茨基也对这一观念表示谨慎的欢迎，因为它在1905年的俄国革命中已获得了相当大的推广。1905年在耶拿举行的党代表大会可能是德国社会民主党所有代表大会中最激进的一次，这次大会通过了倍倍尔提出的关于群众罢工的充满矛盾的决议，它首先是把罢工当做一种防御性策略。其实也仅仅止于防御，因为在同年晚些时候，面对限制普选权的强硬措施，由于俄国革命的失败，加之党的执行委员会的淡漠，运用群众罢工的努力已逐渐停息了。工会领导人强烈反对提及群众罢工，他们认为群众罢工危害他们逐步赢得的收益、精心经营的组织、财政供给和集中领导。在1905年的科隆党代表大会上，他们谴责了有关群众罢工的思想，附带还谴责了党内激进的一翼。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罗莎·卢森堡撰写了《群众罢工、党和工会》的小册子，力求把工会的经济改良主义和政治行动之间的鸿沟弥合起来。她想要阐明，群众罢工不再是无政府主义者的工具，因此现在再沿用恩格斯以前对此问题的批判已不恰当了。至于工会的反对，大体上也是不中肯的，因为俄国革命的主要教训是“群众罢工不是‘人为’的，也不是凭空‘决定’，更不是‘鼓动’出来的。相反，它是在一定时期遵循历史必然性而从社会关系中产生出来的一种历史现象”^[23]。然后，她分析了1905年俄国群众罢工的作用，并得出三条主要结论。第一，群众罢工不是一种孤立的行动，相反是一个“持续数年或数十年整个阶级斗争时期的整体性概念体现出来的征兆”^[24]。第二，群众罢工中的经济因素和政治因素是不可分割的：

经济斗争是把政治斗争从一个关节点引到另一个关节点的斗争；政治斗争是定期为经济斗争的土壤施肥的斗争。在这里，原因和结果不断更换位置。因此，不像学究式的看法那样，二者远不是完全分离、或乃至互相排斥的，群众罢工时期的政治因素和经济因素只是形成了俄国无产阶级斗争中两个互相交织在一起的方面，而且二者的统一正是群众罢工。^[25]

第三，不是群众罢工导致革命，而是相反：正是革命创造了条件，使群众罢

工中的政治因素和经济因素能够融合在一起。在归纳上述观点的一段话中，她写道：

如果群众罢工并不表示一个单独的行动，而是表示阶级斗争的整个时期，如果把阶级斗争时期等同于革命时期，那么很明显，群众罢工是不能随意号召的，哪怕号召的决定是出自最强大的社会民主党的最高委员会。只要社会民主党不能根据它自己对形势的估计发动或取消革命，那么，即使社会民主党的队伍热情多么高昂和多么跃跃欲试，也不足以形成一个真正的作为生动有力的人民运动的群众罢工时期。^[26]

卢森堡认为，自发性因素在所有的俄国罢工行动中起了巨大的作用。这不是因为俄国无产阶级有“不受教育的”天赋，而是因为“革命不允许任何人充当他们的老师”^[27]。当然，这并不是说领导是不必要的。卢森堡对领导的作用作了如下的归纳：

提出斗争的口号和方向；制定政治斗争的策略，以便无产阶级现有的、已解放出来的积极力量的总和在斗争的各个阶段和每时每刻都会实现出来，并在党的斗争立场上表达出来；务必使社会民主党的策略在坚决性和准确性上，绝不低于、甚至高于实际力量对比的水平——这就是群众罢工时期“领导”最重要的任务。^[28]

在这本小册子的最后几节中，卢森堡力图表明，俄国群众罢工取得较大的成就不是由于俄国的落后。俄国工人同德国工人在经济和社会状况上，比一般想像的更为相似。德国工会也不能争辩说，他们组织得不够充分，难以发动群众罢工。组织和斗争是辩证的统一。工会显然忽视了的是阶级意识：

社会民主党灌输给启蒙了的德国工人的阶级意识是理论上的、潜在的，因为在资产阶级议会制统治时期，阶级意识通常是不能作为群众的直接行动而活跃起来的……在革命中，群众登上了政治舞台，阶级意识才成为实际的、活跃的。^[29]

最后，卢森堡抨击了那种认为工会和党享有“平等权威”的思想。工会

是整个运动的一部分，但从非常特定的意义来说，工会运动不是与其领导人相一致的，而是“存在于已被争取过来进行阶级斗争的无产阶级群众的意识之中的事物”^[30]。

倡导群众罢工的并非只有卢森堡一人。伯恩施坦也因鼓吹群众罢工以实现某些具体的改良而使其工会伙伴感到焦恼；而在倍倍尔和社会民主党领导看来，群众罢工是防御措施的最后一招；最后，甚至连考茨基也没有超越这一立场。^[31]卢森堡则进一步认为，群众罢工意义更为深远，它代表了她整个的政治战略。她最初虽然主张以传统的议会策略为辅助，后来便开始转向这样一种立场（与她发展着的帝国主义观点相关联），即把议会活动归之于过时的斗争阶段。从这个意义上讲，拉狄克（Radek）说卢森堡论《群众罢工》这本小册子标志着共产主义运动在德国开始脱离了社会民主党，这种说法是确切的。^[32]在当时的德国形势下，她的观点显然过于乐观，而从短期看，考茨基是正确的。德国与俄国极少共同之处。列宁确实认为考茨基的观点是现实主义的，甚至连急躁的帕尔乌斯也认为卢森堡没有考虑到政治形势的种种现实。耶拿代表大会标志着德国社会民主党内的激进主义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而工会领导人反对群众总罢工的思想，并赞同党的书记奥尔（Auer）所持的观点，即认为，“总罢工全然没有意义”^[33]。1906年，他们开始反击，在曼海姆代表大会（正是卢森堡写出的《群众罢工》这本小册子施加影响的那次代表大会）上，尽管考茨基反对，仍然还是明确规定：工会与党的关系是平等的，而不是从属于党的，没有工会的同意（极不太可能不同意），不得发动任何群众罢工。于是，耶拿代表大会的精神被推翻了，通过更难以对付的工会的诸多影响，修正主义重新渗入党内。

卢森堡：帝国主义

群众罢工的学说是与关于帝国主义的思想密切相关的。在左翼激进派中，有一个共同的观点，即帝国主义和随后产生的军国主义意味着官僚主义的权力更大，而议会的权力更小，因而必须采取直接行动。从20世纪初开始，艾斯纳（Eisner）、李卜克内西和考茨基都指出，帝国主义的发展和社会主义的兴起是齐头并进的。^[34]在这方面最重要的著作是罗莎·卢森堡的《资本的积累》。她原先一直研究经济学，1907年，她在柏林的党校执教，

主要讲授经济学。她写好讲稿后，便随即编成简明《政治经济学入门》一书。1911年，她特别对资本的再生产问题感兴趣，而于1913年发表了最杰出的著作——《资本的积累》。她从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二卷中所提出的简单再生产和扩大再生产的模式出发，着手进行阐述。她对马克思的主要批评是，一旦把技术革新引进他的扩大再生产模式，就解释不了在这种封闭的体系中怎样才能吸收随后产生的剩余产品，因为对这种体系说来，不存在任何要求剩余价值积累的理由。在广泛研讨了古典经济学家和俄国合法马克思主义者对这个问题的论述以后，卢森堡提出了自己的解决办法。那就是：必须放弃封闭体系的想法；剩余的实现是靠把产品销售给非资本主义国家。“决定性的事实是，剩余价值的实现既不能靠把产品销售给工人，也不能靠销售给资本家，只有靠把产品销售给那些非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的社会组织或阶层。”^[35]因此，就出现了殖民地扩张现象。卢森堡有几段话对农业社会的解体阐述得很精辟，并着重强调了军国主义的经济作用。因此，资本主义之所以能发展，恰恰是有前资本主义社会可供剥削。当所有这些社会都已纳入资本主义积累过程时，资本主义制度就会崩溃，因为“资本主义之所以能继续存在下去，正是靠吸纳那些惟一能确保其生存的条件”^[36]。所以，

资本愈是残酷无情地消灭国内和外部世界的非资本主义阶层，就会愈加降低全部工人的生活标准，资本的日常演进史中的变化也就愈大。这就造成了一系列的政治和社会灾难与骚动，在这些条件下，积累由于被周期性经济灾难或危机所中断，便不能再继续下去了……发展到一定的阶段，除了采用社会主义原则，便别无他途了。^[37]

当时没有一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赞同《资本的积累》中的这些结论。这部著作之所以一直受到批评，基于两个主要原因：第一，当时人们大多批评这部著作持的是技术经济论，而且普遍认为她对马克思的批评是错误的。^[38]第二，卢森堡关于资本主义在多大程度上自动崩溃的想法，被认为相当含糊不清。她似乎决然地相信，某种崩溃理论对制定正确的社会主义战略是必需的。对此，列宁当然不同意。卢森堡的自动崩溃论，连同人们认为她自发性观点中固有的宿命论，后来都成为列宁主义连珠炮似的猛攻的目标。^[39]当然，这些批判很多是完全错误的，因为卢森堡肯定不比马克思本人更崇信“宿命论”。^[40]无论在有关再生产的较为技术性问题上出现了多大的

思想混乱，但她对经济帝国主义及其对不发达社会的破坏性影响的广泛论述仍然是中肯的。

社会民主党的分裂

从1906年起，激进派在党内的处境日趋困难。在与修正主义的争论期间，他们大抵居于支配的地位，因而是集权制的支持者。然而，由于工会在策略上与执行委员会取得了一致，其影响已显露出来，激进派愈来愈受到排挤。肖尔斯克（Schorske）在论述这段时期的经典著作中这样写道：

可以认为，在我们这段时期，持反革命态度的工会主义者较之社会民主党更准确地代表了工人群众。工会领导人通过把党所不能组织的那些工人组织起来，得以把政治上消极的工人所持的主观看法传输到社会民主党内，而党的执行委员会则成了他们的代理人。从这个意义来说，工会所赢得的胜利使党较之1906年以前更代表德国工人。然而这里包含着致命的困难：工会的官僚主义由于在现存的制度中有共同的利益，永远是反革命的。工人阶级并不完全那样，因而党既代表了无产阶级的革命潜力，也代表了其改良主义现状。在我们这段时期，党在工会面前屈服，放弃其政治灵活性，这就为随后的瓦解铺平了道路。^[41]

党的组织助长了一种总的保守趋势，那就是，到1906年，官僚主义分子在执行委员会内占大多数，而行政管理方面又日益脱离政治。到1911年，艾伯特（Ebert）这个社会民主党新官僚的化身，成了党内最有影响力的人物。1910年短暂的激进化、罢工浪潮以及对选举改革的鼓动，使考茨基和卢森堡之间产生了分裂。考茨基拒绝在《新时代》上发表她的《现在怎么办？》这篇文章，原因是该文鼓吹群众罢工和共和主义。她把对党的领导的总看法作了如下的概述：

甚至在无产阶级的政党内，每一次具有决定性的大运动决不能来自一小撮领导人的倡议，而应来自支持党的那些群众的决心和信心。当前普鲁士为争取选举权而斗争所作出的决定……（包括发动群众罢工的决

定）“必定”只能由党内最广泛的集团作出。^[42]

1912年的竞选运动是修正主义者最终获胜的标志，那场竞选是为了达到与各资产阶级政党最大限度的合作而策划的。^[43]

基于这样的背景，社会民主党的国会代表中，除李卜克内西一人外，都决定投票赞成1914年的战争预算，这就不足为奇了。从20世纪初起，李卜克内西和艾斯纳二人都敦促党严肃看待军国主义和帝国主义问题。然而，在1907年第二国际斯图加特代表大会上，社会民主党代表团引人注目地对军国主义和战争问题采取了保守的立场，甚至主张对殖民主义持积极态度。出于害怕实施反社会党人法、害怕被沙皇俄国击败，工会事先决定同政府合作；尤其害怕失去工人阶级的支持，所有这一切都影响了8月4日的选举。

到1912年，左翼激进派在社会民主党内部开始形成一股凝聚的力量，它同时强调群众罢工（一般性的群众行动）和帝国主义同是核心的政治现象。随着战争的发展和反战的加剧，社会民主党的分裂达到了顶点。到1917年初，斯巴达克派（Spartacist，左翼激进派的称号）和持反对立场的中间派都被驱逐出党。于是组成了德国独立社会党（*Unabhängige Sozialistische Partei Deutschlands*, USPD），它包括从斯巴达克派到考茨基等所有的人，甚至包括和平主义者伯恩施坦。从一开始，左翼激进派就不容忍任何妥协。罗莎·卢森堡的《朱尼厄斯的小册子》（其中对第二国际的瓦解作了深刻的分析）与标题很是切题的《非此即彼》对他们的态度作了最好的阐述。这两本著作都已由斯巴达克联盟发表，其主要观点是：全面反对战争，把战争视为不同国家资产阶级之间的帝国主义竞争；顺理成章地强调国际主义；依靠群众的行动来达到他们的目标。与这后一种观点相关联的是对布尔什维克革命的评论，这种评论是1918年卢森堡在狱中写的。虽然她比列宁更不信任资产阶级民主的作用，也不同意列宁对农民的那股热情，但就一般而言，她还是赞同列宁关于在俄国有可能进行以无产阶级为先锋的资产阶级革命的观点。^[44]而且，她高度赞扬了1917年事件：

列宁的党是惟一担当真正革命政党的义务和责任的党；他们提出了“一切权力归无产阶级和农民”的口号，从而确保了革命不断向前推进。这样，布尔什维克便解决了“赢得人民的大多数”这一著名的问题，而

这个问题经常像梦魇一样压在德国社会民主党身上。^[45]

但她也批评了看似布尔什维克成功的必要条件的那些东西。因为在她看来，把土地收归国有比剥夺土地并分配给农民更可取；在俄国强调民族自决是错误的；布尔什维克解散立宪议会是错误的；此外还有：

仅仅支持政府的人享有自由，仅仅一个党的成员享有自由（不论其成员多么众多），便根本不是什么自由。自由永远是、而且仅仅是授予拥有不同思想的人的自由。这不是出于对“正义”的任何狂热的概念，而是由于所有那些在政治自由中具有指导意义的、有益的、纯粹的东西都是由上述本质特征决定的；当“自由”变为特权时，其效力便化为乌有了……列宁所运用的手段是完全错误的。法令、工厂监工的专政力量、残酷的刑罚、恐怖统治，所有这些东西只不过是治标的办法。走向新生的唯一途径是公众接受生活本身的教育，是最无限制的、最广泛的民主和公众舆论的畅通。恐怖统治才产生蜕化。^[46]

到底卢森堡在临终前的几个月内，在多大程度上改变或修改了上述观点，仍然是个有争议的问题。^[47]

结果是，斯巴达克联盟对1918年11月至1919年1月的骚动事件影响甚微。直到1918年最后几天，这个联盟还是德国独立社会党内的一个压力集团，只是于1919年1月1日才转变为德国共产党（*Kommunistische Partei Deutschlands*, KPD）。这个党只包括一些孤立的小宣传集团。1918年10月，社会民主党终于掌握政权（这是它彻底采取被动、容忍态度的典型后果）时，斯巴达克联盟及时反对了政府的议会形式，但它处在那种地位已是毫无建树的了。同年12月，斯巴达克联盟发布其纲领，正式承诺：“除非反映德国全体无产阶级绝大多数人明确无误的意志，决不推翻政权。”^[48]

当1月初发生大规模街道示威之后，社会民主党政府出来执行指令时，曾爆发一次武装起义，它在几天内就逐渐平息下来。这次起义既非为斯巴达克联盟所发动，也未受其控制，更与它的目标不一致。但是起义却为政府提供了镇压极左派的机会，而且，卢森堡和李卜克内西二人均遭杀害。后来，德国的社会主义便分化为布尔什维化的德国共产党和社会民主党，而在后者

那里，人们日益难以找到马克思主义的痕迹。^[49]

〔注释〕

[1] J. P. Nettl, *Rosa Luxemburg*, abridged edition (Oxford, 1969) p. 151.

[2] 参见 Z. Zeman and W. B. Scharlau, *The Merchant of Revolution* (London, 1965)。对帕尔乌斯的论述，可进一步参见该译本第 86 页以下。

[3] 进一步参见该译本第 192 页以下。

[4] 参见 W. Lerner, *Karl Radek: The Last Internationalist* (Stanford, 1970)。

[5] Parvus, 'Der Opportunismus in der Praxis', *Die Neue Zeit*, vol. 19, p. 660.

[6] R. Luxemburg, 'Social Reform or Revolution', in *Selected Political Writings*, ed. D. Howard (London and New York, 1971) p. 52.

[7] *Ibid.*, p. 58.

[8] *Ibid.*, pp. 70f.

[9] *Ibid.*, pp. 96f; 还可参见 p. 107。

[10] *Ibid.*, p. 105.

[11] *Ibid.*, p. 110.

[12] *Ibid.*, p. 112.

[13] *Ibid.*, p. 116.

[14] *Ibid.*, p. 115.

[15] 进一步参见 J. P. Nettl, *Rosa Luxemburg*, abridged edition (Oxford, 1969) p. 134.

[16] R. Luxemburg, *op. cit.*, p. 86.

[17] R. Luxemburg, 'Organizational Questions of Russian Social Democracy', *Selected Political Writings*, p. 290。对列宁当时的观点更细微的描述，见本书第 94 页以下。另见 N. Geras, 'Rosa Luxemburg after 1905', *New Left Review*, 89 (1975) pp. 41f。在那里谈到了卢森堡后来改变了对布朗基主义指责的方式。

[18] R. Luxemburg, *op. cit.*, p. 290.

[19] *Ibid.*, pp. 305f.

[20] 关于德国马克思主义者与俄国马克思主义者在这一时期的接触，可参见 P. Lösche, *Der Bolschewismus im Urteil der deutschen Sozialdemokratie* (Berlin, 1967) ch. 2; and C. Weil, *Marxistes russes et Social-democratie allemande 1898—1904* (Paris, 1977)。

[21] 参见 N. Geras, 'Rosa Luxemburg's Concept of Collapse', *New Left Review*,

82 (1973) p. 20.

[22] J. P. Nettl, *Rosa Luxemburg*, abridged edition (Oxford, 1969) p. 154.

[23] R. Luxemburg, 'Mass Strike, Party and Trade Union', *Selected Political Writings*, p. 231.

[24] Ibid., p. 237.

[25] Ibid., p. 241.

[26] Ibid., p. 244.

[27] Ibid., p. 245.

[28] Ibid., p. 247.

[29] R. Luxemburg, *Politische Schriften* (Leipzig, 1969) p. 194.

[30] R. Luxemburg, 'Mass Strike, Party and Trade Union', *Selected Political Writings*, p. 270.

[31] 见该译本第 32 页以下。

[32] K. Radek, *Rosa Luxemburg, Karl Liebknecht, Leo Jogiches* (Hamburg, 1921) p. 15. 引自 J. P. Nettl, *Rosa Luxemburg*, abridged edition (Oxford, 1969) p. 205.

[33] *Protokoll über die Verhandlungen des Parteitages des SPD zu Mannheim* (Berlin, 1906) p. 246.

[34] 参见 H.-C. Schröder, *Sozialismus und Imperialismus. Die Auseinandersetzung der deutschen Sozialdemokratie mit dem Imperialismusproblem und der 'Weltpolitik' vor 1914* (Hanover, 1968)。

[35] R. Luxemburg, *The Accumulation of Capital* (London, 1971) pp. 351f. 关键性章节是第 26 章。

[36] Ibid., pp. 466f.

[37] Ibid.

[38] 参见她热情洋溢的答复, *The Accumulation of Capital-An Anti-Critique* edited with a good introduction by K. Tarbuck (London and New York, 1972)。另见 P. Sweezy, *The Theory of Capitalist Development* (New York, 1942) pp. 202ff. and T. Kemp, *Theories of Imperialism* (London, 1967)。更为同情性的论述, 见 J. 罗宾逊 (Robinson) 为《资本的积累》英译本写的序言。

[39] 参见 E. Stokes, 'Late Nineteenth Century Colonial Expansion and the Attack on the Theory of Economic Imperialism. A Case of Mistaken Identity?', *Historical Journal*, 12 (1969) pp. 297f.

[40] 参见 N. Geras, 'Rosa Luxemburg's Concept of Collapse', *New Left Review*, 82 (1973)。

[41] C. Schorske, *German Social Democracy 1905—1917* (Cambridge, Mass,

1955). p. 110.

[42] R. Luxemburg, 'The Next Step', *Selected Political Writings*, ed. R. Looker (London, 1972) p. 159.

[43] 关于党逐渐反映它所反对的国家体制的方式，见 G. Ritter, *Die Arbeiterbewegung im Wilhelminischen Reich* (Berlin, 1959)。

[44] N. Geras, 'Rosa Luxemburg after 1905', *New Left Review*, 89 (1975) pp. 21ff.

[45] R. Luxemburg, *The Russian Revolution*, ed. B. Wolfe (Ann Arbor, 1961) p. 38.

[46] *Ibid.*, pp. 69ff.

[47] J. P. Nettl, *Rosa Luxemburg*, abridged edition (Oxford, 1969) pp. 444ff. P. Lösche, *Der Bolschewismus im Urteil der deutschen Sozialdemokratie* (Berlin, 1967) pp. 134ff. 另见卢卡奇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中对卢森堡的答复（伦敦1971年，第272页以下）与杰拉斯在《罗莎·卢森堡的遗产》中的评价（伦敦1976年，第176页以下）。

[48] 'What does the Spartacus League want?', in R. Luxemburg, *Selected Political Writings*, ed. D. Howard (London and New York, 1971) p. 376.

[49] 进一步参见 D. Authier, J. Barrot, *La Gauche communiste en Allemagne 1918—1921* (Paris, 1976)。关于20世纪20年代的德国马克思主义，见本书第187页以下。

深入阅读材料

由卢柯 (Looker)、沃特斯 (Waters) 和霍华德 (Howard) 三人各自编辑的卢森堡选集都是很好的读本，它们都附有优秀的导论。还有戴维斯 (Davis) 所编的关于民族问题的专集和沃尔夫 (Wolfe) 所编的关于布尔什维克革命（有一个令人误解的书名——《列宁主义还是马克思主义？》）的专集。她的主要著作《资本的积累》内有 J. 罗宾逊 (Robinson) 的一篇很好的序言。另外，她其他次要一点的著作有《社会改良还是革命》、《群众罢工》等，都以小册子的形式发表。

对卢森堡的观点最佳的评论要数杰拉斯 (Geras) 的《罗莎·卢森堡的遗产》。就背景材料而言，可参见内特尔 (Nettl) 为她写的精彩传记，这部传记原本分上下两卷，也有一卷本的大部头节本。此外，有价值的相关著作还有巴索 (Basso) 的《罗莎·卢森堡：重新评估》（杜纳也斯卡亚 Dunayevskaya 作了热情洋溢的跟踪评述）和布朗纳 (Bronner) 的《罗莎·卢森堡：我们时代的革命者》。

论激进派其他人士，有泽曼 (Zeman) 和沙尔劳 (Scharlau) 合写得很漂亮的帕尔乌

斯传记，有雷纳（Lerner）对拉狄克所作的有点单薄的评论，还有迈耶（Meyer）对李卜克内西所作的更简练的描述。关于1918年那场流产的革命，参阅米沙克（Mishark）、瓦尔德曼（Waldmann）和哈佛纳（Haffner）分别写的著作。

参考文献

Luxemburg

Texts

Dick Howard (ed.), *Selected Political Writings of Rosa Luxemburg* (London and New York, 1971).

R. Looker (ed.), *Rosa Luxemburg: Selected Political Writings* (London, 1972).

Horace B. Davis (ed.), *The National Question: Selected Writings by Rosa Luxemburg* (New York, 1976).

Rosa Luxemburg, *The Accumulation of Capital*, Introduction by J. Robinson (London, 1971).

—*The Accumulation of Capital -An Anti-Critique* in Rosa Luxemburg and N. Bukharin, *Imperialism and the Accumulation of Capital*, ed. K. Tarbuck (London and New York, 1972).

— ‘The Belgian General Strike of 1902’ (five articles) in *Permanent Revolution* (Journal of Workers’ Fight), 1 (1973).

—*The Mass Strike, The Political Party and the Trade Unions* (New York, 1971).

—*The Russian Revolution and Leninism or Marxism?*, Introduction by B. D. Wolfe (Ann Arbor, 1961).

—*Social Reform or Revolution?* (London, n. d.).

M.-A. Waters (ed.), *Rosa Luxemburg Speaks* (New York, 1970).

Commentaries

Hannah Arendt, ‘Rosa Luxemburg: 1871—1919’, in *Men in Dark Times* (London, 1970).

L. Basso, ‘Rosa Luxemburg: The Dialectical Method’, *International Socialist Journal*, 16-17 (1966).

—*Rosa Luxemburg: A Reappraisal* (London, 1975).

Stephen Bronner, *Rosa Luxemburg: A Revolutionary for Our Times* (New York, 1987).

E. H. Carr, 'Red Rosa, 1917', in *1917: Before and After* (London, 1969).

F. L. Carsten, 'Freedom and Revolution: Rosa Luxemburg', in L. Lebedz (ed.), *Revisionism: Essays in the History of Marxist Ideas* (London, 1962).

Tony Cliff, *Rosa Luxemburg* (London, 1968).

Raya Dunayevskaya, *Rosa Luxemburg, Women's Liberation and Marx's Philosophy of Revolution* (Atlantic Highlands, 1982).

Paul Frölich, *Rosa Luxemburg: Her Life and Work* (London, 1940).

Norman Geras, *The Legacy of Rosa Luxemburg* (London, 1976).

G. Lee, 'Rosa Luxemburg and the Impact of Imperialism', *Economic Journal*, 81 (1971) 324.

George Lichtheim, 'Rosa Luxemburg', in *The Concept of Ideology and Other Essays* (New York, 1967).

George Lukács, 'The Marxism of Rosa Luxemburg', in *History and Class Consciousness* (London, 1971).

J. P. Nettl, *Rosa Luxemburg*, 2 vols (Oxford, 1966) (extensive bibliography, pp. 863-917); and abridged edition in one volume (Oxford, 1969).

E. Vollrath, 'Rosa Luxemburg's Theory of Revolution', *Social Research* 40, 1 (1973).

Other Radicals

Charles B. Burdick and Ralph H. Lutz, *The Political Institutions of the German Revolution: 1918—1919* (London, 1966).

Sebastian Haffner, *Failure of a Revolution: Germany 1918—1919* (Chicago, 1986).

Warren Lerner, *Karl Radek: The Last Internationalist* (Stanford, 1970).

Richard Lowenthal, 'The Bolshevisation of the Spartacus League', *St Antony's Papers*, 9 (London, 1960).

Franz Mehring, *On Historical Materialism* (New York, 1975).

Karl W. Meyers, *Karl Liebknecht: Man Without a Country* (Washington, 1957).

John W. Mishark, *The Road to Revolution: German Marxism and World War I. 1914—1919* (Detroit, 1967).

Allan Mitchell, *Revolution in Bavaria-1918—1919: The Eisner Regime and the Soviet Republic* (Princeton, 196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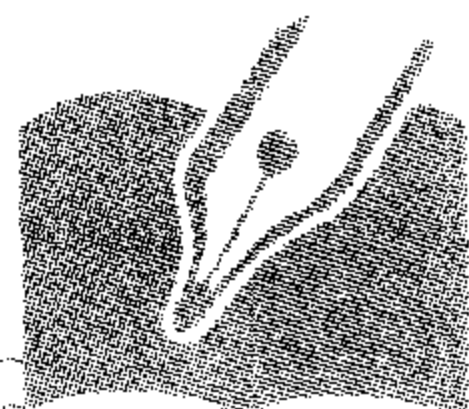
A. J. Ryder, *The German Revolution of 1918: A Study of German Socialism in War and Revolt* (Cambridge, 1967).

H. Schurer, 'Radek and the German Revolution', *Survey: A Journal of Soviet and East European Studies*, 53 (1964).

— 'Alexander Helphand -Parvus: Russian Revolutionary and German Patriot', *Russian Review* (1959).

Eric Waldmann, *The Spartakist Uprising of 1919 and the Crisis of the German Socialist Movement* (Milwaukee, 1958).

Z. Zeman and W. B. Scharlau, *The Merchant of Revolution: The Life of Alexander Israel Helphand [Parvus]* (London, 1965).



第四章 奥地利马克思主义

“奥地利马克思主义”一词是指奥地利社会主义者中的一种思想倾向。这种倾向始于1907年创办《马克思研究》(*Marxstudien*)这一颇具影响的刊物。奥地利马克思主义并不是一个政治组织或工人组织，而是一种思想流派。其主要代表人物是马克斯·阿德勒(Max Adler)、卡尔·伦纳(Karl Renner)、奥托·鲍威尔(Otto Bauer)，以及鲁道夫·希法亭(Rudolf Hilferding)。他们原初都是急于想解决马克思主义所面对的诸如新康德主义、边际经济学和民族问题等各个领域的新问题。

马克斯·阿德勒以新康德主义的观点对马克思作了最精辟的阐述。他主要是强调了认识论，



认为：经验是一种逻辑构造，因此先于精神与物质的区分。从某种意义上说，阿德勒把马克思的方法论视为康德的方法论：透过外表看其实在。阿德勒自称效法考茨基，宣称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历史的唯物主义，因而与哲学或世界观（Weltanschauung）无关。阿德勒的目的是要用一种以新康德主义形式出现的哲学来补充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他与福伦德（Vorländer）等德国新康德主义者的不同之处在于，他拒绝把社会主义看作伦理学的一条准则。马克思主义本身是科学的，因而与伦理学无关，而伦理学本身能够由对人性和社会的一种（康德式的）批判观建立起来。^[1]阿德勒虽然在哲学上接近唯心主义，但在政治上却属于奥地利党的激进派（这种结合以一种更为极端的形式存在于康德主义者卡尔·李卜克内西身上）。战后，他仍是工厂委员会的积极倡导者，而没有去鼓吹国家议会。^[2]

由于对无产阶级的革命潜力丧失了信心，卡尔·伦纳转向了奥地利党（战后惟一没有分裂的党）的右翼。他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所作的主要贡献是，把法律和经济的关系作为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个特例进行了开拓性的研究。但是，奥地利马克思主义的核心贡献在于鲍威尔和希法亭两人的政治学和经济著作。鲍威尔是奥地利马克思主义学派的主要政治思想家。他在关于民族问题^[3]（对于多民族的奥匈帝国的居民来说，这无疑是头等关心的问题）的主要著作中，特别强调了构成民族的心理因素与文化因素，并提出以联邦的形式作为实现民族自决的过渡。不同于列宁和罗莎·卢森堡，鲍威尔认为，民族共同体体现着同社会主义并行不悖的价值。在这本民族问题著作的结尾处，鲍威尔用一节的篇幅论述了帝国主义。这一节在当时具有罕见的创见。鲍威尔认为，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周期性萧条使得资本家进一步向利润率更高的不发达国家寻求势力范围。卡特尔和银行使这种寻求过程更容易了，因为资本家的投资能够受到关税的保护。鲍威尔还关注垄断资本主义与帝国主义的关系。^[4]后来，他还开展了对俄国革命的评判，他承认临时性的少数人专政的必要性，但这种专政只能是向多数人的民主过渡这一条件下的、正当的防卫措施。^[5]鲍威尔尖锐地批判了1930年前后苏联的“国家资本主义”。在1920年由奥地利社会民主党人、俄国孟什维克和其他欧洲工党共同组建的所谓“第二半国际”中，鲍威尔的观点占据了支配地位。

在《金融资本》（*Finanzkapital*）中，希法亭大量引用了鲍威尔关于帝国主义的论述。《金融资本》是奥地利马克思主义者最负盛名之作，考茨基把它形容为“不愧为《资本论》第二、三卷的续卷”^[6]。在回答庞·巴维克

（Böhm-Bawerk）对马克思的攻击时，希法亭提出了区分边际学派和马克思主义这两派经济学方法的明确界限，因而早就名噪一时了。^[7]在《金融资本》中，他一开始就分析了信用机构日益控制工业促使公司所有制不断壮大的趋势。这一趋势之所以加剧，是由于资本密集化产业为了保护自己免遭利润率下降的必然要求所致。社会上决策者的人数在缩减，日益实行自觉的调控和计划，而银行对卡特尔和托拉斯的控制则与日俱增：“工业资本中愈来愈多的部分不再归使用资本的工业家所有。他们只能运用资本，因为银行仍然是资本的占有者。另一方面，银行需要把投入工业中的更多的资本作为固定资本，于是银行在更大的规模上成为工业资本家。银行资本，即货币形式的资本，实际上已转化为工业资本，也就是我所称为的金融资本。”^[8]一旦国内竞争已经消除，便会产生要求关税保护以抵制外来竞争的压力，以便能够实行垄断价格政策。其结果是，国家权力加强，于是彻底同古典自由主义原则对立起来。希法亭著作中的某些段落，其内容经过了几十年，至今仍未丧失其洞察力和影响力。他写道：

金融资本不是力求自由，而是力求统治；它并不主张每个资本家有独立性，而是要他处于从属地位；它避免竞争的无政府状态而力求组织起来——当然，这只是为了能够进行更大规模的竞争。但为了实现这一点，为了维护和加强自己的统治，它需要国家行使一定的职能，通过关税政策保障自己的国内市场，并且更易于争夺国外市场。它需要一个政治上如此强大的国家，其贸易政策无须考虑其他国家的对抗性利益。最后，它需要一个强权国家来增进它在国外的金融利益，并运用其政治力量把恰当的供应贸易协定强加给小国；它需要的国家是能够在世界各地进行干涉，以便把整个世界变成本国金融资本投放的场所。金融资本需要强权国家推行扩张政策，把新殖民地纳入到它的势力范围内。^[9]

在民族主义、种族主义和军国主义思想观念的支持下，资本主义国家日益具有强权和侵略的本性，为垄断市场和原料来源而展开的竞争日趋激化，从而加剧了国际紧张局势。与此同时，以“垄断”性高价向国外倾销在国内滞销的商品，这一做法也在不断增多；另外，它还助长了在国外建立企业从而输出资本的倾向。这就导致了国与国之间的经济战和为扩大潜在市场而对不发达地区进行的武力扩张。在这个过程中，自由、民主和平等成了首当其



冲的牺牲品：

金融资本并不关心资本家利益的协调。它懂得竞争性争斗愈来愈变成争夺政治权力的斗争。随着和平的理念日益淡薄，人道思想被国家的大国和强权观念取代了……金融资本虽然是以经济为基础的，但通过对民族观念的严重歪曲（不再承认每个民族有政治自决和独立的权利，也不再从民族的角度来表达在一切人道的事物上平等的民主信念），也为自己进行意识形态上的辩护。垄断组织的经济优势，正是由其本民族所获得的统治地位反映出来的。于是，这个民族俨然命定般比其他一切民族优越。由于征服其他民族要靠暴力，因此习以为常地看来，对居于统治地位的民族来说，其优势似乎归功于其特殊的自然品质，即其种族的特性。这一种族主义的意识形态，冒充科学，构成了替金融资本追逐权力作合法性辩护的依据，借以证明其争夺行为的科学判决性和必然性。平等的民主观念被寡头统治的观念所取代了。^[10]

最终，整个过程以武装冲突而告终。“在敌对利益的激烈冲突中，资本巨头的专政最终将转化为无产阶级的专政。”^[11]因此，资本主义制度的崩溃，并不是由于纯经济上的原因，而是由于帝国主义战争开辟了革命的前景。

人们批评希法亭过分强调了金融资本的重要性，因为金融资本的主导作用并不能持久；还有人批评他只注重流通领域，而不注重生产领域——因此，他把危机只看作各个生产领域之间比例失调的结果。但总的说来，希法亭是第一个对帝国主义认真作出经济分析的人，他的这种分析为列宁论述帝国主义的著作奠定了基础。作为对垄断及其帝国主义后果的研究，希法亭的这本书在第二国际所有思想家的经济著作中，是最为引人注目的。

[注释]

[1] 参见 T. B. 博托摩尔 (Bottomore) 为题为《奥地利马克思主义》(牛津, 1978) 的文集写的序言, 见该书第 11 页以下。

[2] 特别参见 *Staatsauffassung des Marxismus* (Berlin, 1922) p. 188.

[3] O. Bauer, *Die Nationalitätenfrage und die Sozialdemokratie* (Vienna, 1907).

[4] 进一步参阅 G. Lichtheim, *Marxism* (New York and London, 1964) pp. 307f.

[5] Y. Bourdet (ed.), *Otto Bauer et la Révolution* (Paris, 1968).

[6] K. Kautsky, 'Finanzkapital und Krisen', *Die Neue Zeit*, vol. 29, p. 883.

[7] 庞·巴维克的著作和希法亭的答复已由 P. 斯威齐 (Sweezy) 作序出版 (纽约和伦敦, 1975)。

[8] R. Hilferding, *Das Finanzkapital*, ed. E. März (Frankfurt, 1968) vol. 2, p. 309.

[9] Ibid., pp. 456f.

[10] Ibid., pp. 457f.

[11] Ibid., p. 507.

深入阅读材料

有关奥地利马克思主义英文本文献寥寥无几。但也可参见莱塞尔 (Leser) 和克罗恩 (Croan) 的文章、克拉科夫斯基 (Kolakowski) 的《马克思主义的主要流派》第二卷；当然，尤其是《奥地利马克思主义》文选及其博托摩尔 (Bottomore) 所写的序言。还可参阅霍华德 (Howard) 和金 (King) 编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史》第一卷，第五、六章。庞·巴维克 (Böhm-Bawerk) 和伦纳 (Renner) 分别所写的著作已有英文版，并含有导言。《金融资本》的英译本也面世了。

参考文献

Austro-Marxism, Texts Selected and edited by T. Bottomore and P. Goode (Oxford, 1978).

E. Böhm-Bawerk, *Karl Marx and the Close of his System*, ed. P. Sweezy (New York, 1949).

M. Croan, 'Prospects for the Soviet Dictatorship: Otto Bauer', in *Revisionism*, ed. L. Labeledz (London, 1972).

Rudolf Hilferding, *Finance Capital* (London, 1980).

M. C. Howard and J. E. King, *A History of Marxian Economics*, vol. 1, 1883—1929 (Princeton, 1989).

L. Kolakowski, *Main Currents of Marxism* (Oxford, 1978) vol. 2, ch. 12.

N. Leser, 'Austro-Marxism: A Reappraisal', in *The Left-Wing Intellectuals between the Wars 1919—1939*, ed. W. Laqueur and G. Mosse (New York, 1966).

K. Renner, *The Institutions of Private Law and their Social Functions*, ed. G. Kahn-Freund, 2nd edn (London, 1976).

第二编

俄国的马克思主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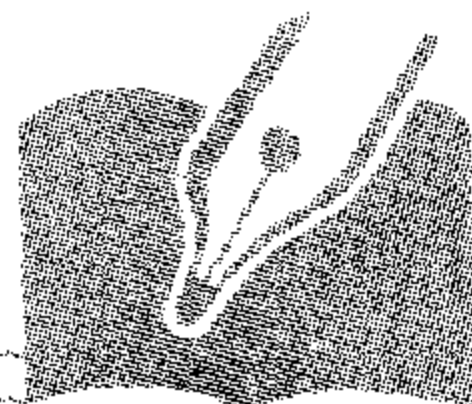
那些自夸制造出革命的人，在革命的第二天总是看到，他们不知道他们做的是什​​么，制造出的革命根本不像他们原来打算的那个样子。这就是黑格尔所说的历史的讽刺，免遭这种讽刺的历史活动家为数甚少。

——恩格斯致维拉·查苏利奇 (Vera Sassoulitch)



马克思以后的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主义研究译丛

第五章 起 源

马克思、恩格斯和普列汉诺夫

乍看起来，俄国不像是最有革命前景的国家。19世纪中叶的俄国一直是反动的代名词，基本上仍处于中世纪状态。即使在1861年废除农奴制以后，俄国也还是一个不发达的农业社会。然而，俄国社会中的某些阶层却享有一种深受西欧发展影响的活跃的精神生活，他们把西欧的发展视为俄国追求进步的楷模，但是，政府的顽固保守主义势力使得这些知识分子的运动始终处于被攻击的境地。国家的独裁和集权性质以及工业发展不足（因而没有相应的资产阶级）意味

着，俄国的革命运动往往仅由知识分子组成。而这些知识分子所依仗的是道德上的热情和慷慨的辞令，不太求助于系统的、批判性的、并且是深入细致的分析。

在这些革命运动中，最激进者是以“民粹主义”（Populism）著称的。正如这个名称本身所表明的那样，他们对俄国人民和人民的民族复兴力量有着最为强烈的情感投入。民粹派折中主义地吸收了西方的哲学思想，对黑格尔、唯物主义诸流派和各种形式的社会主义加以兼收并蓄。他们首要关心的是保全俄国的农村公社，首先是反对被西欧社会主义者有力批判的资本主义，其次是把农村公社作为俄国社会主义社会的基础。在策略上，民粹主义思想分为两派：一派相信人民能自我解放，并试图通过和平宣传来达成这一目标；另一派则认为，有必要通过恐怖分子小集团直接打击专制制度。19世纪70年代中叶，在农民中的宣传运动失败以后，一个更严密的组织，即“土地与自由社”（*Zemlyay Volya*）建立起来了，但它很快就陷入分裂。一派倾向于土地改革，自称是“重分黑土党”（*Chernyi Peredel*）；另一派把重点放在恐怖行动上，叫做“民意党”（*Narodnaya Volya*）。后者在1881年行刺沙皇时达到了它的一个目标；但事后却发现，这一举动本身，除了葬送掉整个组织外，一无所获。

19世纪80年代，在俄国大地上第一次蓬蓬勃勃地涌现出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这些思想是在与民粹派不断辩论中发展起来的。马克思本人的思想在俄国的传播则更早些：他的《哲学的贫困》曾译成俄文；主要的民粹派革命家之一特卡乔夫（Tkatchev）在19世纪60年代就读了马克思的著作；而1872年的《资本论》俄译本是最早出现的外文译本。然而，民粹派对马克思的理解非常片面，他们大体上接受的是马克思的社会学分析和对资产阶级社会的批判，而不是他的唯物主义观或对无产阶级革命的信念。在他们看来，马克思的政治学未必能直接适用于俄国。正是基于这个理由，俄国的审查官起初允许了《资本论》的出版。

马克思和恩格斯本人关于俄国的见解充满了突出的矛盾。他们对俄国的发展已有一定深度的研究。核心问题是农村公社的命运。1875年，恩格斯在反驳特卡乔夫时写道：

由此可见，俄国的公社所有制早已度过了它的繁荣时代，看样子正在趋于解体。但是也不可否认有可能使这一社会形式转变为高级形

式……然而这种过渡只有在下述情况下才会发生，即西欧在这种公社所有制彻底解体以前就胜利地完成无产阶级革命。^[1]

19世纪70年代初，恩格斯认为俄国革命者或多或少地受巴枯宁的影响。但到70年代后期，随着革命运动的成长和“土地与自由社”的建立，马克思逐渐同情起民粹派来了。马克思在1877年致米海洛夫斯基(Mikhailovsky)的信中，对车尔尼雪夫斯基(Chernyshevsky)关于农村公社可以作为共产主义基础的观点未加评论。他仅仅声言：“如果俄国继续走它在1861年开始走的道路，那它将会失去历史所能提供给一个民族的最好的机会，而遭受资本主义制度所带来的一切极端不幸的灾难。”^[2]而当1881年维拉·查苏利奇(Vera Sassoulitch)又重新强调这一点时，马克思却答复说：

在《资本论》中所作的分析，既不包括赞成俄国农村公社有生命力的论据，也不包括反对农村公社有生命力的论据。但是，从我根据自己找到的原始材料所进行的专门研究中，我深信：这种农村公社是俄国社会新生的支点；可是要使它发挥这种作用，首先必须肃清从各方面向它袭来的破坏性影响，然后保证它具备自由发展所必需的正常条件。^[3]

所以，似乎矛盾的是，恰恰在普列汉诺夫(Plekhanov)及其在日内瓦的追随者们确立了反民粹派的马克思主义立场时，马克思却靠近了民粹派。^[4]1882年，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俄文版序言中宣称：“假如俄国革命将成为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信号而双方互相补充的话，那末现今的俄国土地公社所有制便能成为共产主义发展的起点。”^[5]但到1894年时，恩格斯则相信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已经摧毁了这种公社的革命可能性，认为俄国革命只会“加速现代工业无产阶级的胜利；没有这种胜利，目前的俄国无论是在公社的基础上还是在资本主义的基础上，都不可能达到对社会的社会主义改造”^[6]。

可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这一矛盾看法（其证据性的文献在当时大都尚未发表）^[7]并未对俄国最初的马克思主义者产生影响。尽管马克思主义作为俄国内部一股活跃的力量，只是伴随着1890年大饥荒后社会与政治活动的重新觉醒才得以崛起，但早在1883年，一个紧密结合的俄国马克思主义者

团体就在日内瓦成立了。这个自称为“劳动解放社”的团体只有三个成员：格奥尔基·普列汉诺夫、巴维尔·阿克雪里罗得（Pavel Axelrod）和维拉·查苏利奇。普列汉诺夫是军官的儿子，在19世纪80年代初接受马克思主义以前的若干年中，曾是一个活跃的民粹派。他不仅是完整接受马克思主义的第一个俄国人，而且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一直是俄国马克思主义者中无可争辩的精神领袖、整整一代革命者的教育家。

在普列汉诺夫看来，“马克思主义是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这是他最后一部重要著作中的开篇语。^[8]他既具有沉着冷静而逻辑性强、并富有系统性的头脑——这使他极其重视学理的正统性，同时又具有一种超脱的个性——这是由于1917年以前40年间一直留居国外所带来的。最初，普列汉诺夫以《论一元论历史观》赢得了广大读者，该书是用笔名于1884年在俄国发表的。它是俄国第一部系统地阐述历史唯物主义的著作，也使普列汉诺夫在西方赢得了声誉。这一威望也因最先对伯恩施坦的修正主义观点作出详细批判而获得了提升。《论一元论历史观》把马克思主义阐发成集法国18世纪唯物主义、空想社会主义和德国唯心主义中固有的积极倾向之大成。在这一著作和其后的著作中，他用他的一元论观点来对抗诸“因素”相互作用的观点。普列汉诺夫的独到之处在于，他认为纯地缘上的影响对历史发展有着重大的作用^[9]，以及他把历史唯物主义运用于美学的研究。普列汉诺夫与梅林和拉法格一道，详细阐发了这样的观点：艺术依赖于阶级的价值观，因而其最终的判断标准是内容而不是形式。

但这些观点不过是把恩格斯的观点通俗化了而已。普列汉诺夫最重要的贡献是为俄国革命的发展奠定了一种正统的马克思主义的参照视角。如同大多数“西方化”了的俄国马克思主义者，普列汉诺夫看不到俄国和西方之间的根本区别，但他刚刚转向马克思主义以后所写的两本篇幅很长的小册子——《社会主义和政治斗争》及《我们的意见分歧》——却确立起了直到19世纪末为止在这一领域中的正统学说（尽管这两本小册子遭到了恩格斯的冷遇）^[10]。普列汉诺夫的观点可概括为以下三大要点：

首先，俄国在某种意义上已经是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并愈益资本主义化。农奴的解放意味着引进商品市场和雇佣劳动。根据《资本论》第一卷第七章的描述，普列汉诺夫断言，俄国已经纳入到产业资本主义体系中了。

其次，就政治策略而言，上述情况表明俄国大致已进入工厂生产阶段，而无产阶级是未来的对抗阶级。无产阶级将成为民主革命的领导者，因为它

在资产阶级之前就作为一个政治反对派出现了，并且具有更为良好的组织。西欧的经验——特别是 1848 年德国的经验——证明了资产阶级作为革命阶级是靠不住的。

第三，如果认同以上两点，便赋予了激进的知识分子在一个政党中领导无产阶级的权利和义务。这个政党将为下面两个目标而斗争：（1）推翻专制统治，建立自由民主；（2）继而由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建立专政。在此，普列汉诺夫的战友阿克雪里罗得还阐发了这样一个观点：第一阶段应处于“无产阶级领导权之下”^[11]。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建立

19 世纪 80 年代是俄国马克思主义的停滞时期。1891 年的大饥荒终于刺激了那里的马克思主义群体，推动他们摆脱学理，从事更为实际的活动。普列汉诺夫本人是最早提出从广泛宣传转向更直接鼓动的人之一。在这方面，领先的是维尔纳（Vilna）的马克思主义者，那里是惟一拥有大量组织得很好的犹太工人的地区。^[12]他们的主要文件是《论鼓动》这本小册子。由于这个文件重点放在纯经济目标上——虽然这些目标是以把工人阶级觉悟提高到政治层面上为出发点的，因而必然大大大降低其作为政治文献的重要性。维尔纽斯团的思想在遍布欧俄中部的一些反对派团体（通常具有民粹派根源）当中是有影响的。这些反对派团体中便包括有圣彼得堡小组，它自 1895 年以来就在当地工厂中就某些具体问题从事鼓动工作，并自称为“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这些反对派的思想由于 1896 年在彼得堡组织纺织业工人罢工取得成功而具有了号召力。^[13]

可是，“劳动解放社”感到自己难于适应这些新的发展。普列汉诺夫希望致力于广泛的理论问题，而不是日常的工人鼓动工作。这种理论工作大都由阿克雪里罗得来承担。但在成立于 1895 年的“俄国社会民主主义者国外联合会”内的两个组织之间，最多只有一种不自然的共处关系。俄国国内的一些知识分子组织遇到了困难，压力来自若干工人要求加入这些组织、并破除工人与知识分子之间一直存在着的严格界限——这是由 19 世纪 90 年代中期历次罢工成功而催生出的一种想法。老革命活动家日益感到固执于经济目标将有碍于清晰的政治远见，于是，阿克雪里罗得于 1897 年广泛地批判了

“经济主义”^[14]。尽管如此，1898年3月初还是在明斯克成立了稚嫩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

但并非一切都一帆风顺。“国外联合会”被年轻的革命者把持着，他们虽然不与普列汉诺夫发生争执，却对他的控制要求感到不快。而俄国国内希望把工人的斗争与争取政治解放的斗争区分开来的“经济主义者”又不断取得成功。到1900年，普列汉诺夫对考茨基迁就伯恩施坦的态度深感震惊，便主张同经济主义者断然决裂。当时，在俄国有两种基本的思潮：第一个是以库斯柯娃（Kuskova）和普罗柯波维奇（Prokopovitch）为首的明显的经济主义者；第二个是诸如杜冈—巴拉诺夫斯基（Tugan-Baranovsky）和司徒卢威（Struve）那样的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他们同情伯恩施坦，但支持反沙皇的政治活动，有时被称为“合法马克思主义者”。普列汉诺夫与这两派都是对立的，他抱怨经济主义者否认为政治目的而组织起来的必要性。他希望保持党对工人阶级的独立性，并维持党的觉悟水平。按照普列汉诺夫的看法，党应该是无产阶级的先驱，正统的理论家应该控制党——这就是后来由列宁大力阐发的一种思想。

列宁1870年生于萨马拉。像几乎所有其他的俄国马克思主义者一样，他起初也被民粹主义思想所吸引（他的哥哥1882年因参与民粹派暗杀沙皇的行动而被处死），但到19世纪90年代初期，在圣彼得堡度过三年之后，他成为了一位完全的马克思主义者。^[15]在那里，他参加了协会，抨击《论鼓动》中的思想，并作为马克思主义者最重要的领袖之一而崭露头角。这些经历使得列宁周密地研究了组织策略以及工人阶级觉悟从生产斗争发展到政治斗争的观点。1895年，他写出了第一部主要的著作，题为《什么是人民之友》，这是他先前与民粹派辩论的成果，其基本思想完全与俄国马克思主义的正统相一致。列宁首先论证说，虽然民粹派（“人民之友”）是在为反对专制制度、并为激进的民主纲领而斗争，就此便可以接纳为附属的同盟者，但只要他们试图充当社会主义的代言人，就必须予以反对。其次，他断言，农民日益分化为农村无产阶级和农村资产阶级，因而他们越来越愿意接受俄国马克思主义者的观点。第三，他坚持无产阶级有作为“俄国全体被剥削劳动群众的唯一的和天然的代表”的使命。其所以是天然的代表，是因为俄国劳动者所受的剥削，……到处都是资本主义的剥削；不过生产者大众所受的剥削是小规模的、零散的、不发达的，而工厂无产阶级所受的剥削则是大规模的、社会化的、集中化的”^[16]。在此，列宁与他的同事们的不同之处仅仅在

于，他对无产阶级的先锋作用和农民的革命性的看法较之其他人，如普列汉诺夫，稍微要乐观一些。

1896年，列宁被捕，并遭流放。由于他认为工人阶级觉悟的发展和社会民主党的发展是与俄国经济的发展携手并进的，因此，在流放期间，他非常细致地研究了这个问题，并写了一部被大大低估了的著作——《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这本书用确凿的材料证据研究了俄国资本主义从封建主义内部兴起的过程，填补了马克思无疑会放进其未完成的《资本论》第三卷中去的一些细节。民粹派认为在俄国不可能发展资本主义，因为工资太低无法扩大国内市场，列宁不同意这样的看法，他论证说，俄国已经是资本主义的了。在某些地方，马克思所概述的高利贷资本和商业资本阶段早已为产业资本、即直接运用于生产系统中的资本所取代，而产业资本的下一个阶段也已出现在地平线上。列宁从这一详尽的分析中得出结论说，无产阶级持有一种独特的立场，因为他们是完全理解、并能揭示俄国全体劳动人民（包括手工业工人和农村无产阶级）所受剥削的惟一阶级。《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为列宁已在《什么是人民之友》中得出的结论提供了经济学上的证据：对工业无产阶级来说，

剥削已十分发达，并且以赤裸裸的形式表现出来，没有混杂着任何模糊真相的枝节成分。工人已不能不看出：是**资本**在压迫他们，他们必须进行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正因为如此，工厂工人不过是全体被剥削群众的先进代表。^[17]

这一看法（连同其中关于无产阶级在革命斗争中领导全体人民的思想）支配着1914年以前列宁的政治思想。

1900年初，列宁从西伯利亚流放地回来，与他先前在圣彼得堡协会的同志马尔托夫（Martov）和波特列索夫（Potresov）一道，支持普列汉诺夫为确立一条明确的正统路线而进行的斗争。但在列宁看来，只有在正统派已经聚集了力量的时候，才是这样做的恰当时机。他认为，最好通过一份杂志——《火星报》（*Iskra*）——来达到这个目的，因为它不仅能确立一条正统路线，还将通过其发行网把期待已久的党组织创建起来。当《火星报》主要由于列宁的大力推动而在俄国国内牢固地站稳了脚跟时，列宁便同“国外联合会”决裂了，而后者抱怨《火星报》委员会对工人阶级群众运动采取了

独裁主义和分离主义的态度。这次决裂预示了两年以后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之间的分裂。列宁在长篇小册子《怎么办？》中对《火星报》的组织原则作了总结。^[18]

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的分裂

《火星报》编辑部内部对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纲领早有争论。这其中的意见分歧涉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否已在俄国占统治地位（因而也关系到党对自由派的态度），涉及同农民的未来关系（在农民支持无产阶级目标的问题上，列宁远没有普列汉诺夫那么有信心），同时也涉及党和无产阶级的关系。^[19]尽管如此，在1903年7月的代表大会前夕，领导成员内部似乎是团结的。代表大会是《火星报》为建立一个全俄社会民主党而进行长期斗争所获得的最辉煌的成就。代表大会一开始就以压倒的多数一致谴责了“经济主义者”，并否决了分离组织“犹太崩得”（*Jewish Bund*）鼓吹的联邦制原则。但在讨论党的章程时，这种一致性便消失了。列宁和马尔托夫对党章第一条提出了不同的草案。列宁的草案说，只有“承认党纲、在物质上帮助党并且参加党的一个组织”的人才是党员。^[20]而马尔托夫宁肯说，作为一个党员应“接受党的纲领，既在物质上又在党的一个组织的监督和指导之下定期工作来支持党”^[21]。列宁坚持说，他最初的草案“把党员的概念……缩小了……而马尔托夫的条文却是把它扩大了，因为它的特点是有（根据马尔托夫本人的正确的说法）‘伸缩性’。在我们现在所处的党的生活的这个时期，这种‘伸缩性’无疑会为一切涣散的、动摇的和机会主义的分子敞开大门”^[22]。随后，马尔托夫声称列宁的草案，

不仅排除了同情党、向党提供帮助，而又觉得自己不能参加一个非法组织的大量知识分子；还排除了一大部分社会民主主义党工人，他们本是党和群众之间的纽带，却出于利害考虑而拒绝加入党的行列。^[23]

虽然字面上的差别看起来不那么要紧，但却表明双方之间隔着一条很宽的鸿沟。列宁为了弥补在这一问题上的失败（马尔托夫的草案获得微弱多

数),更热中于搞一个小型的中央委员会和一个精简的《火星报》编辑部——两者都只有三个成员,这就势必让“老卫兵”查苏利奇、阿克雪里罗得和波特列索夫退隐。尽管从效果看,这样做被证明是合适的(这三个人从未对这份报纸的经营有过多大贡献),但还是招致了诸多恶感。不过,列宁还是有办法,当“崩得”的代表们退出代表大会时,列宁自己的追随者便占了多数,这些布尔什维克便成为马尔托夫追随者的敌对面,后者后来被称为“少数派”或孟什维克。

争论一开始时无疑带有许多个人因素。马尔托夫写信给卡尔·考茨基说,争论带有私人性质而不是原则性的。将近一年以后,阿克雪里罗得还承认,“无论在原则还是在策略上,双方仍然没有明确的界限区分。即使在组织问题上,分歧也并没有达到原则高度,而只出现在应用的范围上,即如何实施我们全都接受的组织原则”^[24]。确实,在党的第四次代表大会上,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暂时联合起来了,列宁的草案没有遭到反对就被接受了。在组织上,较之布尔什维克,孟什维克并不明显地更民主。相反地,当列宁于1905—1906年修改《怎么办?》中提出的体制时,孟什维克就显得更不民主了。在1905年革命中,孟什维克的革命性并不亚于布尔什维克。正是在1905年以后,由于孟什维克主张与激进的自由派结成更为紧密的同盟,并对农民表示怀疑,而布尔什维克则倾向于持相反的看法,分歧才开始明显地暴露出来。根据上述两条,列宁猛烈抨击孟什维克抛弃了“民主革命中无产阶级领导权”这一正统老观念,是有一定道理的。然而,他指责孟什维克想“取消”党,这种责难却没多少根据,因为孟什维克仅仅希望通过从事合法(与非法)活动来建立一个群众性的政党——这恰是布尔什维克自身在1912年以后也实施了的政策。

[注释]

[1] K. Marx, F. Engels, *Basic Writings on Politics and Philosophy*, ed. L. Feuer (New York, 1959) p. 473.

[2] K. Marx, F. Engels, *Selected Correspondence* (Moscow, 1965) p. 312.

[3] K. Marx, *Selected Writings*, ed. D. McLellan (Oxford and New York, 1977) pp. 576ff.

[4] 参见马克思对与民粹派活动家相对立的日内瓦小组的尖锐评论,见 *Selected*

Correspondence (Moscow, 1965) p. 333.

[5] K. Marx, *Selected Writings*, ed. D. McLellan (Oxford and New York, 1977) p. 584.

[6] F. Engels, *MFW*, vol. 22, p. 435.

[7] 马克思对查苏利奇的复信以及他的长篇草稿一直到1924年和1926年才分别发表。

[8] G. Plekhanov, *Fundamental Problems of Marxism* (London, 1937) p. 1.

[9] 比方说, 参见《马克思主义基本问题》第六节。

[10] 参见恩格斯致查苏利奇的信, 1885年4月23日, 载 K. Marx, F. Engels, *Selected Correspondence* (Moscow, 1965) pp. 383ff.

[11] A. Ascher, *Pavel Axelrod and the Development of Menshevism* (Cambridge, Mass., 1972) pp. 134ff.

[12] 尤其参阅 A. Patkin, *The Origins of the Russian-Jewish Labor Movement* (London and Melbourne, 1947) pp. 101ff.

[13] 关于协会, 参见 R. Pipes, *Social Democracy and the St. Petersburg Labor Movement 1885—1897* (Cambridge, Mass., 1963); 以及对该书的批评, 载 A. Wildman, *The Making of a Workers' Revolution* (Chicago, 1967) pp. 73ff.

[14] “经济主义”是一个相当模糊的术语。相关的讨论见 J. Keep, *The Rise of Social Democracy in Russia* (Oxford, 1963) pp. 58ff.

[15] 对民粹派或雅各宾派的思想长期影响列宁的思想这样一个观点的批驳, 见 N. Harding, ‘Lenin’s Early Writings—the Problem of Context’, *Political Studies*. Dec. 1975.

[16] V. Lenin, ‘What the Friends of the People Are’, *Collected Works*, vol. 1, p. 299.

[17] V. Lenin, ‘The Development of Capitalism in Russia’, *Collected Works*, vol. 1, p. 299.

[18] 同上书, 第94页以下。

[19] 可特别参见 J. 弗兰克尔 (Frankel) 写序的著作 *Vladimir Akimov on the Dilemmas of Russian Marxism* (Cambridge, 1969) pp. 60ff.

[20] V. Lenin, ‘Draft Rules of the RSDLP’, *Collected Works*, vol. 6, p. 474.

[21] 引自 V. Lenin, ‘Account of the Second Congress of the RSDLP’, *Collected Works*, vol. 7, p. 27.

[22] V. Lenin, ‘Speech on Party Rules’, *Collected Works*, vol. 6, p. 500.

[23] L. Martov, *Geschichte der russischen Sozialdemokratie* (Berlin, 1925) p. 84.

[24] 阿克雪里罗得致考茨基, 1904年5月22日。引自 C. Weill, *Marxistes russes*

et Socialdemocratie allemande (Paris, 1977) p. 131.

深入阅读材料

苏联 (概述)

夏皮罗 (Schapiro) 虽然一贯反对布尔什维克, 但他的著作《苏联共产党》却包含了大量研究详尽的资料。麦考利 (McAuley) 的《政治与苏联》是一本很好的导读性的著作, 尽管它偏重于当代和社会学。内特尔的《苏联的成就》提供的是可读性强的短篇概述。

布尔什维主义与孟什维主义的起源

概述性的书中, 有海姆森 (Haimson) 写的, 更好的有孟什维克派丹 (Dan) 写的。文图里 (Venturi) 把民粹派的背景写得很出色。门德尔 (Mendel) 和金德斯利 (Kindersley) 论述了合法马克思主义。弗兰克尔 (Frankel) 对阿基莫夫 (Akimov) 的介绍对经济主义作了大量的阐发。派普斯 (Pipes) 描绘了圣彼得堡的背景, 而帕特金 (Patkin) 考察了犹太“崩得”的作用。基普的《俄国社会民主党的兴起》是基础性的读本。最好的读本是怀尔德曼 (Wildman) 的《工人革命的形成》。当然, 还可参阅柏格曼 (Bergman) 写的《查苏利奇传》。

普列汉诺夫早期的著作见于他的《哲学著作选》第一卷。他最重要的书——《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发展》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问题》有英译本。他的一本《哲学著作选》就正在出版发行。巴伦 (Baron) 的是这方面的主要评注。另可参见瓦利齐 (Walic-ki) 的《马克思主义与向自由王国的飞跃》第三章和怀特 (White) 的《卡尔·马克思与辩证唯物主义的起源》第七、八章。

对孟什维克派的短小精悍的评述是阿谢尔 (Ascher) 的文集《俄国革命中的孟什维克派》, 其中, 有一篇很好的导言。阿谢尔还写了一本关于阿克雪里罗得的极其详尽的传记。另外, 还有盖茨勒 (Getzler) 对马尔托夫作了精湛的研究。

参考文献

Soviet Union (General)

Alexander Baykov, *The Development of the Soviet Economic State* (New York, 1948).

Nicolas Berdyaev, *The Russian Idea* (New York, 1948).

J. M. Bochenski, *Soviet Russian Dialectical Materialism* (Dordrecht, 1963).

Maurice Cornforth, *Dialectical Materialism and Science* (London, 1949).

- Maurice Dobb, *Soviet Economic Development Since 1917*, 6th edn (New York, 1966).
- Merle Fainsod, *How Russia is Ruled*, rev. edn (Cambridge, Mass., 1963).
- Jerome Gilson, *The Soviet Image of Utopia* (Baltimore, 1975).
- Loren R. Graham, *Science and Philosophy in the Soviet Union* (New York, 1966).
- John Hazard, *The Soviet System of Government*, 3rd edn (Chicago, 1965).
- History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the Soviet Union [Bolsheviks]* (Moscow, 1943).
- David Joravsky, *Soviet Marxism and Natural Science* (London, 1961).
- John Keep (ed.), *Contemporary History in the Soviet Mirror* (London, 1964).
- Ernest Mandel, 'On the Nature of the Soviet State', *New Left Review*, 108 (1978).
- Mary McAuley, *Politics and the Soviet Union* (London, 1977).
- P. E. Mosley, *The Kremlin and World Politics* (New York, 1960).
- J. P. Nettl, *The Soviet Achievement* (London, 1967).
- Martin Nicolaus, *Restoration of Capitalism in the USSR* (Chicago, 1975).
- Alec Nove, *An Economic History of the USSR* (London, 1969).
- Alexander Philipov, *Logic and Dialectic in the Soviet Union* (New York, 1952).
- Myron Rush, *Political Succession in the USSR* (New York, 1965).
- Leonard Schapiro, *The Communist Party of the Soviet Union*, 2nd edn (London, 1970).
- Howard J. Scherman, *The Soviet Economy* (New York, 1969).
- Derek Scott, *Russian Political Institutions* (London, 1965).
- A Short History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the Soviet Union* (Moscow, 1970).
- John Somerville, *Soviet Philosophy: A Study of Theory and Practice* (New York, 1946).
- Rudolf L. Tökes (ed.), *Dissent in the USSR: Politics, Ideology and People* (Baltimore, 1977).
- Robert C. Tucker, *The Soviet Political Mind* (New York, 1963).
- Gustav Wetter, *Dialectical Materialism: A Historical and Systematic Survey of Philosophy in the Soviet Union* (London, 1958).
- P. J. D. Wiles,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Communism* (Oxford, 1962).
- Karl Wittfogel 'The Marxist View of Russian Society and Revolution', *World Politics*, XII (1960).

- N. Berdyaev, *The Origins of Russian Communism* (London, 1937).
- Jay Bergman, *Vera Zasulich: A Biography* (Stanford, 1983).
- Theodore Dan, *The Origins of Bolshevism* (New York, 1964).
- David Footman, *Red Prelude: A Life of A. I. Zhelyabov*, 2nd edn (London, 1968).
- Jonathan Frankel, *Vladimir Akimov on the Dilemmas of Russian Marxism: 1885—1903* (Cambridge, 1969).
- Shmuel Galai, *The Liberation Movement in Russia: 1900—1905* (Cambridge, 1973).
- L. H. Haimson, *The Russian Marxists and the Origins of Bolshevism* (Cambridge, Mass., 1955).
- J. L. H. Keep, *The Rise of Social Democracy in Russia* (Oxford, 1963).
- Richard Kindersley, *The First Russian Revisionists: A Study of 'Legal Marxism' in Russia* (Oxford, 1962).
- David Lane, *The Roots of Russian Communism: A Social and Historical Study of Russian Social Democracy, 1898—1907* (Assen, 1969).
- A. P. Mendel, *Dilemmas of Progress in Tsarist Russia: Legal Marxism and Legal Populism* (Cambridge, Mass., 1961).
- A. L. Patkin, *The Origins of the Russian-Jewish Labour Movement* (London and Melbourne, 1947).
- Richard Pipes, *Social Democracy and the St Petersburg Labour Movement: 1885—1897* (Cambridge, Mass., 1963).
- L. B. Schapiro, 'The Role of the Jews in the Russian Revolutionary Movement', *Slavonic and East European Review*, 4 (1961).
- J. Schneiderman, *Sergei Zubatov and Revolutionary Marxism: The Struggle for the Working Class in Tsarist Russia* (Ithaca, New York, 1977).
- S. V. Utechin, *Russian Political Thought: A History of the Populist and Socialist Movements in Nineteenth Century Russia*, Introduction by I. Berlin (London, 1960).
- Allen K. Wildman, *The Making of a Workers' Revolution: Russian Social Democracy 1891—1903* (Chicago, 1967).

Plekhanov: Texts

G. V Plekhanov, *Anarchism and Socialism* (London, 1906)

— *In Defense of Materialism: The Development of The Monist View of History* (London, 194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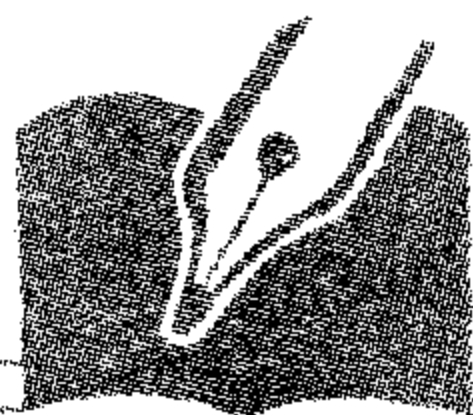
- Fundamental Problems of Marxism* (London, 1937).
- Materialismus Militans: Reply to Mr. Bogdanov* (London, 1973).
- The Materialist Conception of History* (London, 1940).
- The Role of the Individual in History* (London, 1940).
- Selected Philosophical Works*, 5 vols (London and New York, 1978—1980).

Plekhanov: Commentaries

- Samuel H. Baron, 'Between Marx and Lenin: George Plekhanov', in L. Labedz (ed.), *Revisionism Essays on the History of Marxist Ideas* (London, 1962).
- 'Plekhanov and the Revolution of 1905', in J. S. Curtiss (ed.), *Essays in Russian and Soviet History* (Leiden, 1963).
- *Plekhanov: The Father of Russian Marxism* (London, 1963).
- Andrej Walicki, *Marxism and the Leap to the Kingdom of Freedom* (Stanford, 1995) ch. 3.
- James White, *Karl Marx and the Origins of Dialectical Materialism* (London, 1996) chs 7 and 8.

Mensheviks

- Abraham Ascher, 'Axelrod and Kautsky', *Slavic Review*, XXVI (1967).
- *The Mensheviks in the Russian Revolution* (London, 1976).
- *Pavel Axelrod and the Development of Menshevism* (Cambridge, Mass., 1972).
- Anna Bourguina, *Russian Social Democracy: The Menshevik Movement, A Bibliography* (Stanford, 1968).
- Israel Getzler, *Martov: A Political Biography of a Russian Social Democrat* (Melbourne, 1967).
- 'The Mensheviks', *Problems of Communism* XVI (1967).
- Leopold Haimson (ed.), *The Mensheviks: From the Revolution of 1917 to the Second World War* (Chicago, 1974).
- Geoffrey A. Hosking, *The Russian Constitutional Experiment: Government and Duma, 1907—1914* (Cambridge, 1973).
- J. L. H. Keep, 'Russian Social Democracy and the First State Duma', *Slavonic and East European Review*, 34 (1955).
- Maureen Perrie, *The Agrarian Policy of the Russian Socialist-Revolutionary Party from its Origins through the Revolution of 1905—1907* (Cambridge, 1976).



第六章 托洛茨基

托洛茨基 (Trotsky) 是列宁在 1903 年的主要反对者之一。他于 1879 年出生在一个颇为富裕的犹太农民家庭，很早就显示出革命热情和新闻写作的才华。他曾是《火星报》团体的成员和列宁的亲密合作者，可是 1904 年以后，却逐渐站到与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都不相同的立场上去了。对广大工人阶级的觉悟程度和行动能力持乐观主义，使托洛茨基拒绝列宁所强调的组织一个革命先锋队的政党。的确，托洛茨基在反对列宁关于党的看法时，就像任何一个孟什维克一样凶狠。在他的《第二次代表大会上西伯利亚代表团的报告》中，托洛茨基严厉批评列宁“凭着他特有的天才和精力，充当了党的瓦解者的角

色”^[1]。托洛茨基希望党组织成为适应工人阶级运动需要、并允许工人最大限度加入的党。在被公认为“对布尔什维克现象作出最中肯分析”的小册子《我们的政治任务》（1904年）中^[2]，托洛茨基认为列宁的思想和“经济主义者”一样，对俄国无产阶级进行政治活动的潜力丧失了信心：

如果经济主义者充当尾跟在历史后面跑的低下角色，从而逃避掉他们所应承担的艰巨任务，那么“政治主义者”则努力把历史抛在自己的后面，以此解决了这个问题。^[3]

在托洛茨基看来，列宁是俄国的罗伯斯比尔，他企图把具有雅各宾派分子特征的政治置于至高无上的地位。因此，布尔什维克实际上是企图由他们自己来代替无产阶级。在比较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时，托洛茨基写道：

两种体制间的差别……对确定我党工作的性质有决定性的意义。一种情况是，我们有一个替无产阶级**思维**的体制，一个政治上取代无产阶级的体制；另一种情况是，有一个政治上教育和动员无产阶级的体制，使它能够对所有集团和政党的意志施加有效的压力。这两个体制产生的结果在客观上是完全不同的。^[4]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托洛茨基作出了他最著名的预言之一：

在党内政治生活中，正如我们还将看到的，这些方法导致：党的组织机构以自身代替了党，而中央委员会又取代了党的组织机构，最后，被一个“独裁者”取代了中央委员会。^[5]

1905年，他在苏维埃的经历只能是加深他的上述看法。尽管他曾试图作为俄国社会民主党两翼之间的调停人进行活动，但这一看法仍未改变。只是到了1917年的危急时刻，托洛茨基才得出这样的结论：布尔什维克党是实现他的革命目标的必要手段。

托洛茨基关于党的见解绝不是独一无二的，但他对俄国社会的分析和对革命前途的论断倒很独特。1904年春天，他和帕尔乌斯在慕尼黑的会晤，对这些观点的发展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帕尔乌斯是德国党左翼中的一位杰出

的俄国犹太移民，他在1904年《火星报》上发表的以《战争与革命》为题的一系列文章中，概述了如下几大主张：他认为，由于对海外市场的争夺和工业连续不断的扩张，导致资本主义列强互相冲突，并将最终导致战争的爆发，因而，民族国家正在迅速地落后于时代。俄国将被迫卷入一场这样的战争，但由于它的社会结构早已过时，其结果会有助于社会的解体，从而增大革命的可能性：

资本主义发展的世界进程给俄国带来了政治动乱，这又反过来会影响所有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发展。俄国革命将动摇资本主义世界的政治基础，俄国无产阶级将起社会革命的先锋作用。^[6]

由于俄国资产阶级的软弱和俄国的迅速工业化，无产阶级成了惟一真正的革命力量。由此得出的结论是：俄国社会民主主义应以直接建立工人政府为目标。

据托洛茨基说，帕尔乌斯“使我更接近了社会革命问题，并且对我来说，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已从天文学的‘最终’目标明确地转变为我们当前的实践任务”^[7]。托洛茨基接过了这些思想，并在他本人发挥了领导作用的1905年事件中加以确认，借助对当时俄国社会和政治的详细分析，从而使之理论化和系统化。这一理论框架分两部分：其一是关于综合发展和不均衡发展社会经济理论；其二是政治上与之相对应的不断革命论。两部分综合起来看，是“自马克思的《共产党宣言》以来，对社会主义革命进行预测的最激进的（如果不是修正主义的）重申”^[8]。在社会经济的分析中，托洛茨基从俄国落后这一现象出发，认为“我们可以说，俄国社会发展的主要特点是比较原始和缓慢”^[9]。但除此以外，还存在一个事实，即“建立在一定国内经济基础上的俄国社会生活，始终处于外部社会—历史环境的影响、甚至压力之下”^[10]。俄罗斯国家必须吸收更多的剩余产品来保全自己，因为它比那些向它施加压力的国家——如波兰、瑞典和立陶宛——更不发达。于是：

从某一时期（特别是从17世纪末）起，国家全力致力于加速本国自然经济的发展。手工业、机械制造、加工工业、大工业、资本的新部门，可以说都是人为地嫁接到自然经济主干上来的。资本主义似乎成为了国家的产物。^[11]

这就是说，在国内根本就没有靠自己的剩余进行投资的、自给自足的资本家阶级，而国家的投资只能从国外向欧洲资产阶级借贷而来——这是一种迫不得已的、脆弱的制度安排。其人为性（不同于缓慢的有机增长）意味着它能发展得更快。确实，1900年前后工业化的步子是巨大的。少数实现了这种扩张的资本家依靠的是国家渠道引进的外国资本，因而缺少独立和广阔的社会基础。与此同时，工人阶级非常迅速地形成起来了，他们直接来自农村——这与西方不同。这样，俄国得以跨越经济发展的一些阶段，但同时也造成了奇特的社会结构：中央集权的、专制而带有贵族特权的政府和一个庞大的农民阶级，再加上发达的工业化和一个为数甚少、但有内聚力的工人阶级。这种缺乏强大的中产阶级作为中间因素的新旧力量的结合，造成了社会和政治的不稳定。托洛茨基的结论是：

专制主义能够不顾社会发展的（实际状况）而赖以继续存在下去的行政、军事和金融力量，不仅没有如自由派所主张的那样排除革命的可能性；恰好相反，却使革命成为惟一的出路；而且，它还预先规定了这一革命必然具有这样的特性；即革命的激进性同专制主义——它使自身与民族之间的鸿沟越来越深——的巨大势力之间成比例地消长。^[12]

后来成为著名的“不断革命论”的理论就出自这一分析。因为，在托洛茨基看来，工人阶级在俄国具有一种同其规模不相称的巨大的重要性，因为大规模工业中的工人比小企业中的工人更重要，而俄国只有大工业。而且，俄国工业比西方更袒露在外，而不受一种持久的、无孔不入的资本主义社会—文化风气包裹。像少数其他国家一样，俄国的工人阶级能使工业瘫痪并控制城市中心。因此，托洛茨基断言，“工人阶级在经济落后国家有可能比在先进国家更早地夺取政权”^[13]。他还断言，俄国已把经济上资本主义发展水平低、政治上资本主义的资产阶级力量微不足道和有一个强大的革命无产阶级这三个因素结合起来了。他还援引考茨基的话，其大意是：“为全俄国利益而斗争的责任，已注定落在国内惟一现存的强大阶级——工业无产阶级——的身上”^[14]。当然，工人阶级具有一定的觉悟水平是夺取政权所必需的，但托洛茨基声称，只要有少数的坚定分子就足够了。（在此，我们从萌芽状态中就看到了政治对社会和经济的支配地位，它将成为革命后的俄国的独特之处）农民的支持是必要的，农民也会看到，他们的问题只有依靠革命

手段才能解决——但是，无产阶级仍然必须保持支配地位。然而，在土地再分配之后农村出现分化时，无产阶级就要被迫对他们采取社会主义的态度。（这里，托洛茨基走得比帕尔乌斯远多了）无产阶级政府将意识到，对他们将不得不采取越来越多的激进措施：

一旦权力转到社会主义者占多数的革命政府手里，我们的最高纲领和最低纲领之间的区分便在原则上和直接实践上都将失去其全部意义。无产阶级政府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受这类区分的限制。^[15]

因此：

根本谈不上什么资产阶级革命中**特殊形式**的无产阶级专政，即**民主的**无产阶级专政（或无产阶级和农民的专政）。工人阶级如果不能把它的专政限定在民主纲领的界限内，就不能保持其专政的民主性质。对这一点存在任何幻想都将是致命的，它定将从一开始就危及社会的民主。^[16]

这就是“不断革命的思想……一个把肃清专制主义和封建主义同社会主义革命联系起来的思想”^[17]。但就是这些社会主义措施肯定会导致激烈的内部反抗（尤其对这样一个两极分化的、落后的社会体制来说），以至于这种无产阶级政府本身的存在，如果没有外来援助，也将成为问题：

没有欧洲无产阶级直接的国家援助，俄国工人阶级就不能保持政权，也就不能把其暂时的统治变成长期的社会主义专政。^[18]

当然，在1917年俄国布尔什维克取得政权的时候，欧洲无产阶级的这种援助恰恰并未到来。

[注释]

[1] L. Trotsky, *Vtoroi Syezd RSDRP (Otchet Sibirskoi Delegatsii)* (Geneva, 1903), p. 11. 引自 B. Knei-Paz, *The Social and Political Thought of Leon Trotsky*

(Oxford, 1978) p. 180.

[2] B. Knei-Paz, *op. cit.*, p. 193.

[3] L. Trotsky, *Nashi Politicheskiye Zadachi* (Geneva, 1904) p. 54, 引自 B. Knei-Paz, *op. cit.*, p. 197。

[4] L. Trotsky, *op. cit.*, p. 50.

[5] *Ibid.*, p. 54.

[6] N. Parvus, *Rossiya y revolyutsiya* (St Petersburg, 1906) p. 133, 引自 A. Zeman and W. Scharlau, *The Merchant of Revolution* (London, 1965) p. 64.

[7] L. Trotsky, *My Life* (London, 1930) p. 147. 另见 L. Trotsky, *Stalin* (London, 1947) pp. 429f.

[8] L. Deutscher, *The Prophet Armed, Trotsky 1879—1921* (Oxford, 1954) p. 150.

[9] L. Trotsky, *The Permanent Revolution and Results and Prospects*, 3rd edn (New York, 1969) p. 37.

[10] *Ibid.*, p. 38.

[11] *Ibid.*, p. 41.

[12] *Ibid.*, p. 44.

[13] *Ibid.*, p. 63.

[14] *Ibid.*, p. 66.

[15] *Ibid.*, p. 78.

[16] *Ibid.*, p. 80.

[17] *Ibid.*, p. 81.

[18] *Ibid.*, p. 105.

深入阅读材料

原著

托洛茨基流亡期间的著作收集在“Pathfinder”多卷本(纽约, 1972年及以后)中。最好的单行本是由多伊彻(Deutscher)编辑出版的。在托洛茨基的早期著作中,《回顾与展望》可在《不断革命》为书名的作品里找到。作为当代历史学家,其才华可见于《1905年》,当然还可见于《俄国革命史》。至于他在20世纪20年代的观点,可参见《十月的教训》、《新路线》与《走向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这些以单行本出版的书。就他对斯大林主义的看法,见《被出卖了的革命》和他的传记《斯大林》。《文学与革命》则表现了他作为文学评论家的才华。

评论

长期以来，多伊彻煌煌三卷本传记是仅见的长篇评论。而最近，戴伊（Day）的《列昂·托洛茨基与经济孤立政治》对托洛茨基 20 世纪 20 年代的策略作了大量的阐明。豪（Howe）的《现代大师——托洛茨基》从民主社会主义者的角度对他作了精彩而简练的介绍。但最基本的著作无疑是奈·帕兹（Knei-Paz）的近作——《托洛茨基的社会、政治思想》，此书研究精细，分析全面。还有克拉索（Krasso）和史密斯（Smith）收编的短小精悍的论文集。马弗拉基斯（Mavrakis）的《论托洛茨基》是一本以毛主义的观点写的论战性著作，写得很不成功。而莫里纽科斯（Molyneux）的《托洛茨基的革命理论》则是一个追随者所作的优秀的解读。

参考文献

Texts

- Leon Trotsky, *The Writings of Leon Trotsky 1929—1940*, ed. G. Breitman and S. Lovell (New York, 1972ff.), 11 volumes.
- The Bolsheviks and World Peace* (New York, 1918).
- The Case of Leon Trotsky* (London, 1937).
- Diary in Exile-1935* (London, 1959).
- The First Five Years of the Communist International*, 2 vols (New York, 1953).
- The History of the Russian Revolution*, 3 vols (London, 1945).
- In Defense of Marxism* (New York, 1973).
- The Lessons of October* (London, 1937).
- Literature and Revolution* (Ann Arbor, 1960).
- The Living Thoughts of Karl Marx* (London, 1940).
- My Life* (New York, 1960).
- The New Course* (Ann Arbor, 1965).
- 1905* (London, 1972).
- On Lenin: Notes Towards a Biography* (London, 1971).
- Problems of the Chinese Revolution* (London, 1969).
- The Real Situation in Russia* (New York, 1928).
- Results and Prospects*, in *The Permanent Revolution and Results and Prospects* (London, 1962).
- The Revolution Betrayed: What is the Soviet Union and Where is it Going?*

(London, 1937).

- Stalin: An Appraisal of the Man and His Influence* (London, 1941).
- The Stalin School of Falsification* (New York, 1937).
- Terrorism and communism: A Reply to Karl Kautsky* (Ann Arbor, 1961).
- The Third International After Lenin* (New York, 1936).
- Towards Socialism or Capitalism?* (London, 1976).
- The Trotsky Papers: 1917—1922*, 2 vols, ed. J. M. Meijer (The Hague, 1964, 1971).
- Where is Britain Going?* (London, 1926).
- The Young Lenin* (London, 1972).

Anthologies

- Leon Trotsky, *The Age of Permanent Revolution: A Trotsky Anthology*, ed. Isaac Deutscher (New York, 1964).
- Basic Writings*, ed. Irving Howe (London, 1964).
 - The Essential Trotsky* (London, 1963).
 - Leon Trotsky on Britain* (New York, 1973).
 - Leon Trotsky on the Jewish Questions* (New York, 1970).
 - Leon Trotsky on Literature and Art*, ed. Paul N. Siegel (New York, 1970).
 - Leon Trotsky on the Trade Unions* (New York, 1969).
 - Leon Trotsky Speaks* (New York, 1972).
 - Marxism and Military Affairs, 1921—1924* (Colombo, 1969).
 - Marxism and Science* (Colombo, 1973).
 - Military Writings* (New York, 1969).
 - Problems of Every day Life and Other Writings on Culture and Science* (New York, 1973).
 - The Spanish Revolution: 1931—1939* (New York, 1973).
 - The Struggle Against Fascism in Germany*, Introduction by Ernest Mandel (New York, 1971).
 - Whither France?* (New York, 1936).

Commentaries

- Siegfried Bahne, 'Trotsky on Stalin's Russia', *Survey* (1962).
- Joel Carmichael, 'Trotsky's Agony', *Encounter*, 5-6 (1972).
- Trotsky: An Appreciation of His Life* (London, 1975).



Richard B. Day, *Leon Trotsky and the Politics of Economic Isolation* (Cambridge, 1973).

—— ‘The Theory of Long Waves: Kondratiev, Trotsky, Mandel’, *New Left Review*, 99 (1976).

Isaac Deutscher, *The Prophet Armed: Trotsky 1879—1921* (Oxford, 1954).

—— *The Prophet Unarmed: Trotsky 1921—1929* (Oxford, 1959).

—— *The Prophet Outcast: Trotsky 1929—1940* (Oxford, 1963).

Max Eastman, *Leon Trotsky: The Portrait of a Youth* (New York, 1925).

Norman Geras,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in the Revolutionary Thought of Leon Trotsky’, in G. Parry (ed.), *Participation in Politics* (Manchester, 1972). Louis Gottschali, ‘Leon Trotsky and the Natural History of Revolutions’,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938).

Joseph Hanson et al., *Leon Trotsky: The Man and His Work* (New York, 1969).

Geoff Hodgson, *Trotsky and Fatalistic Marxism* (Nottingham, 1975).

Irving Howe, *Trotsky* (London and New York, 1978).

Baruch Knei-Paz, *The Social and Political Thought of Leon Trotsky* (Oxford, 1978).

—— ‘Trotsky, Marxism and the Revolution of Backwardness’, in Shlomo Avineri (ed.), *The Varieties of Marxism* (The Hague, 1977).

Nicolas Krasso (ed.), *Trotsky: The Great Debate Renewed* (St Louis, 1972).

Lee Chen-Chung, ‘Trotsky’s Theory of “Permanent Revolution” and Mao Tse-tung’s Theory of the “Continuous Revolution”’, *Issues and studies* (1972).

Steven Levine, ‘Trotsky on China: The Exile Period’, *Papers on China*, 18 (Harvard, 1964).

George Lichtheim, ‘Reflections on Trotsky’ in Lichtheim, *The Concept of Ideology* (New York, 1967).

Alasdair MacIntyre, ‘Trotsky in Exile’, *Encounter* (1963).

Robert H. McNeal, ‘Trotsky’s Interpretation of Stalin’, *Canadian Slavonic Papers*, 5 (1961).

L. Maitan, ‘The Theory of Permanent Revolution’, in E. Mandel (ed.), *Fifty Years of World Revolution* (New York, 1968).

André Malraux, ‘Leon Trotsky’, in Trotsky, *Writings 1933—1934* (New York, 1972).

Kostas Mavrikis, *On Trotskyism: Problems of Theory and History* (London, 1976).

- John Molyneux, *Leon Trotsky's Theory of Revolution* (London, 1981).
- Nicholas Mosley, *The Assassination of Trotsky* (London, 1972).
- Joseph Nedava, *Trotsky and the Jews* (Philadelphia, 1972).
- Giuliano Procacci, 'Trotsky's View of the Critical Years: 1929—1936', *Science and Society* (1963).
- Heinz Schurer, 'The Permanent Revolution: Leon Trotsky', in L. Labedz (ed.), *Revisionism; Essays in the History of Marxist Ideas* (New York, 1962).
- Louis Sinclair, *Leon Trotsky: A Bibliography* (Stanford, 1972).
- Irving H. Smith (ed.), *Trotsky* (Englewood Cliffs, N. J., 1973).
- M. S. Venkaturamani, 'Leon Trotsky's Adventure in American Radical Politics: 1935—1937',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Social History*, IX (1964).
- Robert D. Warth, 'Leon Trotsky: Writer and Historian', *Journal of Modern History* (1948).
- Fred Weinstein, 'Trotsky and the Sociological Dimension: An Analysis of Social Action', *Social Forces* (1961).
- Bertrand D. Wolfe, 'Leon Trotsky as Historian', *Slavic Review* (1961).



马克思主义研究译丛

第七章 列 宁

政 党

尽管如同下面所要表明的，不应过高估价《怎么办？》一书的重要性，但它确实是列宁论党的基本著作。列宁这本小册子的副标题“我们运动中的迫切问题”，作为当时的历史发展过程的标志，有着特殊的意义。

在该书中，列宁毫无新的建树，而只是力图重申 1894 年以前那个时期普列汉诺夫的正统学说，以反对新近的发展趋势；^[1]该书丝毫未透露不再信任群众的情绪，而仅仅旨在弥补“领导者落后于群众自发高潮”的流弊。^[2]前三章批判了

“经济主义者”和恐怖分子，并描述了19世纪90年代后期运动中的混乱状况，等等。列宁把库斯柯娃（Kuskova）的《信条》（*Credo*）和两份俄国工人报刊《工人思想报》（*Rabochaia Mysl*）、《工人事业》（*Rabochee delo*）杂志当做“经济主义”的典型加以抨击。^[3]他的主要论点是，这些小团体已显然不适于充当领导，无力发挥无产阶级在反专制斗争中作为所有阶级的领导者的作用。立足于在《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一书中得出的结论，列宁断言，经济主义者不可能产生出在政治上适应从家庭手工业（*Kustar*）生产向国家资本主义过渡要求所必需的最初的党组织。经济主义者只能重复无产阶级孤立的和局部的努力。在随后几章中，列宁持与普列汉诺夫和阿克雪里罗得（Axelrod）相同的观点，详尽地阐述了他对社会民主主义意识的看法，这其中包含了对社会经济状况的深入了解和对各个阶级的展望。而对无产阶级来说，由于其“经济”斗争太狭隘了，因而不可能获得这种觉悟（对无产阶级，列宁从来不谈“阶级意识”或“阶级觉悟”的问题）。列宁附和普列汉诺夫和阿克雪里罗得的观点，坚持认为，如果放任自流，无产阶级将不可避免地追随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在这一问题上，列宁详细引证了考茨基，继而在如下的关键段落中写道：

既然谈不到由工人群众在其运动进程中自己创造的独立的思想体系，那么问题只能是这样：或者是资产阶级的思想体系，或者是社会主义的思想体系。这里中间的东西是没有的（因为人类没有创造过任何“第三种”思想体系，而且在为阶级矛盾所分裂的社会中，任何时候也不能有非阶级的或超阶级的思想体系）。因此，对于社会主义思想体系的任何轻视和任何脱离，都意味着资产阶级思想体系的加强。人们经常谈论自发性，但工人运动的自发的的发展，恰恰导致运动受资产阶级思想体系的支配，恰恰是按照《信条》这一纲领进行的，因为自发的工人运动就是工联主义的运动、也就是纯粹工会的运动，而工联主义正是意味着工人受资产阶级的思想奴役。因此，我们社会民主党的任务就是要反对自发性，就是要使工人运动脱离这种投到资产阶级羽翼下去的工联主义的自发趋向，而把它吸引到革命的社会民主党的羽翼下来。^[4]

在第四章，列宁提出了一些积极的建议。基于党的任务是在民主主义革命中对一切被剥削阶级担负起领导的作用（用普列汉诺夫的话来说，就

是“无产阶级在民主主义革命中的领导权”)，党就必须拥有一个全俄的组织。这个组织最好是以一份全俄的报纸为中心，就像《火星报》(Iskra)所渴望充任的那样。这样，它就能够在全俄的基础上保持联系和思想上的一致，保证其专业化和一元化，从而保持无产阶级的领导地位。这样一种组织也就带有保密性、集中性、专职性和排他性。而所有这些特性都必然取决于列宁的基本思想，即这种组织必须由职业革命家组成。这个想法正是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发生分裂的要害所在。必须是职业革命家，这有两个意思：他们会把全部时间贡献给党的工作；他们应接受全面而充分的训练。“为了同政治警察作斗争，就需要有特别的品质，需要有职业的革命家。”^[5]列宁也并不反对群众组织，但他坚决主张，群众组织必须与党的中坚分子完全区别开来：

这样的小组、工会和团体，必须遍布各地，履行各种不同的职能；但是如果把这些组织同革命家的组织混为一谈，抹杀这两者之间的界限，使群众中本来已很模糊的一种认识完全消失，也就是使他们忘记要为群众运动“服务”，就需要有一些人专门献身于社会民主党的活动，而且这些人应当坚持不懈地把自己培养成为职业革命家，那就是荒唐和有害的了。^[6]

列宁也不反对党内民主，这意味着完全公开化和一切职务经过选举产生。但只有“不可救药的空想家”才会在俄国当时的条件下鼓吹这种党内民主。因此，只能按照人事内定的寡头政治原则来选择领导者。^[7]

应当指出，列宁的观点是代表包括普列汉诺夫和阿克雪里罗得在内的整个“劳动解放社”的，因此，《怎么办?》是得到所有正统马克思主义者赞同的最后一部重要的出版物。在第二次代表大会出现分裂以后，普列汉诺夫和马尔托夫都谴责列宁“独裁”。卢森堡发表了一篇尖锐批评列宁思想的文章。^[8]而且，正如我们所知，托洛茨基也这样做了。但是至少在1905年以前，布尔什维克与孟什维克之间对党内民主并没有太大的分歧。^[9]列宁与批评他的人之间存在着的分歧不是原则上的，而是在方法上。而把列宁的理论当做布朗基主义来谴责，理所当然是无的放矢，因为对列宁的理论来说，对群众施加影响、并赢得群众支持，是绝对本质的要素。

但无论如何，过分强调《怎么办?》的重要性是错误的。列宁后来写

道，不应该脱离它（他的小册子）“与我们党发展的已经过去很久的了的具体历史条件的联系”^[10]。他在1903年的代表大会上说，“‘经济派’把棍子弄弯了。……要把这根棍子弄直，就必须把棍子弯向另一边，我就是这么做的”^[11]。1917年以后他从未再版过这本书——虽然斯大林出于明显的理由把它奉为圣典。

1905年席卷俄国的罢工和骚乱浪潮使得《怎么办？》一书中的许多东西完全过时了，群众的自发革命行动驳倒了列宁的悲观主义。^[12]尽管列宁在《怎么办？》中一直反对把党的大门向群众成员开放，但在1905年变化了的情况下却涌进了大批新党员。党员人数增加了10倍，由精英分子组成的党与群众组织之间的差别变得不那么严格了。列宁尽管没有放弃秘密党的思想，但他毕竟承认“我们党曾经在秘密环境中停滞不前”^[13]。他督促他的追随者们“扩大自己的根据地，号召所有的社会民主主义者工人到自己方面来，把他们成百成千地吸收到党组织中”^[14]。他还说：“新的组织形式，或者确切些说，工人政党的新的基层组织形式，无条件地必须比旧的小组织更广泛些。此外，新的支部大概应当是手续不太严格的、比较自由的、比较散漫的组织”^[15]。这就必须改变党的结构，而列宁自己曾致力于引进实行选举原则，并削减中央委员会的权力，甚至主张公民投票原则。^[16]

党的新体制被概括为“民主集中制”这一术语。这个术语出自孟什维克，在暂时统一了两派的1906年斯德哥尔摩代表大会上，根据列宁的提议，把它写进了党章。^[17]列宁在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解释道，民主集中制原则在于“要进行顽强的工作，使基层组织真正成为而不是口头上成为党组织的基本细胞，使所有的上层机关都成为真正选举出来的、要汇报工作的、可以撤换的机关”^[18]。党内少数派的权利也应得到保证。列宁把他的原则说成是“讨论自由，行动一致”^[19]——行动的号召只能由代表大会而不是由中央委员会发出。

当然，1905—1906年提出新的民主集中制，确实并非单纯出于当时的革命热情。列宁不能不受下述事实的影响，即：在1906年斯德哥尔摩统一代表大会上，布尔什维克是少数派，而且大会选出的中央委员会处于孟什维克控制之下。随着革命的失败、布尔什维克与孟什维克的重新分裂，以及恰逢1908年到1912年的反动时期，布尔什维克党内的宗派情绪又大规模地回潮了。在列宁的推动下，这个在国内受迫害而在国外闹内部分裂的党，又变得坚如磐石了。由此，列宁越发坚持“党”的路线了。^[20]

然而，正如1905年已使布尔什维克党严格的组织形式受到严重冲击那样，1917年再次开创了党内生活中最开放和“自由”的时期。党员人数几个月内重新增加了10倍，坚如磐石、高度集中的党的组织结构便难以承受新开创的自由狂热气氛的冲击。不同倾向在党内发挥作用，党的组织便“必然有些松散和不稳定性”^[21]，从上到下对党的政策选择展开了激烈辩论。以前遭到列宁斥责、而今受到同志般欢迎的托洛茨基，甚至宣称党应该“非布尔什维克化”^[22]。

但这一事态未能、也不可能维持太久。布尔什维克在1918—1921年间所遇到的内战和严重混乱，迫使它取缔了先前的自由。以布哈林与列宁为对立的双方，在缔结对德和约问题上曾有过非常公开的辩论；到1921年以前，在经济政策和对苏维埃与工会的关系问题上也发生了多次争论。但国内战争结束时，这个国家已消耗殆尽。无产阶级大批遭到杀害，而大多数人对共产党——当时它已重新命名——怀有敌意。中央委员会与施略普尼柯夫（Shliapnikov）和柯伦泰（Kollontai）所领导的“工人反对派”发生了争执，后者要求工人有充分自由的权利选举他们自己的工会领导人，并拥有与党相对立的独立性。当时几乎同样与党的发展趋向对立的派别是“民主集中派”，他们希望党内更加民主，希望地方苏维埃有实权。他们的反对立场实在是出于积怨过深。^[23]而直到1920年底，列宁还在重申党内所有派别都有自由表达意见和在党的代表大会上有其相应代表的权利。但1921年3月，在残酷镇压喀琅施塔得（Kronstadt）起义仅仅几个星期后召开的第十次党代表大会^[24]，标志着与这一传统的彻底决裂。根据列宁的提议，通过了两项决议：第一项要求“毫无例外地解散一切按某种纲领组成的派别（如‘工人反对派’、‘民主集中派’等），并责令立即执行”^[25]，如有2/3的多数票，便可把这些成员开除出党。第二项决议特别谴责“工人反对派”，并以迥然不同于1917年对群众表示信任的精神宣布，“只有工人阶级的政党，即共产党，才是能团结、教育和组织成无产阶级和全体劳动群众的先锋队，也只有这个先锋队才能抵制这些群众中不可避免的小资产阶级动摇性，抵制无产阶级中不可避免的种种行会狭隘性或行会偏见的传统和恶习的复发”^[26]。随之而来的是对党的清洗，不久以后，斯大林成了党的总书记。

革 命

列宁的革命观源自正传统的传统，这一传统是从普列汉诺夫那里师承下来的，更具体地说，它源于列宁在《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一书中对俄国经济发展的考察。列宁在其 1894 年反对民粹派的论战性著作《什么是人民之友？》中，系统地阐述了他的观点：俄国的经济体系已基本上是资本主义的，（由于资产阶级太软弱）无产阶级不得不领导争取民主的斗争。某些评论家认为《什么是人民之友？》是在以唯意志论的雅各宾派方式鼓吹一场直接的社会主义革命。列宁虽然谈到过一场“胜利的共产主义革命”，但从他所认定的若干先决条件可以看出，他认为这一革命将发生在遥远的未来。在 1916 年对帝国主义的研究改变其基本看法以前，他从未谈论过直接的社会主义革命。直到那时为止，他的基本观点是：在基本上是资本主义的俄国，无产阶级领导的是一场资产阶级革命。

这一想法的近期目的是推翻专制制度，并建立资产阶级民主，这也是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几乎所有俄国马克思主义者的共同理想。后来的主要分歧点在于达到这一目的的手段上，特别是同盟军问题。无论是布尔什维克、还是孟什维克都认为，与自由派的联盟是必要的，但孟什维克对结成这一联盟持乐观态度，而列宁对此却始终持怀疑态度，尤其在 1905 年革命期间，他更是疑虑重重。从这次革命的失败中，孟什维克得出的结论是：只有与自由派结盟赢得初步的变革，社会主义才能胜利。列宁则得出相反的结论：在任何革命斗争中，自由派都是完全靠不住的同盟者。这一分歧突出地表现在他们各自对待杜马的态度上。孟什维克热中于参加杜马，并随之与立宪民主党自由派结成联盟；而列宁一开始就不顾强烈的反对意见而硬要他的追随者抵制杜马——后来，他有了改变，并承认这一观点是错误的。

但正是在关于即将到来的革命中农民的作用问题上，列宁显示了其思想的灵活性和独创性。他对自由派越来越不肯让步的态度，使得他更乐观地看待农民，以至于他可以自称为第一个提出在政权中联合农民的马克思主义者，从而把农民置于经典的西欧马克思主义范式中的自由派地位。1905 年的事件使他深信，革命的命运取决于边缘集团特别是农民的态度。孟什维克认为农民太无组织，不能作为可靠的同盟者；而列宁在其 1905 年夏写成的

《两种策略》中，却提出一种“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按照《两种策略》的结论，这种专政之所以把农民包括在内，是因为：

不仅彻底的土地改革，而且农民的一般的和经常的一切利益，都使农民趋向于革命。农民甚至在和无产阶级作斗争时也需要有民主，因为只有民主制度才能准确地表现农民的利益，使他们能够以群众资格，以多数资格取得优势。农民受到的教育愈多，他们就会愈彻底、愈坚决地拥护完全的民主革命，因为他们并不像资产阶级那样害怕人民的统治，相反地，人民的统治对他们是有利的。^[27]

在1906年召开的第四次党代表大会上，列宁提出土地国有化和把土地分给农民的建议，以便把农民从大资产阶级那里争取过来，并为民主共和国创造经济基础——这走的是与普鲁士道路相反的美国道路，即宁要独立的小土地所有者而不要容克制度。这将是一场“民主”革命，同时列宁也十分清楚这场革命的资产阶级性质：“那些对俄国来说是势在必行的政治制度方面的民主改革和社会经济方面的改革，就其本身来说，不仅不会摧毁资本主义和破坏资产阶级的统治，反而会第一次为资本主义的广阔而迅速的、欧洲式的而不是亚洲式的发展真正扫清道路，第一次使资产阶级这个阶级的统治成为可能。”^[28]但是，一场革命就社会经济形式而论是资产阶级的，就政治形式而论又是社会主义的，这种想法看来有点矛盾。

列宁的思想和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到底有什么区别呢？这一直是个大有争议的问题。正统的共产主义者总想声称，列宁有一种包容1905年和1917年革命的始终如一的理论。托洛茨基的追随者（和托洛茨基本人）后来希望最大限度地弥合与列宁的分歧，而斯大林主义者则竭力论证他们之间的对立，企图以此作为认定托洛茨基早就“背叛”的根据。这场论战还由于使用了大量不确切的术语而蒙上了疑云。很清楚，托洛茨基决不像经常被指责的那样敌视农民，而列宁本人对于两种革命的关系也往往并不明确。在经常被人引用的一个段落中，他甚至说过：

我们将立刻由民主革命开始向社会主义革命过渡，并且正是按照我们的力量，按照有觉悟有组织的无产阶级的力量开始向社会主义革命过渡。我们主张不断革命。我们决不半途而废。^[29]

并且，列宁在许多场合提到过“长驱直入”（Parastanie），或从一个阶段到另一个阶段的“过渡”。

然而，不能因此而模糊托洛茨基与列宁之间的分歧。列宁在反对民粹派的论战中就开始研究经济学了，因此任何在俄国直接实行社会主义的提议都很容易使他想起从前的对手。虽然列宁明白，“资产阶级”革命一旦胜利，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便立即开始，但他还是严厉指责托洛茨基“把不同的历史时期混淆起来……拿正在进行资产阶级革命的俄国同早已结束这种革命的欧洲相提并论”^[30]，并把托洛茨基的“主要错误”归结为“忽视革命的资产阶级性质，对于从这种革命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的问题，没有一个明确的看法”^[31]。他在1917年以前一直持这一基本看法。

恰如1905年时那样，在1917年2月，布尔什维克领袖们又大惊失色地跟在起义群众后面，而不是去领导起义。直到列宁于1917年4月初到达彼得堡，布尔什维克一直犹豫不决，并倾向于与孟什维克合作而有条件地支持临时政府——这并不令人惊讶，因为作为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他们认为应该置身于资产阶级革命之中。在1917年3月的《远方来信》里，列宁原本不怎么考虑从资产阶级革命已有可能过渡到某种无产阶级革命的思想了。而在著名的《四月提纲》中，他又再次提出了这一思想。这至少使某位布尔什维克人士惊呼，“列宁恰恰使自己成为过去三十年中一直空着的巴枯宁宝座的候补者了”^[32]。列宁宣称：

俄国当前形势的特点是从革命的第一阶段向革命的第二阶段过渡，第一阶段由于无产阶级的觉悟和组织程度不够，政权落到了资产阶级手中，第二阶段则应当使政权转到无产阶级和贫苦农民手中。^[33]

因此，党应当拒绝支持临时政府，放弃与孟什维克重新联合的念头，并鼓动群众结束战争、全部土地国有化和政权归苏维埃。列宁声称，他自1905年起一直主张的革命民主专政已经实现了：

现在谁只谈“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谁就是落在生活的后面，因而实际上跑到小资产阶级方面去反对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这种人应当送进革命前的“布尔什维克”古董保管库（也可以叫作“老布尔什维克”保管库）。^[34]

不过，列宁仍然坚持有必要在推翻临时政府的任何举动中都必须得到群众的支持。任何其他的路线，任何以少数派名义行动的企图，都将是“荒谬的布朗基主义”^[35]。但在7月，所发生的一系列大规模的示威，尽管布尔什维克并未予以支持，但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支持的临时政府却仍然以此对布尔什维克进行了镇压。列宁得出结论说：

俄国革命和平发展的一切希望都彻底破灭了。客观情况是：或者是军人专政最终取得胜利，或者是工人的武装起义取得胜利……“全部政权归苏维埃”的口号是革命和平发展的口号，在4月、5月、6月，甚至7月5日—9日以前，即政权实际转到军事独裁者手中以前，革命和平发展还是可能的。现在这个口号已经不正确了，因为它没有估计到这种转变，没有估计到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实际上已经完全背叛革命。^[36]

但列宁并未将上述思想立即付诸行动。在7月剩下来的日子和8月里，他流亡芬兰，忙于写作《国家与革命》。但到9月，科尔尼洛夫将军发动政变失败，引起了有利于左派的反应。托洛茨基（他刚刚正式加入布尔什维克）任主席的彼得堡苏维埃以及莫斯科苏维埃，都处于布尔什维克的影响之下。无组织的起义席卷了农村地区。到9月中旬，仍在芬兰的列宁写信给中央委员会：“布尔什维克既然在两个首都的工兵代表苏维埃中取得多数，就能够而且必须夺取国家政权。”^[37]仍在俄国的大部分党的领导人对7月的失败记忆犹新，不愿意认真采纳列宁的建议，而列宁因此而竟然威胁要退出中央委员会，并向普通党员呼吁，鼓动他们采取果断行动。而这一行动只是在他于10月中旬亲自来到彼得堡时，才终于着手进行。即便如此，像季诺维也夫（Zinoviev）和加米涅夫（Kamenev）这样一些有影响的党员（他们并不是孤立的）还是继续反对起义，甚至在出版物中公开了这一分歧（因而也公开了列宁的意图）。但由托洛茨基精心部署、并督促执行的起义计划自有其本身的能量，因此，当临时政府10月24日企图封闭某些布尔什维克的报纸时，布尔什维克便开始夺取政权。这无疑是有史以来最容易而不流血的一次夺权行动——至少从其最初阶段看。

帝国主义

列宁认为，帝国主义现象是与资本主义性质的改变——即成长为垄断资本主义——紧密联系在一起的。20世纪初，当发达的经济操纵在集中于卡特尔和托拉斯的银行控制下的金融资本手中，这种垄断形式的资本主义便取代了竞争的资本主义。早期资本主义的形式是以商品输出为典型特征，而垄断资本主义则输出资本。过剩的资本不能用于国内（因为对资本家来说，这就意味着降低利润），而是“输出国外，输出到落后的国家去，以提高利润。在这些落后的国家里，利润通常都是很高的，因为那里资本少，地价比较贱，工资低，原料也便宜”^[38]。事实上，这又导致把世界分割为各个国际卡特尔的势力范围。虽然列宁通常批评说，殖民扩张实际上发生在垄断资本高度发展之前^[39]，但他的表述确实含糊不清，其实并没有指出其原因所在。^[40]

对此，当时的一些马克思主义思想家的看法都很普遍，其中包括考茨基，他在战争爆发的前几年中已经改变了对帝国主义前途的看法。他认为，可能会发展出一种“超帝国主义”阶段，一些主要的资本主义国家将以某种国际卡特尔的形式和平地分割世界。而对列宁来说，这是不可能的，因为：

资本主义愈发达，原料愈感缺乏，竞争和追逐全世界原料产地的斗争愈尖锐，那么占据殖民地的斗争也就愈激烈。^[41]

而且，在列宁看来，考茨基只关心产业资本，而没有认识到，使帝国主义具有其必不可免的特征的是金融资本。资本主义制度不可能实现均衡，因为：

金融资本和托拉斯不是削弱而是加强了世界经济各个部分在发展速度上的差异。既然实力对比发生了变化，那么在资本主义制度下，除了用实力来解决矛盾，还有什么别的办法呢？^[42]

列宁在这本小册子（指《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一书——译者注）的第八章中指出了帝国主义对国内的两大作用：第一，作为帝国主义

基础的垄断造成了延缓和阻滞技术进步的趋势。第二点，也是更重要的一点是，帝国主义有超额利润就有可能去“收买无产阶级的上层，从而培植、形成和巩固机会主义”^[43]。这里提出了对第二国际政策的解释。列宁并未去探究到底有多少工人已被收买，相关国家的整个无产阶级何以不会受到侵袭，以及这对革命的可能性将有何影响等问题。^[44]

虽然列宁把帝国主义称作资本主义的“垂死”阶段，但总的说来，他的见解却远不是那么乐观的。他说：

如果以为这一腐朽趋势排除了资本主义的迅速发展，那就错了。不，在帝国主义时代，某些工业部门，某些资产阶级阶层，某些国家，不同程度地时而表现出这种趋势，时而又表现出那种趋势。整个说来，资本主义的发展比从前要快得多，但是这种发展不仅一般地更不平衡了，而且这种不平衡还特别表现在资本最雄厚的国家的腐朽上面。^[45]

列宁这本小册子的副标题是“通俗的论述”，由此可见，他并未自称是一部高度独创性的著作。列宁具体参考了英国自由党人霍布森（Hobson）（他曾主张，殖民扩张应归咎于缺乏国内的投资机会）和希法亭，但更直接的资料来源却是布哈林（Bukharin）的《帝国主义和世界经济》，该书在列宁这本小册子的前几个月写成。布哈林把希法亭从金融资本主义的必然要求的角度而对帝国主义所作的分析作为自己的出发点，^[46]接着描述了希法亭著作出版后几年以来垄断发展的程度：国家日益增强的干预已使整个国民经济以资本主义托拉斯或国家资本主义的形式组织起来。然而，为反对德国社会民主党内流行的看法，布哈林强调了帝国主义是当代资本主义的必然特征，帝国主义将不可避免地导致战争与革命。^[47]另一方面，列宁从卢森堡那里却借鉴得很少，原因是她的见解侧重于过多地强调不发达国家，而且包含了一种不给政治行动以活动余地的“帝国主义的经济主义”。

列宁对帝国主义的分析是他的革命观发展的关键。帝国主义战争将世界金融资本主义带入其最后阶段，并为世界范围的社会主义革命准备了客观的和主观的先决条件。列宁早在1915年就写道：“俄国无产阶级的任务就是要把俄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进行到底，以掀起欧洲的社会主义革命。”^[48]他1917年离开瑞士以前已得出结论：“帝国主义战争的客观条件，保证了革命不会局限于俄国革命的第一阶段，不会局限于俄国这一个国家”^[49]。俄国无

产阶级革命的时代已迫近，而列宁也致力于思考无产阶级的国家将采取何种形式的问题。

国 家

列宁关于国家问题的最重要著作是《国家与革命》，事实上，它被柯莱蒂（Colletti）称为“列宁对政治理论的最大贡献”^[50]。它可以说是列宁关于帝国主义的思想在实践中的应用。

该书源于1916年夏天列宁与布哈林就无产阶级革命以后国家的存在问题进行的一场争论。布哈林强调“消亡”方面，而列宁则坚持利用国家机器来剥夺剥夺者的必要性。事实上，是列宁改变了自己的想法，而写成于1917年夏天的《国家与革命》中的许多想法，特别是反国家主义的命题，原本是布哈林的思想。^[51]

列宁关于国家的直截了当的定义是：“国家是特殊的强力组织，是镇压某一个阶级的暴力组织”^[52]。因此，他甚至对议会民主也加以贬低，因为这种民主已受到他所认为现代日益增长的官僚和军事势力的影响：

每隔几年决定一次究竟由统治阶级中的什么人在议会里镇压人民、压迫人民，——这就是资产阶级议会制的真正本质，不仅在议会制的立宪君主国内是这样，而且在最民主的共和国内也是这样。^[53]

于是，列宁遵循马克思关于巴黎公社——被列宁奉为楷模^[54]——的结论，宣称革命的任务是打碎国家。虽然在共产主义条件下，“在一定的时期内，不仅会保留资产阶级法权，甚至还会保留没有资产阶级的资产阶级国家”^[55]，但列宁相信，在无产阶级革命成功之后，国家不仅已开始消亡，而且已处于一种高度的解体状态。不过，列宁还是把国家称作“武装起来进行统治的无产阶级”。难道这也要消亡吗？是的，就其无论如何是一种脱离群众、并且与群众对立的权力而言，它是要消亡的。（苏维埃的最新经验对列宁的影响在这里是显而易见的）他几乎不谈这一过渡时期的体制形式，而特别强调的是无产阶级专政：

只有承认阶级斗争、同时也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的人，才是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主义者同平庸的小资产者（以及大资产者）之间的最深刻的区别就在这里。必须用这块试金石来检验是否真正理解和承认马克思主义。^[56]

但列宁对于这一专政可能采取的形式几乎未作分析。既然他竭力坚持国家在革命后立即消亡，因而具有自由主义、甚至无政府主义的色彩，因而这一专政的形式问题就愈发令人费解了。他的一般性见解似乎体现了古典的社会主义模式，即对人的统治能够让位于对物的管理：

我们工人自己将以资本主义创造的成果为基础依靠自己的工人的经验，建立由武装工人的国家政权维护的最严格的铁的纪律，来组织大生产，把国家官吏变成我们委托的简单执行者，变成为对选民负责的、可以撤换的、领取微薄薪金的“监工和会计”（当然还要用各式各样的和具有各种等级的技术人员），这就是**我们**无产阶级的任务，无产阶级革命实现时就可以而且应该从这里**开始**做起。在大生产的基础上，这个开端自然会导致任何官吏逐渐“消亡”，使一种不带引号的、与雇佣奴隶制不同的秩序逐渐建立起来，在这种秩序下，日益简化的监督职能和填制报表的职能将由所有的人轮流行使，然后将成为一种习惯，最后就不再成其为特殊阶层的**特殊**职能了。^[57]

在政治领域内，最为引人注目的是，作为革命的动力——党——本身却没有提及。而在一处严肃谈到党的地方，列宁说：

马克思主义教育工人的党，也就是要教育无产阶级的先锋队，使它**能够夺取政权并引导全体人民**走向社会主义，指导并组织新制度，成为所有被剥削劳动者在不要资产阶级并反对资产阶级而建设自己社会生活的事业中的导师、领导者和领袖。^[58]

到底是先锋队还是无产阶级“能够夺取政权并引导”，在这里是不明确的。列宁思想的总体特性大概是倾向于前者，但前者必然与他那更为自由主义的阐述发生明显的冲突，而他从来就没在任何地方详细论述过这一

冲突。

然而，在十月革命成功后不久，《国家与革命》中固有的乐观主义情绪就消失了。由于苏维埃国家处于敌对势力包围下的孤立境地，由于国外革命运动的失败，以及随之而来的苏维埃政府被迫单独与德国人在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Brest-Litovsk）签订屈辱的和约——在接受和约的政策上，面对托洛茨基和布哈林等左派共产主义者的强烈反对，列宁遇到了巨大的困难，所有这一切使苏维埃陷入重重困难之中。在1918年3月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上，列宁在回答布哈林时，提出了一个不同的侧重点。“什么时候国家才开始消亡呢？”他提出问题并自我回答，“要等到我们可以说：你们看，我们的国家在消亡！要等到那个时候，我们还来得及召开几次党的代表大会。而现在还早得很。提前宣布国家的消亡将会破坏历史的发展远景”^[59]。无产阶级的专政逐渐变成党的专政，并把党和国家等同起来，这两种情况是由三个主要因素所助长、促成的：党事实上使权力掌握在自己的手中、官僚主义的发展以及工人们很难有效地发表自己的意见。

1917年后期，布尔什维克党力量弱小而且其组织毫无效用。某些像普列奥布拉任斯基（Preobrazhensky）那样的布尔什维克甚至提出，要把党融化到苏维埃里面去。但是，正如利布曼（Liebman）所言：

新政权的民众基础缩小了，苏维埃民主变得更加徒具形式；与此相反，党由于更加紧密团结而更坚忍地克服了种种社会政治困难，增强了它的威信，并重新确立起先前有利于自己的不平衡地位。^[60]

到1919年，党和国家已交融为一体，而无产阶级专政变成为等同于党的专政，以至于列宁可以谈论在“党的领导下”调控阶级关系了。^[61]

由于1918年1月解散立宪会议并开始镇压反对派，党的这种统治得以强化。革命前，列宁一直赞同召集立宪会议，而没有明显地意识到这与“一切权力归苏维埃”口号之间的必然冲突。对于一个宣称进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党来说，决定解散布尔什维克在其中只有25%表决权的立宪会议，是不可避免的。因为立宪会议中最大的党代表的是农民的利益，而会议的整个体制更适合于资产阶级民主。

但是，苏维埃作为民众意志的体现也未能维持多久，内战和公共生活的军事化很快就使苏维埃政权黯然失色了。反对党的生存本身也逐步受到威



胁。1917年以前，列宁从未提出过一党制国家，因而后来，布尔什维克不能与自己的社会主义反对派达成联合，这固然在于自身不妥协，但同时也是由于其反对派一样不让步。然而，内战的压力和把反布尔什维主义与反革命等同起来的倾向，最终导致镇压所有的反对党。一贯代表富裕农民的社会革命党人从根本上对布尔什维克的纲领怀有敌意；而孟什维克的情况不同，人民对他们的支持（尽管有布尔什维克的干扰）日渐增长。1918年6月，他们被逐出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而到1920年底就被全面镇压了。

这种集权主义的倾向因官僚主义的发展而增强了。^[62]而征用制和为战争努力所导致的国有化方案的层层加码，又助长了官僚主义；个中原因还有俄国专制制度中传统的官僚主义作风的影响，以及将越来越多的待业者纳入国家机关、为他们安排工作的主观努力。到1920年底，这台行政机器已经吸纳了近六百万的雇员，形成一种与经济生产力（下降）恰成反比的增长。虽然列宁赞成招用资产阶级技术人员和专家，并确实给了他们种种特权，但他也不断与官僚主义作斗争。他写道：“我们所有的人都陷在官僚主义的‘官厅’的臭泥潭里。”^[63]1921年初，列宁指出苏联的特点是“这个工人国家还带有官僚主义的毛病”^[64]。一年以后，列宁在他最后一次参加的党代表大会上承认：

如果拿这堆官僚主义的庞然大物来说，我们必然问：是谁在领导谁呢？说共产党员在领导这堆庞然大物，我很怀疑这种说法。说句实话，不是他们在领导，而是他们被领导。^[65]

甚至著名的工农检查院（Rabkrin）这个原本对行政机关实行群众监督的组织，也（“异化”）成了另一个“机关”，沾染上了它自身本应与之斗争的一切缺陷。在终其一生事业的最后几个月里，列宁对这一问题的评判近乎绝望。

党的权力和官僚主义势力的增长必然妨碍基层工人阶级有效地表达意见。工人监督已在1917年11月原则上加以采用，但在经济效益上却并不成功，几个月后就开始放弃了。迫于经济形势的压力，列宁要求实行计件工资制，甚至泰罗制。1918—1921年实行的“战时共产主义”，使高度集中的管理成为必要；而其后的新经济政策则意味着（虽然也是必要的）后退一步。罢工在“属于”工人的国家里被看成是不合逻辑的。在工会地位这个重大问

题上，有两种彼此对立的见解：第一种是以柯伦泰（Kollontai）和施略普尼柯夫（Shliapnikov）为代表的所谓工人反对派的观点，他们认为工会在经济事务的管理中应享有决定权。第二种是托洛茨基的观点，他认为工会只应是政治权威的一种工具。列宁则在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中赋予工会以某种独立性，但他的意见最后并没有占上风。^[66]整个说来，苏联政府无力去实践《国家与革命》的原理，这令列宁在逝世的前几年中深感悲观和忧虑。

民族问题

列宁支持民族自决权，但他让这一权利受制于一些最终使它在实践中归于消灭的条件。列宁在他最初的一处相关表述中写道：

从我们的角度来说，我们这样做所关心的并不是各民族的自决权，而是每个民族的无产阶级的自决权……而支持民族自治要求，则绝不是无产阶级经常性和纲领性的职责。只是在个别的、特殊的情况下，这种支持才是无产阶级所必需的。^[67]

因此，列宁只能给予民族独立的要求以有条件的承认。这方面的一个重要例子是欧洲最大的被征服民族——波兰，这也是在社会主义者中间长期辩论的一个话题。马克思曾经无条件地支持波兰的独立要求，但列宁却批评波兰社会党无条件地要求其国家独立。当然，这并不是说，在列宁那里，民族问题是个无足轻重的问题；恰恰相反，他完全懂得利用民族意愿对于无产阶级事业的重要性。事实上，他几乎比当时所有其他社会民主党领袖都更强烈地表示赞成民族自决原则，但他从未谈论过爱国主义或者“民族”文化。（在1914年12月的“论大俄罗斯人的民族自豪感”一文中，他似乎赋予大俄罗斯民族文化以一种内在的价值，这必须看作一个例外，也许是受一种强烈的欲求支配，他渴望表明：布尔什维克当时在对待战争上并不完全是反俄的。）在列宁看来，民族自治问题纯粹是个策略问题，因为自决权始终服从于党的利益。

因此，列宁坚决反对奥地利马克思主义者支持联邦原则和民族文化自治。他虽然确曾宣布，他坚信：“一切民族和语言完全平等，取消带强制性



的国语”和“把取消任何民族特权以及不得侵犯少数民族权利的基本法律包括在宪法里”，这“尤其必须实行广泛的区域自治和完全民主的地方自治”^[68]。但只不过列宁并没有走得像罗莎·卢森堡那么远（她把民族主义看成是立足于反动的知识分子和小资产阶级，他们对资本主义发展充满了畏惧感^[69]），他在1913年非常明确地写道：

我们绝对不宣传分离。总的说来，我们是反对分离的。但我们拥护分离权，因为黑帮的大俄罗斯民族主义大大损害了民族共居的事业，有时在自由分离以后，反而可以获得更多的联系！自决权是我们集中制总前提中的一个例外。在黑帮的大俄罗斯民族主义存在的时候，这个例外是绝对必要的，稍一抛弃这个例外，就是机会主义（像罗莎·卢森堡那样）。^[70]

1914年大战的爆发也未能使这些看法有所改变。尽管列宁接受了希法亭和卢森堡关于国际垄断资本主义新阶段到来的基本论点，但他并不接受卢森堡关于它现已导致一切民族集团趋于过时的结论。因为资本主义发展的步子是不均衡的，而列宁最关心的东欧地区，资本主义还不甚发达。

列宁对民族自决的热情随着革命的成功自然有所减退。当时，布尔什维克正陷入既要同外国现政府谈判，又须扶植当地革命事业的尴尬境地。正如列宁在他关于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和约的《提纲》中写道的：“如果不违背马克思主义和一般社会主义的原则，任何一个马克思主义者都不能否认社会主义的利益高于民族自决权的利益。”^[71]因此，布尔什维克党一旦被确立为多民族国家中无产阶级利益的代表，民族自主的余地也就所剩无几了。列宁认可了红军1921年对格鲁吉亚的征服——尽管他对斯大林和奥尔忠尼启泽（Orjonikidze）的过分残忍感到震惊。正是在这一场合，他发表了如下著名的评论：

如果像捷尔任斯基（Dzerzhinsky）同志告诉我的那样，事情发展到奥尔忠尼启泽竟会动手打人，那么可以想像得出，我们已掉到什么样的泥潭里去了。^[72]

其实，同他的许多布尔什维克同志——比方说布哈林、拉狄克和斯大

林——相比，列宁在民族策略上是极其“自由主义”的。只是因为内战以及军事形势下和工业化运动中不可避免的集权倾向的存在，他把上述观念付诸实施的努力受到了阻碍。

哲 学

作为一位马克思主义者，列宁早年并不认为马克思主义需要一个哲学上的特殊组成部分。例如，列宁在1894年写的《什么是人民之友？》中说：“坚持辩证法……不过是科学社会主义由以长成的那个黑格尔主义的遗迹，是黑格尔主义表达方式的遗迹罢了。”^[73]确实，认为马克思主义没有哲学内容，这是19世纪末的一个普遍看法。资产阶级批评家视之为可攻击的缺陷，正统马克思主义者（例如，弗兰茨·梅林）视之为特点（优点），而另外一些马克思主义者则企图用康德或马赫的观点来补充他们的马克思主义。然而，列宁在流放西伯利亚时研读了普列汉诺夫的著作，便认定马克思主义正好需要一门遵循普列汉诺夫本人思路的哲学。但即便在布尔什维克建党之后，列宁仍然相信哲学中不应有什么特殊的“党的路线”，而宁肯把这些问题留给一批有才华的专业哲学家和知识分子去讨论，像波格丹诺夫（Bogdanov）、卢那察尔斯基（Lunacharsky）和高尔基（Gorki）这样的人，他们都是在1905年加入布尔什维克的。

波格丹诺夫深受物理哲学新近发展的影响，特别是受恩斯特·马赫（Ernst Mach）思想的影响。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科学家当中逐渐出现了一种对其上辈进行颇为肤浅的唯物主义批判的态度。这集中体现在：自道尔顿（Dalton）以来，长期认为实体的原子是基本的“宇宙之砖”的看法，改变为视原子为一团带负电荷的电子云的看法。简而言之，“物质”似乎消失了。马赫在按科学发展进程作预测时，企图建构一种完全建立在感觉之上的世界观，即认为：我们称之为客观的东西（包括自我在内），只不过是经济而有条理的方式归类而来的各种感觉的复合体。^[74]这些观点为波格丹诺夫所接受，在其名之为“经验一元论”的体系中，他企图更进一步来表明，物理现象和心理现象是同一个经验，只是其组织起来的方式各不相同而已。波格丹诺夫的观点的核心是，经验是组织起来的思想：心理现象是以个人方式组织起来的，物理现象是以社会方式组织起来的。

甚至到1908年，列宁仍把马赫主义看作不仅在党内，而且在各个派别内都是件个人选择的事情。但他本人在自己一派内激烈反对马赫主义，这有两个主要原因：第一，列宁与召回派（Otzovists-fellow-Bolsheviks）——以波格丹诺夫为首，原属布尔什维克，希望抵制第三届杜马选举——之间的争论从1907年起变得尖锐起来了。列宁当时处于极少数派地位，而波格丹诺夫则被选为该派发言人。于是，波格丹诺夫和他的朋友们开始把他们的影响扩大到俄罗斯以外，并在卡普里岛的高尔基住宅为党的活动分子建立了一所布尔什维克学校。因此列宁被迫去削弱波格丹诺夫（以及左派敌手们）的权威，以便重新确立他本人的统治地位。第二，《新时代》刊印了波格丹诺夫论“恩斯特·马赫与革命”的文章的译文，并在简短的“序言”中告诉德国读者，在孟什维克奉行斯宾诺莎与霍尔巴赫的哲学的同时，布尔什维克已把马赫哲学作为该派的思想基础。新近出版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论文集》，作为到那时为止最大胆的马赫主义的著作（特别是就卢那察尔斯基关于“宗教无神论”的言论来看），对上述看法予以支持。这样，列宁就担心布尔什维克会被看作哲学上的修正主义者，而孟什维克则被看作正统派哲学家。因此，列宁写《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的目的，不是把哲学上的争论和政治上的争论结合起来，而是要把它们分别开来；倒是孟什维克试图把这二者加以联系，并试图把争论从布尔什维克哲学上的修正主义引申到其政治上的修正主义。甚至正当列宁撰写这部著作时，德波林（Deborin）便在孟什维克的报纸上写道：

在所谓布尔什维主义的一切策略上都留下了主观主义与唯意志论的印记，其哲学表现就是马赫主义。我们的马赫主义式的马克思主义者们的自觉地把马赫主义诉诸于实践和策略的布尔什维克；而布尔什维克的策略家们是只讲实用的、不自觉的马赫主义者和唯心主义者。^[75]

因此，列宁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的真正价值并不在于其哲学上的论证，而在于他认为，从实际政治出发，唯一的哲学就是有益于无产阶级的。他认为，马赫主义这类当代哲学倾向，从党的工作的立场来看，是不正确的意识形态；党的实际工作才是头等重要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中表述的核心哲学观，其价值是次要而又短暂的。

《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对马赫和波格丹诺夫进行了广泛的针锋相

对的批判。在一段论证认识论等同于本体论的文字中，列宁说：

我们现在谈的完全不是唯物主义的这种或那种说法，而是谈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对立，哲学上两条基本**路线**的区别。从物到感觉和思想呢，还是从思想和感觉到物？^[76]

他对物质下的定义是，“物质是标志客观实在的哲学范畴，这种客观实在是人通过感觉感知的，它不依赖于我们的感觉而存在，为我们的感觉所复写、摄影、反映”^[77]。这两个学说——世界的外部实在性和认识的“复写”理论——构成了列宁唯物主义的中心主题。该书的基本概念是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这两大互相冲突的哲学派别。对唯心主义哪怕作出最微小的让步最终都将导致信仰主义和宗教，从而在客观上帮助和拯救了资产阶级。他不仅力图说明，那些否认不依赖感官知觉而存在的客观世界的实在性的人实际上是宗教信仰徒，而且企图——更令人难以置信地——表明，在关于外部世界的存在不可知论和宗教之间有一种必然联系。

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中，很少有耐人寻味的哲学趣味。列宁的（甚为错误的）看法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几十次地把自己的哲学观点叫作辩证唯物主义”^[78]。确实，列宁这本书只不过是恩格斯晚期经常被人引用的著作中某些论点的简单转述而已。^[79]（只有四处引证了马克思，其中没有一处是有关主要论点的。）一般说来，列宁所理解的唯物主义是马克思以前的。甚至他对马赫立场的说明，在若干要点上也是一种曲解。当然，依据其哲学内容来评价列宁这本书，也许有失公允。因为它的目的主要是政治性的，并在这方面是大为成功的。更一般地来说，基于俄国当时落后的经济状况，列宁回复到18世纪唯物主义的某些肤浅的形式是可以理解的。18世纪的唯物主义是资产阶级对贵族特权及其宗教后盾进行反抗的组成部分。既然俄国没有强大的资产阶级，那么唯物主义就成了无产阶级反对沙皇政权封建主义的斗争武器。总之，列宁在哲学上的落后是俄国经济发展落后的产物。^[80]

1914年世界大战爆发后，列宁重新把注意力转向了哲学——这一次不再是抱工具主义的（寻求应急工具的）态度。令人吃惊的是，面对欧洲社会主义所经历的大变动，列宁为了重新确定自己的观点，竟花了大量的时间极其细致地研究了黑格尔。这同《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形成鲜明的对

照，后者中只有两处关于黑格尔的评论（而且，都很肤浅），极少谈及辩证法。^[81]列宁的笔记（长达300页左右的篇幅）只是到1929年才发表出来，它用以支持当时党反对“机械论”偏向的斗争。^[82]这部《哲学笔记》的最重要部分是列宁对黑格尔《逻辑学》的研究。在《哲学笔记》中，他打算把黑格尔的唯心主义颠倒过来，从而正确阐明马克思的唯物主义。但是，其重点从批判黑格尔转为热情地接受黑格尔思想中的辩证法因素。列宁在其笔记的结尾处写道：“在黑格尔这部最唯心的著作中，唯心主义最少，唯物主义最多。”^[83]

列宁在《哲学笔记》中最有名的评论是关于黑格尔与《资本论》的关系：

不钻研和不理解黑格尔的全部逻辑学，就不能完全理解马克思的《资本论》，特别是它的第一章。因此，半世纪以来，没有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是理解马克思的！！^[84]

这实际上是个自我批评——这也是对他以前的哲学良师普列汉诺夫的评论，普列汉诺夫“关于哲学……大约写了近1000页的东西”，但“关于……辩证法本身……却一字不提！！”^[85]《哲学笔记》坚持认为，关于认识的反映论中的“复写”是不完全的和片面的，我们从未认识一切事物。但与《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的不同之处，最鲜明地表现在这样一种看法中，即唯心主义不是个错误，而只是一种片面的夸大。正如列宁所说：“聪明的唯心主义比愚蠢的唯物主义更接近于聪明的唯物主义。”^[86]辩证思维与非辩证思维的对比取代了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对比。列宁称赞黑格尔《哲学全书》中的第25节，“在那里‘认识’（理论的）和‘意志’（实践活动）被描述为既消灭主观性的‘片面性’，又消灭客观性的‘片面性’的两个方面、两个方法、两个手段”^[87]。列宁谈到了主观和客观的统一，谈到了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把实践的标准引进认识论。他总结说：“人的意识不仅反映客观世界，并且创造客观世界”^[88]。列宁不断强调，辩证法的主要规律就是对立面的斗争和统一。实际上，他有时也陷入到某种“非理性主义的活力论”中去了。^[89]当然，还不可能证明，在列宁对黑格尔的理解和他此后的政治态度之间到底有什么确切的联系，^[90]但显然，作为列宁对1914年世界大事变的哲学反应，《哲学笔记》是与他在经济学领域中对帝国

主义的分析相对应的。某些评论家声称，他们发现列宁对黑格尔的理解，对他的《国家与革命》的若干章节、他关于革命期间党群关系的政治见解，以及他在1920—1921年对工会问题的讨论都产生了影响。^[91]

[注释]

[1] 参见本书第5章第1节的末尾。

[2] V. Lenin, 'What Is to be Done?', *Selected Works* (Moscow, 1960), vol. 1, p. 211.

[3] 关于列宁事实上是如何曲解经济主义者的，参见 A. Wildman, *The Making of a Workers' Revolution* (Chicago, 1967) pp. 118ff.

[4] V. Lenin, 'What Is to be Done?', *Collected Works* (Moscow, 1960), vol. 1, pp. 156f.

[5] *Ibid.*, p. 215.

[6] *Ibid.*, pp. 228f.

[7] 进一步参见 V. Lenin, *Collected Works*, vol. 6, pp. 229ff. 此处对这种权力集中制有详述。

[8] R. Luxemburg, *Organizational Questions of Russian Social Democracy* (1904); 另见本书第3章第3节。

[9] 比方说，考茨基在评判两派分裂可能包含的原则性问题时所遇到的困难，见 C. Weill, *Marxistes russes et Social-démocratie allemande 1898—1904* (Paris, 1977) pp. 123ff.

[10] V. Lenin, 'Preface to the Collection *Twelve Years*', *Collected Works*, vol. 13, p. 101.

[11] V. Lenin, *Speech on the Party Programme*, *Collected Works*, vol. 6, p. 489.

[12] S. Schwarz, *The Russian Revolution of 1905* (Chicago, 1967) ch. 4.

[13] V. Lenin, 'The Reorganisation of the Party', *Collected Works*, vol. 10, p. 32.

[14] *Ibid.*

[15] *Ibid.* p. 34.

[16] V. Lenin, 'The Social Democrats and the Duma Elections', *Collected Works*, vol. 11, p. 434.

[17] V. Lenin, 'A Tactical Platform for the Unity Congress', *Collected Works*, vol. 10, p. 163.

[18] V. Lenin, *Report on the Unity Congress*, *Collected Works*, vol. 10, p. 376.

[19] Ibid. , p. 381.

[20] 例如, 参见 V. Lenin, 'Resolution Adopted by the Second Paris Group', *Collected Works*, vol. 17, pp. 221ff.

[21] L. Schapiro, *The Communist Party of the Soviet Union*, 2nd edn (London, 1970) p. 174.

[22] 引自 I. Deutscher, *The Prophet Armed; Trotsky, 1879—1921* (Oxford, 1954) p. 258。强调有关 1917 年布尔什维克党内各种激进选择的观点, 见 R. Daniels, *The Conscience of the Revolution* (New York, 1969) 中的前两章。

[23] R. Daniels, *The Conscience of the Revolution*, chs 5 and 6.

[24] P. Avrich, *Kronstadt 1921* (Princeton, N. J. , 1970).

[25] V. Lenin, 'Preliminary Draft Resolution of the Tenth Congress', *Collected Works*, vol. 32, p. 244.

[26] Ibid. , p. 246.

[27] V. Lenin, *Two Tactics*, *Collected Works*, vol. 9, pp. 98f.

[28] Ibid. , p. 48.

[29] V. Lenin, 'Social Democracy's Attitude Towards the Peasant Movement', *Collected Works*, vol. 9, pp. 236f.

[30] V. Lenin, 'The Historical Meaning of the Inner-Party Struggle in Russia', *Collected Works*, vol. 16, p. 376.

[31] V. Lenin, 'The Aim of the Proletarian Struggle in our Revolution', *Collected Works*, vol. 15, p. 371.

[32] N. Sukhanov, *The Russian Revolution, 1917* (London and New York, 1955) vol. 1, p. 287.

[33] V. Lenin, 'The Tasks of the Proletariat in the Present Revolution', *Collected Works*, vol. 24, p. 22.

[34] V. Lenin, 'Letters on Tactics', *Collected Works*, vol. 24, p. 45。列宁的《四月提纲》标志着同他先前的理论彻底决裂。后来, 他通过强调苏维埃的作用, 又回到了这些原初的理论。参见 J. Frankel, 'Lenin's Doctrinal Revolution of April 1917',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History*, Apr. 1969。

[35] V. Lenin, 'The Seventh All-Russia Conference', *Collected Works*, vol. 24, p. 263.

[36] V. Lenin, 'The Political Situation; Four Theses', *Collected Works*, vol. 41, p. 442.

[37] V. Lenin, 'The Bolsheviks must Assume Power', *Collected Works*, vol. 26, p. 19.

- [38] V. Lenin, *Imperialism, The Highest Stage of Capitalism, Collected Works*, vol. 22, p. 241.
- [39] 例如, 参见 D. Fieldhouse, *The Theory of Capitalist Imperialism* (London, 1967) pp. 187ff.
- [40] E. Stokes, 'Late Nineteenth Century Colonial Expansion and the Attack on the Theory of Economic Imperialism: A Case of Mistaken Identity?', *Historical Journal*, vol. 12 (1969), pp. 289ff.
- [41] V. Lenin, *Imperialism... op. cit.*, p. 260.
- [42] *Ibid.*, p. 274.
- [43] *Ibid.*, p. 281.
- [44] 进一步参见 E. Hobsbawm, 'Lenin and the "Aristocracy of Labour"', *Monthly Review*, Apr. 1970, pp. 47ff.
- [45] V. Lenin, *Imperialism... op. cit.*, p. 300.
- [46] 见本书第4章。
- [47] 就此, 列宁大大得益于布哈林, 见 S. Cohen, *Bukharin and the Bolshevik Revolution* (New York, 1973) pp. 25ff.
- [48] V. Lenin, 'Seven Theses', *Collected Works*, vol. 21, p. 402.
- [49] V. Lenin, 'Farewell Letter to Swiss Workers', *Collected Works*, vol. 23, p. 373.
- [50] L. Colletti, *From Rousseau to Lenin* (London and New York, 1972), p. 224.
- [51] 参见 S. Cohen, *Bukharin and the Bolshevik Revolution* (New York, 1973) pp. 39ff.
- [52] V. Lenin, *Selected Works* (Moscow, 1960), vol. 2, p. 320.
- [53] *Ibid.* p. 338.
- [54] 他对(巴黎)公社持有迥然不同的看法, 认为“这是我们的政府不应仿效的政府……”, 见 *Two Tactics, Collected Works*, vol. 9, p. 81.
- [55] *Collected Works*, vol. 2, p. 381.
- [56] *Ibid.* p. 328.
- [57] *Ibid.* p. 341.
- [58] *Ibid.* p. 322.
- [59] V. Lenin, 'Speech against Bukharin's Amendment', *Collected Works*, vol. 27, p. 148.
- [60] M. Liebman, *Le Léninisme sous Lénine* (Paris, 1973), vol. 2, p. 109.
- [61] V. Lenin, *Left-Wing Communism-An Infantile Disorder, Collected Works*, vol. 31, p. 48.

- [62] 参见布哈林和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对这个问题的评说, *The ABC of Communism* (Harmondsworth, 1969) pp. 237ff.
- [63] V. Lenin, *Letter to A. Tsyurupa*, *Collected Works*, vol. 36, p. 566, 另见他于1921年12月给波格丹诺夫的信, *Collected Works*, vol. 38, p. 557.
- [64] V. Lenin, 'The Party Crisis', *Collected Works*, vol. 32, p. 48.
- [65] V. Lenin, 'Report of the Central Committee to the Eleventh Congress', *Collected Works*, vol. 33, p. 288.
- [66] 参见本书第8章第2节。详见 R. Daniels, *The Conscience of the Revolution* (New York, 1969) pp. 119ff.
- [67] V. Lenin, 'On Manifesto of Armenian Social Democrats', *Collected Works*, vol. 6, p. 327.
- [68] V. Lenin, 'Resolution on the National Question', *Collected Works*, vol. 19, p. 427.
- [69] 关于列宁和卢森堡之间在这方面的分歧, 见 H. Davis 为《罗莎·卢森堡民族问题选集》(纽约, 1976) 所写的“导言”(第8页以下)。
- [70] V. Lenin, *Letter to S. Shahumyan*, *Collected Works*, vol. 19, p. 501.
- [71] V. Lenin, 'Theses on the Question of a Separate Peace', *Collected Works*, vol. 26, p. 449.
- [72] V. Lenin, 'The Question of Nationalities', *Collected Works*, vol. 36, p. 605.
- [73] V. Lenin, *What the Friends of the People Are*, *Collected Works*, vol. 1, p. 164.
- [74] 有关马赫, 可进一步参见 J. Blackmore, *Ernst Mach* (Berkeley, 1972) ch. 15.
- [75] 引自 D. Joravsky, *Soviet Marxism and Natural Science* (London, 1961) p. 34.
- [76] V. Lenin, *Materialism and Empiriocriticism*, *Collected Works*, vol. 14, p. 42.
- [77] *Ibid.*, p. 130.
- [78] *Ibid.*, p. 19.
- [79] 主要指的是《反杜林论》, 当时,《自然辩证法研究》尚未出版。
- [80] 这一问题的详述, 见 A. Pannekoek, *Lenin as Philosopher* (London, 1975) pp. 92ff.
- [81] 与之相反的解释, 见 D. H. Ruben, *Marxism and Materialism* (Atlantic Highlands, 1977), 请特别参阅第5、6章。
- [82] 参见本书第8章末尾。
- [83] V. Lenin, *Philosophical Notebooks*, *Collected Works*, vol. 38, p. 234.

[84] Ibid., p. 180.

[85] Ibid., p. 277.

[86] Ibid., p. 276.

[87] Ibid., p. 208.

[88] Ibid., p. 212. 另可参见 pp. 195, 201, 293, 211, 213.

[89] 参见 L. Colletti, *Marxism and Hegel* (New York and London, 1973) pp. 162f.

[90] 对此, 肯定的看法, 见 M. Lowy, 'From the Great Logic of Hegel to the Finland Station in Petrograd', *Critique*, 6 (Spring 1976), pp. 8ff.

[91] 比方说, 可参见 H. Lefebvre, *La Pensée de Lénine* (Paris, 1957) pp. 189ff; M. Liebman, *Le Léninisme sous Lénine* (Paris, 1973), vol. 2, pp. 349ff.

深入阅读材料

列宁：原著

莫斯科版《列宁选集》45卷本已出齐。

列宁：评论

有两部详尽的传记, 都出自与列宁谋过面的人之手, 一本是舒布 (Shub) 的《列宁》, 一本是费希尔 (Fischer) 的《列宁的一生》。沃尔夫 (Wolfe) 在《制造革命的三个人》中的描述很成功, 可惜只写到 1914 年。关于列宁的早年生活, 有多伊彻 (Deutscher) 写的自我投射性传记的片段。波索尼 (Possony) 的《列宁：强力革命家》和西恩 (Theen) 的《列宁：一个革命家的诞生与成长》提供了不太可信的心理学解释。摩尔根 (Morgan) 的《列宁》是本短小精悍的入门书。就列宁晚年的醒悟的描述, 可参见莱文 (Lewin) 的《列宁最后的斗争》。在列宁的同龄人中, 克鲁普斯卡娅 (Krupskaya) 的《列宁回忆录》对列宁个人作了活生生的描写, 是本最具价值的书, 该书还有巴拉巴诺夫 (Balabanoff)、托洛茨基 (Trotsky)、瓦连廷诺夫 (Valentinov) 和蔡特金 (Zetkin) 的描述作补充。当然, 现在看来, 最有权威性的描述还要算塞维斯 (Service) 的三卷本《列宁的政治人生》。

就列宁的总体思想而言, 费希尔 (Fischer) 的《列宁思想精要》是一本简短而又可信的导读性著作。舒克曼 (Shukman) 的《列宁与俄国革命》是部篇幅稍长一点的著作。迈耶 (Meyer) 的《列宁》仍值得一读。对列宁深怀敌意的著作有康奎斯特 (Conquest) 的《现代大师列宁》和乌拉姆 (Ulam) 的《布尔什维克》——尽管后者有详尽的研究内容。卢卡奇的《列宁》对列宁思想作出了简要的哲学解释。还有一些介绍列宁思想不同侧面的选集, 各为斯威齐 (Sweezy)、马格多夫 (Magdoff)、雷德威 (Reddaway) 和夏



皮罗 (Schapiro) 等人编写。最近, 克利夫 (Cliff) 在他的三卷本《列宁》中为列宁作了通盘的辩护。利布曼 (Liebman) 的《列宁的列宁主义》是本具有卓越洞察力的书, 尽管可惜是从法文节选下来的。有关这方面的最好的著作是哈丁 (Harding) 的两卷本《列宁政治思想》, 它以高度专业的眼光重构了列宁 1914 年前后的政治策略。还可参见贝桑松 (Besancon) 和洛厄尔 (Lovell) 的《列宁》分别都对列宁进行了批判, 另外, 还有波伦 (Polan) 富有启发的著作《列宁和政治的终结》。

在一些更为具体的领域, 曼德尔 (Mandel) 捍卫了列宁的党的概念。就列宁在 1917 年的策略改变, 参见弗兰克尔 (Frankel) 写的一篇优秀文章。就列宁的国际战略方面, 参见佩奇 (Page) 所写的相关著作。就列宁在哲学上的贡献而言, 见保罗 (Paul)、乔丹 (Jordan)、尤其是潘捏库克 (Pannekoek) 所作的批判, 而鲁宾 (Ruben) 在其《马克思主义和唯物主义》一书的最后两章中为列宁作了辩护。就列宁对待文化颇为功能主义的态度, 参见克劳丁—尤伦多 (Claudin-Urondo) 的《列宁与文化革命》。

1905 年革命和 1917 年革命

关于 1905 年, 托洛茨基用同名标题作了引人入胜的描述。最现代的分析是施瓦兹 (Schwarz) 的《1905 年俄国革命》。如同下面所列的参考文献将看到的那样, 有关 1917 年革命的书多得不可胜数。最为精悍的描述是利布曼 (Liebman) 的《俄国革命》。丹尼尔 (Daniel) 和费罗 (Ferro) 都对十月革命进行过广泛的描述, 而张伯伦 (Chamberlain) 的两卷本著作则一直写到 1924 年。卡特科夫 (Katkov) 和科汉 (Kochan) 的著作写法各异, 但都扣人心弦。最基本的文本无疑是卡尔 (Carr) 的《布尔什维克的革命》。从无政府主义的角度看, 有布林顿 (Brinton) 所展开的一贯反布尔什维克的批评。

在亲历性的纪实作品中, 托洛茨基的巨著——《俄国革命史》已跻身于经典之列。苏哈诺夫 (Sukhanov) 的《俄国革命》以一个政治记者的身份对所见所闻作了全景式的描绘。类似的作品有里德 (Reed) 的激动人心的《震撼世界的十天》。克伦斯基 (Kerensky) 以大量的回忆证实自己对革命所持的立场。佩西布里奇 (Pethybridge) 的《俄国革命目击记》是一部很有价值的文集。拉克尔 (Laqueur) 的著作提供了一部对 1917 年革命 (及其后) 所作的解释的流变史。另外, 还可参见派普斯 (Pipes) 新近面世的概论——《俄国革命》。

参考文献

Lenin: Texts

V. I. Lenin, *Collected Works*, 45 vols (Moscow, 1960—1970).

——*Selected Works*—in one Volume (Moscow, 1968); in three volumes (Moscow, 1960—1961).

——*The Essential Works of Lenin*, ed. M. Christian (New York, 1966). *The Lenin Anthology*, ed. R. Tucker (New York, 1975).

Lenin: Commentaries

Angelica Balabanoff, *Impressions of Lenin*, Foreword by B. D. Wolfe (Ann Arbor, 1964).

Alain Besancon, *The Rise of the Gulag: The Intellectual Origins of Leninism* (New York, 1981).

M. Brinton, *The Bolsheviks and Workers' Control* (London, 1970).

Fernando Claudin, 'Democracy and Dictatorship in Lenin and Kautsky', *New Left Review*, 106 (1977).

C. Claudin-Urondo, *Lenin and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Hassocks, Sussex, 1977).

Tony Cliff, *Lenin*, 3 vols (London, 1975—1978).

Lucio Colletti, 'Lenin's State and Revolution', in R. Blackburn (ed.), *Revolution and Class Struggle: A Reader in Marxist Politics* (London, 1977);

and L. Colletti, *From Rousseau to Lenin: Studies in Ideology and Society* (London and New York, 1972).

R. Conquest, *Lenin* (London, 1972).

Isaac Deutscher, *Lenin's Childhood* (Oxford, 1970).

Ernst Fischer, *The Essential Lenin* (New York, 1972).

Louis B. Fischer, *The Life of Lenin* (London, 1965).

Jonathan Frankel, 'Lenin's Doctrinal Revolution of April 1917',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History* (Apr1969).

Maxim Gorky, *Days With Lenin* (New York, 1932).

Thomas Hammond, *Lenin On Trade Unions and Revolution: 1893—1917* (New York, 1957).

Neil Harding, *Leninism* (London, 1996).

——*Lenin's Political Thought*, 2 vols (New York and London, 1977f.).

Christopher Hill, *Lenin and Russian Revolution* (London, 1947).

Z. A. Jordan, 'The Dialectical Materialism of Lenin', *Slavic Review*, XXV, 2 (1966).

N. Krupskaya, *Memories of Lenin*, with an Introduction by Andrew Rothstein (London, 1970).

Vladimir Ilyich, *Lenin: A Biography* (Moscow, 1965).

Moshe Lewin, *Lenin's Last Struggle* (London, 1969).



- M. Liebman, *Leninism Under Lenin* (London, 1975).
- David Lovell, *From Marx to Lenin: The Evaluation of Marx's Responsibility for Soviet Authoritarianism* (Cambridge, 1984).
- George Lukács, *Lenin: A Study on the Unity of his Thought* (London, 1970).
- Ernest Mandel, 'The Leninist Theory of Organisation', in R. Blackburn (ed.), *Revolution and Class Struggle: A Reader in Marxist Politics* (London, 1977).
- *The Leninist Theory of Organisation* (London, 1971).
- A. G. Meyer, *Leninism*, 2nd edn (New York, 1962).
- M. C. Morgan, *Lenin* (London, 1971).
- S. W. Page, 'Lenin and Self-Determination', *Slavonic and East European Review* (1950).
- 'Lenin: The National Question and the Baltic States, 1917—1919', *The American Slavic and East European Review*, VII, 1 (1948).
- *Lenin and World Revolution* (New York, 1959).
- 'The Role of the Proletariat in March 1917: Contradictions Within the Official Bolshevik Version', *Russian Review*, IX (1950).
- Anton Pannekoek, *Lenin as Philosopher* (London, 1975).
- G. A. Paul, 'Lenin's Theory of Perception', *Analysis*, vol. 5 (1938).
- A. J. Polan, *Lenin and the End of Politics* (London, 1984).
- Stefan T. Possony, *Lenin: The Compulsive Revolutionary* (London, 1966).
- D. Ruben, *Marxism and Materialism* (Hassocks, 1977).
- L. Schapiro, 'Putting the Lid on Leninism', *Government and Opposition*, II, 2 (1967).
- L. Schapiro and P. Reddaway (eds), *Lenin, The Man, the Theorist, the Leader: A Reappraisal* (London, 1967).
- Robert Service, *Lenin: A Political Life*, 2 vols (London, 1985—1994).
- David Shub, *Lenin: A Biography* (New York, 1948).
- Harold Shukman, *Lenin and the Russian Revolution* (New York, 1968).
- Peter Struve, 'My Contacts and Conflicts with Lenin', *The Slavonic and East European Review*, XII, 36 (1934).
- Paul M. Sweezy and H. Magdoff (eds), 'Lenin Today: Eight Essays on the Hundredth Anniversary of Lenin's Birth', *Monthly Review*, XXI, 11 (1970).
- Rolf Theen, *Lenin: Genesis and Development of a Revolutionary* (London, 1974).
- Leon Trotsky, *On Lenin: Notes Towards a Biography* (London, 1971).
- Adam Ulam, *Lenin and the Bolsheviks* (New York, 1964).

Nikolai Valentinov, *The Early Years of Lenin*, ed. R. Theen (Ann Arbor, 1969).
——*Encounters with Lenin* (Oxford, 1968).

Edmund Wilson, *To the Finland Station* (London, 1960).

Bertram D. Wolfe, 'Leninism' in M. M. Drachkovitch (ed.), *Marxism in The Modern World* (Stanford, 1965).

——*Three Who Made a Revolution* (New York, 1948).

Clara Zetkin, *Reminiscences of Lenin* (New York, 1934).

1905

Sydney Harcave, *First Blood: The Russian Revolution of 1905* (London, 1965).

H. Scuder, 'The Russian Revolution of 1905 and the Origins of German Communism', *The Slavonic and East European Review* 39 (1960—1961).

Solomon M. Schwarz, *The Russian Revolution of 1905: The Workers' Movement and the Formation of Bolshevism and Menshevism* (Chicago, 1967).

Leon Trotsky, *1905* (London, 1972).

1917 and its Aftermath

Raphael R. Abramovitch, *The Soviet Revolution: 1917—1939* (London, 1962).

Arthur Adams (ed.), *The Russian Revolution and Bolshevik Victory: Causes and Processes* (Lexington, Mass., 1972).

Peter Arshinov, *History of the Makhnovist Movement: 1918—1921* (Chicago, 1974).

Abraham Ascher, 'Russian Marxism and the German Revolution: 1917—1920', *Archiv fur Sozialgeschichte*, 6-7 (1966—1967).

N. Berdyaev, *The Russian Revolution* (London, 1935).

The Bolsheviks and the October Revolution: Minutes of the Central Committee of the Russian Social-Democratic Labour Party (Bolsheviks) August 1917-February 1918 (London, 1974).

R. P. Browder and A. F. Kerensky (eds), *The Provisional Government: 1917*, 3 vols (Stanford, 1962).

J. Bunyan and H. H. Fisher, *The Bolshevik Revolution 1917—1918: Documents and Material* (Stanford, 1934).

E. H. Carr, 'The Background of the Russian Revolution', in Heinz Lubasz (ed.), *Revolutions in Modern European History* (London, 1966).

——*1917: Before and After* (London, 1969).



- The Bolshevik Revolution: 1917—1923*, 3 vols (London, 1950—1953).
- William H. Chamberlain, *The Russian Revolution: 1917—1921*, 2 vols (London, 1935).
- V. Chernov, *The Great Russian Revolution* (New Haven, Conn., 1936).
- Robert V. Daniels, *Red October: The Bolshevik Revolution of 1917* (New York, 1967).
- ‘The Russian Revolution Runs its Course’, in H. Lubasz (ed.), *Revolutions in Modern European History* (London, 1966).
- Marc Ferro, *The Russian Revolution of February 1917* (London, 1973).
- O. H. Gankin and H. H. Fisher, *The Bolsheviks and the World War: The Origins of the Third International* (London, 1940).
- George Katkov, *Russia 1917: The February Revolution* (London, 1969).
- ‘German Foreign Office Documents on Financial Support to the Bolsheviks in 1917’, *International Affairs*, XXXII (1956).
- Alexander F. Kerensky, *The Catastrophe: Kerensky's Own Story of the Russian Revolution* (New York, 1927).
- The Kerensky Memoirs* (London, 1966).
- The Prelude to Bolshevism* (London, 1919).
- Lionel Kochan, *Russia in Revolution* (London, 1970).
- Walter Laqueur, *The Fate of the Revolution: Interpretations of Soviet History* (London, 1967).
- Marcel Liebman, *The Russian Revolution* (London, 1970).
- Roger Pethybridge (ed.), *Eye-witnesses of the Russian Revolution* (London, 1964).
- Richard Pipes, *The Formation of the Soviet Union* (Cambridge, Mass., 1954).
- The Russian Revolution* (New York, 1990).
- M. Phillips Price, *My Reminiscences of the Russian Revolution* (London, 1921).
- Alexander Rabinovitch, *Prelude to Revolution: The Petrograd Bolsheviks and the July 1917 Uprising* (Bloomington, Ind., 1968).
- O. H. Radkey, *The Election of the Russian Constituent Assembly of 1917* (Cambridge, Mass., 1950).
- The Agrarian Foes of Bolshevism: Promise and Default of the Russian Socialist Revolutionaries, February to October 1917* (New York, 1958).
- J. Reed, *Ten Days that Shook the World* (New York, 1935).
- John L. Snell, ‘The Russian Revolution and the German Social Democratic party in

1917', *The American Slavic and East European Review*, XI, 1 (1956).

N. N. Sukhanov, *The Russian Revolution, 1917: Eye-witness Account*, 2 vols (London and New York, 1955).

Leon Trotsky, *The History of the Russian Revolution*, 3 vols (London, 1967).

Rex A. Wade, *The Russian Search for Peace: February—October 1917* (Stanford, 1969).



马克思主义研究译丛

第八章 20世纪20年代俄国的 马克思主义

战时共产主义

取得胜利的布尔什维克面临着两大问题：一个是政治问题，即党和国家的作用和职能；一个是经济问题，即如何奠定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经济问题是最基本的，它成了俄国马克思主义者许多重大争论的实质所在。特别是在1921年和1923年西欧革命失败以后，俄国马克思主义者更加把注意力转向国内问题。战时共产主义、新经济政策和最后提出的一国社会主义学说，都是用来回应落后的农业国家如何发展工业化社会主义经济这一问题的不同答案。革命后的经济问

题，以前几乎完全没有考虑到，这意味着布尔什维克不得不从头开始，意味着内战的创伤必须更彻底地医治。马克思本人并没有提供什么指导。十月革命的胜利使布尔什维克感到措手不及，最为重要的是，他们以前指望革命具有可意的国际性，进而指望取得胜利的西欧无产阶级会帮助他们来克服由于自身落后而产生的各种问题。

布尔什维克的第一批经济措施相对温和、稳健：有选择的国有化、8小时工作日、在平等、但仍以个体为单位的基础上将国有化的土地在农民当中进行重新分配，以及偶然出现的、半自发的工人管理制度。

然而到1918年春，经济形势趋于恶化。工人管理进一步打乱了因连年战争而枯竭了的经济的正常秩序。面对这一威胁性的混乱，列宁提出了一种明显以德国战时经济为模型、被他称为“国家资本主义”的政策，这就是新经济政策所体现出的退却的短暂前奏。它包括如下双重努力：既通过加强劳动纪律、实行工资奖励和树立管理权威以取得对经济更加集中的控制；又与较大的金融势力相妥协，换句话说，“停止一下向资本的进攻”^[1]，并试图采用同旧经济秩序妥协的权宜之计。

到1918年夏，内战爆发使列宁的“国家资本主义”（它已经受到左派共产主义者的责难）无法坚持下去。只是为了苏维埃政府的生存，才实行了以“战时共产主义”著称的、极端的国家控制制度。战时共产主义有三个主要方面：第一，由于1918年6月实行的全面国有化法令几乎使所有的大企业处于国家的控制之下，国有化程度有了巨大的提高。加上因战时封锁和俄国经济最发达地区被敌人占领而导致燃料和原料严重匮乏，更使得政府的干预甚至变得必不可少。同时，国家垄断贸易，政府的官僚主义程度加剧。第二，无法控制的通货膨胀使有产阶级和广大农民陷于破产（工人由于以实物支付还有些保障），这意味着，政府不能靠多发行货币来增加其财力，而不得不征用农民的储备物资，这样就失去了中农的支持而导致农业生产率下降。第三，内战的压力一解除，就把复员的红军部队派去执行各项紧急任务，在上级指派的工会官员的纪律约束下，劳动力便部分地军事化了。

这些严厉的政策得到布尔什维克所有领导者的支持。托洛茨基是最乐观的人之一。他居然在1920年初就把注意力从军事问题上转到劳动问题上来，从而成为最积极地鼓吹劳动军事化的人之一。他把劳动军事化说成是落后国家之必然，是促进社会主义经济必不可少的痛苦分娩过程。但对此，托洛茨基并不是绝无仅有的人。布哈林在1920年发表的《过渡时期经济学》一书



中，对战时共产主义作了经典性的理论辩护。他在分析了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成长和作为其崩溃标志的世界大战之后，宣称革命时期难免对生产力会有最初的破坏，由此摆脱了经典马克思主义的传统认识。同时，布哈林与希法亭之间发生了争论。希法亭曾说，无产阶级接管柏林的六家大银行就能控制德国的经济。布哈林则坚决认为，“同所有革命一样，无产阶级的共产主义革命也伴随着生产力下降”^[2]——这恰是一个令俄国这样的落后国家聊以自慰的观点。布哈林还宣称，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不会有政治经济学，这就给人以一种印象，即革命后的俄国比其他国家更少受到客观性的限制，^[3]而这与他那赤裸裸的强调强制的必要性观点是完全一致的：

这听起来好像自相矛盾：无产阶级的一切强制形式，从各种机构体制到义务劳动，正好构成了一套把资本主义时代人的素质改造成共产主义新人性的方法。^[4]

这一观点还同特别强调国家无所不能的作用结合起来：

工会的国家化和一切无产阶级的群众组织实际上的国家化是由改造过程本身的内在逻辑决定的。劳动机构各个最小的基层组织必须使自己转化为整个组织化进程的代表，整体性地接受工人阶级集体理性的指挥和领导，其具体的物质化身就是最高的和最全能的组织，即国家机器。这样，国家资本主义制度便向其对立面辩证地转化，变成工人的社会主义国家形式。^[5]

列宁仔细阅读了布哈林的这本书，并对它作出了批评性的评论。^[6]尽管他不赞同其中的某些术语，但确实基本上是赞成他的整个观点的，而且尤为赏识他那读来令人生畏的“过渡时期的超经济强制”一章。^[7]

新经济政策

然而，战时共产主义没能持续下去。从斯大林的社会主义在一国胜利的政策的一些方面，我们可以重新找到战时共产主义更为持久的体现；但



到1921年初，很显然，它只是使国家的经济问题恶化了，而并未解决任何问题。如果不进行彻底的改革，政权自身将处于危险之中。喀琅施塔得叛乱正好就发生在第十次党代表大会通过新经济政策的时候，这绝不是一种巧合——内战行将结束，使采取极端措施失去其存在的直接理由。持续了7年的新经济政策是从1921年3月开始的，当时用一定份额的实物税取代了余粮征收制，使农民能保留其一定数量的剩余产品。这又导致取消自由贸易的限制和恢复工农业之间的市场关系。实行了一定数量的非国有化，但仅限于小企业；工业则按托拉斯组织起来，并享有有限的市场独立性。1921年11月，国家银行重新开放，硬通货政策被采纳，到1923年卢布稳定下来。

从战时共产主义向新经济政策的转变是在列宁的倡议下采取的。在第十次党代表大会的讲话中，列宁尽管对这一转变作了些辩解^[8]，但很快就把新经济政策说成是继战时共产主义偏轨之后，重新回到1918年初的国家资本主义政策上去的政策。关于过去的三年，他写道：“‘战时共产主义’是战争和经济破坏迫使我们实行的。它不是而且也不能是一项适应无产阶级经济任务的政策。它是一种临时的办法。”^[9]几个月后，他说，战时共产主义是“同我们以前所说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言论相抵触的”^[10]。而同时，列宁又继续把新经济政策称为“退却”，即意味着在发动一次新进攻之前临时重新组织力量。但另一方面，列宁并没有把新经济政策只看作一种短期的权宜之计，而是“决定实行这一政策是非常慎重的，是从长远打算的”^[11]。实行这一政策的目的在于同农民建立一种经济上稳定的联盟，他甚至暗示联盟将为期10年。^[12]这种过渡性的混合体制或称国家资本主义，其特征就是渐进主义，即“目前的新事物，就是我国革命在经济建设的一些根本问题上必须采取‘改良主义的’、渐进主义的、审慎迂回的行动方式”^[13]。他还说：“与原先的革命的办办法相比，这是一种改良主义的办办法（革命这种改造是最彻底、最根本地摧毁旧事物，而不是审慎地、缓慢地、逐渐地来改造旧事物，力求尽可能少加以破坏）。”^[14]

对此，布哈林最初有些犹豫，后来，他却转变成新经济政策的最主要倡导者之一。他承认，他关于战时共产主义的思想虽足以破坏旧制度，但不足以建设新制度。他为新经济政策的渐进主义辩护的理由是：无产阶级（不同于革命的资产阶级）在革命的时刻不能不是落后的，只能在革命后的社会里趋于革命的成熟；而这个社会将由一个至少在最初阶段是受资产阶级知识分



子领导的党来加以掌控（布哈林敏感地注意到这其中所蕴涵的危险，甚至谈到，有可能出现“新的阶级”）。

在新经济政策实施前的一年里，托洛茨基虽然极力主张过改行实物税，但是他并没有附和这一政策。在实施伊始，他就宣称反对新经济政策，并且不同意把战时共产主义说成是国外形势强加于俄国而导致的偏差。他承认新经济政策在农业中获得的成功，但认为它在解决工业化的主要问题方面不起什么作用。的确，新经济政策的付诸实施，标志着托洛茨基普遍影响力的下降。这方面的一个实例是，1921年初党内发生的关于工会作用的大辩论。有鉴于工人反对派力争实行充分的无产阶级民主和恢复工人对工业的管理，托洛茨基在内战接近结束时体验到工会难以对付之后就争辩说，应当剥夺工会的自治权，并将其并入政府机构内。列宁把托洛茨基的主张称为对工会的“官僚主义折磨”而加以反对，并寻求一项保证工会一定程度自治权的折中方案。托洛茨基的观点尽管得到布哈林的支持，但在第十次党代表大会上仍被彻底否决了。

还值得注意的是，第十次代表大会热中于使党愈益成为铁板一块。1919年3月，五人政治局重新设立，它在夺取政权之前曾存在过一个短暂的时期。内战也要求许多重大决定只能由少数人作出，而27名成员的中央委员会则很难驾驭。同时还设立了一个组织局和一个书记处，而惟有斯大林一人同时是这四个机构的成员。随着经济政策的更加自由化，就更有必要加强严格的政治控制。当时，党的代表大会强烈谴责了工人反对派，并禁止党内派别的存在。然而，由于列宁患病和逝世，某些形式的集体领导还是必要的，尽管它存在着内在的不稳定性。既然党日趋铁板一块，那么就使得当权者更容易加强其统治。随着列宁失去工作能力，斯大林、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便很自然地组成为一个反对托洛茨基的联盟，而托洛茨基当时仍然是最有声望的布尔什维克领袖。奇怪的是，托洛茨基对于他可能遭受排除出权力之外的危险没有作出反应。他既没有利用列宁对斯大林的无情批评（而这种利用对当时的他来说，是必要的），也没有不失时机地支持党内的民主事业。只是到了1923年底，列宁处于垂危之际，权力的天平已决定性地向不利于托洛茨基的方向倾斜时，他才打破沉默。在《新方针》这本小册子（其中已包含有后来他批判斯大林主义时所详尽阐述的全部重大命题）中，他号召党组织的民主化和党内言论自由，同时还谴责了个人统治和官僚主义倾向。但是，托洛茨基影响的衰落还取决于下述比政治局内部斗争更重大的因素：内

战已经结束，军事人民委员都不再是人们注目的中心，托洛茨基的特殊行政才干也不再需要了。在政治局委员中，托洛茨基是惟一一个新近被吸收加入布尔什维主义的成员，势单力薄，在党组织中没有独立的权力基础。欧洲革命的可能性（托洛茨基特别予以看重的）也在减小，而整个国家已经被以托洛茨基为象征的“英雄”时代弄得精疲力竭，正渴望着休养生息和一个重建期。平凡得多的经济问题已开始支配了党内的大小辩论。

新经济政策在许多方面是不能令人满意的。正如托洛茨基指出的，新经济政策并没有解决落后国家实现工业化这一根本问题。在需要增加资本来发展经济同需要发展工业这二者之间似乎存在着矛盾，其中，农业是前者惟一的源泉，后者则只有牺牲农业才能做到。对经济发展发挥主要作用的究竟应该是农业还是工业这个问题，布哈林和季诺维也夫的看法是，农业部门购买力的提高是工业生产率提高的必要条件。相反，托洛茨基则认为，不扩大工业品的流通，粮食和原材料的生产必将下降。这两种观点可以追溯到对战时共产主义的意见分歧上。那些务实型的人认为，战时共产主义是取决于军事需要的权宜之计；而深受布尔什维主义英雄传统鼓舞的人则认为，那是一场尽管尚不成熟、但正是直奔社会主义的正确运动，一旦条件许可，它就会重新掀起。

这两种观点的对立首先明显地暴露在对1923年出现的所谓“剪刀差”危机的反应上。“剪刀差”危机是因提高工业品价格的同时降低农产品价格而形成的，它很大程度上应归咎于国家工业占垄断地位，从而有资格在同农业部门的交换中取得有利条件。作为反托洛茨基联盟的代言人，布哈林坚持认为：繁荣的农民经济是工业复苏的先决条件，任何其他政策将损害同农民的有历史意义的联盟。为了扩大当下的农业生产，也为了提高工业本身的效益，必须降低工业品的价格。这样就能通过国家工业利润的日益增长，通过对繁荣的农业部门实行征税，并通过富裕农民或富农的储蓄，获得投资的资本。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则是相反观点的首要倡导者。他显然重视生产而不重视流通，因而认为只有私有成分即农民，能够为工业发展提供所必需的资本。他在1924年出版的《新经济学》一书中宣称，有进行“社会主义原始积累”的必要，这也就是反对私人积累的必要。他给社会主义原始积累的“规律”作了如下的界定：

一个正向社会主义生产组织转变的国家愈在经济上落后，愈是适应

于小资产阶级和农民，则这个国家的无产阶级在社会主义革命发生时能为社会主义积累作出的贡献也就愈小；其社会主义积累势必依赖于从社会主义以前经济成分的剩余产品中提取的份额（在比重上）愈大，它靠自己生产进行积累的相对重要性就愈小，也就是说，它将愈加无法依靠社会主义工业中工人的剩余产品来积累资金。^[15]

既然不发达的工业部门不能提供必要的资金，国家便不得不向农民榨取，正如资本主义原始积累向各种非资本主义成分榨取资金一样。因此，“剪刀差”危机不仅被热情地接受，还通过国家干预而持续下去了。在经济上既不是资本主义成分占优势、也不是社会主义成分占优势的过渡时期的紧急关头，速度就是根本性的问题。正是经济形势的这一特性，要求采取大规模地把来自农业的剩余价值转到国有部门中去的办法来强化工业化，而不管党的领袖们愿意与否。托洛茨基基本上赞同普列奥布拉任斯基的分析，尽管他否认自己希望剥削农民，并且显然不同意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关于积累可以在一种孤立的经济中进行的观点。斯大林出于政治目的而很想利用左派明显的反农民倾向，但他在这场争论中最初并没有攻击其中任何一方；只是在获得了无懈可击的支配地位之后，他才借用托洛茨基和普列奥布拉任斯基的某些思想成分，融注到他的一国社会主义理论中去。

一国社会主义

一国社会主义论的成功有多种原因：国际氛围对革命不利，特别是1923年萨克森和汉堡早熟的起义的失败，助长了俄国这样一种观点，即认为欧洲无产阶级不可靠，相比于取得了胜利的布尔什维克党人而言，这些欧洲共产主义者因无能而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蔑视。整个国家在反击外来侵略和内战的几年中消耗殆尽，因而渴望着某种发展经济的政策，而一国社会主义论似乎提供了一种明确而乐观的追求经济目标的方案。此外，还存在着利用民族主义情绪和对独立的自豪感来作为进一步追求经济目标的诱导因素。

一国社会主义源自布哈林为新经济政策的辩护，是保证俄国能以自己的资源“长驱直入”社会主义的一种孤立主义的说教。斯大林转向这一教义则是突然的。他直到1924年4月还认为：

在一个国家内推翻资产阶级政权，建立无产阶级政权，还不等于保证社会主义的完全胜利。社会主义的主要任务即组织社会主义生产的任务尚待解决。没有几个先进国家中无产阶级的共同努力，能不能解决这个任务，能不能在一个国家内获得社会主义的最后胜利呢？不，不能。^[16]

在1924年12月的一篇文章中，斯大林才第一次阐述这一理论。在此，他从列宁关于混合发展和不平衡发展的言论中引申出如下结论：

在其他国家（即使这些国家的资本主义比较发达）还保存着资本主义的情况下，社会主义在一个国家（即使这个国家的资本主义不大发达）内胜利是完全可能的，是可以肯定的。^[17]

相比之下，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思想，由于被说成是对俄国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抱悲观主义态度，而被斥为“孟什维主义的变种”^[18]。斯大林曾承认，社会主义的“完全”胜利的确需要世界无产阶级的支持。但在《列宁主义问题》（1926年1月）中，他用如下的话来更有力地表述他的理论：

我们指的是可能用我国内部力量来解决无产阶级和农民间的矛盾，这就是在其他国家无产者的同情和支援下，但无须其他国家无产阶级革命的预先胜利，无产阶级可能夺得政权并利用这个政权来在我国建成完全的社会主义社会。^[19]

这段话的附言则降低了调子：社会主义的“完全的最后的”胜利只有在下述意义上才需要世界无产阶级的成功，即没有世界无产阶级的成功就“不可能有免除武装干涉因而不可能有免除资产阶级制度复辟的完全保障”^[20]。

斯大林经常把“一国社会主义”称为列宁主义的理论，并援引列宁1915年反对托洛茨基“欧洲联邦”口号的声明中的一段话，来印证这一点。列宁指出：

社会主义可能首先在少数或者甚至在单独一个资本主义国家的获得胜利。这个国家的获得胜利的无产阶级既然剥夺了资本家并在本国组织



了社会主义生产，就会奋起同其余的资本主义的世界抗衡，把其他国家的被压迫阶级吸引到自己方面来。^[21]

斯大林还提到列宁1923年写的“论合作社”一文。列宁在这篇文章中说：“国家支配着一切大的生产资料，无产阶级掌握着国家政权，这种无产阶级和千百万小农及最小农结成了联盟”，是“仅仅通过合作社……来建成完全的社会主义社会所必需的一切”^[22]。

然而，很显然，斯大林迫不及待地把自己的创新归宗到列宁身上，多少有点牵强附会。列宁曾经明确宣布，“社会主义革命在一个国家内的完全胜利是不可能的，它至少需要几个先进国家最积极的合作”^[23]。这才是他多次重申、并符合他整个思想主旨的声明。^[24]

毫无疑问，一国社会主义的重要理论家是布哈林。他根据列宁的晚期论述论证说：“甚至在这种低下的技术基础上，我们能够建设社会主义……我们将以爬行的速度前进，但……依然是在建设社会主义，并且我们会建成它。”^[25]新经济政策将导向社会主义，因为在苏维埃社会中，上层建筑调节着基础。掌握经济命脉（特别是控制了信贷）将引导着非社会主义化的经济成分（包括农业）向社会主义发展。西欧资本主义在没有从俄国市场受益的条件下也已稳定下来了，而俄国则不得不在孤立状态中发展。通过更集中地使用现有资金来扩大生产，这将导致工业品价格降低，从而有利于农业部门。布哈林最为重视的是农业部门。在他看来，富有而又高效率的农民——富农——将通过合作社“长入”社会主义。据此，他向全体农民提出一个曾遭到诸多非难的口号：自己发财致富去吧！

托洛茨基对于社会主义在一国胜利的看法，由于受到斯大林的讽刺与丑化，显得有些模糊不清。斯大林把他的一国社会主义理论同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对立起来，把不断革命论说成是对苏联内部前景悲观而倚重于不可靠的国外冒险活动。托洛茨基曾徒劳地抗议说，他以前关于不断革命论的思想针对的不是当前的形势，因此与这场辩论无关。的确，托洛茨基早期的著作并没有排除一国社会主义的某种可能性。内战一结束，托洛茨基倡导建立在经济孤立主义基础之上的政策就非常接近一国社会主义。而斯大林到1925年表述的观点仍可看成是回复到托洛茨基1920年倡导的自力更生的观点。只是到了1926年，托洛茨基才对斯大林的观点提出挑战，尽管季诺维也夫挑战斯大林还要早得多。托洛茨基提出挑战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他承担过各

种经济任务，因而确信：只有同世界经济重新结合，俄国才能扩大其资本积累量。^[26]托洛茨基放弃了他1921年至1923年的观点，他争辩说，欧洲的衰退及其为扩大出口而展开的斗争将变得对俄国有利，因为俄国可以很容易用谷物换取机器；另外，俄国应该鼓励租用的申请，并欢迎外国投资。这样，俄国的经济将不至于放慢到布哈林所说的“爬行速度”。托洛茨基在《走向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一书中，强调了他同斯大林的贸易保护主义有根本分歧：

如果我们突然把资源转到……新机器的制造上，我们要么将破坏各个经济部门之间甚至一个部门内部基本资金和流动资金之间的必要比例，要么将为保持必要的比例而大大降低整个发展系数。对我们来说，发展速率的下降绝对要比从外国进口我们通常所需的机器和商品危险很多。^[27]

托洛茨基无法理解的是，世界在政治上分裂为两个阵营就意味着经济上的分裂；俄国应准备从国际分工中得到好处。换句话说，托洛茨基所反对的与其说是社会主义在一国的胜利，不如说是那种漠视整个世界经济、自命在单独的一个国家中发展社会主义的观点。当然，托洛茨基的立场并不只是一种经济上的立场。在《共产党宣言》以来整个马克思主义传统势力的推动下，他并没有放弃俄国只有通过世界革命才能实现社会主义的观点。建设社会主义无论如何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而且在他看来，斯大林和布哈林的观点似乎偏离了党的整个国际方针，对世界无产阶级的革命潜力感到绝望了。英国苏维埃委员会鼓励同改良主义的英国工会合作、并直接反对革命，这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同样失策的还有同中国国民党进行的、造成巨大灾难的合作。然而，党内采纳托洛茨基和整个左翼反对派观点的场合越来越少。使托洛茨基遭受挤压的是他那自我标榜的观点：“归根结底，党总是正确的。”^[28]此外，在1920年所写的反考茨基的论战性著作《恐怖主义和共产主义》中，他实际上把公理同化为强权。托洛茨基日益孤立。尽管在1926年，他最后一搏，企图同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一起结成一个反斯大林的联合反对派，而最终，他还是于1927年被开除出党，1928年被驱赶出莫斯科，1929年被驱逐出俄国。



艺术和哲学

十月革命前，对艺术与布尔什维主义之间的关系，党并没有明确的看法。1905年，列宁写道：

文学事业应当成为无产阶级总的事业的一部分，成为一部统一的、伟大的、由整个工人阶级的整个觉悟的先锋队所开动的社会民主主义机器的“齿轮和螺丝钉”^[29]。

但是，这只是针对党内人士而言，并不是提倡对非党人士实行检查制度。与19世纪文学相反，革命时期的主要流派都着重于形式而不是内容。因此，尽管其中的某些人（尤其是未来学派及其最主要的诗人马雅可夫斯基 Mayakovsky）对革命满腔热忱，但他们并不总是同马克思主义直接相容。作为弥补这一缺陷的尝试，俄国于1917年创立了无产阶级文化派组织。这个组织独立于布尔什维克党，其核心人物是列宁的哲学宿敌波格丹诺夫。该组织还得到了新任教育人民委员卢那察尔斯基（Lunacharsky）和《真理报》（*Pravda*）编辑布哈林的支持。无产阶级文化派以培植特定的无产阶级艺术形式来领导文化上的（相对于政治上的或经济上的而言）革命为己任。1920年，它主持创建了全俄无产阶级作家协会。

尽管无产阶级文化派完全符合战时共产主义的艰苦创业精神，然而新经济政策的实施却成了它的末日。列宁尖锐批判了无产阶级文化派领袖们的观点：

只有确切地了解人类全部发展过程所创造的文化，只有对这种文化加以改造，才能建设无产阶级的文化。……无产阶级文化并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那些自命为无产阶级文化专家的人杜撰出来的。如果硬说是这样，那完全是一派胡言。无产阶级文化应当是人类在资本主义社会、地主社会和官僚社会压迫下创造出来的全部知识合乎规律的发展。^[30]

1922年，针对公开挑战官方路线者所实行的一般性检查制度出现扩大

化的倾向。卢那察尔斯基写道：

甚至有必要把检查制度加诸于纯文学上，对此，我们决不迟疑，因为在纯文学这面旗帜和这副漂亮的外表之下，毒药可能被灌输到广大人民群众天真而蒙昧的心灵中去。这个心灵是易受波动的，并且由于前进途中的困难太大，容易摆脱指引它通过茫茫荒野到达希望之乡的那只手。^[31]

对无产阶级文化派最精辟的批评来自托洛茨基，他可是文学方面最有才干的布尔什维克领袖。在《文学与革命》中，他否定“马克思主义”艺术的存在，正如他曾拒绝接受内战期间某些人提出的“无产阶级的”军事战略的概念一样。同样地，不能抛弃过去的文化成就。托洛茨基宣称：“不首先吸收和同化旧文化的要素，无产阶级就不可能开始建设新文化。”^[32]在反对那些想用无产阶级文化取代资产阶级文化的人时，托洛茨基写道：

把无产阶级的文化和艺术同资产阶级的文化和艺术对立起来是根本错误的。因为无产阶级政权是暂时的和过渡性的，无产阶级的文化和艺术永远不会存在。无产阶级革命的历史意义及其伟大的道义力量正来源于以下事实：它为一种超越于各阶级之上的、真正第一流的人类文化打下了基础。^[33]

因此，无产阶级专政下的主要任务是“把现有文化的基本要素传授给落后群众”^[34]。党对待艺术问题，一般说来都应当慎言，因为“艺术领域并不是要党去发号施令的领域”^[35]。不过，对那些积极活跃地反对革命的人，也是不可能容忍的，因此，“我们在艺术领域中应该有警觉的革命检查制度和广泛灵活的政策，以免受到卑鄙的、宗派的恶毒偏见的影响”^[36]。由于一国社会主义论获得了胜利，托洛茨基的观点受到了特别是来自卢那察尔斯基和布哈林的攻击。攻击的主要根据是，托洛茨基对无产阶级文化的否定在革命前文化和社会主义的建立之间留下了一个文化真空。直到1929年为止，关于马克思主义与艺术的关系的争论一直很热烈。1929年，随着斯大林的“左倾转向”，党加强了对文学的控制，从而导致了以1930年初马雅可夫斯基自杀为标志的独立文学创作的终结。



虽然马克思主义在艺术上没有正統的理论，但哲学上的情况就不同了。自从恩格斯以来，马克思主义拥有一门哲学——辩证唯物主义，关于它的重要性，列宁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中反复予以强调了。在革命时期，庸俗唯物主义是在布尔什维克当中占统治地位的哲学，而到了20世纪20年代中期，对辩证唯物主义出现了两种微妙的解释。这两种解释都自称继承了列宁在《论战斗唯物主义的意义》这篇短文中所确立的有关哲学的最后指示。在该文中，列宁论证了哲学家应该同自然科学家建立一种唯物主义的联盟，同时指出他们应该创立一个“黑格尔辩证法唯物主义之友协会”^[37]。上面谈到的两个学派，根据他们在辩证唯物主义中究竟强调辩证法一面还是强调唯物主义一面，而逐渐以机械论（机械唯物主义）者和德波林主义者著称。机械论者有其主要代言人波格丹诺夫和布哈林，后者在列宁的遗嘱中被指责为“从来没有学过辩证法，并且，我想，从来不完全了解辩证法”^[38]。第一，这一派人认为，哲学不是一门独立的科学，而是一切科学的方法。第二，他们相信，一切运动都是外在的、外来的。每一事物都是一个统一体，并无内部矛盾。布哈林说过，运动是从外面产生的，并且提出均衡论来解释各种联系：

世界上是由以各种方式起作用的、互相对立的力量所组成的。这些力量只是在某些特殊情况下才暂时保持均衡，于是就有“静止”状态，即这些力量间实际的“斗争”隐蔽起来了。但是，只要改变了其中的某个力量，“内在的矛盾”就立刻暴露出来，平衡遭到破坏；而如果新的均衡重新确立起来，这种均衡就是建立在新的基础上，即各种力量重新组合的基础上等等。由此可以得出结论：“斗争”、“矛盾”即向不同方向起作用的各种力量的对抗，决定着这个体系的运动。^[39]

第三，机械论者实际上贬低了质的飞跃的思想。按照他们的说法，一切高级的现象原则上都能还原为比较简单的和低级的现象。就布哈林来说，这些哲学观点完全符合他在经济学中决定论的和渐进主义的主张，而且也完全符合整个新经济政策的观点。不过还应当指出，托洛茨基尽管很少涉足哲学，却也是一个机械论者。^[40]

德波林主义者得名于学院派哲学教授阿布拉姆·德波林（Abram Deborin）。他们的主要观点是：哲学作为一门科学，有其独立的地位；自然界

是辩证的，矛盾是一切事物的真正本质中所固有的；因而，他们强调存在着辩证的飞跃，并否认精神可以还原为物质。1925年，恩格斯《自然辩证法》的问世和1929年列宁《哲学笔记》的首次出版，帮了德波林主义者的忙。还有，由于布哈林在政治上垮台了，他的机械论在1929年正式遭到谴责，他们从中也受益了。然而，如果说机械论是右倾的话，德波林主义则很快就同“左”倾主义联系到一起。他们被指责为在哲学上采取政治中立、理论和实践相脱离、低估列宁而高估黑格尔和普列汉诺夫，最终于1930年被贬斥为“孟什维克式的唯心主义”。就像在其他方面一样，斯大林的意见在哲学问题上也变得至高无上了。

〔注释〕

[1] V. Lenin, 'The Immediate Tasks of the Soviet Government', *Collected Works*, vol. 27, p. 245.

[2] N. Bukharin, *Economics of the Transformation Period* (New York, 1971) p. 58.

[3] 在这方面，应该提及布哈林和普列奥布拉任斯基的《共产主义入门》（发表于1919年）一书，尽管该书没有什么理论上的趣味，但极其普及，集中体现了战时共产主义的英雄乐观主义。

[4] Bukharin, *op. cit.*, p. 160.

[5] *Ibid.*, p. 79.

[6] 这些引人注目的评论作为斯大林发动攻讦布哈林的运动的一部分，首次发表于1929年；后来，作为附录重载于该书原文后，见第212页以下。

[7] 有一种成书于1924年的不同的国家观，参见极富创意的下书：E. Pasukanis, *General Theory of Law and Marxism* (London and New York, 1978)。该书的内容远远超出了其表面上的法理学主题。作者认为，法律形式是同商品生产相联系的，他还把资本主义社会中服从法律的崇拜主义看作是同马克思所谓的商品拜物教相并行的。

[8] V. Lenin, *Collected Works*, vol. 32, pp. 402ff.

[9] V. Lenin, 'The Tax in Kind', *ibid.*, p. 343.

[10] V. Lenin, 'The NEP and the Tasks of the Political Education Departments', *Collected Works*, vol. 33, p. 62.

[11] V. Lenin, 'Speech on the Tax in Kind', *Collected Works*, vol. 32, p. 429.

[12] Cf. *ibid.*, p. 431.



- [13] V. Lenin, 'The Importance of Gold', *Collected Works*, vol. 33, p. 109.
- [14] *Ibid.*, p. 110.
- [15] E. Preobrazhensky, *La Nouvelle Economique* (Paris, 1966) p. 180.
- [16] J. Stain, *Leninism* (London, 1940) p. 153.
- [17] *Ibid.*, pp. 94f.
- [18] *Ibid.*, p. 93.
- [19] *Ibid.*, p. 156.
- [20] *Ibid.*
- [21] V. Lenin, 'On the Slogan for a United States of Europe', *Collected Works*, vol. 21, p. 342.
- [22] V. Lenin, 'On Cooperation', *Collected Works*, vol. 33, p. 468.
- [23] V. Lenin, 'Speech to the Sixth Congress of Soviet', *Collected Works*, vol. 28, p. 154.
- [24] 相反的观点, 即认为, 在列宁的著作中较之在斯大林的著作中, 更能够看出对一国社会主义的支持, 见 K. Radjavi, *La Dictature du Proletariat et Le Depérissement de L'Etat de Marx à Lénine* (Paris, 1975) pp. 148ff.
- [25] 引自 S. Cohen, *Bukharin and the Bolshevik Revolution* (New York, 1975) p. 187.
- [26] R. Day, *Leon Trotsky and the Politics of Economic Isolation* (Cambridge, 1973) chs 1-3.
- [27] L. Trotsky, *Towards Socialism or Capitalism?* (London, 1976) pp. 43f.
- [28] 引自 I. Deutscher, *The Prophet Unarmed, Trotsky 1921—1929* (Oxford, 1959) p. 139.
- [29] V. Lenin, 'Party Organization and Party Literature', *Collected Works*, vol. 10, p. 45.
- [30] V. Lenin, 'The Tasks of the Youth League', *Collected Works*, vol. 31, p. 287.
- [31] 引自 E. H. Carr, *The Bolshevik Revolution*, vol. 3 (London, 1953) p. 65.
- [32] L. Trotsky, *Literature and Revolution* (Ann Arbor, 1969) p. 226.
- [33] *Ibid.*, p. 14.
- [34] *Ibid.*, p. 193.
- [35] *Ibid.*, p. 218.
- [36] *Ibid.*, p. 221.
- [37] V. Lenin, 'On the Significance of Militant Materialism', *Collected Works*, vol. 33, p. 234.

[38] V. Lenin, 'Letters to Congress', *Collected Works*, vol. 36, p. 595.

[39] N. Bukharin, *Historical Materialism* (New York, 1925) p. 74.

[40] 参见托洛茨基 1925 年对化学家门捷列夫的评论 (Sochineiya, vol. 21, pp. 268ff) 和他的《保卫马克思主义》(New York, 1973), 尤其是其中的第 44 页以下和第 73 页以下。

深入阅读材料

20 世纪 20 年代的俄国

最基本的读本 是卡尔 (Carr) 的多卷本《历史》。贝特尔海姆 (Bettelheim) 的两卷本《苏联的阶级斗争》提出了一种新毛泽东主义的解读。卢因 (Lewin) 的《俄国农民和苏联政权》对农民问题作了最基本的论述。就工业化问题, 可参阅厄利奇 (Erich) 和贾斯尼 (Jasny) 的著作、普列奥布拉任斯基 (Preobrazhensky) 的《新经济学》和戴伊 (Day) 的揭露性著作《列·托洛茨基与经济孤立的政治》。夏皮罗 (Schapiro) 的《共产主义独裁的根源》和丹尼尔斯 (Daniels) 的《革命的良知》对布尔什维克日益集权化过程作了很好的描述。就以其名义进行革命的工人的命运, 见卡普兰 (Kaplan) 的《布尔什维克的意识形态与苏联劳工的道德观》和布林顿的《布尔什维克和工人管理》。艾夫里奇 (Avrich) 的著作充分地阐述了作为历史转折点的喀琅施塔得事件, 而菲茨帕特里克 (Fitzpatrick) 的《启蒙人民委员会》对文化问题写得好。布哈林的主要著作《有闲阶级的经济理论》、《帝国主义和世界经济》、《过渡时期经济学》与《历史唯物主义》等都有单行本发行。科恩 (Cohen) 的大传记《布哈林与布尔什维克革命》在未来很长的时间内都将是一部重要的评论。在这个时期内, 托洛茨基所著的书或关于他的书, 见本书第六章的“深入阅读材料”。

参考文献

Russia in the 1920s

Paul Avrich, *Kronstadt 1921* (Princeton, N. J., 1970).

Charles Bettelheim, *Class Struggles in the USSR: First Period, 1917—1923* (Hassocks, Sussex, 1977).

——*The Class Struggles in the USSR: Second Period, 1923—1930* (Hassocks, Sussex, 1978).

C. E. Black (ed.), *Transformation of Russian Society* (Cambridge, Mass., 1960).



F. Borkenau, *World Communism* (Ann Arbor, 1962).

Maurice Brinton, *The Bolsheviks and Workers' Control, 1917—1921: The State and Counter-Revolution* (London, 1970).

N. Bukharin, *The Economic Theory of the Leisure Class* (New York, 1927).

— *Economics of the Transformation Period* (New York, 1971).

— *Historical Materialism: A System of Sociology* (New York, 1925).

— *Imperialism and World Economy* (New York, 1929).

N. Bukharin and E. Preobrazhensky, *The ABC of Communism* (London, 1924).

E. H. Carr, *The Interregnum: 1923—1924* (London, 1954).

— *Socialism in One Country: 1924—1926*, 3 vols (London, 1958—1964).

E. H. Carr, *The Russian Revolution from Lenin to Stalin, 1917—1929* (London, 1979).

E. H. Carr and R. W. Davies, *Foundations of a Planned Economy: 1926—1929*, 3 vols (London, 1969—1978).

Stephen F. Cohen, *Bukharin and the Bolshevik Revolution* (New York, 1975).

Robert V. Daniels, *The Conscience of the Revolution: Communist Opposition in Soviet Russia* (Cambridge, Mass., 1960).

R. W. Davies, *The Industrialisation of Soviet Russia*, 2 vols: Vol. 1 *The Socialist Offensive, 1929—1930*; Vol. 2 *The Soviet Collective Farm, 1929—1930* (London, 1979).

R. Day, *Leon Trotsky and the Politics of Economic Isolation* (Cambridge, 1973).

J. Degras (ed.), *The Communist International 1919—1943* (London, 1956).

Alexander Erlich, *The Soviet Industrialisation Debate, 1924—1928* (Cambridge, Mass, 1960).

Sheila Fitzpatrick, *The Commissariat of Enlightenment: Soviet Organisation of Education and the Arts under Lunacharsky* (Cambridge, 1970).

David Footman, *Civil War in Russia* (London, 1961).

Sidney Heitman, 'Between Lenin and Stalin: Nikolai Bukharin', in L. Labeledz (ed.), *Revisionism* (London, 1962).

N. Jasny, *Soviet Economists of the Twenties* (New York, 1972).

Frederick I. Kaplan, *Bolshevik Ideology and the Ethics of Soviet Labour, 1917—1920: The Formative Years* (London, 1968).

Adam Karfwan, 'The Origin of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Socialism": An Essay in Soviet Economic Thought', *Soviet Studies*, 3 (1953).

Moshe Lewin, *Russian Peasants and Soviet Power — A Study of Collectivisation*

(Evanston, Ill., 1968).

Richard Pipes, *The Formation of the Soviet Union: Communism and Nationalism 1917—1923* (Cambridge, Mass., 1964).

E. A. Preobrazhensky, *From New Economic Policy to Socialism: A Glance into the Future of Russia and Europe* (London, 1962).

—*The New Economics* (Oxford, 1965).

W. W. Rostow, *The Stages of Economic Growth* (Cambridge, 1971).

Leonard Schapiro, *Origin of the Communist Autocracy: Political Opposition in the Soviet State, First Phase, 1917—1922* (London, 1955).

Robert Service, *The Bolshevik Party in Revolution* (London, 1979).

Jay B. Solenson, *The life and Death of Soviet Trade Unionism: 1917—1928* (New York, 1969).

Nicolas Spulber, *Soviet Strategy for Economic Growth* (Bloomington, Ind., 1964).

A. S. Whiting, *Soviet Policies in China: 1917—1924* (London and New York, 1954).



马克思主义研究译丛

第九章 斯大林主义

工业、农业和党

斯大林的创新之处在于，使一切（包括布尔什维主义的国际方面和党组织本身）服从于以牺牲农业部门为代价来迅速实现重工业化这一目标。20世纪20年代中期，斯大林曾经肆意嘲笑过托洛茨基那样的“超工业化派”，后者提出，俄国的产量应每年增加近20%。可是，在1929年中期，苏联资本投资的拨款突然增加了5倍之多，并且作出了实行大规模农业集体化的决定。这一壮举只有一个团结的党才能实现，而在此以前的两年中，布尔什维克党内部还发生了最后一



次大辩论。这次辩论是在以下两派间展开的：一派主张，在新经济政策的原则基础上发展苏联经济，其主要代表人物是布哈林；另一派主张，绝对优先增加工业生产，这就是斯大林的方针——当然，要证明这个方针有多偏激，尚待慢慢显露。有两个因素促发了党内危机：其一是，到1929年，工业生产率已达到1914年以前的水平，因而必须商定发展的计划，而定于1929年春颁布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正处于酝酿阶段；其二是，1927年底和1928年初粮食供应开始急剧下降，这主要是由于当时产品越来越缺乏，这意味着可供农民交换剩余产品的东西越来越少了。

在危机面前需要采取紧急行动，而在这个节骨眼上，政治局却分裂了。布哈林捍卫已成为新经济政策的（也是反托洛茨基主义的）正统做法，即按美国模式拓展农业，求得进步。1928年1月，他勉强同意采取带有惩罚性的临时措施，去剥夺富农（*Kulaks*）手中的剩余产品。事实上，由于这些措施是由斯大林所控制的各级党的机关执行的，斯大林就可以使这些措施执行得比政治局已批准的决议要激烈得多；与此同时，他自己却又抱怨政治局的行为“过火”了。

在接下来的权力斗争中，布哈林及其同僚一开始就注定要失败。他徒劳地一再引证列宁后期论合作制的文章，并强调列宁是多么重视维护同农民的同盟。实际上，布哈林既不反对集体化，只是坚持集体化是一个长远目标，必须有一定的机器储备等为其先决条件罢了；也不反对有计划的工业化，只要求工业化是逐步而灵活的。然而，“右倾反对派”（就像斯大林机敏地讥讽他们的那样）之所以一蹶不振，就在于这次斗争是在斯大林牢固控制的党的最高机关中进行的。“右倾反对派”曾得到农村群众、甚至城市工人的有力支持，但他们以前谴责过宗派主义，坚持团结和统一在党的决议周围，并在两年前仍以此反对过托洛茨基分子，因而妨碍了他们去利用群众的支持。斯大林对党的机器的控制当时已占据压倒的优势，同时党员人数从1924年到1928年增加了3倍，的确使党的性质本身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更为普遍地说，右派总是倾向于悲观主义，而直到1929年中期，斯大林一直是以核心人物的面目出现的，他拥有一套解决国家问题的强有力的办法，从而把越来越多的务实型的行政官员吸引过去。到1928年7月，右派未能说服中央委员会，并失去了他们在政治局中原本可能争取到的多数。同情布哈林的莫斯科党组织领导人被解职，托姆斯基（*Tomsky*）被逐出工会领导岗位，这标志着右派已完全势孤力竭。基于布哈林把斯大林的政策描绘为朝着沙皇政权

的“军事封建”剥削方向倒退，党的分裂也就无可挽回了。

接下来，斯大林对党的控制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严密，他推行的政策也更为极端化了。整个1928年，粮食供应问题依然存在，而就在这年夏天，他还拒绝接受在农村发动阶级战争和剥夺富农的观点（第一个五年计划规定，到1933年集体化农户只占20%）；可是1929年下半年内，一场急剧的变革便显露出来了，这是斯大林的“自上而下革命”的先兆。斯大林越来越独断专行，同农民的关系也恶化了，反右运动愈演愈烈，“个人崇拜”掩盖了集体化运动中政府所面临的各种明显的困难，并逐渐形成气候。在共产国际内部，同非共产主义的社会主义者联盟的政策（以前曾遭到托洛茨基的猛烈批判）也被抛弃了；而社会民主党人被当做社会法西斯主义者，甚至作为比真正的法西斯分子还要强大的敌人而遭到反对。

1929年12月，蕴蓄已久的风暴骤然爆发了。斯大林在一次同马克思主义的土地问题专家的谈话中宣布，党“最近已从限制富农剥削趋向的政策过渡到消灭富农阶级的政策”^[1]。他接着又说：“现在来多谈剥夺富农财产问题是可笑而不严肃的。既然割下了脑袋，也就不必怜惜头发了。”^[2]最后，他总结说——这简直是一个置千百万人于死地的声明：“还有一个同样可笑的问题：能不能让富农加入集体农庄？当然不能让他们加入集体农庄。所以不能，是因为他们是集体农庄运动的死敌。人们是会这样认为的。”^[3]从1929年10月到1930年3月，参加集体农庄的农户从4%上升到58%。混乱和滥权现象普遍存在，于是斯大林下令暂时停止前进。到1930年9月，参加集体农庄的农户所占比例又下降到21%。但是到1930年底，再次超过50%，而到1934年达到了75%。这场大折腾导致数千万人被驱逐，并引起广大农民阶层（而不限于富农）的激烈反抗——其实，富农本身是一个模糊的名称，它不超过农民的4%。党的干部对于政策的急剧改变几乎完全没有准备。尽管政府终于牢牢地控制住了农业部门，坚决要维持甚至增加为城市征购的粮食数额，却由此导致饿殍遍地，数百万人死亡。农业生产花了许多年才恢复到20世纪20年代后期的水平（一半以上的牲畜被绝望的农民屠宰掉了）；但是，这却为30年代工业的迅速发展奠定了牢固的基础。^[4]

尽管加强国家对农业的控制的决定贯彻得很迅速，并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但采取这一行动的先决条件却孕育了许多时间。整个1929年，城市的粮食供应一直处于危机状态，并引起了普遍的骚乱。随着农民对政府的要求

进行抵制，农产品价格不断上涨。一些粗暴的作法，比如说对不能或不愿完成定额的人停止供应工业品，只能进一步加剧了党群关系的紧张。斯大林为他的所谓“伟大的转折”提供的理由是：近来在工业部门，特别是在工业建设方面，劳动生产率已有所提高；与此同时，集体化的小型农业部门所提供的粮食供应也有了改善（同负隅顽抗的个体土地所有者所提供的数量相比较而言）。在意识形态上，斯大林强调社会主义愈接近胜利，阶级斗争愈加激烈的观点。更实际地说，他感到，只有通过农业展开正面进攻，才能保住工业化的虚弱勢头。老布尔什维克把农民当做异己的绊脚石，对他们仍然疑虑重重，这就很容易重新营造一种内战的和战时共产主义的政策气氛。随着农业的集体化，以发展重工业为重点的计划经济结构牢固地建立起来了。

斯大林的政策对党的冲击同样是很激烈的。20世纪30年代后期的清洗可以看作是斯大林在政治上对其经济政策的配合。尽管对布哈林分子的清除削弱了党，但是许多托洛茨基分子被及时吸引回来，支持斯大林的“左”倾转向。1934年底暗杀基洛夫（Kirov），为掀起大清洗发出了信号。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是作为政治反对派被审讯和处死的第一批人中的两个。以1938年对布哈林的审判为高潮的几次公开审判，实际上消除了任何其他可供选择的统治的可能性。对此，多伊彻作过这样的简述：

在历次审判庭中，除斯大林本人和托洛茨基以外，前列宁政治局的所有成员全都在场。而托洛茨基虽然缺席，却是首要的被告。而且在被告中，有一位前总理、几位副总理、两位前任共产国际首脑、工会首脑（托姆斯基在审讯前已自杀）、军队的总参谋长和总政委、所有重要军区的最高司令员，以及几乎所有苏联驻欧洲和亚洲的大使，最后还有更重要的两名政治警察头目。^[5]

政府人员从上到下被大撤换。大约300万人被处死，以至于到1939年的党代表大会上，出席过1934年党代表大会的代表只占3%，而且，上届中央委员有70%已被枪毙。一批新的行政人员填补了大清洗后留下的空缺。尽管在1936年有一部“民主”的新宪法，但连民主的形式上的表面文章也被抛弃了——在斯大林统治的漫长岁月里，只开过四次党代表大会和三次共产国际代表大会。

作为理论家的斯大林

可以委婉地说，斯大林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缺乏敏锐的头脑。然而，在马克思主义学说中，有一些流传很广的理论创新却要归功于他。他精心制定的一国社会主义理论已在前面提到过了。可以概述斯大林的理论的主要教科书是《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它于1938年问世，并连续近20年被当做共产主义理论的最权威著作。该书包括以下几项创新：首先，斯大林颠倒了恩格斯论述的顺序，在论述哲学之前论述了辩证法。大量依据恩格斯的后期著作和列宁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把辩证法（斯大林把它与形而上学对立起来）界定为这样一种看法：自然界的一切现象都是互相联系的，一切现象都处在运动的状态中；运动可能突变，而且量变引起质变；最后，矛盾是一切事物所固有的。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唯物主义（同唯心主义相对立）的主要特征则被表述为：世界按其本质来说是物质的，物质是存在于我们的意识以外并独立于我们的意识的本原的客观实在，是第一性的，而意识则是物质的反映，是第二性的；世界及其规律是完全可知的。值得注意的是，斯大林把恩格斯关于辩证法的规律归纳为两点，他尽管谈到了对立面的互相渗透和量转化为质，却删去有关否定之否定规律的全部论述，其政治含义是很明显的。

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被生硬地分割开来。在论述历史唯物主义时，斯大林赋予了不可能还原到其根源的观念以重要的意义，并有意强调其重要性。尽管新观念的产生有待于物质的适当发展，然而：

历史唯物主义决不否认它们在历史上的作用，相反，正是着重指出它们在社会生活和社会历史中的重大作用 and 意义……它们（一经产生）就会成为促进解决社会物质生活的发展所提出的新任务、即促进社会前进的最重大的力量。^[6]

斯大林在1939年又进一步对观念作了强调，他宣称：

苏联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之间的利益一致，在此基础上，也就使

得像苏联社会在道义上和政治上的一致、苏联各族人民的相互友爱，以及苏维埃爱国主义这样一些推动力获得了发展。^[7]

就苏联而言，斯大林还采用了“自上而下的革命”这个新颖的概念。在谈到剥夺富农时，斯大林写道：“这个革命的特点，就在于它上有国家政权的倡议，下有千百万农民群众的直接支持。”^[8]此外，随着社会主义在苏联的出现，尽管阶级依然存在，但是没有一个阶级压迫其他的阶级，所以它们被确定为“非对抗性的”。新提出的一国社会主义理论也有助于说明国家还不可能自行消亡。斯大林宣称，甚至到共产主义时期（苏联仍未能达到），国家也将继续存在，“除非资本主义的包围已不存在，外国军事进攻的危险已被消除”^[9]。

在战后，一次范围广泛的“哲学讨论”又提起了人们对哲学问题的兴趣。讨论以谴责亚历山大罗夫（Alexandrov）的《西欧哲学史》过于“客观主义”而告终。这次讨论主要是根据斯大林在所有理论问题上的代言人日丹诺夫（Zhdanov）的倡议进行的。斯大林还亲自干预，支持李森科（Lysenko）反对孟德尔（Mendel）的遗传学观点，以至于这种干预后来在学术界成为不可或缺的。但是，斯大林创新的最明显的例子还是他对1950年语言学争论的表态。在这次争论中，他谴责了苏联最卓越的语言学理论家马尔（Marr）的观点。马尔曾坚持认为，语言是意识形态的一部分；在与阶级发展相联系的各种语言体系之间，显然存在着界限分明的质的区别；形式的和逻辑的思维应由辩证唯物主义所取代。最后，他还说：

思想比语言更占优势，在新的无阶级社会到来之前，思想将一直比语言更占优势。在新的无阶级社会里，才能废除口头语言体系，并创造出一种单一的语言；单一语言从音节语言中超脱出来的距离，就像音节语从手势语中超脱出来的距离一样远，甚至更远。^[10]

相反，斯大林坚持，语言是整个人类而不是某个阶级的创造物；语言是逐渐地、而不是跳跃式地发展的；就语言从来不可能与思想分离这一看法而言，马尔是一个唯心主义者。从更广的意义上说，斯大林为观念具有相对独立性的讨论开辟了道路。他再次宣称：

基础创立上层建筑，就是要上层建筑为它服务，要上层建筑积极帮助它形成和巩固，要上层建筑为消灭已经过时的旧基础及其旧上层建筑而积极斗争。^[11]

他重申了他的非对抗阶级论，实际上否认量质互变的规律适用于苏联。

总之，应当告诉那些醉心于爆发的同志，从旧质过渡到新质经过爆发的规律，不仅不适用于语言发展的历史，而且也不是在任何时候都适用于诸如基础或上层建筑之类的其他社会现象。对于分成敌对阶级的社会，爆发是必需的。但是对于没有敌对阶级的社会，爆发就决不是必需的了。^[12]

斯大林特别指出，“马克思主义者不能认为语言是基础的上层建筑”，“把语言和上层建筑混为一谈，就是犯了严重的错误”^[13]。更一般地说，斯大林提出了这样一种思想，即马克思主义学说的正确性只限于它们被提出的那个时期。斯大林自己的某些论点看来可能与早期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相抵触，但是：

两个不同的公式适应于两个不同的社会发展时代，而且正因为它们是与之适应的，所以这两个公式都是正确的，——每一个对于自己的时代是正确的。要求这两个公式不彼此矛盾，要求它们不互相排斥，这是何等的荒谬。这就像要求资本主义统治时代同社会主义统治时代不彼此矛盾，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不互相排斥一样。^[14]

这些理论上的创新和斯大林的政治实践之间的相互关系是显而易见的。

托洛茨基对斯大林主义的批评

虽然斯大林主义在苏联的出现窒息了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独创性思考，但它却激发出一种高度独创性的贡献，这就是托洛茨基对苏联的批评。这一批判连同他对法西斯主义的真知灼见的分析，是他在流放中潜心钻研的成

果。的确，斯大林曾借用托洛茨基（更确切地说，是普列奥布拉任斯基）自1920年以来所信奉的几个观点，以至于布哈林把斯大林的政策称为“在意识形态上向托洛茨基主义的彻底投降”^[15]。但是，托洛茨基并不赞同斯大林的经济孤立主义，也不认同他轻视西方革命的民族主义观点，以及他把国有化和社会主义等同起来的见解。因此，托洛茨基面临着一个如何从马克思主义的角度对苏联加以归类的问题。他把官僚主义现象作为他分析的中心（马克思本人曾经多处谈到过官僚主义现象^[16]）。虽然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暗示过，官僚主义问题能够通过政治和行政措施来解决，但托洛茨基不同于列宁，他认为官僚主义扎根于俄国的社会和历史环境，是落后的产物。在《被背叛了的革命》（写于1936年，是他有关这个问题的主要著作）中，他写道：

官僚主义统治的基础是社会消费品的匮乏以及由此引发的每个人与一切人之间的争夺。当商店有足够的商品时，顾客可以在他们需要的时候来购买。当商店没有多少商品时，顾客被迫排队购买。当队排得很长时，就有必要指派一名警察来维持秩序。这就是苏联官僚主义政权的出发点。^[17]

然而，对于像俄国这样的落后国家如何避免出现官僚主义这一随之而来的问题，托洛茨基从未明确回答过。

在对苏联社会的描述中，托洛茨基拒绝把国有化财产等同于社会财产，因为只有国家财产这种过渡形式消失了，社会财产才能产生。在苏联，所有权的改变本身就是毫无意义的，特别是在伴随有巨大的斯达汉诺夫（Stakhanovite）工资级差和官僚主义等级制度时，更是如此。那么，能把苏联称为国家资本主义社会吗？在《被背叛了的革命》的关键性的第九章中，托洛茨基否认了这种说法。官僚阶层并不构成一个新阶级。他们并不像资产者那样拥有生产资料，也不积累和世袭他们的财产。官僚阶层是被招募来的，在经济体制中并没有独立的财产来源，因而他们所扮演的角色不能当做阶级剥削的例子，而只是一种社会寄生现象。

那么，苏联社会制度的特征何在呢？按照托洛茨基的说法，它的特征就在于生产力日益社会化与分配日益发展的资产阶级方式之间的矛盾。因此，它是一个过渡性的社会，但又未必会向社会主义过渡。它可能朝着两条（也

仅此两条) 道路发展: 走向社会主义或者走向资本主义。持久的官僚主义统治只能导致资本主义的复辟。

《被背叛了的革命》一书的核心论点之一是, 法国革命和俄国革命具有某种相似性, 托洛茨基苦心孤诣地要在俄国找出与热月相同的事件。热月政变标志着雅各宾派的最后垮台, 并成了波拿巴崛起的前提。20世纪20年代末, 托洛茨基曾经认定热月式的危险来自布哈林和右翼反对派, 因为当时他把法国热月政变解释为资产阶级的复辟。但这种分析并不适用于斯大林的崛起, 因为后者并不意味着阶级之间的权力转移。然而, 托洛茨基想把斯大林称为俄国的波拿巴; 而在1934—1935年间, 即在基洛夫遭暗杀后, 托洛茨基则把热月政变看成是革命运动内部权力的转移, 即从资产阶级群众转向富有的少数人。苏联与此相类似的事件是, 1924年以后权力从无产阶级群众移向官僚阶层和工人贵族。这不是反革命, 而是革命内部的一种反动。一国社会主义论是导致官僚主义统治的热月式说教。正是在这种见解之下, 托洛茨基作出了与波拿巴主义之间的类比:

拿破仑进一步推行了热月的政策, 他不但进行了反对封建势力的斗争, 而且进行了反对“下层民众”和中小资产阶级民主阶层的斗争。他用这种方法, 把革命所产生的诸多政权的成果都集中在新资产阶级贵族手中。斯大林在捍卫十月革命的成果时, 不但反对封建—资产阶级的反革命, 而且反对劳苦大众的要求, 以及他们的迫切心情和不满情绪。他粉碎了左派及其所代表的包括非特权劳动群众在内的符合历史的进步倾向。他实行工资、特权、地位等方面极为严格的区别对待而创造了一个新的贵族阶层。靠这个新社会等级秩序内的最高层的支持来反对最低层(有时则反其道而行之), 斯大林已把权力全部集中在自己手中。如果不把这个政权称为苏维埃波拿巴主义, 又该称作什么呢?[18]

就两者都是处于危急时刻的政权, 它们都通过权力的人格化使政治攫取了凌驾于社会之上的某种独断性而言, 这种苏维埃波拿巴主义同法西斯式的波拿巴主义有着十分相似之处。在托洛茨基看来, 关键的差别在于, 斯大林主义是新兴阶级的布尔什维克波拿巴主义, 法西斯主义是旧的垂死阶级的波拿巴主义。

然而, 托洛茨基并没有与苏联决裂。他认为, 在某种意义上, 苏联仍然

是革命的国家，对世界无产阶级是一种鼓舞。因为只有苏联有国有化的财产，这是社会主义最根本的前提条件。苏联尽管蜕化了，但仍然是一个工人国家。因而需要的是一场政治革命，而不是社会革命。托洛茨基还受自身下述信念的影响，即同法西斯分子的战争不可避免，而苏联在这场战争中将需要支持。这些观点开始遭到第四国际内部某些托洛茨基分子的反对。第四国际是托洛茨基为反对斯大林主义而于1934年创立的。这些托洛茨基分子不可能那么容易地把斯大林同苏联区分开来，于是他们开始怀疑起整个十月革命的正确性。这一观点在第四国际的美国支部中特别普遍，在那里，像詹姆斯·伯纳姆（James Burnham）和麦克斯·沙切特曼（Max Schachtman）这样一些作家开始论证说，苏联的官僚化是世界官僚化的开端，世界官僚化将在合理而高效地生产的名义下既取代资本主义，又取代社会主义。^[19]托洛茨基本人受到了这些思想的影响，因此就在临终前，他还为苏联设想出第三种选择：即将到来的时代究竟是社会主义革命时代，还是蜕化为极权主义的官僚主义时代？面对这一问题，托洛茨基宣称：

不言而喻，出于我们整个时代和当前新战争的经验，国际无产阶级如果证明它不可能成为社会的主人，这将意味着沦丧掉社会主义革命的全部希望，因为不可能期待还有其他更有利于社会主义革命的条件了。^[20]

他还谈到，也许“无产阶级天生地不能成为统治阶级”，也许“根据目前苏联的基本特征来看，它已是新的国际范围内的剥削体制的先驱”^[21]。托洛茨基从没有想到，斯大林主义兴起的原因也许恰好是1917年布尔什维克取得成功的原因——那就是，俄国社会制度和经济基础虚弱，随之而来的政治处于虚脱状态；在这种状态下，激进的措施和计划工业的扩展加剧了权力的集中和官僚主义的日盛。托洛茨基最后的反思并不代表他思想中的主流（而且，他气愤地驳斥了那些从其反思中妄加推断的人），但是这些反思确实表明，直到去世前，他所作出的许多结论还多么富有探索性。

〔注释〕

[1] J. Stalin, *Leninism* (London, 1940) p. 325.



[2] Ibid. , pp. 325f.

[3] Ibid. , p. 326.

[4] 回顾1902年就党的纲领展开的讨论,当时,列宁说,如果农民不愿接受无产阶级的提议,那么“当要实行专政时,我们将对你们说‘在不得不使用暴力时,废话是没有用的’”。想来真有点好笑。薇拉·查苏利奇对此加了批注:“面对千百万人,你试试看!”参见L. Schapiro, *History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the Soviet Union* (London, 1970) p. 47。

[5] I. Deutscher, *Stalin: A Political Biography* (Harmondsworth, 1966) pp. 368f.

[6] J. Stalin, *History of the CPSU: Short Course* (Moscow, 1943) p. 116.

[7] *The Essential Stalin*, ed. B. Franklin (New York, 1972) p. 367.

[8] J. Stalin, *History of the CPSU: Short Course*, p. 305.

[9] *The Essential Stalin*, p. 387.

[10] 引自G. Wetter, *Dialectical Materialism* (London, 1958) p. 196。有关苏联对语言学最具原创性的贡献,写于1929年。参见V. Volosinov, *Marxism and the Philosophy of Language* (New York, 1973)。

[11] *The Essential Stalin*, p. 408f.

[12] Ibid. , p. 425.

[13] Ibid. , p. 412.

[14] Ibid. , p. 443f.

[15] 引自S. Cohen, *Bukharin and the Bolshevik Revolution* (New York, 1975) p. 311.

[16] 参见,比方说, I. Fetscher ‘Marxism and Bureaucracy’, in *Marx and Marxism* (New York, 1971) p. 204ff.

[17] L. Trotsky, *The Revolution Betrayed* (London, 1937) p. 110。这个论点在托洛茨基1923年发表的《新方针》中就已简要地提出过。

[18] ‘The Workers’ State, Thermidor and Bonapartism’, *Writings of Leon Trotsky*, 1934—1935 (New York, 1971) p. 181.

[19] B. Rizzi, *La bureaucratization du monde* (Paris, 1939), 及其续篇 J. Burnham, *The Managerial Revolution* (New York, 1941)。

[20] ‘The USSR in War’, in L. Trotsky, *In Defense of Marxism* (New York, 1973) p. 15.

[21] Ibid. , p. 9.

深入阅读材料

原著

鉴于斯大林被褫夺了往日的光彩，《斯大林选集》出到第13卷就停刊了。他的一些主要著作都有了单行本，如《马克思主义与民族和殖民问题》、《列宁主义》、《苏联的经济问题》等。另外，还有一部有用的文集，那就是富兰克林（Franklin）的《斯大林著作精选》，其中有一个为斯大林辩护的“导论”。

评论

在诸多传记中，从多方面来看，最好的还是所描述的事件的参与者——苏瓦林（Souvarine）和托洛茨基的两部研究成果。费舍（Fischer）说得好：最明白晓畅的是多伊彻（Deutscher）在公正评价斯大林的成就上所付出的饶有趣味的努力。最近，我可以看到乌拉姆（Ulam）详尽的叙事作品、塔克（Tucker）更多地从心理学方面进行的研究，以及欣克利（Hingley）充满敌意的著作。

有很多有关斯大林时代的研究著作，有些著作更近于论战、而非分析。就斯大林主义产生的根源，卡尔（Carr）的《一国社会主义》与《计划经济的基础》论述详尽且可信度高。也可参阅卢因（Lewin）的《苏维埃体制的形成》和梅德韦杰夫（Medvedev）的《让历史来评判：斯大林主义的前因后果》。就20世纪30年代的“大清洗”，康奎斯特（Conquest）的《大恐怖》作了引人入胜的细致刻画。多伊彻的《未竟的革命》或许是最具反思性的导读著作。关于斯大林晚年的社会气氛，参看德吉拉斯（Djilas）的《与斯大林谈心》。塞顿—沃森（Seton-Watson）对当时的国际态势作了很好的概述。一位当代共产主义者对历史分寸有度的反思之作是埃伦斯坦（Ellenstein）的《斯大林现象》。另外，还可参阅拉克奎尔（Lacqueur）的《斯大林：格拉斯诺斯特革命》和斯蒂茨（Stites）的《革命梦幻：苏联的乌托邦观念和实验性生存》。把斯大林主义当做意识形态进行比较好的评论的是瓦利奇（Walicki）的《马克思主义与向自由王国的飞跃》，第5章。

参考文献

Texts

Joseph Stalin, *Works*, 13 vols (Moscow, 1952-5).

——*The Essential Stalin: Major Theoretical Writings, 1905—1952*, ed. Bruce Franklin (New York, 1972).

——*Leninism* (London, 1940).

——*Marxism and the National and Colonial Question* (London, 1936).

Robert H. McNeal (ed.), *Stalin's Works: An Annotated Bibliography* (Stanford, 1967).

Commentaries

Victor Alexandrov, *The Tukhachevsky Affair* (London, 1963).

Svetlana Alliluyeva, *Twenty Letters to a Friend* (London, 1967).

John A. Armstrong, *The Politics of Totalitarianism: The Communist Party of the Soviet Union from 1934 to the Present* (New York, 1961).

Abdurakham Avtorkhanov, *Stalin and the Soviet Communist Party: A Study in the Technology of Power* (New York, 1959).

Henri Barbusse, *Stalin: A New World Seen Through One Man* (London, 1935).

Nikolaus Basseches, *Stalin* (London, 1952).

Max Beloff, *The Foreign Policy of Soviet Russia: 1929—1936* (London, 1962).

Conrad Brandt, *Stalin's Failure in China* (Cambridge, Mass., 1958).

E. H. Carr, *Socialism in One Country: 1924—1926*, 3 vols (London, 1958—1964).

E. H. Carr and R. W. Davies, *Foundations of a Planned Economy: 1926—1929*, 3 vols (London, 1969—1978).

Dudley Collard, *Soviet Justice and the Trial of Radek and Others* (London, 1937).

Lucio Colletti, 'The Question of Stalin', in R. Blackburn (ed.), *Revolution and Class Struggle: A Reader in Marxist Politics* (London, 1977); and *New Left Review*, 61 (1970).

Robert Conquest, *The Great Terror: Stalin's Purge of the Thirties* (New York, 1968).

Robert V. Daniels (ed.), *The Stalin Revolution—Fulfillment or Betrayal of Communism?* (Boston, 1965).

Theodore Denno, *The Communist Millennium: The Soviet View* (The Hague, 1964).

Isaac Deutscher, *Soviet Trade Unions* (London, 1950).

———*Stalin: A Political Biography* (Harmondsworth, 1966).

———*The Unfinished Revolution: Russia 1917—1967* (London, 1967).

Milovan Djilas, *Conversations with Stalin* (London, 1962).

M. M. Drachkovitch and Branko Lazitch, *The Comintern: Historical Highlights* (New York, 1966).

J. Ellenstein, *The Stalin Phenomenon* (London, 1976).

Alexander Erlich, 'Stalin's Views on Soviet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Ernest J. Simmons (ed.), *Continuity and Change in Russian and Soviet Thought* (Cambridge, Mass., 1955).

Louis Fischer, *The Life and Death of Stalin* (London, 1953).

- Ruth Fisher, *Stalin and German Communism* (Cambridge, Mass., 1948).
- Valentino Gerratana, "Stalin, Lenin and Leninism", *New Left Review*, 103 (1977).
- Zaga Golubovic, 'The History of Russia under Stalin', *New Left Review*, 104 (1977).
- Elliot R. Goodman, *The Soviet Design for a World State* (New York, 1960).
- A. V. Gorbatov, *Years of My Life: The Memoirs of a General of the Soviet Army* (London, 1964).
- Loren R. Graham, *The Soviet Academy of Sciences and the Communist Party: 1927—1932* (Princeton, N. J., 1967).
- Chris Harman, *How the Revolution was Lost* (London, 1969).
- R. Hingley, *Joseph Stalin: Man and Legend* (London, 1974).
- G. F. Hudson, *Fifty Years of Communism: Theory and Practice 1917—1967* (London, 1968).
- George D. Jackson, *Comintern and Peasant in East Europe: 1919—1930* (London, 1966).
- Julius Jacobson (ed.), *Soviet Communism and the Socialist Vision* (New Brunswick, N. J., 1972).
- Naum Jasny, *Soviet Industrialisation: 1928—1952* (Chicago, 1961).
- George Katkov, *The Trial of Bukharin* (London, 1969).
- Arthur Koestler, *Darkness at Noon* (New York, 1961).
- Walter Lacqueur, *Stalin: The Glasnost Revelations* (New York, 1990).
- Isaac Don Levine, *Stalin* (London, 1931).
- Moshe Lewin, *The Making of the Soviet System* (New York, 1985).
- Kermit E. McKenzie, *Comintern and World Revolution, 1928—1943: The Shaping of Doctrine* (New York, 1964).
- Roy A. Medvedev, *Let History Judge: The Origins and Consequences of Stalinism* (New York, 1971; revised edn, 1989).
- Barrington Moore, *Soviet Politics-The Dilemma of Power: The role of Ideas in Social Change* (New York, 1965).
- Olga A. Narkiewicz, *The Making of the Soviet State Apparatus* (Manchester, 1970).
- Alec Nove, *An Economic History of the USSR* (New York, 1984).
- Economic Rationality and Soviet Politics: or, Was Stalin Really Necessary?* (New York, 1964).

- Thomas H. Rigby (ed.), *Stalin* (Englewood Cliffs, N. J., 1966).
- Arthur Rosenberg, *A History of Bolshevism* (Garden City, New York, 1967).
- Hugh Seton-Watson, *From Lenin to Krushchev: The History of World Communism* (New York, 1960).
- Max Shachtman, *The Bureaucratic Revolution: The Rise of the Stalinist State* (New York, 1962).
- Edward Ellis Smith, *The Young Stalin: The Early Years of an Elusive Revolutionary* (New York, 1967).
- Boris Souvarine, *Stalin: A Critical Survey of Bolshevism* (London, 1939).
- ‘Stalinism’, in M. M. Drachkovitch (ed.), *Marxism in the Modern World* (Stanford, 1965).
- Richard Stites, *Revolutionary Dreams: Utopian Vision and Experimental Life in the Soviet Union* (New York, 1989).
- Julian Towster, *Political Power in the USSR, 1917—1947: The Theory and Structure of Government in the Soviet State* (Oxford, 1948).
- Leon Trotsky, *Stalin: An Appraisal of the Man and his Influence* (London, 1941).
- Robert C. Tucker, *Stalin as Revolutionary, 1879—1929: A Study in History and Personality* (New York, 1973).
- *Stalin in Power: The Revolution from Above, 1928—1941* (New York, 1990).
- (ed.), *Stalinism: Essays in Historical Interpretations* (New York, 1977).
- Roert C. Tucker and S. F. Cohen (eds), *The Great Purge Trial* (New York, 1965).
- Adam B. Ulam, *The Unfinished Revolution* (London, 1970).
- *Stalin: The Man and His Era* (London, 1974).
- Alexander Uralov, *The Reign of Stalin* (London, 1953).
- Andrej Walicki, *Marxism and the Leap to the Kingdom of Freedom: The Rise and Fall of Communist Utopia* (Stanford, 1995).
- Sidney and Beatrice Webb, *Soviet Communism: A New Civilisation?* (New York, 1938).



第十章 斯大林以后的共产主义

在 1956 年第二十次党代表大会上，赫鲁晓夫对斯大林的谴责在整个共产主义世界产生了深远的反响。斯大林被宣判：

曾经以全苏共产党（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的名义支持了对社会主义法制最粗暴的侵犯，支持了严刑拷问和迫害。就像我们所看到的，这些做法导致了对那些清白无辜的人们的诽谤和他们的自我控告。^[1]

赫鲁晓夫谴责“个人崇拜”，并要求恢复苏维埃社会主义民主的这一列宁主义原则。从 20 世纪 60 年代初，赫鲁晓夫实行了与俄国经济学

家李普曼 (Libermann) 的名字联系在一起、有限度的经济分权方案。不过，他首先集中改进在斯大林统治下受到严重忽视的农业部门。恢复了物质刺激，改善了投资，允许集体农庄管理自己的机械化动力，着手大力开垦哈萨克斯坦的处女地。

为了和新精神保持一致，1961年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通过了一个修正纲领，以取代1903年和1919年的两个纲领。修正纲领的新原理在于它宣布，“社会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的和平共存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需要”^[2]，资本主义已经进入了一次新的危机，“其主要特征是，它的发展不是与世界战争联系在一起的”^[3]。另一方面，苏联在未来十年中将为共产主义奠定物质的和技术的基础，而到1980年，“共产主义社会将在苏联基本上建立起来”^[4]。从正统马克思主义观点来看，更为出乎意料的是，它声称党不再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而是全（体）（人）民的先锋队。这个纲领还要求反复灌输以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原则（“社会主义人道主义”是正统的列宁主义传统中早已不存在的概念）为基础的共产主义道德。然而，由于1964年赫鲁晓夫垮台，伴随着对和平共存的强调力度的减弱，出现了对斯大林的比较肯定的态度。这种情况的变化就反映在1967年出版的政治基础教科书《科学共产主义原理》中。在国际舞台上还同时（在入侵捷克斯洛伐克前后）出现了勃列日涅夫的“有限主权论”。“有限主权论”包含这样一些观点：通往社会主义的道路不能是不同的、保卫社会主义是整个世界社会主义体系的事情，以及把无产阶级在一国专政的观念改为无产阶级国际专政的观念。代替1936年斯大林宪法的新宪法在1961年就已决定通过，但直到1977年才公布。新宪法加强了党的权力——把党的总书记和国家主席的职位集于勃列日涅夫一身，但和二十二大保持一致的是，它放弃了“无产阶级专政”的提法，而代之以“全民国家”。

虽然在斯大林以后的年代，苏联在发展马克思主义思想方面没有多大的贡献，但其东欧邻邦的情况却有所不同。在波兰，政府的主要经济顾问之一奥斯卡·兰格 (Oskar Lange) 试图把计量经济学这样的“资产阶级”学科引进到一个实行权力下放、并容许一定数量的自主管理、允许按价值规律确定价格的社会主义体制中。莱塞克·克拉科夫斯基 (Leszek Kolakowski) 领导了波兰的哲学复兴。他在一系列生机盎然的文章中声称，马克思主义不是一个封闭的体系。他抛弃了传统马克思主义关于意识形态的观念，并从理论上证明立足于实践概念而不是立足于反映论的认识论。^[5]克拉科夫斯基的



人道主义则含有一种强烈的道德要素：

人们不能借口其行动只构成一定历史进程中的零星部分而推卸其积极的或消极的责任。一个战士在道义上要对其听命于上级而犯下的罪行负责；一个人更要对其接受某种不为人知的历史使命——或为想像中的或是现实中的——而采取的行动负责……我们完全接受关于个人要对其行动负全部责任和关于历史进程无所谓道德不道德的观点。^[6]

克拉科夫斯基最终流亡国外后，在国内更有影响的是亚当·沙夫（Adam Schaff）的著作。沙夫是党中央委员会成员中的一位语言学专家。他在《语义学导论》（1962年版）中作出了把现代语言学纳入马克思主义的最佳尝试。^[7]尽管沙夫强烈反对克拉科夫斯基的“青年马克思主义”，并为一种经过修改的反映论形式辩护，但他又确实诉诸于“异化”（alienation）概念，并对社会主义能以多大速度消灭国家、家庭和商品生产持怀疑态度。他宣称：

要说明在社会主义国家中继续存在着异化是完全可能的。而要否定它的存在，无论如何是不能令人信服的，或至少是欠妥当的。令人遗憾的是，连某些自诩为科学的书也经常那么去做。设想人的意识、立场和社会惯例仅仅由于生产资料私有制的消灭而在一夜之间就能发生变化，那是不可信的。^[8]

在捷克斯洛伐克，苏共二十大意味着莫斯科影响的放松，这使捷克人得以依靠他们自身悠久的民主和文化传统来恢复他们的马克思主义，这一过程在1968年的“布拉格之春”达到了巅峰。改革在经济学和哲学中尤为引人注目。经济学方面的代表性人物是奥塔·希克（Ota Sik），他的《社会主义制度下的计划和市场》一书为1968年的许多改革提供了理论基础。希克想强调的是，市场关系甚至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也很重要，以及允许工人集体有充分的自主性也同等重要。在一种可与韦伯对官僚主义的批判相媲美的分析中，希克把捷克斯洛伐克经济运转不佳的原因归结为计划体制的过分集中：

行政管理体制限制了企业的独立性，并损伤它们的主动性的最佳发挥。企业的管理机构难以按照迅速变化的经济状况独立而灵活地决定任

何经济进程，而主要是被迫完成行政上规定的数量指标以保持一些形式上的记录。^[9]

希克并不否认需要计划，但他坚持来自下面的反馈的必要性：

在生产者之间必然存在着某些经济关系，这些关系会不断地迫使他们在作出生产决策时要考虑到消费者的利益。在此，作出损害消费者的片面决定的任何生产者，也会跟消费者一道自食恶果；相反，最佳的决策将对生产者产生积极的影响。作为生产者和消费者的人民的利益既保持经常性的对抗，又直接得到相互平衡，这样的经济关系将促成社会必要的劳动支付，这类关系就是我们所称为的**社会主义商品货币关系**。^[10]

这等于承认，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价值规律将继续存在。

20世纪60年代最有独创性的捷克哲学家是卡雷尔·科西克（Karel Kosik）。他吸收卢卡奇（Lukács）、马尔库塞（Marcuse）和萨特（Sartre）等人的思想成果，重申他所认为是马克思的哲学根基的东西。科西克的基本主张是：

人并不是生活在两种不同的领域里，也不是以其中一部分的存在居住在历史领域而另一部分的存在居住在自然领域。人一直是同时存在于**自然和历史之中**。人作为历史的存在物，因而也是社会的存在物，他不仅使自然界具有人性（人化）了，而且认识自然界，并承认自然界是绝对的整体，是自足的本原，是人性化的前提和必要条件。^[11]

因而，人的中心活动是人类实践（praxis），即：

客观变为主观和主观变为客观的活动领域。正是这一“活动中心”，使人类意图得以实现和自然规律得以发现。人类实践把因果性和目的性统一起来。^[12]

科西克对艺术特别重视，甚至借用海德格尔（Heidegger）的“烦”（Sorge）这一概念来说明人类的状况。

南斯拉夫对莫斯科的正统性背离得最远。由于1948年同莫斯科在政治上决裂，并拒绝把苏联作为楷模，南斯拉夫的马克思主义者对苏联开展了猛烈的批判。有些人认为，布尔什维主义本身是进步的，但是苏联现在被一个根深蒂固的官僚统治阶级所控制，已不再走向共产主义了。^[13]一些更激进的南斯拉夫人则把列宁主义的党视为对马克思的背叛而加以唾弃。在他们看来，列宁主义的直接结果是可界定为一种制度的“国家主义”，在这其中：

国家机构同共产党的机构及其构成纽带机制的其他政治组织完全混为一体。由于生产资料归集体所有，劳动者便受国家机构雇佣和剥削。在分配剩余价值时，统治阶级中每一个代表的个人所得份额，同他在国家等级制中的地位是相称的。对这个中央集权化的阶级，我们也必须根据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精神，来谈论剥夺剥削者和生产资料社会化的前景。^[14]

对苏联的这种批评，一直得到了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哲学复兴运动的支持。这个运动的中心是贝尔格莱德大学和1967年创办的评论性刊物《实践》。在《实践》早期的一期上，编辑之一加欧·彼得罗维奇（Gaio Petrovic）说过：

我们战后哲学发展的基本成就之一，在于发现了人——人在斯大林主义式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被作为障碍而排除了——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的中心。^[15]

对社会主义社会中的异化和自由问题的集中关注，势必导致向青年马克思思想的回归。正如“实践派”的一位历史学家所写的：

已经很明显的是，青年马克思力求解决的那些问题，诸如实践、人的存在和本质的冲突、什么东西构成真正的需要和人的基本能力的问题、异化、解放、劳动和生产，以及当时社会表现出来的其他关注的焦点，非但不是青年时代所犯下的为他全部成熟著作奠基的过错，相反，即便是现在，仍然是我们时代、乃至整个过渡时期的活生生的要害问题。^[16]

然而，在1975年，“实践派”遭到了镇压，它的许多领导成员被解除了职务。

南斯拉夫模式最令人瞩目的方面是，在存在相当分权化的经济体制和浓厚的以市场为导向的社会主义条件下，他们对工人自我管理的高度重视（这可追溯到1949年）。南斯拉夫的自我管理起源于战争期间，当时，游击队员需要寻求一种能够管理解放区的方法。后来，伴随着对建立在合法个人利益和强烈物质刺激之上的经济增长和技术发展的追求，这种管理模式就变得愈加务实了。

在斯大林以后的时代，西欧共产主义的核心人物是意大利共产主义领袖帕尔米罗·陶里亚蒂（Palmiro Togliatti），他曾经是葛兰西（Gramsci）的亲密朋友和合作者。陶里亚蒂一贯主张完全独立的路线，而赫鲁晓夫1956年的讲话恰恰为他提供了一个传播自己主张的机会。他宣称：第一，只对斯大林个人进行批判是以一种过于肤浅的方式对待斯大林主义现象；第二，在多党制国家中有可能建设社会主义；第三，整个共产主义运动已成为一个多中心的体系，在这个体系中，莫斯科已不再拥有独特的地位。基于上述立场，陶里亚蒂在1964年的“雅尔塔备忘录”上对中国共产党所持的立场持有异议，但也同样反对苏联对中国的正式谴责。陶里亚蒂宣称“任何再次创立一个集权化的国际组织的主张”^[17]都是不能接受的，并坚决声明：

我们一向从这样一种观点出发：社会主义是一种政治制度，在这种制度中，工人享有最广泛的自由，并有组织地实际参与整个社会生活的管理。因此，一切原则立场和一切事实，凡是向我们表明，这是存在于一切社会主义国家内的现实，而不仅仅局限于苏联，那么我们都表示欢迎。可是，有些事件有时向我们揭露出正好相反的情况，它们损害着整个运动。^[18]

通过对葛兰西作出的有利于意大利共产党政策的解读，陶里亚蒂的思想获得了支持，最近几年被意大利共产党广为传播，并导致了著名的“历史性妥协”。在这一妥协中，希望扩大自己力量基础的意大利共产党，一相情愿给予那些基本倾向不是社会主义的政党以有保留地支持。

在20世纪70年代，法国共产党和西班牙共产党仿效意大利共产党的榜

样，从而产生并发展出“欧洲共产主义”概念。1976年，法国共产党决定在其纲领中放弃“无产阶级专政”目标，而它在1978年选举中的策略，引发了对党内缺少公开讨论这一现象的空前批评。领导这次批评的是诸如阿尔都塞（Althusser）和埃伦斯坦（Ellenstein）这样一些著名的党内知识分子。迄今为止，最无保留地袒露心声的是西班牙共产党。党的总书记圣地亚哥·卡里略（Santiago Carillo）在他那本引起争议的《欧洲共产主义和国家》一书中，强调赢得、并扩大民主自由和人权，把赢得选民的信任看作改造资本主义斗争中的一个根本步骤。在一段显然针对苏联的文字中，卡里略甚至这样说：

事实上，在我们这些国家里，某些阶层的人们对我们共产党人的民主缺乏“信心”，这并不与我们自身的活动和政策相关，而是与下述事实相关联，即在那些已经消灭了资本私有制的国家，一般地说，无产阶级专政是通过一党制建立起来的。无产阶级专政已遭受官僚主义的严重扭曲，甚至陷入到非常严重的蜕化过程之中。^[19]

在1978年的党代表大会上，西班牙共产党甚至不顾来自莫斯科的激烈反对，决定在自我界定中不具体提及列宁主义，这预示了未来继苏联解体后，大多数欧洲共产党同苏共的决裂。

[注释]

[1] *Krushchev Remembers*, ed. E. Crankshaw (New York, 1971) p. 530.

[2] *The Road to Communism, Documents of the 22nd Congress of the CPSU* (Moscow, 1961) p. 506.

[3] *Ibid.*, p. 470.

[4] *Ibid.*, p. 512.

[5] 尤其参见 L. Kolakowski, 'Karl Marx and the Classical Definition of Truth', in *Towards a Marxist Humanism* (New York, 1968).

[6] L. Kolakowski, *Towards a Marxist Humanism*, pp. 140f.

[7] 尤其参见 pp. 140ff.

[8] A. Schaff, *Marxism and the Human Individual*, ed. R. Cohen (New York,

1970) pp. 128f.

[9] O. Sik, *Plan and Market under Socialism* (White Plains and Prague, 1967) p. 98.

[10] Ibid., p. 167.

[11] K. Kosik, *Dialectics of the Concrete* (Dordrecht, 1978) p. 151.

[12] Ibid., p. 71.

[13] 比方说, 参见 M. Djilas, *The New Class* (London and New York, 1962)。

[14] S. Stojanovic, *Between Ideals and Reality* (London and New York, 1973)。

[15] *Praxis*, vol. 1 (1967) p. 64.

[16] M. Markovic and R. Cohen, *Yugoslavia: The Rise and Fall of Socialist Humanism* (Nottingham, 1975) p. 18.

[17] P. Togliatti, *Memorandum*, in W. Griffith (ed.), *Sino-Soviet Relations 1964—1965* (Cambridge, 1967) p. 380.

[18] Ibid., p. 383.

[19] S. Carillo, *Eurocommunism and the State* (London, 1977) p. 155.

深入阅读材料

苏联

赫鲁晓夫的自述(如果真是他本人的)已列入《赫鲁晓夫回忆录》内,该书附录有1956年对斯大林的谴责。对赫鲁晓夫时代最好的描述是克兰克肖(Crankshaw)的《赫鲁晓夫》、林登(Linden)的《赫鲁晓夫和苏联领导人》,以及最近梅德韦杰夫的《赫鲁晓夫:当政的年代》。有关当代苏联的学说这一令人生厌的话题,参看韦特(Wetter)的《今日苏联的意识形态》和德·乔治(De George)的《新马克思主义》。最好的导读性著作是麦考利(McAuley)的《政治学与苏联》的第二大部分和莱昂纳(Leonard)的《马克思主义的三副面孔》的第四章。另外,还可以参见罗斯伯格(Rothberg)和塔图(Tatu)的相关评论。就苏联体制的解体而言,见怀特(White)的《戈尔巴乔夫及其后时代》、希尔(Hill)的《刺刀下的共产主义政治》、卡格利茨基(Kagarlitsky)的《一元化的分解》与梯克廷(Ticktin)的《苏联危机的根源》。

东欧

有两部优秀的介绍性读物,约内斯库(Ionescu)的《欧洲共产主义国家的政治》和佩利坎(Pelikan)的《东欧社会主义反对派》。就思想观念而言,参见德·乔治的《新马克思主义》。关于左翼批判,见巴罗(Bahro)的《东欧的抉择》。对这个地区的社会主义经济的描述,见霍瓦特(Horvat)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与布鲁斯(Brus)和

拉斯基 (Laski) 合著的《从马克思到经济体制探求中的市场社会主义》。还有一部有价值的文集是斯托科思 (Stokes) 的《从斯大林主义到多元主义——1945年以来东欧历史文献》。

关于波兰的概述, 见乔丹 (Jordan) 的《哲学与意识形态》, 也可参阅沙夫 (Schaff) 和克拉科夫斯基 (Kolakowski) 的著作。

关于捷克斯洛伐克, 对“布拉格之春”最好的背景性描述是库辛 (Kusin) 的《布拉格之春的学理根源》。还可见佩利坎 (Pelikan)、希克 (Sik) 和科西克 (Kosik) 的书。

关于南斯拉夫, 见奥蒂 (Auty) 的《铁托传》, 罗斯·约翰逊 (Ross Johnson) 的《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转型》和克利索尔德 (Clissold) 的文集《南斯拉夫与苏联》这两本书可以作为前一本书的补充。有位社会学家对自我管理的实况作了很好的评价, 这就是佐金 (Zukin) 的《超越马克思和铁托》。“实践派”简史见于马科维奇 (Markovic) 和科恩 (Cohen) 合著的《南斯拉夫: 社会主义人道主义的兴衰》。最好的批评来自知情人斯托雅诺维奇 (Stojanovic) 的《在理想与现实之间》。还可参阅彼得罗维奇 (Petrovic) 的《20世纪中期的马克思》。

西欧

关于意大利式的欧洲共产主义, 参见萨松 (Sassoon) 的《意大利共产党人的自我辩护》和霍布斯鲍姆 (Hobsbawm) 对纳波利塔诺 (Napolitano) 的访谈录——《意大利通往社会主义之途》。关于西班牙, 见卡里略 (Carillo) 的《欧洲共产主义与国家》。而关于西欧总的情况, 见克劳丁 (Claudin) 的《欧洲共产主义与社会主义》, 该书批判中不失同情。还有曼德尔 (Mandel) 的彻底攻击性的著作——《从斯大林主义到欧洲共产主义》。

参考文献

USSR (General)

Paul Bellis, *Marxism and the USSR* (London, 1979).

Robber Conquest, *Power and Policy in the USSR* (New York, 1961).

Isaac Deutscher, *Russia After Stalin* (London, 1953).

Wolfgang Leonard, *The Kremlin Since Stalin* (Oxford, 1962).

——*Three Faces of Marxism* (New York, 1974).

M. Lewin, *Political Undercurrents in Soviet Economic Debates* (Princeton, N. J., 1974).

Sidney Ploss, *Conflict and Decision Making in Soviet Russia: A Case Study of Agricultural Policy, 1953—1963* (Princeton, N. J., 1965).

Gustav A. Wetter, *Soviet Ideology Today* (New York, 1966).

Krushchev: Texts

Nikita Krushchev, *The Crimes of the Stalin Era* (New York, 1956).

——*Krushchev Speaks* (Ann Arbor, 1963).

——*Krushchev Remembers*, 2 vols (London, 1972—1974).

Krushchev: Commentaries

E. Crankshaw, *Krushchev* (London, 1966).

Merle Fainsod, 'Krushchevism', in M. M. Drachkovitch (ed.), *Marxism in the Modern World* (Stanford, 1965).

Mark Frankland, *Krushchev* (Harmondsworth, 1966).

Carl A. Linden, *Krushchev and the Soviet Leadership: 1957—1964* (Baltimore, 1966).

Richard Loewenthal, 'The Nature of Krushchev's Power', *Problems of Communism*, IX (1960).

R. and Z. Medvedev, *Krushchev. The Years in Power* (Oxford, 1977).

Roger Pethybridge, *A Key to Soviet Politics: The Years in Power* (Oxford, 1977).

Roger Pethybridge, *A Key to Soviet Politics: The Crisis of the Anti-Party Group* (New York, 1962).

Lazar Pistrak, *The Grand Tactician: Krushchev's Rise of Power* (New York, 1961).

Myron Rush, *The Rise of Krushchev* (Washington, 1958).

Adam B. Ulam, *The New Face of Soviet Totalitarianism* (Cambridge, Mass., 1963).

Bertram D. Wolfe, *Krushchev and Stalin's Ghost* (New York, 1957).

Post-Krushchev

Archie Brown and Jack Gray (eds), *Political Culture and Political Change in Communist States*, 2nd edn (London, 1979).

Robert Conquest, 'After Krushchev: A Conservative Restoration', *Problems of Communism*, XII (1963).

——*Russia after Krushchev* (New York, 1965).

Alexander Dallin and Thomas Larson, *Soviet Politics since Krushchev* (Englewood Cliffs, N. J., 1968).

Isaac Deutscher, *Russia, China and the West* (London, 1970).

John Dornberg, *The New Tsars : Russia under Stalin's Heirs* (Garden City, New York, 1971).

Ronald Hill, *Communist Politics under the Knife : Surgery or Autopsy* (London, 1990).

Boris Kagarlitsky, *The Disintegration of the Monolith* (London, 1992).

Boris Meissner, *The Brezhnev Doctrine* (Kansas City, 1971).

Abraham Rothberg, *The Hairs of Stalin : Dissidence and the Soviet Regime, 1953—1970* (Ithaca, New York, 1972).

Daniel Tarschys, *The Soviet Political Agenda* (London, 1979).

Michel Tatu, *Power in the Kremlin from Krushchev to Kosygin* (New York, 1970).

Hillel Ticktin, *Origins of the Crisis in the USSR : Essays on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a Disintegrating System* (Armonk, NY, 1992).

Stephen White, *Gorbachev and After* (Cambridge, 1991).

Sino-Soviet Conflict

Edward Crankshaw, *The New Cold War : Moscow vs. Peking* (Baltimore, 1963).

Leopold Labedz and G. R. Urban (eds), *The Sino-Soviet Conflict : Eleven Radio Discussion* (London, 1965).

Robert C. North, *Moscow and Chinese Communists* (Stanford, 1953).

Donald S. Zagoria, *The Sino-Soviet Conflict : 1956—1961* (Princeton, N. J., 1962).

Eastern Europe (General)

Rudolf Bahro, *The Alternative in Eastern Europe* (London, 1978).

Włodzimierz Brus and Kazimierz Laski, *From Marx to the Market : Socialism in Search of an Economic System* (Oxford, 1989).

Richard T. De George, *The New Marxism : Soviet and East European Marxism since 1956* (New York, 1968).

Chris Harman, *Bureaucracy and Revolution in Eastern Europe* (London, 1974).

Branko Horvat,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Socialism : A Marxist Social Theory* (London, 1982).

G. Ionescu, *The Politics of the European Communist States* (London, 1967).

G. D. Jackson, *Comintern and Peasant in East Europe : 1919—1930* (New York, 1966).

- Jiri Pelikan, *Socialist Opposition in Eastern Europe* (London, 1976).
 H. Seton-Watson, *The East European Revolution*, 3rd edn (London, 1957).
 H. G. Skilling, *The Government of Communist East Europe* (New York, 1966).
 Gale Stokes (ed.), *From Stalinism to Pluralism: A Documentary History of Eastern Europe since 1945* (London, 1991).
 R. Tökés, *Opposition in Eastern Europe* (London, 1979).

Poland

- Peter Green, 'The Third Round in Poland', *New Left Review*, 101-102 (1977).
 Z. Jordan, *Philosophy and Ideology: The Development of Philosophy and Marxism-Leninism in Poland since the Second World War* (Dordrecht, 1963).
 Leszek Kolakowski, *Marxism and Beyond: On Historical Understanding and Individual Responsibility* (London, 1968).
 Adam Schaff, *A Philosophy of Man* (New York, 1963).
 ——— *Marxism and the Human Individual* (New York, 1970).

Czechoslovakia

- Vladimir Fiserá (ed.), *Workers' Councils in Czechoslovakia* (London, 1978).
 K. Kosi, *Dialectics of the Concrete* (Dordrecht, 1976).
 Vladimir Kusin, *The Intellectual Origins of the Prague Spring: The Development of Reformist Ideas in Czechoslovakia, 1956—1967* (Cambridge, 1971).
 Jiri Pelikan, *The Secret Vysocany Congress of the Czech Communist Party* (New York, 1971).
 ——— 'The Struggle for Socialism in Czechoslovakia', in R. Blackburn (ed.), *Revolution and Class Struggle: a Reader in Marxist Politics* (London, 1977).
 Ota Sik, *Plan and Market Under Socialism* (White Plains and Prague, 1967).

Yugoslavia

- Phyllis Auty, *Tito: A Biography* (London, 1970).
 ——— *Yugoslavia* (London, 1965).
 I. Avakumovic, *History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Yugoslavia* (Aberdeen, 1964).
 R. Bicanc, *Economic Policy in Socialist Yugoslavia* (Cambridge, 1973).
 Stephen Clissold (ed.), *Yugoslavia and the Soviet Union: 1939—1973* (Oxford, 1976).
 Milovan Djilas, *The New Class* (London and New York, 1962).



- J. C. Fisher, *Yugoslavia : A Multi-national State* (San Francisco, 1966).
G. Hoffman and W. F. Neal, *Tito's Yugoslavia* (California, 1960).
A. Ross Johnson, *The Transformation of Communist Ideology : The Yugoslavia Case, 1945—1953* (Cambridge, Mass. , 1973).
Mihailo Markovic and Robert S. Cohen, *Yugoslavia : The Rise and Fall of Socialist Humanism* (Nottingham, 1975).
Gajo Petrovic, *Marx in the Mid-twentieth Century* (New York, 1967).
Svetozar Stojanovic, *Between Ideals and Reality : A Critique of Socialism and its Future* (London and New York, 1973).
J. B. Tito, *Selected Speeches and Articles* (Zagreb, 1963).
Adam B. Ulam, 'Titoism' in M. M. Drachkovitch (ed.), *Marxism in the Modern World* (Stanford, 1965).
W. Vucinic (ed.), *Contemporary Yugoslavia* (Berkeley, 1969).
S. Zukin, *Beyond Marx and Tito : Theory and Practice in Yugoslav Socialism* (Cambridge, 1975).

Western Europe

- Giorgio Amendola, 'The Italian Road to Socialism' (interview), *New Left Review*, 106 (1977).
Santiago Carillo, Regis Debray and Max Grallo, *Dialogue on Spain* (London, 1976).
Santiago Carillo, *Eurocommunism and the State* (London, 1977).
F. Claudin, *Eurocommunism and Socialism* (London and New York, 1978).
Paolo Flores d'Arcais and France Moretti, 'Paradoxes of the Italian Political Crisis', *New Left Review*, 96 (1976).
E. Hobsbawm and G. Napolitano, *The Italian Road to Socialism* (London, 1977).
Maria-Antonietta Macciocchi, *Letters from Inside the Italia Communist Party to Louis Althusser* (London, 1973).
Ernest Mandel, *From Stalinism to Eurocommunism* (London, 1978).
D. Plotke and C. Boggs (eds), *Eurocommunism* (Berkeley, 1979).
D. Sassoon (ed.), *The Italian Communists Speak for Themselves* (Nottingham, 1978).
G. Urban (ed.), *Eurocommunism* (London, 1978).

第三编

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 欧洲马克思主义

我们就必须努力去理解马克思主义理论自从它作为其（黑格尔）时代的必然产物，从德国唯心主义哲学中最初出现以来的每一个变化、发展和修正。更确切地说，我们应该力图弄清这些变化、发展和修正如何取决于历史—社会进程的总和，并成为这一进程的一般表现（马克思）。由此，我们就能够抓住马克思主义理论退化为庸俗马克思主义的真正根源。同时，我们也就能够看出，今天第三国际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们为恢复“马克思的真正学说”所作出的热情的、而又显然是“意识形态上”的努力，其意义之所在。

——卡尔·科尔施 (Karl Korsch):
《马克思主义和哲学》 (*Marxism and Philosophy*)



马克思以后的马克思主义





第十一章 卢卡奇

本编中所考察的卢卡奇（Lukács）、科尔施（Korsch）和葛兰西（Gramsci）等人的著作，都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引发的相对短暂的资本主义不稳定期写成的。随着 1914 年以前世界秩序的崩溃，以及在很大程度上由第二国际代表的自成体系的马克思主义的破产，马克思主义的一些主要概念，如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民主的性质、国家的职能和哲学的作用，都接受了根本上的重新表述。中欧（德国和从奥匈帝国瓦解后的废墟上崛起的民族国家）在这一变化中起了重要的作用。由于苏联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日益僵化，创造力的中心再度西移。卢卡奇的著作成了革命运动和曾领导过德国、奥地利和其故

乡匈牙利 1918—1919 年起义的共产党的理想蓝图。但蓝图在某种程度上是脱离实际的，因为上述革命在实践中已宣告失败，而卢卡奇是在社会政治真空中制定理论的。他本人在《历史和阶级意识》的序言中曾谈到，“我们许多人对革命的持续时间和发展速度所抱的希望是过分乐观的”^[1]。

卢卡奇 1885 年出生于布达佩斯一个富裕的犹太人家庭（他父亲曾任匈牙利最大的一家银行的董事）。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前，他一直在德国和奥匈帝国的一些大学里学习和写作。1918 年，他参加了共产党。1919 年，他在短命的匈牙利苏维埃政权中出任教育部长。该政权失败后，卢卡奇移居维也纳，在那里写了许多文章，其中多数文章都收集在他最重要的著作——《历史和阶级意识》中。1929 年他迁居莫斯科。

卢卡奇认识到德国古典哲学对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性，这是一种难能可贵的立场。在 1914 年以前的那些年里，他就完全投入到围绕下述主题所展开的论辩中：新康德学派的衰亡、现象学的兴起，以及直觉主义和浪漫主义倾向日益增长的影响。所有这些思潮都是反对自然科学方法论所占据的主导地位的。^[2]这种世界观深受狄尔泰（Dilthey）的影响，它把历史研究置于中心地位：

研究历史能揭示出人的本质，就像它从总体的人类经验中逐渐表露出来的那样，而历史学家只要通过自己的头脑再现前人用以确立自身的那些思想和活动，便能进入过去几代人的生命中。人文科学（*Geisteswissenschaft*）与人生哲学（*Lebensphilosophie*），即“精神科学”与“生命哲学”，就是为了超经验地看待活生生的世界历史总体而进行不懈探索的两个方面。^[3]

卢卡奇把他那个时代的问题概念化的过程中，所使用的主要工具之一是黑格尔的哲学。在马克思主义思想家中，卢卡奇是认真评价黑格尔在马克思思想形成中的作用的第一人——也许拉布里奥拉（Labriola）可与他相比（但这种可能性很小）；他还重新恢复了马克思主义的黑格尔维度（在《现象学》中，恰如在《逻辑学》中那样）。同样，卢卡奇曾惊人地预见到，1930 年前后《经济学哲学手稿》的发表将会给马克思的思想投下新的光辉。就像青年马克思一样，卢卡奇是通过黑格尔走向马克思主义的。这条路径终于使卢卡奇既反对社会主义工会领袖们 20 年前推行的“经济主义”理论设想，

也反对以前许多马克思主义哲学家的科学主义倾向中对那么明显的自然必然性的强调。他批判了自然辩证法的概念及认识的反映论^[4]，并指责《反杜林论》对辩证法缺乏了解：

恩格斯甚至没有提到最重要的相互作用，即历史过程中主体和客体的辩证关系，更不用说给这种辩证关系以应有的突出地位。然而，没有这个要素，辩证法就不再是革命的——尽管试图（但最终定会是虚妄之举）保留“流变”的概念。因为这意味着没有认识到，在一切形而上学中，客体仍然是未被感触到的、未改变的，因此思想仍然是直观的、不实用的；对辩证法说来，核心的问题是改变现实。^[5]

《历史和阶级意识》的全部的中心概念——物化、主体和客体的辩证，以及整体性——都植根于黑格尔。这本书的主要论题，就是书名中的“历史”和“阶级意识”这两个词，事实上两者完全是一回事。在探讨阶级意识时，卢卡奇是从马克思止步不前的地方出发的。众所周知，马克思对阶级的阐述是不完整的。不过，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的一段名言中区分了客观因素（对生产资料的一般关系）和主观因素（利益分享的意识等）。^[6]卢卡奇超越无产阶级实际的主观意识，而讨论“被赋予的”阶级意识，即一个阶级在充分意识到自身的利益后必定会拥有的意识。卢卡奇认为，这种阶级意识“在心理学上没有实在性”^[7]。他在关键的一节中写道：

把意识与整个社会联系起来，就能推论出人们在某一特定情况下所应有的思想和感情，只要他们能够估价到该特定情况，以及在此情况下生发的利益，就能由此影响到他们直接的行动和整个社会结构。这也就是说，有可能推论出符合他们客观情况的思想 and 感情。在任何社会，此类情况都不是无限量的。尽管大量细致的研究工作能够使社会的类型搞得很细，但能明确区分的基本类型通常则只有若干个，其特性取决于生产过程中占有地位的类型。因而，阶级意识总是由下述事实形成的，即生产过程中某一特定的典型地位往往“被赋予”相应的理性反应。所以，这种意识既不是组成阶级的单纯个人的思想或感情的总和，也不是其平均数。然而归根到底，整个阶级的富有历史意义的行动则取决于阶级的意识，而不是取决于个人的思想——只有参照这种意识，才能理解

这些行动。^[8]

从历史的角度看，卢卡奇对400多年来阶级意识的发展和局限性作了精辟的阐述。他认为，阶级意识本身只能随着工业革命出现，因为只有那时，阶级才变成民族的实体，阶级意识才由于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两极分化而变得“更纯”——尽管发达资本主义社会日益加剧的变动性和复杂性明显地给最终的阶级概念的界定造成一些困难。卢卡奇深信，在他进行写作的当时，强调意识是至关重要的，因为那时世界革命的客观条件既已成熟，世界革命的成功便依赖于无产阶级意识这一无形的因素：

需要一种新的因素，即无产阶级的意识必须变成行动。但是，当单纯的矛盾已提升为一种有意识的辩证的矛盾，当成为有意识的行动转变为实践中的过渡点，我们便再一次更具体地把无产阶级辩证法的特征，如同我们经常所描绘的那样：在这里，既然意识不是对某种对立的客体的认识，而是客体的自我意识，那么意识的行动便推翻客体的客观形式。^[9]

在这本著作1967年版“序言”中，卢卡奇说，他关于实际的阶级意识和被赋予的阶级意识之间的区别，与列宁在《怎么办？》中对工联主义的意识和“从外面”灌输的社会主义意识的区分是一致的。^[10]同时，按照卢卡奇的说法，“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及其对历史使命的自觉的体现者”^[11]是党。

卢卡奇深信，一种发达的阶级意识能使无产阶级既成为历史的客体，又成为历史的主体：

只有当无产阶级的意识能够指出推动历史辩证法客观地前进、但又不可能使之在孤立无援的情况下前进的必由之路时，无产阶级的意识才能领悟到这一过程；也只有那时，无产阶级才能成为同一个历史主体和客体，他们的实践才能改变现实。^[12]

在一篇详尽的长篇分析中，卢卡奇试图论证以往的思想由于把主观和客观完全分裂开来，因而不能正确地理解世界。^[13]只是有了黑格尔才克服了这种分裂——尽管是以一种唯心主义的方式。无产阶级是把主体和客体联系起



来的惟一的阶级，在其主观思想中（至少在其“被赋予的”意识中），它表达出其客观地在历史上的所作所为。这种主体和客体之间历史性的相互作用，被卢卡奇当做辩证法的基本形式：

具有头等重要意义的是，要认识到，这种方法在这里只限于历史和社会的领域。恩格斯在解释辩证法时所产生的错误理解，基本上可以归因于这样的事实：恩格斯受黑格尔的错误指引，把这种方法扩展应用于自然界。可是，辩证法的最关键的决定性因素，即主体与客体的相互作用、理论与实践相统一，以及这些范畴所立足的、作为思想变化根源的、现实的历史性变化等等，在我们对自然界的认识中，是不存在的。^[14]

在这段话的上下文中，卢卡奇几次引用了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对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的论述。同马克思一样，卢卡奇也认为，实践是思想和现实的具体结合。

先前，卢卡奇曾广为使用“物化”（reification）这一术语，来表示那种妨碍人们对世界进行了解的现象。他显然是从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商品拜物教的下述分析出发的：人们之间的社会关系（既是主观地，也是客观地）转变为商品之间的关系。物的世界正通过似乎不受人支配的客观规律统治着人们。人变成了客体，变成了成就其生活过程的消极旁观者。卢卡奇从经济上的劳动分工出发，探索了国家和现代官僚机构中的这一物化发展过程（在这里，他借用了马克斯·韦伯的“合理性”概念）。

与“物化”概念相联系的是“整体性”（totality）概念。物化的结果之一是“整体的每一个形象的消灭”^[15]。劳动的专门化和社会的普遍分裂，意味着人及其周围的世界被视为抽象的、分立的、没有内在联系的单个实体。资产阶级必然这样地看待事物，因为这一观点对他们的生活方式是必要的。直到现在，物化过程的核心动力一直是客观性的普遍存在性，即在物化了的世界里不存在主体。可是，资本在社会中的演变现已到达了如此地步，以致无产阶级可以消灭物化而成为历史进程的主体。资产阶级片面而静止的观点绝不可能达到对社会的认识：

只有在这种情况下，即把社会生活中孤立的事实视为历史过程的各

个方面，并把这些孤立的事实归结为一个“整体”，对事实的认识才有望变成对**现实**的认识。^[16]

在这一点上，卢卡奇坚持认为：

构成马克思主义与资产阶级思想的决定性分歧的，不是经济动机在阐述历史时的首要性，而是关于整体性的观点。整体性范畴，即整体无处不高于局部的普遍优越性，是马克思承袭黑格尔的方法的精髓。……**整体性范畴的这种首要地位是科学中革命原则的体现者。**^[17]

后来，他又说：

现实只有作为一个整体才能被了解透彻，而一个主体只有当它本身也是一个整体时，才能有这样透彻的洞察力……**只有阶级能够积极地洞察社会现实，并将其作为整体来加以改造。**因为这个缘故，从阶级立场提出的“批判”就是从整体观点提出的批判，所以它能够达到理论与实践的辩证统一。在这种辩证的统一中，它既是历史辩证过程的原因，也是其结果，既是其反映，也是其动力。作为社会中思想之主体的无产阶级，一下子就打破了这种无可作为的困境，这种困境是带有宿命论色彩的纯法则造成的，也是纯主观性的伦理学造成的。^[18]

这样，卢卡奇为何极其重视正确的方法论的原因也就很清楚了。的确，他多少有点不顾自己曾强调过概念的整体性和易变性，而提出在马克思的命题和他的方法之间存在着一种严格的两分法：

为讨论起见，让我们假定，新近的研究永久性地否定了马克思个人的每一个命题。即使这个假定得到了证实，每一个严肃的“正统”马克思主义者仍然能够无保留地接受所有这些现代的研究成果，从而完全放弃马克思的全部命题——但一刻也无须放弃他的正统……正统是专指方法而言。^[19]

在卢卡奇看来，任何当代问题，包括战争、危机和苏俄的经济问题，没

有什么不能仅凭辩证法而予以解决的。

我们已经指出，卢卡奇这本书的历史背景是1917年十月革命，可以说他的著作是把这次革命理想化的理论。卢卡奇确实谈到过列宁对他的决定性影响；只要无产阶级的意识是被赋予的而不是实在的，就存在一种诱惑力，即从革命知识分子的某位精英身上找到他所体现的阶级意识。但总的说来，卢卡奇相信，无产阶级意识会有机地增长，相信无产阶级面对列宁主义的党易沾染的官僚主义倾向时，有能力控制其领袖，就此而言，他更接近于卢森堡或托洛茨基。

卢卡奇的这本书遭到来自共产党内部的反对，是不足为奇的。从哲理上说，该书带有左派黑格尔主义的色彩，拒绝了苏联据以解释世界的较为质朴的唯物论。确实，它把这种唯物论描述为“头脚倒置的柏拉图主义”和“资产阶级革命的观念形态”^[20]。布尔什维克致力于按照自己的模式来改造欧洲各国的共产党，因而俄国以外每每出现一位显然具有独创精神的大理论家，都会令他们感到不安。卢卡奇热中于罗莎·卢森堡和工人委员会，这就在一定程度上支持了工联主义倾向，而工联主义恰恰是为使西方共产党布尔什维克化所作努力的主要障碍。1924年的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谴责了卢卡奇的这本书。卢卡奇发表了一篇后来称为不严肃的自我批判。但在1967年，他为《历史和阶级意识》再版所写的长篇序言中说，他的那本书是“革命救世主主义”的典型^[21]，“对当前关于马克思主义的本真性的争论，没有切中要害的价值”^[22]。他认为那本书的主要错误是缩小了经济学的基础，这是由于没有把劳动的概念视为人与自然界的中介，否定了自然界在本体论上的客观性。这就导致了黑格尔式的异化和客体化的等同。这些命题直到临终前他一直在撰写的《本体论》这部大部头著作中仍然出现。

在20世纪20年代，卢卡奇出版了一部论述列宁的短篇著作，强调了列宁方法论中的辩证法要素。他也批判了布哈林的机械社会学——尽管他在20年代后期与布哈林具有共同的政治立场。然而，随着斯大林统治的巩固，卢卡奇转到不太引起争议的问题上去了——主要从事于文艺批评。他进一步发展了恩格斯对现实主义与自然主义的对比，颂扬由莎士比亚、巴尔扎克和司各特（Scott）所代表的现实主义，认为他们力图把客观世界及其主观感受统一起来；而以左拉（Zola）为主要代表的自然主义者，则仅仅反映了他们的环境，没有达到完美的主、客观的统一。卢卡奇致力于对批判的现实主

义和理性的人道主义的阐述，认为它们在德国古典文学（歌德）中便得到体现，而到他同时代由托马斯·曼（Thomas Mann）保持下来。他把这些作家的观点与后来出现的反理性主义的浪漫倾向作了尖锐的对比，后者存在于各种颓废的资产阶级现代主义形式之中。在这一领域内，卢卡奇的《美学》是他的著述的顶点。在《美学》中，他试图在他视为颓废的西方主观唯心主义与过分简单化的苏联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之间保持中间立场。他追随黑格尔和早期的马克思，把艺术描绘为一种人性化的过程，即反映和表现人的本性和人类的一致性。^[23]

卢卡奇由于过分强调意识——无产阶级不是他自身的创造者，而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产物——而受到批判。除了那种认为党是唯一有能力体现无产阶级被赋予的意识的极左观点外，卢卡奇并没有提供出无产阶级怎样发展自己的意识的理论。^[24]当然，虽然卢卡奇在后半生向莫斯科妥协了，但他的著作仍然是独创性的。他重新让人们提起了对马克思主义中的黑格尔因素的兴趣，而他所阐明的“异化”、“物化”、“整体性”等概念，为后来对资产阶级文化的马克思主义批判奠定了基础。

〔注释〕

[1] G. Lukács, Preface to 1967 edition, *History and Class Consciousness* (London, 1971) p. xLi.

[2] 进一步参见 H. Stuart Hughes, *Consciousness and Society* (London, 1959) ch. 2.

[3] G. Lichtheim, *Lukács*, (London, 1970) p. 27.

[4] 参见 G. Lukács, *History and Class Consciousness*, p. 200.

[5] Ibid., p. 3.

[6] 参见 B. Ollman, 'Marx's use of "Class"',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Mar, 1968)。卢卡奇的观点就暗含在马克思那里，对此有争议的看法，请参见 I. Meszaros, 'Contingent and Necessary Class Consciousness', in *Aspects of History and Class Consciousness*, ed. I. Meszaros (London, 1971) p. 94.

[7] G. Lukács, *History and Class Consciousness*, p. 75.

[8] Ibid., p. 51.

[9] Ibid., p. 178.

[10] G. Lukács, Preface to 1967 edition, *History and Class Consciousness* (London, 1971) p. xviii.



[11] Ibid., p. 41.

[12] Ibid., p. 197.

[13] Ibid., pp. 110ff.

[14] Ibid., p. 24.

[15] Ibid., p. 103.

[16] Ibid., p. 8.

[17] Ibid., p. 27.

[18] Ibid., p. 39.

[19] Ibid., p. 1.

[20] Ibid., pp. 202, 222.

[21] G. Lukács, Preface to 1967 edition, *History and Class Consciousness*, p. xiv.

[22] Ibid., p. ix.

[23] 进一步参见 G. Lichtheim, *Lukács*, ch. 8.

[24] 比方说, 参见 A. Callinicos, *Althusser's Marxism* (London, 1976) pp. 26ff; L. Colletti, *Marxism and Hegel* (London, 1972) pp. 175ff.

深入阅读材料

原著

卢卡奇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最重要的贡献无疑是《历史与阶级意识》，尤其是其中论“物化”的那篇长篇论文。他早期重要的论文都收集在《政治学文集》中，另可参见他的短篇著作《列宁》。同政治没有直接关联的哲学著作，请见《青年黑格尔》，该书最大限度地弱化宗教对黑格尔早期思想的影响；其次，最近有译本《本体论：黑格尔》与《本体论：马克思》。卢卡奇最好的文学批评收集在他的《小说理论》和《论欧洲的现实主义》内，还可见于他最早期的著作——《精神及其形式》。最后，还有一部有价值的选集，那就是卡达基（Kadarky）的《卢卡奇读本》。

评论

最通俗的介绍性作品是帕金森（Parkinson）的《卢卡奇》，连同他所编的论文集。利希特海姆（Lichtheim）的短篇著作容量大、晦涩难读，但富有洞见。最好的全面阐述或许是卢伊（Lowy）的《格奥尔格·卢卡奇——从唯心主义到布尔什维主义》，尽管该书内容大多局限在20世纪30年代以前。梅萨罗斯（Meszaros）的文集《历史和阶级意识面面观》很有价值，而他的《卢卡奇的辩证法概念》附有一个精当的参考文献。梅萨罗斯是卢卡奇的一个学生，他致力于对老师做深入细致的研究。就卢卡奇的早期，斯特德曼—琼斯（Stedman-Jones）的文章立论充分、批判有力。齐陶（Zitta）的研究极有特

色。关于作为一个文学批评家的卢卡奇,见詹姆逊 (Jameson) 的《马克思主义与形式》的第三章。卢卡奇晚年的哲学在沙法伊 (Shafai) 的《格奥尔格·卢卡奇的本体论》中得到了阐述,而他的哲学起步在康登 (Congdon) 的《早年卢卡奇》中有说明。最完整的传记是卡达基的《格奥尔格·卢卡奇;生平、思想与政治》。

参考文献

Texts

- George Lukács, *Conversations with Lukács*, ed. T. Pinkus (London, 1973).
——*The Destruction of Reason* (London, 1974).
——*Essays on Thomas Mann* (London, 1964).
—— ‘Existentialism or Marxism?’ in R. W. Sellars and M. Farber (eds), *Philosophy for the Future* (New York, 1949) and George Novack (ed.), *Existentialism Versus Marxism* (New York, 1966).
——*Goethe and His Age* (London, 1968).
——*The Historical Novel* (London, 1962).
——*History and Class Consciousness* (London, 1971).
——*Lenin: A Study of the Unity of his Thought* (London, 1970).
——*The Lukács Reader*, ed. A. Kadarky (Oxford, 1995).
——*Marxism and Human Liberation*, ed. E. San Juan (New York, 1973).
——*The Meaning of Contemporary Realism* (London, 1963).
——*Ontology: Hegel, Hegel's False and His Genuine Ontology* (London, 1977).
——*Ontology: Marx, Marx's Basic Ontological Principles* (London, 1977).
——*Political Writings, 1919—1929: The Question of Parliamentarism and Other Essays* (London, 1972).
——*Solzhenitsyn* (London, 1970).
——*The Soul and the Forms* (London, 1973).
——*Studies in European Realism* (London, 1950).
——*The Theory of the Novel: A Historico-Philosophical Essay on the Forms of Great Epic Literature* (London, 1971).
——*Writer and Critic and Other Essays* (London, 1970).
——*The Young Hegel* (London, 1975).

Commentaries



Lee Congdon, *The Young Lukács* (Chapel Hill, 1983).

Andrew Feenberg, *Lukács, Marx and the Sources of Critical Social Theory* (New York, 1986).

Mary Gluck, *Lukács and His Generation 1900—1918* (Cambridge, 1985).

Lucien Goldmann, *Lukács and Heidegger: Towards a New Philosophy* (London, 1978).

F. Jameson, *Marxism and Form* (Princeton, N. J., 1971).

Agnes Heller, *Lukács Revalued* (Oxford, 1983).

Arpad Kadarky, *Georg Lukács: Life, Thought and Politics* (Oxford, 1991).

George Lichtheim, *Lukács* (London, 1970).

Michael Lowy, *Georg Lukács: From Idealism to Bolshevism* (London, 1979).

Istvan Meszaros (ed.), *Aspects of History and Class Consciousness* (London, 1971).

——— *Lukács' Concept of Dialectic* (London, 197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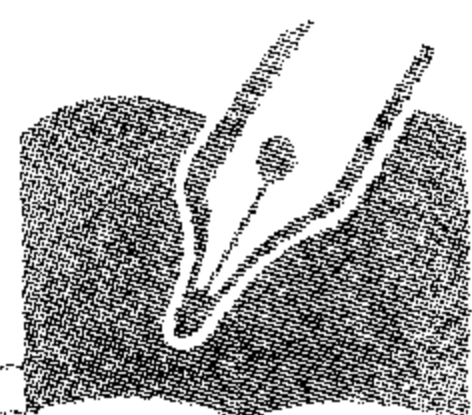
G. Parkinson, *Georg Lukács* (London, 1977).

——— (ed.), *Georg Lukács: The Man, his Work and his Ideas* (London, 1970).

Fariborz Shafai, *The Ontology of Georg Lukács: Studies in Materialist Dialectics* (Aldershot, 1996).

G. Stedman Jones, 'The Marxism of the Early Lukács: an Evaluation', *New Left Review*, 70 (1971), and *New Left Review* (eds), *Western Marxism: A Critical Reader* (London, 1977).

Victor zitta, *Georg Lukács' Marxism: Alienation, Dialectics, Revolution: A Study in Utopia and Ideology* (The Hague, 1964).



马克思主义研究译丛

第十二章 科尔施

卢卡奇著作中提出的许多命题在卡尔·科尔施 (Karl Korsch) 的著作中也得到了表述。科尔施是汉堡一个银行家的儿子。他曾研究过法律，1917 年参加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1920 年加入德国共产党。像卢卡奇一样，他的著述深受其在 1918—1923 年动乱年代经历的影响，并着重于理论问题。科尔施相信，1918—1919 年的革命是由于社会心理原因而失败的，并试图把马克思本人的思想应用于马克思主义，以理解马克思主义理论以往的演进。科尔施的主要著作是《马克思主义和哲学》，它出版于 1923 年。这本书所激起的反对，甚至比卢卡奇的著作更为强烈。他在该书的跋中写道：“就我所能确立的命



题而言，感到荣幸的是，我与这位作者（卢卡奇）基本一致，他的命题在许多方面与本书所提出的问题有关，虽然这种关系是建立在哲学基础之上。”^[1]科尔施是德国共产党最著名的成员之一，曾在图林根政府里短时期地当过部长。在20世纪20年代中期，他是德国共产党内极左派的成员。该派反对苏联官方新经济政策的路线，反对西欧资本主义已巩固的论调。1926年，科尔施被开除出党；1933年，他不得不逃出德国，移居美国，继续从事理论著述。

在《马克思主义和哲学》中，科尔施所关注的主要问题是哲学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中的作用。科尔施专注于恢复马克思主义中的黑格尔因素，虽然他不像卢卡奇那样直率明朗地去做。他把他那本书的主要观点概括如下：

我们已经讲过，马克思和恩格斯本人总是否认科学社会主义不再是一种哲学的论调。但是，我们可以雄辩地、有根有据地、轻而易举地表明，马克思和恩格斯这两位革命辩证法家所说的哲学的对立物，与后来的庸俗马克思主义所说的哲学的对立物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他们二人的主张远不是超越阶级差别的、无偏见的纯理论研究……如果正确理解的话，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科学社会主义与资产阶级社会的纯科学（经济学、历史学或社会学）的区别，远远超出它与哲学的区别，而作为第三等级的革命运动在哲学中曾一度得到最高的理论表述。^[2]

然而，资产阶级哲学史学家们却未能领悟到，德国古典唯心主义在科学社会主义中依然存在。他们同第二国际著名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家都认为，马克思主义主要是经济学，因此抹杀了赋予马克思主义以生命的哲学因素。在这一方面下，科尔施比卢卡奇更猛烈地批评了恩格斯。^[3]科尔施的目的是，“把马克思的辩证唯物主义原理运用于马克思主义的整个历史”^[4]。在这样做的时候，他把马克思主义划分为三个阶段：从起源到1848年、从1848年到19世纪末以及20世纪阶段。在第一个阶段，马克思和恩格斯创造了他们的“作为一个活的整体来理解和实践的社会发展理论”^[5]。第二个阶段以他们的后期著作为标志，他们从思想整体中分化出了各种不同的成分——经济的、政治的、科学的等。科尔施倾向于运用马克思的早期著作，他引用《德意志意识形态》或《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比引用《共产党宣言》或《政治经济学批判》要多得多。在他看来，后者是“以非常片面的方式表述唯物主

义的原理”^[6]。然而，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追随者们却是如此：

尽管全都公开宣称在理论上和方法论上忠于历史唯物主义，实际上却把社会革命理论搞得支离破碎……后来的马克思主义者越来越多地把科学社会主义看作一套纯粹的科学见解，而与阶级斗争的政治或其他的实践没有任何直接的联系……作为一个统一整体的关于社会革命的一般性理论，变成了对资产阶级经济秩序的批判、对资产阶级国家的批判、对资产阶级教育制度的批判，以及对资产阶级的宗教、艺术、科学和文化的批判。^[7]

科尔施引证的例子是希法亭。在他看来，希法亭的经济学似乎没有任何实际的政治洞察力。但是科尔施把他的批判扩大到了整个第二国际的理论：

这个时期所谓正统马克思主义（现在仅是一种庸俗的马克思主义）的主要表现为：那些背上传统包袱的理论家们，力图使形成为马克思主义最初形态的社会革命理论保持纯理论的形式。这种理论是完全抽象的，没有任何实际的效应——它只不过力图抵制新改良主义理论，在新改良主义理论中，历史运动的真实性在当时被作了非马克思主义的表述。这正是新革命时期中，恰恰是第二国际的正统马克思主义者必然完全不能解决诸如国家和无产阶级革命之间的关系这类问题的原因。^[8]

第三阶段是以罗莎·卢森堡或列宁这样一些思想家为代表的。他们复活了原初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例如在《国家与革命》中）。科尔施注意到了“在马克思主义与哲学和马克思主义与国家这两个问题之间特有的类似之处”^[9]。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观点来看，废除国家是同他们克服和取代哲学的意愿相对应的。相反，保持国家和哲学二者作为独立的领域而继续存在则是第二国际理论家们所特有的。

总的来说，科尔施同卢卡奇一样断言，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成为唯物论者之前就已是辩证论者了；无产阶级在意识形态领域内肩负着有待完成的重大使命。对辩证法和整体性的强调再次确认了思想意识的重要性，并且产生了

支持工人委员会的相应的政治行动。

[注释]

- [1] K. Korsch, *Marxismus und Philosophie* (Leipzig, 1923) p. 71.
 [2] K. Korsch, *Marxism and Philosophy* (London, 1970) p. 61f.
 [3] Cf. K. Korsch, *op. cit.*, pp. 46f.
 [4] *Ibid.*, p. 51.
 [5] *Ibid.*, p. 54.
 [6] *Ibid.*, p. 67.
 [7] *Ibid.*, pp. 54ff.
 [8] *Ibid.*, p. 58.
 [9] *Ibid.*, p. 48.

深入阅读材料

原著

科尔施的主要著作《马克思主义与哲学》已有英文版。由凯尔纳 (Kellner) 所编的科尔施论文集提供了更为广泛的视角。

评论

见哈利迪 (Halliday) 为《马克思主义与哲学》的英译本写的导言。另外, 更好一点的材料是凯尔纳为他编的论文集所写的导言。有关全面的评论, 参见古德 (Goode) 写的学术传记。

参考文献

Texts

- D. Kellner (ed.), *Karl Korsch: Revolutionary Theory* (Austin, Texas, 1977).
 Karl Korsch, *Karl Marx* (London, 1938)
 ——*Marxism and Philosophy*, ed. F. Halliday (London, 1970).
 ——*Three Essays on Marxism* (London, 1971).

Commentaries

P. Goode, *Karl Korsch : A Study in Western Marxism* (London, 1979).

Hedda Korsch, 'Memories of Karl Korsch', *New Left Review*, 76 (1972).

Paul Mattick, 'The Marxism of Karl Korsch', *Survey: A Journal of Soviet and East European Studies*, 53 (1964).

Telos, vol. 26 (1975). (Devoted to articles on Korsch.)



第十三章 委员会共产主义

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在意识形态上对苏联列宁主义发动的最全面挑战，集中来自逐渐以“委员会共产主义”（Council Communism）著称的思想。从1917—1923年始，当时的工人委员会或苏维埃在革命斗争中表现突出，这些思想家从中获得了鼓舞。他们放弃了议会制或工会可以作为无产阶级解放的工具这一思想。但随着俄国革命的不断发展，他们对一党制观念——尤其是根据列宁主义路线的——日益感到怀疑，并最终认定，苏维埃政权是资产阶级统治的另一类变种。

卢卡奇和科尔施二人都是工人委员会的倡导者，虽然卢卡奇的相关言论只局限于《历史和阶级意识》一书中。在该书中，他写道：

无产阶级的每一次革命都以一种日益激进和自觉的方式缔造了工人委员会。当这一斗争武器威力扩大到足以成为国家机构时，这种迹象就表明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将能够克服其领袖们的资产阶级观点了。革命的工人委员会（不可让机会主义对它的歪曲描述混淆视听）是无产阶级意识一开始就一直努力创造的形式之一。它存在下来并不断发展这一事实表明，无产阶级开始有了自己的觉悟，从而踏上了胜利的门槛。工人委员会宣告物化在政治上和经济上破产了。在实行专政以后的时期，它将消除资产阶级立法、行政和司法的三权分立。在进行管理的斗争中，工人委员会的使命具有双重性：一方面，它必须在时间和空间上克服无产阶级的分裂；另一方面，它必须把经济和政治统一起来，化为真正一体化的无产阶级实践。^[1]

委员会共产主义者自认为他们已经回到马克思那里了，因为他们断言无产阶级是历史上第一个能够获得自我解放的阶级。资本主义生产过程需要一支专业化的和组织良好的工人大军，从而也武装了无产阶级，使它有能力和成就为历史变革的倡导者。由于接受了无政府工联主义观点，他们也在某种程度上越出了马克思，认为不需要经过过渡性质的国家就可以达到共产主义。这些观点的先驱是罗莎·卢森堡^[2]，以及奥地利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斯·阿德勒（Max Adler），还有被列宁称为“经济主义者”的阿基莫夫（Akimov）那样的早期俄国马克思主义者。^[3]所有的委员会共产主义者都从1917年革命的苏维埃经验中获得最大的鼓舞，因为对他们来说，苏维埃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开始。在俄国的苏维埃归附于党和国家之后，通过对比第二国际和第三国际的政治理论，特别是基于他们否定了无产阶级有可能自己获得革命的阶级意识，委员会共产主义者对布尔什维主义进行了全面的批判。委员会共产主义者还认为，法西斯主义的崛起在某种程度上是由布尔什维克促成的，因为布尔什维克的行动方式不仅难以与法西斯主义区别开来，而且他们剥夺了工人阶级自主行动的能力，从而削弱了工人阶级抗击法西斯主义的力量。

最重要的委员会共产主义者是荷兰天文学教授安东尼·潘涅库克（Anton Pannekoek）。由于倡导群众罢工和通过斗争提高觉悟的理论，他在1914年以前的荷兰和德国党左派中赫赫有名。潘涅库克虽然不是一位经济学家，但他在1917年以前，还是用了很多时间来抨击那些在经济理论上似

乎没有给工人阶级的首创精神留下余地的马克思主义者。他批评了希法亭和奥托·鲍威尔，因为他们宣扬资本主义有无限扩张的能力。他也批评了罗莎·卢森堡，因为她对资本主义崩溃持过于“自动的”观点。20世纪20年代重新掀起了一场关于马克思的资本再生产和一般积累的模式争论，当时亨利克·格罗斯曼（Henryk Grossmann）把强调的重心转向生产领域而不是流通领域，并声称利润率下降将导致积累的枯竭。^[4]潘涅库克也反对这些观点，因为这些观点把工人描绘为只能对他们不能控制的经济力量作出反应。与这些经济上的观点相并立的是潘涅库克自己的观点，他认为，他称之为考茨基的“消极的激进主义”仅仅旨在于为无产阶级夺取国家政权，而“无产阶级的斗争不单纯是一场以夺取国家政权为目标的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恰恰相反，它是一场反对国家政权的斗争”。所以无产阶级的革命是“通过无产阶级的权力工具来消灭和粉碎国家政权的工具”^[5]。

潘涅库克深信工人阶级自身具有改变处境的潜力。这种信念受到了荷兰、比利时、德国和俄国群众罢工的鼓舞。他相信，同工人阶级的这些自发的自我组织形式相比较，议会活动和工会官僚体制就变得微不足道了，而且实际上还会引入歧途。所以他对1917年俄国的苏维埃深有感触，并像卢森堡一样表示了批判性的认可。而当布尔什维克倡导工人阶级在西方通过议会和工会进行活动时，他很快就感到理想幻灭了，因为潘涅库克至此已终于把这两种机构都看成是地道的反革命。布尔什维克政权在最初困难的几年里明显地希望从当时西方的工人组织那里得到支持，对此，他并不抱同情态度。^[6]在潘涅库克看来，布尔什维克政府已演变成了一种对社会的专政，而这个专政离开了国家便行不通。这主要是由于俄国经济不发达的缘故，所以潘涅库克修正了他早期的观点，即第三世界可以按俄国的模式解放自己，而认为社会主义只能在工业发达的西方实现。东西方的工人阶级早就错误地把社会主义同公有制或国有化搞混了；由于他们比资产阶级更因循守旧，要他们抛弃所承袭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则更为缓慢，因此他们处于不利的地位。在潘涅库克看来，社会主义本身并不是一门科学，不是一种引向社会主义的理论，而仅仅是工人阶级现实运动的表达。同样，工会、政党和国家概念基本上是与资本主义联系在一起，并将随之一同消失。工人阶级的自我解放绝对需要新的组织形式，这种形式不允许把工人阶级的活动与他们对社会生活和思想各个领域的管理分裂开来。潘涅库克认为，重要的是，只要工人阶级是在革命形势下被迫起来捍卫自己的利益而反对资本的利益的时，他们的组织

就该采取工人委员会的形式。他甚至勾勒出了一幅共产主义社会的蓝图，在那里，将没有政府，只有一种以工厂委员会为其管理基础的委员会分级制：

这些委员会不是政府，甚至最高一级委员会也没有政府的性质。它们不拥有任何把它们愿望强加给群众的手段，它们没有权力机构。^[7]

这些委员会将组建一个首先是按劳而分配的社会，再达到这样的阶段：社会消费超过个人消费，自由分享将确保《哥达纲领批判》中“各尽所能，按需分配”这一著名口号的实现。

潘涅库克的观点得到了荷兰同胞海尔曼·戈尔特（Hermann Gorter）的支持。他是名诗人，于1926年创立了一个反布尔什维克的共产党。戈尔特反对列宁，认为俄国的经验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不一定适用。在西欧，工人阶级必然成为生产的中心，有自我组织的能力，而农民则是反动的。这意味着无产阶级群众应该是关注的中心，而党却是次要的，工会和党的进步作用已经过时。潘涅库克这样写道：

工会和政党这些旧的组织形式，与委员会（苏维埃）这种形式，在社会发展中属于不同的阶段，有不同的作用。前者必须在资本主义内部争取工人阶级在其他阶级中的地位，属于资本主义的扩张时期。后者必须为工人赢得统治，摧毁资本主义，结束阶级分化，属于资本主义的衰落时期。^[8]

威廉·赖希（Wilhelm Reich）的著作进一步强调，要在日常生活的一切领域中提高阶级意识。他强调有必要把无产阶级从一切生活领域——尤其从性领域——的压抑下解放出来。不同于大多数委员会共产主义者，赖希把希望寄托在妇女和青年身上。这些人比社会上其他人受压抑更深，因而更有机会看透这种压抑的机制。像其他委员会共产主义者一样，赖希也认为，布尔什维主义由于强化了党和工会的集权主义体制，为法西斯主义铺平了道路。^[9]

委员会共产主义者的上述观点取决于无产阶级对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出现的政治挑战自发地作出反应的能力。事实上，他们的思想在工人中并没有引起什么反响，所以到20世纪30年代后期，他们（例如潘涅库克、科

尔施、赖希) 中的大部分人的著作变得愈来愈抽象, 愈来愈脱离当时工人阶级的直接斗争。

[注释]

[1] G. Lukács, *History and Class Consciousness* (London, 1971) p. 80.

[2] 比方说, 见 ‘Organization Questions of Russian Social Democracy’, *Selected Political Writings*, ed. D. Howard (London and New York, 1971) pp. 283 ff.

[3] 进一步参见 *Vladimir Akimov and the Dilemmas of Russian Marxism*, ed. J. Frankel (Cambridge, 1969)。

[4] 参见 H. Grossmann, *Das Akkumulations-und Zusammenbruchsgesetz des Kapitalistischen Systems* (Leipzig, 1929)。

[5] A. Pannekoek, ‘Massenstreik und Aktion’, *Die Neue Zeit*, vol. 30, p. 544.

[6] 见列宁的回应, 载于 *Left-Wing Communism-an Infantile Disorder*, *Collected Works*, vol. 31, pp. 21ff.

[7] A. Pannekoek, *Workers' Councils* (Melbourne, 1950) p. 52.

[8] A. Pannekoek, ‘General Remarks on the Question of Organization’, *Living Marxism*, vol. 4, p. 148.

[9] 进一步参见 Reich: C. Rycroft, *Reich* (New York, 1971) chs 3 and 4.

深入阅读材料

主要人物外的其他人, 有关他们的英文著述很少。斯马特 (Smart) 的文集对基本原著作了很好的选录。马蒂克 (Mattick) 最近有一本期待已久的著作问世。潘涅库克的《哲学家列宁》最近再版了英文本。

参考文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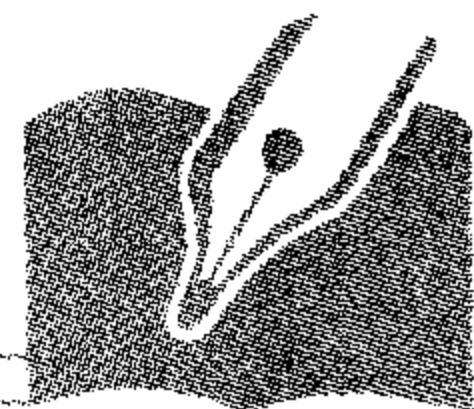
S. Bricianer (ed.), *Pannekoek and the Workers' Councils* (St Louis, Miss., 1978).

Paul Mattick, *Anti-Bolshevik Communism* (London, 1977).

Anton Pannekoek, *Lenin as Philosopher* (New York, 1948).

——*The Way to Workers' Control* (London, 1957).

D. A. Smart (ed.), *Pannekoek and Gorter's Marxism* (London, 1978).



马克思主义研究译丛

第十四章 葛 兰 西

引 言

安东尼奥·葛兰西（Antonio Gramsci, 1891—1937年）所关注的许多问题与委员会共产主义者是相同的。同他们一样，葛兰西深信革命运动必须从劳动群众的日常生活着手。换言之，他和卢卡奇一样强调整体性概念。与第二国际宿命论的马克思主义形成鲜明对照的是，葛兰西恢复了马克思主义思想中主观的、具有创造性的方面。作为一位坚贞不渝的革命家，他反复强调马克思主义各重政治因素，多次声明意识形态斗争在社会主义改造中的重要性。葛兰西的生活



和思想可以分为四个时期。1918年以前，作为意大利社会党的一名成员，他一直在对传统的马克思主义作出自己的批判。在1919和1920这两个“红色年”中，他是都灵工厂委员会运动幕后的主要鼓动者，是《新秩序报》(*Ordine Nuovo*)的主编。1921年至1926年，从意大利共产党创立起，他便是该党领导人之一，而忙于制定党的政策，并与第三国际进行谈判。最后，自1926年入狱一直到1937年逝世，他都在撰写他的重要理论著作——《狱中札记》。无论他的人生经历多么曲折，无论他所关注的事业多么繁复，他对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革命进程的看法则表现出某种前后连贯性。

都灵工厂委员会运动

1891年，葛兰西生于撒丁(Sardinia)岛的阿莱斯(Ales)。撒丁是新统一的意大利的一个极落后的地区，一直遭受接连不断的外国征服者的剥削，还没有完全迈出封建时代。葛兰西的母亲出生于富裕的撒丁尼亚人的家庭，而他的父亲是个外地人，一个来自大陆本土的小文官。在他三岁那年发生了一起事故，使他成了驼背；而他父亲由于渎职而遭到监禁，这就是说，葛兰西度过的是一个贫穷、孤苦的童年。尽管孤苦伶仃，但他如饥似渴地博览群书，在校成绩优异，终于跻身于当地的报界。后来他就读于都灵大学，攻读语言学。1913年，他加入了意大利社会党，1916年任该党《前进报》(*Avanti*)的专职记者。葛兰西深受索雷尔(Sorel)激进工联主义的影响，但这时对他影响最大的是克罗齐(Croce)的黑格尔历史主义。克罗齐注重个人道德责任心，强调通过文化的传播来促进和发展社会主义。在克罗齐的部分影响下，葛兰西比马克思以后的任何马克思主义者都更注重历史学。1917年在俄国革命的鼓舞下，他开始积极地参与政治组织工作，在新兴的工厂委员会运动中表现卓著。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意大利面临着一场巨大的经济危机。当时农业仍然是经济的基础，而由于农民应征入伍，农业处于凋敝状态。国家由于支付战争开支而债台高筑，通货膨胀严重失控。另外，复员的士兵扩大了失业的人数。由于这次经济危机和随之而来的生活水平的下降，工人阶级的战斗精神加强了。很多资本家在战争中发了横财，社会党人则反对战争。许多工人，尤其是都灵大冶金企业中的工人，都认为工会过于软弱，而且疏远了基层的

反对意见。工厂委员会运动正是在这种动荡不安中兴起的。这些工厂委员会组织萌发于工会会员选举出来的“厂内委员会”，它是前十年在这些工厂内建立起来的，用以处理有关仲裁和处罚之类的琐碎事宜。到1918年，“厂内委员会”日益被看成是能够代表和捍卫工人阶级实际利益的团体了。

葛兰西和《新秩序报》都想把“厂内委员会”转变成工厂委员会。葛兰西写道：

今天，厂内委员会在工厂里限制了资本家的权力，起了仲裁和训诫的作用。明天，它们会发展和充实起来，必能成为无产阶级的权力机构，代替资本家行使其在管理和行政方面一切有用的职能。^[1]

达到这个目的的第一步是要确保：首先，公司的每一个人都能选出他们的代表；其次，委员会必须切实建立在工厂内部劳动分工的基础上。后来，葛兰西把工厂委员会的组织规定如下：

每个工厂划分为若干个车间，每个车间按不同工种划分成小组，每个小组在劳动过程中担负一部分具体工作。每个小组的工人在其成员中选出一名代表，授之以可维持亦可撤销的权力。全厂代表大会产生一个委员会，由该委员会自身造出执行委员会。各厂执行委员会的政治书记大会则轮流组成各委员会的中央委员会，中央委员会从其成员中选出一个全市的教育委员会，负责组织宣传、起草工作计划、审批各个工厂甚至个别工人提出的方案或建议，最后肩负起领导整个运动之责。^[2]

在葛兰西看来，工厂委员会同它旨在控制、并最终取代的工会大不相同：

无产阶级革命的实际过程同具有自愿性和契约性的革命组织（如政党和工会）的发展和活动是两码事。这些组织是在资产阶级民主和政治自由的范围内产生的，是对这种政治自由的肯定和发展……而革命过程则发生在生产领域中，发生在工厂中。在其中，存在着的关系是压迫者和被压迫者、剥削者和被剥削者的关系；在其中，工人没有自由，民主也不存在。^[3]



工会，换言之，官僚主义和权贵性质的组织，是在资产阶级社会框架内起作用的。在这方面，意味深长的是，《新秩序报》大力强调在工厂内部改进技术和提高生产率。他们意在使工人能够控制、并扩大真正的社会主义生产过程，而不是同资本家计较更大份额的眼前利益。

在对意大利进行革命改造的这个时期，“工厂委员会”是葛兰西关注的中心概念。工厂委员会的主要任务是改变工人群众的态度，即从依附的态度改变为领导的态度。工厂委员会能够完成这项任务，是通过把那些还没有代表的工人吸引到自己的活动中来，培养他们的管理能力和技术才干来实现的。这样便更新了工会和党，为一个新型的工人国家奠定了基础。因为工厂委员会是新型无产阶级国家的雏形：

社会主义的国家已经潜在于以被剥削的工人阶级为特色的社会生活机构中。为把这些机构联合起来，把它们协调和安排到一种高度集中的权能等级制内，同时又尊重每个机构必要的自主权和发言权，这样就能立刻建立起真正的工人民主——一种对资产阶级的国家进行积极而有效地反抗的工人民主；就能立刻准备取代资产阶级的国家行使管理和控制民族遗产的全部基本职能。^[4]

葛兰西对工厂委员会所描绘的图景看起来很像俄国苏维埃那幅理想化的蓝图。无疑，俄国苏维埃作为一种双重权力机构在1917年所扮演的角色，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不过，强调生产中的技术效率，并把工厂委员会设想成政治上和经济上的自治机构，这就远远超过了俄国苏维埃模式。伴随着俄国革命的发展进程和苏维埃权威的降低，葛兰西转而强调党是对工厂委员会的一个必要的补充。起初，葛兰西曾把1917年的革命刻画为“反卡尔·马克思《资本论》的革命”^[5]，一场自发的、自由意志的爆发。直到1921年，葛兰西对有关俄国正在发生的事态的信息来源极其有限^[6]，他所得到的消息都是强调苏维埃的作用。他似乎完全消化、吸收了仅有的的一本列宁著作是《国家与革命》，在这本书里，党的作用是微乎其微的。因此不足为怪的是，他认为列宁、卢森堡和潘涅库克观点非常一致。

但由于1920年末都灵工厂委员会运动宣告失败，加上他逐渐了解到苏联的真实情况，以及他对法西斯崛起的关注，使葛兰西改变了自己的观点（关于这一点，有个不太起眼的例证，那就是葛兰西把“雅各宾”一词日渐

用作褒义，而该词在1920年以前始终是个贬义词)。葛兰西是主张脱离意大利社会党、且于1921年1月创立意大利共产党的最热烈的鼓吹者之一。甚至在意大利共产党成立以前，他在一篇受到列宁赞许的文章中就宣称：需要“一个同一的、内部团结一致的党，这个党有自己的理论、策略和严格而不动摇的纪律”。而没有共产党，没有一个能够“在其中央执行委员会内协调和集中无产阶级全部革命行动的”共产党，工厂委员会运动就注定要失败。^[7]

的确，葛兰西认为，这就是1920年失败的首要原因。足以进一步表明他的这种重点转变的是，他对党颇具军事色彩的描述，他把党分成如下三级：大尉——指导和制定战略；下士——传达大尉的旨意；忠于职守的受训士兵——他们“缺乏创造精神和组织能力”^[8]。当然，葛兰西始终认为，在领导人和群众之间存在着一种辩证关系。比方说，他对自己所说的“有机的集中制”作了如下的界定：

意见一致不可能是消极的和间接达成的，而必须是积极的和直接达成的。因此，意见一致必须要有每一个体参与进来，哪怕这会给人以分裂和混乱的外观。只有集中每个人的意见，使多样性统一起来，才能形成集体的意识，才能形成生动活泼的有机整体。^[9]

像卢卡奇那样，葛兰西强调党的道义品性。也如同卢卡奇，他似乎立于列宁和卢森堡之间的中间道路上，既反对自发性，也反对“命令主义”（directionism）。他对自发的感情作了这样的表述：

自发的感情不是一个具有自觉性的领导集团系统地开展教育活动的结果，而是通过“常识”所阐明的日常经验（即人们传统流行的世界观）而形成的——这种经验或世界观被缺乏想像力的人们称为“本能”，尽管它事实上也是一种原始的、基本的历史产物。^[10]

这样的情感并非误导人，但必须“给予有意识的领导，或者纳入政治斗争而使之提升到更高的水平”^[11]。相反，命令主义（葛兰西把它同意大利共产党另一个主要的理论家波尔迪加 [Bordiga] 所鼓吹的狭隘先锋队党联系起来）并非如此：

把党看成是革命群众的自发运动和中央有组织、有指导的意志这二者相结合的辩证过程产生的结果；而只是把党当做某种漂浮在空中的东西，它只是自我发展，为自己而发展。只有当形势有利、革命进入高潮，或党中央认为必须发动攻势和深入群众去鼓动并带领群众行动的时候，群众才会够得着它。^[12]

因此，尽管葛兰西在1920年以后进入了他所称为的“必然王国”，而很少谈及工厂委员会运动，但他却没有放弃早年在都灵的经验教训。尽管需要同波尔迪加妥协，还同第三国际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但他所强调的重点还是同列宁有别。正如他在论述自发性和命令主义时所指出的，他并不像列宁那样强调“来自外部的意识”（列宁至少在《怎么办？》一书中是如此主张的）。而且，列宁似乎比葛兰西更加关心政治策略的“时机”方面和直接掌握政权的问题。但只是在《狱中札记》一书中，两人侧重点上的真正分歧才具体地表达出来。

《狱中札记》

《狱中札记》一书写于1929年至1936年之间，它无疑是葛兰西最主要的理论成就。然而众所周知，基于种种原因，这些札记非常令人费解。首先，札记并非为发表而写，因而跳跃、从简和不甚连贯之处颇多；其次，葛兰西往往采用克罗齐和马基雅弗利的语言来阐发新概念；还有，由于是狱中之作，札记往往故意写得很隐晦，甚至多用暗示的手法，以此来逃避检查；结果是，人们对这些札记的解释一直众说纷纭，以至于给意大利共产党当时“历史性妥协”的支持者和反对者都提供了弹药。该札记涉及的主题包括赋予知识分子更多的使命、突出领导权概念的重要性，以及为东西方革命提供各自不同的策略。

知识分子

葛兰西一直被称为上层建筑的理论家，而最能清楚地说明他受如此看待的原因，莫过于知识分子的作用在他思想中所占据的中心地位。马克思依据的是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区分，在更为狭隘的传统意义上使用知识分子这一术语，与此相反，葛兰西则是以宽泛得多的方式来使用知识分子这一概念

的。在葛兰西看来，以往对智力活动标准所作的定义过于狭隘了。

在我看来，方法上最普遍的错误是，从智力活动的内在本质去寻求这种区分的标准，而不从这些智力活动（以及人格化地体现这些活动的知识分子集团）在社会关系总复合体中占有其地位的整个关系体系中去寻求这种区分。^[13]

他继续写道：“所有的人都是知识分子……但并非所有的人在社会上都具有知识分子的职能”^[14]。由此，葛兰西得出结论说：

最终，每一个人在他的职业活动之外，还从事某种方式的智力活动，就是说，他是一个“哲学家”、一个艺术家、一个有鉴赏力的人，他对世界有自己的独特见解，有自觉的道德行为准则，从而对维护或改造某种世界观、即为造就某种新的思想方式作出贡献。^[15]

依葛兰西的看法，每一个社会阶级都是这样：

都有组织地亲自参与创造一个或几个知识分子阶层，其中每个阶层都具有同质性，不仅在经济领域，而且在社会和政治领域都对自身的职能有一种自觉。^[16]

葛兰西把“传统的”和“有组织的”知识分子区分开来。传统的知识分子是这样的知识分子，他们错误地认为自己独立于社会各阶级之外，他们看似体现了某种超越社会政治变革的历史连续性。这类知识分子大都是作家、艺术家和哲学家，特别是牧师。虽然造就他们的生产方式已经消亡，但他们一直存活着、世代相传。他们与历史上垂死的阶级有联系，却又自称具有某种独立性，这一事实就包含了一种思想意识形态（通常具有某种唯心主义倾向）的产生，借以掩饰他们实际上已落后于时代。如果说传统知识分子的概念主要是一个历史的概念，那么，有组织的知识分子的概念则具有更多的社会学含义。衡量一个知识分子有组织的程度如何，是以他所在的组织与该组织所代表的阶级的联系紧密度来确定的。有组织的知识分子在政治、社会和经济领域明确表达出他们那个阶级的集体意识，



同时他们又具有一定的独立性：

知识分子同生产界的关系没有像同主要社会集团的关系那般直接，但这种关系在不同程度上是以整个社会结构和上层建筑复合体作为“中介”的。在其中，准确地说，知识分子只是上层建筑复合体内的“工作人员”。应该能够衡量不同知识分子阶层的“组织性”以及他们同主要社会集团联系的程度；应该能够为他们的职能和自下而上的上层建筑确定出一套等级秩序来。^[17]

通过一系列的历史研究，葛兰西阐明了他关于传统的和有组织的知识分子的思想。例如，法国和英国的资产阶级最终在反对教士和贵族的斗争中占了上风（尽管在英国，这主要只限于经济方面）。在意大利，来自世界各地的、传统的教会知识分子则竭力压迫或同化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结果资产阶级在文艺复兴运动中却造就了自己“有组织的”知识分子。相比之下，美国“相当缺少传统的知识分子”，因而：

它比古老的欧洲发展速度要快得多。欧洲存在着一系列的牵制（道德上的、精神上的、政治上的、经济上的牵制，这些牵制来自居民中特定的一部分人，他们是不愿退出历史舞台的旧政权的残渣余孽），以致成为快速发展的绊脚石，把每一种首创精神磨平到庸庸碌碌的平均水平上，从而在时间和空间上泯没了它们。^[18]

当前，工人阶级面临的问题是，造就本阶级有组织的知识分子。有时，葛兰西把这一点说成是任何革命运动取得成功必不可少的先决条件。无产阶级需要改造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使之为自己的事业服务，但这还不够：

任何正在走向统治地位的集团，其最重要的特点之一就是“意识形态上”竭力同化并征服传统的知识分子。这种同化和征服的工作做得越快、越有成效，则该集团在精心造就自己有组织的知识分子的工作中就越成功。^[19]

这些有组织的知识分子的任务（葛兰西尤其依据他在《新秩序报》的经

验)，是把工人阶级活动中所固有的潜在斗志和潜力挖掘出来，并使之协调一致。由此，有组织的知识分子同他们的阶级的关系成为这样一种辩证关系：他们从工人阶级的经验中汲取养料，同时又向工人阶级灌输理论意识。无产阶级有组织的知识分子的形成，较之资产阶级有组织的知识分子的形成要困难得多，因为资产阶级在封建社会的夹缝中已经享有自己的生活和文化。有时，葛兰西以至于说，无产阶级只有在夺取政权以后，才能造就自己的知识分子。^[20]

葛兰西对这个问题给出了一个回答，那就是政党：

对某些社会集团来说，政党只不过是直接在政治和哲学领域内、而不只是在生产技术领域内造就它们自己那类有组织的知识分子的一种特殊方法。基于这个集团的一般性质及其形成、生活和发展的条件，这就注定这些知识分子不能通过别的途径，而只能通过这一途径来造就。^[21]

党是能同本阶级最有机地联系在一起的知识分子的组织。党是“集体的知识分子”——这一提法是陶里亚蒂首创的（葛兰西在谈到马基雅弗利时，把党称为“现代君王”）：

党只能是一个有机体，是社会的一种复合成分，在其中，集体的意志得到了公认，并在某种程度上体现为行动，因而它开始有了具体的形式。历史已经提供了这样一个有机体，它就是政党——集体意志聚合于其中的第一个细胞，集体意志的胚芽将发展成为普遍的、全社会的意志。^[22]

第二国际之所以在政治上出现了背离（有人也许要说，这是列宁主义某种形式的偏差），乃源于对领导和群众之间的必然的有机联系的否定。

葛兰西强调知识分子的作用，使他较之以往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更准确地表述了历史唯物主义。他喜欢援引马克思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而且相信黑格尔的遗产尚未完全被那种倾向于把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粗暴地对立起来的马克思主义所接纳下来。^[23]葛兰西写道：

这种社会学一直企图按照预先制定的哲学体系模式，去创造历史科

学和政治科学的方法，也就是进化论者的实证主义方法……它成了非哲学家的哲学，即企图用仿照自然科学模式制定的标准，来对历史事实和政治事实作图解式的描述和分类。因此，它企图用“预言”橡树长自橡树籽的方法，“凭经验地”界定人类社会进化的规律。庸俗进化论植根于社会学，而社会学却不了解进化从量变到质变的辩证原理。^[24]

葛兰西认为，马克思主义是黑格尔主义的一种发展，而且是这样的：

已从任何片面的、狂热的意识形态成分中解放出来（或自身正试图解放出来）的一种哲学。它是充满着矛盾的意识，在这些矛盾中，哲学家本人既被理解为个人，又被理解为一个社会集团的整体，他不仅了解这些矛盾，而且把自己树为矛盾的一个要素，并把这个要素提高到认识的原则，从而也提高到行动的原则。^[25]

在这些论述中，葛兰西指出，把恩格斯的思想 and 马克思的思想混为一谈是错误的。他抛弃了普列汉诺夫的“庸俗唯物主义”，而倡导回到马克思原初的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辩证统一上去。他尤为详尽地批判了布哈林的《历史唯物主义》，指责该书宣扬哲学唯物主义和把马克思主义描绘为一种进化论的实证主义社会学。^[26]

可见，葛兰西的主要兴趣不在社会的经济基础，而更在于无产阶级能以了解资本主义社会的社会经济关系的手段和推翻资本主义社会所必需的政治手段。同科尔施一样，他摈弃他称之为“经济主义”和“意识形态主义”的这两种倾向。他声称：

人们忘记了，对“历史唯物主义”，应该强调的是第一个术语“历史”，而不是第二个词。对“唯物主义”的过分强调只会是形而上学的根源。实践哲学是绝对的“历史主义”，是绝对的思想世俗化和尘世化，是绝对的历史人道主义。^[27]

正是在这样一种思想背景下，葛兰西一再强调“意志”在政治行动中的重要性^[28]，勾画（虽然很简略）了类似于马克思在《巴黎手稿》中所论述的那种人道主义^[29]，并断言：在共产主义社会，自由必将支配必然。^[30]

一般地说，葛兰西倾向于通过上层建筑来分析基础，并对在间接的意义上解释历史唯物主义是深有体会的。他是最富有辩证色彩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家之一，他（特别在《狱中札记》中）对自由和必然的关系的分析、对上层建筑的分析、对知识分子和工人阶级的关系的分析等，始终都是用辩证方法来阐发的。

领导权（Hegemony）

那么，除了维护本阶级的经济组织和政权，知识分子的主要职能就是要用他们所代表的有辩护力的意识形态来确保本阶级对全社会的领导权（有人译为霸权，但霸权一般特指国际领域一国对他国的盟主权。——译者注）。如同看待知识分子概念，葛兰西同样拓展了原来用得过于狭隘的领导权概念的含义，因而，他的这一概念同样修正和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传统。在19世纪与20世纪交替之际，普列汉诺夫及其马克思主义者同僚曾大量使用领导权这一术语，用来描述无产阶级在他们认为即将到来的俄国资产阶级革命中的作用。这个术语还在20世纪20年代第三国际的各种文献中再度出现过。^[31]在此，葛兰西特地承认受惠于列宁。他认为列宁关于领导权的见解是列宁最大的理论贡献。^[32]葛兰西沿用了这一术语，把它理解为这样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无产阶级赢得一切反资本主义力量（特别是农民）的领导权，并把这些力量组合成“一个新的、同质而没有内部矛盾的、政治经济上的历史性集团”^[33]。“历史性集团”把各种经济、社会和意识形态的力量联合成一个临时的统一体去改造社会，这一概念乃是葛兰西许多分析的核心。较之联盟，历史性集团含义要更为丰富，因为：

统治集团是具体地同各从属集团的一般利益相协调的，而国家生活则被认为是基本集团和从属集团之间形成和变换其不稳定的动态平衡态（在法律层面上的）的持续过程。在这种平衡态中，统治集团的利益高于一切，但是只能达到一定的限度，即不缺乏紧密结合的共同经济利益。^[34]

葛兰西吸取了他在都灵工厂委员会运动中的经验，扩大了领导权的概念，即把对统治阶级取得下属集团认可自己统治的方法的分析也包括进去。他写道：

历史的（也就是具体的）进步阶级的知识分子，在一定条件下发挥

这样一种感化力，最终，他们征服其他社会集团的知识分子。就这样，他们在所有的知识分子之间，建立起了一个以心理素质（虚荣心等）或常常是以身份特征（技术界、司法界、法人等）为纽带的凝聚体系。^[35]

换言之，统治阶级的世界观经由其知识分子如此彻底传播开来，最终成为整个社会的“常识”。韦伯所分析的官僚主义的和工艺的理性主义，是资本主义意识形态领导权的一部分，其作用就是抑制工人阶级任何创造发明的精神。^[36]统治阶级为了维护其统治，在大多数情况下，不必诉诸武力，葛兰西把这种认识当做他的理论核心。“甚至可以断言，就本质特征而言，当代马克思主义就是这一具有历史政治性的领导权概念。”^[37]

如同研究知识分子那样，葛兰西也借鉴历史研究来阐述领导权。例如，法国资产阶级的雅各宾主义发挥了对农民的感召力，从而一度发展成渗透到法国广大人民群众之中的全国性群众运动。另外，在美国，在没有封建传统的情况下，由于能直接运用资本主义的价值规范，因而统治阶级能够行使巨大的意识形态领导权。而另一方面，意大利的文艺复兴运动则只限于知识界的精英人物，因而没有为国家的统一提供任何基础。皮德蒙特（Piedmont）的北方自由主义曾不得不用武力征服意大利，却不能对它行使意识形态的领导权，因为它不去深入群众，而不得不在政治上收买知识分子。葛兰西写道，“要是你研究一下意大利从古到今的全部历史，你就会发现：一个小的领导集团有条不紊，把群众运动所产生的政治人物成功地吸收到自己这方面来，而这些政治人物原来就具有破坏性”^[38]。后来，葛兰西认为，第二国际的失败根源在于工人阶级运动无力抗拒资产阶级意识形态领导权的渗透。

就这样，领导权的概念解开了资本主义何以能在西方资产阶级民主制下继续存在之谜：

在今日议会制的传统领域，“规范地”行使领导权是以强制力同自愿相结合为特征的，二者相互平衡，强制力的一面并不过分地盖过自愿的一面。的确，社会总是想办法让人确信，诉诸强制力似乎是建立在所谓舆论机构（报纸、社团）所表达出的多数人同意的基础上。因此，在某些情况下，舆论工具就人为地膨胀起来。^[39]

只要资产阶级继续行使这种文化领导权，无产阶级革命就是不可能的。

葛兰西喜欢援引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关于意识形态诸多形式的论述，即认为，在这些形式中，人们意识到了社会冲突并力求克服这些冲突；但只要资产阶级领导权还存在，无产阶级就仍然不会明了资本主义社会矛盾的本质所在，也不会懂得改造这种社会的可能性。因为资本家们的意识形态领导权一个必不可少的部分，就是他们能把自己的利益表达成是全社会的利益。这样，葛兰西认真分析了资产阶级如何能通过认同而不是通过强制把它的统治永久地维持下去。他作为第一个进行这样分析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是有丰功伟绩的，尽管他认为他在这个问题上的见解至少在列宁那里就作过提示。很多先前的马克思主义者有个共同的特点，即都相信经济决定论和革命不可避免性，但不论是哪一方面的信念，对革命的成功都同样有致命的危害。因为，在葛兰西看来：

有可能排除即将爆发的经济危机本身能产生出重大历史事件的可能性；危机只能创造更有利的环境去传播某种思想方式，传播那些涉及今后国民生活全面发展的解决方法。^[40]

工人阶级为了建立自己的领导权，就必须超越为自己狭隘的宗派利益而进行的斗争，必须使自己能够以全社会利益的捍卫者身份出现。无产阶级要建立与资产阶级对立的领导权，而没有工人阶级的知识分子积极参与，则是不可能的。在这个问题上，党也是一个根本因素。葛兰西关于党的见解，较之列宁的见解更为广泛，因为他认为，党除了夺取政权外，还肩负起意识形态和文化方面的斗争重任。葛兰西深信，列宁主义的策略忽视了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领导权，必然在西方发达的工业化国家中行不通。因此，他主张党在试图夺取政权之前，应该是一个教育机构（而不是一个直接的政治组织），由它提供一种“反（资产阶级的）文化”，其目的是在市民社会的大多数方面取得支配地位。党组织（还有工厂委员会）预先训练工人管理自己的生活，从而为革命后的形势作准备。没有在市民社会中获得领导权的政权控制，对社会主义纲领来说，便缺少可靠的基础。在一段颇为孤立的无背景性文字中，葛兰西甚至宣称：

一个社会集团在赢得政权以前，可能而且确有必要已经在行使“领导权”了（这的确是赢得政权一个最基本的前提条件）；而在行使权力

时，这个集团随之便成了统治力量。但即便它牢牢掌握了政权，也必须继续“领导”下去。^[41]

当然，这不是说葛兰西轻视了必要的暴力因素，他倒是把暴力同夺取市民社会的领导权斗争辩证地结合起来。他认为，说服和暴力这二者在任何革命过程中都是必不可少的。特别在资本主义的世界观已长期渗透在社会中的西方，夺取意识形态领导权的斗争有时至关重要。葛兰西已意识到，如果不具备那些已掌握经济、政治权力的人所拥有的全部手段，这一斗争会是异常艰难的；因而，有时他暗示，要造就一支有组织的工人阶级知识分子队伍，否则市民社会的领导权也只有夺取政权以后才能正式行使。

国家、市民社会和革命

葛兰西对无产阶级可能在西方取得领导权这一进程的分析促使他提出了市民社会与国家之间的关系问题，并在这个问题上将西方和俄国作了对比。虽然他和马克思都声称是从黑格尔那里继承了市民社会的概念，但实际上他俩对这一术语的用法迥然不同。马克思使用市民社会一词指的是经济关系的总和，^[42]葛兰西则用以指上层建筑。市民社会是“一般称为私有的那些机构的整体”，“它适从于统治集团对全社会行使领导权的职能”^[43]。有时，葛兰西也确实把市民社会说成是在经济与政治之间起中介作用的东西，他说：“市民社会存在于经济结构和拥有司法和强制手段的国家之间”^[44]。不过，葛兰西通常用市民社会来概指统治阶级在一切文化领域内用以散布替自身意识形态所作的辩护的全部组织机构和技术手段。葛兰西的意识形态概念内涵极其广泛（甚至包括自然科学的许多方面），又相当地多样化（从哲学到民谣），因而市民社会首先具有文化职能，并通过统治阶级的领导权来体现“国家的道德内容”^[45]。

葛兰西对“国家”这一术语用法也不一样。有时它既包括市民社会，也包括政治社会，而马克思则认为这二重社会截然对立。葛兰西写道：

国家的一般性概念所包含的成分需要回溯到市民社会的概念上去（在这个意义上，人们可以说：国家=政治社会+市民社会，换言之，即强制性防护起来的领导权）。^[46]

葛兰西在别处还说，国家等于专政（dictatorship）加领导权；甚至还

说，“市民社会与国家是一回事”^[47]。1931年在谈到关于知识分子的札记时，他写道：

这项研究也得出了国家概念的某些规定性，国家通常被理解为政治社会（或专政，或迫使人民群众在一定时期内顺应某一特定生产形式和某一特定经济制度的强制性机构），而不是政治社会和市民社会之间的均衡物，也不是一个社会集团通过所谓私人机构（如教会、工会、学校等）对整个国民社会所行使的领导权；正是在市民社会里，知识分子发挥着特殊的作用。^[48]

虽然葛兰西意识到市民社会和国家之间的紧密合作关系（甚至意识到，在法西斯统治下，二者融为一体），但他毕竟也把二者作了对比。这两者之间的反差在自由资本主义政权下较之封建法西斯主义或社会主义政权下要显著。

葛兰西最具有独创性的见解之一，就是在这方面指出了东方（俄国）和西方的不同之处。下面这段话最为引人注目：

在俄国，国家就是一切，市民社会还处于初生的混沌状态；而在西方，国家和市民社会之间存在着一种恰当的关系，当国家发生动摇时，市民社会稳定的结构就立即显现出来。国家只不过是外围的一条壕沟，它后面还屹立着坚固的堡垒和工事群。^[49]

这段话意味着，东西方的革命策略应当有所不同。在落后的社会里，国家应是正面攻击的目标；在较发达的社会里，正面攻击的目标应是市民社会。葛兰西借用最新军事科学研究中的术语，把上述第一种攻击称为“运动战或机动战”，即使用炮火瞬间在防线上打开缺口，让队伍可以迅速从一地转到另一地，直捣、并攻克堡垒；把第二种攻击称为“阵地战”，即敌人的兵力配置均衡，而不得不安顿下来作长期的堑壕战。例如，法国的资产阶级在1789年革命胜利之前就进行过这种阵地战，其形式是对贵族政权的意识形态的支持者采取长期的文化攻势。葛兰西认为，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阵地战日趋重要；而运动战对于工人阶级代价高昂，只有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才能采用。葛兰西认为，罗莎·卢森堡论《群众罢工》这本小册子，是试图为西方采用运动战作理论上的辩护。卢森堡认为，经济危机能突然促发一场

导致革命的普遍性危机；葛兰西批评这种见解是“经济主义”的和“自发主义”的。他写道，在卢森堡看来，直接的经济因素能引起这样一些结果：

1. 经济因素在使敌人陷入混乱，并使之对自身、对自身的实力和前途丧失信心之后，会突破敌人的防御；2. 经济因素刹那间就会促使人们组织起自己的军队，并造就必需的干部，或者至少会在瞬间把现有的（直到那时止，由总的历史进程所累积成的）干部各就各位，使他们能把分散的力量统帅起来；3. 经济因素会在刹那间使人们的思想必然集中于要达到的共同目标上。

这种观点是一种顽固的经济决定论，它把夸大了的经济因素想像为在时间和空间上能起闪电般作用的东西。因此它是十足的历史神秘主义，只期待着某种神迹降临。^[50]

当然，另一方面，运动战也绝不能完全放弃：

在政治上，只要还存在夺取非决定性阵地的问题，因而国家领导权的一切手段不可能都调动起来时，运动战便会存在。但是，当非决定性阵地由于某种原因失去了价值，而惟有决定性阵地是成败关键时，人们才会转而采取围攻战；这是一场全力以赴的战争，需要特殊的耐性和创造性。^[51]

换句话说，葛兰西是在告诫人们，不要过于简单地以为，在俄国奉为楷模的列宁主义战略可以毫无问题地适用于西方。因为：

运动战日益成为阵地战，而且可以说，一个国家只要在和平时期对战争作了深入细致的技术上的准备，那它就一定会赢得这场战争。庞大的现代民主体制，既包括各种国家机关，也包括市民社会中各种企业团体的复杂机构，只要是从政治艺术的角度去考虑，它们就好似构成阵地战前沿的“战壕”和永久性防御工事；它们把以前通常被视为战争的“整体”变成了“部分”性的。^[52]

与区分阵地战和运动战相关联的是，葛兰西把机制性危机同突发危机区分开来。他写道：

必须把机制性运动（相对永久性的）与可以称之为“突发”的运动（它是偶然、直截了当地、几乎是意外地出现的）区分开来。当然，“突发”性现象确实依从于机制性运动，但没有什么深远的历史意义。它们只提出一些无伤大雅的、就事论事的政治批评，而且批评的对象只是对政府负有直接责任的上层政治领袖和政治人物。相反，机制现象则提出社会历史性的批判，其对象是更为广泛的社会集团，而不仅限于社会头面人物和上层领导人。^[53]

是阵地战适宜还是运动战适宜，取决于估计危机是机制性的还是突发性的。如果现有统治阶级几十年来都面临着不可救药的体制上的矛盾，那么机制性的危机可能为运动战提供机会，因为机制性的危机能使结构和上层建筑之间造成破裂，从而是统治阶级领导权的一次危机。

葛兰西预见到，无产阶级的领导权将要消除国家和市民社会之间的差别：

只有以国家消亡和自身消亡为奋斗目标的社会集团才可以缔造一个道德的国家——也就是说，它要消除被统治者的内部分裂等现象，并造就一个技术上和道义上统一的社会有机体。^[54]

葛兰西认识到，一个过渡时期是必要的，无产阶级必须在过渡时期依靠政权来改造市民社会，于是产生他称之为“中央集权”的现象。^[55]不论葛兰西在使用市民社会这一概念时如何偏离了马克思的原意，他们二人在终极目标上是一致的，即用市民社会来把政治社会重新吸纳入无阶级的社会内。

20世纪20年代，葛兰西的共产主义政治学观点，在某种程度上传达了东方和西方、阵地战和运动战之间的反差。他关于知识分子、领导权等的思想虽然是在身陷囹圄、与世隔绝的状态下表述出来的，却与他十多年前在意大利党内和国际社会主义运动中的经验密切相关。1926年在意大利，在葛兰西指导下通过的《里昂提纲》，已把他关于党的知识分子和领导权的观点载入了文献中。北方和南方之间的殊异和必须争取农民的支持这些核心问题，已成为具有独创性的文章“论南方问题”的主题，该文恰好是他在囚禁期间撰写的。在国际舞台上，他在政治策略方面所批评的主要对象是托洛茨基。葛兰西坚持（至少在原则上）第三国际1923年以后的政策，这必然导



致同托洛茨基的冲突。从1921年到1924年，葛兰西实际上倾向于在意大利反对第三国际曾经执行的统一战线政策。不过，1924年，波尔迪加在受到季诺维也夫在第三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上短时间“转向左倾”的鼓舞下而在意大利开始捍卫托洛茨基，当时，葛兰西从“中间派”立场出发，起来反对波尔迪加，但又被迫采取托洛茨基的政策立场。葛兰西反对托洛茨基关于西方资本主义相对稳定、革命前途暗淡的观点，而且托洛茨基的政治立场和理论观点也被意共中央（葛兰西和他的支持者在其中占多数）谴责为：

一种关于世界革命发展的悲观论点和一种忽视工人和农民之间正确关系的革命进程观念……认为，如果西方工人阶级的胜利在短期内还得不到最发达的工业国对无产阶级政权的帮助，那么在小资产阶级居优势的国家中，无产阶级便必遭失败、并必然蜕化。^[56]

1929年，第三国际再次改变路线，它宣称：资本主义新的崩溃在西方已迫在眉睫，而社会民主党人竭力支撑旧秩序，因此应视为主要敌人。葛兰西反对这种“以阶级对抗阶级”的论调，但他仍然反对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

就是在这种背景下，他构思出《狱中札记》的表述内容。在这本书中，葛兰西对不断革命论的各个方面未表丝毫的同情。托洛茨基在《总结与展望》一书中关于俄国革命演变的思想，被他描述为“呆板的和抽象的”。^[57]葛兰西认为，布尔什维克反对托洛茨基的思想而坚持革命的、民主的专政，是在实践中发展领导权概念的典范。^[58]他确实也勉强承认，事实证明托洛茨基在1917年是正确的，但托洛茨基有关国际方面的思想才是他所首要关注、并予以批判的。葛兰西还承认，托洛茨基在1924年通过区分东西方战线从而对当时的策略作出了大致的修正，但那也只是“毫无实际指导意义的冠冕堂皇的文章”^[59]。大体上说，葛兰西把托洛茨基看成是一个“在正面进攻只能导致失败的时期却执意主张正面进攻的政治理论家”。在《狱中札记》中，他把颇为褊狭的托洛茨基同要灵活得多的列宁区别开来，认为前者只是力图把因种种特殊原因而在俄国获胜的方法机械地应用于其他国家。不断革命论是“运动战理论在政治上的反映……也就是说，归根到底是在一个国民生活体制尚处于稚嫩和松散状态、还不足以造就‘战壕’或‘堡垒’的国家，其整个的经济、文化、社会条件的反映。在此种情况下，人们可以说布朗斯汀

（托洛茨基）貌似‘西方派’，而实际上是一个世界主义者，也就是说他是表面上的民族派、表面上的西方派或欧洲派；相反，伊里奇（列宁）则是彻底的民族派、彻底的欧洲派”^[60]。葛兰西极力反对被他视为托洛茨基式的那种机械国际主义。他写道：

诚然，发展的路线是走向国际主义，但出发点是“民族的”……那些民族性质的大事变正是在领导权概念中交织在一起的。人们很清楚，某些倾向是如何回避这样的概念，或如何只是对它们一掠而过的。

在论及第二国际的经验和托洛茨基在20世纪20年代中期的观点时，他继续写道：

非民族性的概念（即不能涉及任何个别国家的概念）是错误的，也可以说是荒谬的。其所以荒谬，是因为这些观念在两个截然不同的阶段都会使人陷入被动和无所作为：1. 在第一阶段，没有人相信他们应该发动运动，就是说，人们相信，如果一动手干，就会陷入孤立境地；他们等待每一个人都一齐动手，可是没有人会同时动起手来或组织起运动来；2. 第二个阶段也许更糟，因为他们所期待的是一种不合乎时代潮流的、反自然的“拿破仑主义”的形式（既然并非所有的历史阶段都能以同一形式再现）。这种现代形态的旧式机械论在理论上的弱点靠不断革命的一般理论来掩饰，而不断革命论只不过是表现为教条的一般性预言而已，实际上不能兑现而自我幻灭。^[61]

因此，在关于一国实现社会主义的争论中，葛兰西最终支持斯大林就不足为奇了。

然而，毕竟有一个方面，葛兰西确实是同托洛茨基一致的，那就是对法西斯主义的分析。最明显不过的是，葛兰西把法西斯主义分析为小资产阶级对自己失去政治影响而作出反应的一种运动。他写道：“法西斯主义独特的方面是，它成功地组成起小资产阶级的群众组织，这有史以来还是头一遭。”^[62]

葛兰西看出，一场最初促使传统资产阶级国家崩溃的革命运动，后来逐渐变成反动的了。法西斯主义把一切宣传意识形态的手段都集中在国家手里，从而剥夺了市民社会的自主权。但是，法西斯主义不能抑制私有财产，因而也不能剥夺资产阶级对生产资料的控制权。因此，法西斯主义只能是一种短暂现象，从长远来看，资产阶级会再度夺回政权。

除了俄国革命者，葛兰西是近 50 年来最具有独创性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家。在十月革命以后的十多年内，他的贡献曾遍及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全部领域。他在言论上同潘涅库克和戈尔特（Gorter）等委员会共产主义者相同，而在行动上积极参与第三国际的活动。他对领导权体系以及作为（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有机关联的知识分子的论述，是直接基于马克思的著作——只在很小程度上才根据列宁的著作阐发。

〔注释〕

[1] A. Gramsci, 'Workers' Democracy', *Selections from Political Writings 1910—1920* (London, 1977) p. 66.

[2] A. Gramsci, 'The Turin Factory Councils Movement', *Selections from Political Writings 1910—1920* (London, 1977) p. 317. 另外参看都灵工厂代表第一次代表大会通过的纲领，见上书，第 114 页以下。

[3] A. Gramsci, 'The Factory Council', *Selections from Political Writings 1910—1920*, pp. 260f.

[4] A. Gramsci, 'Workers' Democracy', *Selections from Political Writings 1910—1920*, p. 65.

[5] A. Gramsci, 'The Revolution against Capital', *Selections from Political Writings 1910—1920*, p. 34.

[6] 进一步参见 A. Davidson, *Antonio Gramsci* (London, 1977), pp. 163ff.

[7] A. Gramsci, 'Towards a Renewal of the Socialist Party', *Selections from Political Writings*, pp. 194f.

[8] A. Gramsci, *Selections from Prison Notebooks*, ed. Q. Hoare and G. Nowell Smith (London, 1971) p. 152.

[9] A. Gramsci, *Note sul Machiavelli* (Turin, 1949) p. 158, 引自 J.-M. Piotte, *La Pensée Politique de Gramsci* (Paris, 1970) p. 244.

[10] A. Gramsci, *Selections from Prison Notebooks*, pp. 198f.

- [11] Ibid. , p. 199.
- [12] 葛兰西致陶里亚蒂的信 (1924年1月9日), 引自 A. Davidson, *Antonio Gramsci*, p. 208.
- [13] A. Gramsci, *Selections from the Prison Notebooks*, p. 8.
- [14] Ibid. , p. 9.
- [15] Ibid. , p. 9.
- [16] Ibid. , p. 3.
- [17] Ibid. , p. 12.
- [18] Ibid. , p. 20.
- [19] Ibid. , p. 10.
- [20] 特别参见 J. Karabel, 'Revolutionary Contradictions: Antonio Gramsci and the Problem of Intellectuals', *Politics and Society*, vol. 6 (1976) pp. 123ff.
- [21] A. Gramsci, *Selections from Prison Notebooks*, p. 15.
- [22] Ibid. , p. 129.
- [23] Ibid. , p. 402.
- [24] Ibid. , p. 426.
- [25] Ibid. , pp. 404ff.
- [26] Ibid. , pp. 385ff. , 396, 425ff.
- [27] Ibid. , p. 465.
- [28] Ibid. , pp. 172, 175, 185, 345, 360.
- [29] Ibid. , pp. 351ff.
- [30] Ibid. , pp. 367, 405.
- [31] 进一步参见 C. Buci-Glucksmann, *Gramsci et L'Etat* (Paris, 1975) p. 19 and P. Anderson, 'The Antinomies of Antonio Gramsci', *New Left Review*, 100 (1976—1977) pp. 15ff.
- [32] A. Gramsci, *Selections from the Prison Notebooks*, p. 365.
- [33] Ibid. , p. 168.
- [34] Ibid. , p. 182.
- [35] Ibid. , p. 60.
- [36] 参见《狱中札记》中的“科学管理”和“泰罗制”章节, 第301页以下。
- [37] A. Gramsci, *Lettere dal Carcere* (Turin, 1965) p. 616. 引自 A. Davidson, *Antonio Gramsci: Towards an Intellectual Biography* (London, 1977) p. 260.
- [38] A. Gramsci, *Lettere dal Carcere* (Turin, 1965) p. 633.
- [39] A. Gramsci, *Selections from the Prison Notebooks*, p. 80.
- [40] Ibid. , p. 184.



- [41] Ibid. , pp. 57f.
- [42] K. Marx, 'On the Jewish Question', *Selected Writings*, ed. D. McLellan (Oxford, 1977) pp. 46ff.
- [43] A. Gramsci, *Selections from the Prison Notebooks*, p. 12.
- [44] Ibid. , p. 208.
- [45] Ibid.
- [46] Ibid. , p. 263.
- [47] Ibid. , p. 160.
- [48] A. Gramsci, *Lettere dal Carcere*, p. 481.
- [49] Ibid. , p. 238.
- [50] Ibid. , p. 233.
- [51] Ibid. , p. 239.
- [52] Ibid. , p. 243.
- [53] Ibid. , pp. 177f.
- [54] Ibid. , p. 259.
- [55] Ibid. , pp. 268ff.
- [56] 引自 A. Davidson, *Antonio Gramsci*, p. 219。
- [57] A. Gramsci, *Selections from the Prison Notebooks*, p. 34.
- [58] Ibid. , p. 165.
- [59] Ibid. , p. 236.
- [60] Ibid. and f.
- [61] Ibid. , p. 240f.
- [62] 引自 J. Joll, *Gramsci* (London, 1977) p. 57。

深入阅读材料

原著

葛兰西的基本著作《狱中札记》已有精选的版本。辅助读物有两卷本的《政治著作选》，它涵盖了葛兰西直到入狱前所写的作品，其次有《狱中信札》。

评论

最优秀、也最全面的传记是费奥里 (Fiori) 的《安东尼奥·葛兰西：一位革命家的一生》。约尔 (Joll) 的《现代大师录》是一本出色的短篇介绍著作，同样精彩的是博各斯 (Boggs) 从更为哲理的角度写的著作《葛兰西的马克思主义》。长篇论著有卡梅特 (Cammett) 的《安东尼奥·葛兰西与意大利共产主义的起源》和戴维森 (Davidson)

的《安东尼奥·葛兰西：一个知识分子的生平》。有关葛兰西在都灵的革命活动，参阅克拉克 (Clark) 的详尽的历史著作《安东尼奥·葛兰西与失败的革命》，相关的还有带有较强派系色彩的论著——威廉斯 (Williams) 的《无产阶级的秩序》和斯普利亚诺 (Spriano) 的《占据工厂》。专门评述《狱中札记》的，见霍尔 (Hoare) 和 N. 史密斯 (Nowell Smith) 为该书所写的导言，以及安德森 (Anderson) 所写的精辟论文“安东尼奥·葛兰西的背谬”。另外，穆费 (Mouffe) 的文集《葛兰西与马克思主义理论》很有价值，费米亚 (Femia) 的《葛兰西的政治思想》分析严谨、精当。

参考文献

Texts

Antonio Gramsci, *Cultural Writings* (London, 1985).

History, Philosophy and Culture in the Young Gramsci, ed. P. Cavalcanti and P. Piccone (St Louis, 1975).

——*Letters from Prison* (New York, 1973).

——*The Modern Prince and Other Writings*, ed. L. Marks (London, 1957).

——*New Edinburgh Review*, three special Gramsci issues (1974).

——*The Open Marxism of Antonio Gramsci*, ed. C. Marzani (New York, 1957).

——*Selections from Political Writings: 1910—1920* (London, 1977).

——*Selections from Political Writings: 1921—1926* (London, 1978).

——*Selections from the Prison Notebooks*, ed. Q. Hoare and G. Nowell Smith (London, 1971).

Commentaries

Perry Anderson, 'The Antinomies of Antonio Gramsci', *New Left Review*, 100 (1976—1977).

Thomas R. Bates, 'Gramsci and the Theory of Hegemony',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Ideas*, 36 (1975).

Carl Boggs, *Gramsci's Marxism* (London, 1976).

John M. Cammett, *Antonio Gramsci and the Origins of Italian Communism* (Stanford, 1969).

W. N. Clark, *Antonio Gramsci and the Revolution that Failed* (New Haven, 1977).

A. B. Davidson, *Antonio Gramsci: Towards an Intellectual Biography* (London, 1977).



—— ‘The Varying Seasons of Gramsci Studies’, *Political Studies*, 20 (1972).

Joseph Femia, *Gramsci's Political Thought: Hegemony, Consciousness and the Revolutionary Process* (Oxford, 1981).

—— ‘Hegemony and Consciousness in the Thought of Antonio Gramsci’, *Political Studies*, 23 (1975).

Giuseppe Fiori, *Antonio Gramsci: Life of a Revolutionary* (London, 1970).

James Joll, *Gramsci* (London, 1977).

V. G. Kiernan, ‘Gramsci and Marxism’, *Socialist Register* (1972).

Neil McInnes, ‘Antonio Gramsci’, *Survey* 53 (1964).

John Merrington, ‘Theory and Practice in Gramsci's Marxism’, *Socialist Register* (1968) and *New Left Review* (eds), *Western Marxism: A Critical Reader* (London, 1977).

Chantal Mouffe (ed.), *Gramsci and Marxist Theory* (London, 1979).

A. Pozzolini, *Antonio Gramsci: An Introduction to his Thought* (London, 1970).

Anne Showstack Sassoon, *Approaches to Gramsci* (London, 1982).

—— *Gramsci's Politics* (London, 1980).

Paolo Spriano, *The Occupation of the Factories: Italy 1920* (London, 1977).

Palmiro Togliatti, *On Gramsci and other Articles* (London, 1977).

Gwyn A. Williams, ‘The Concept of Egeomnia in the Thought of Antonio Gramsci’,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Ideas*, 21 (1960).

—— *Proletarian Order: Antonio Gramsci, Factory Councils and the Origins of Communism in Italy* (London, 1975).



第四编

中国和第三世界

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共产党员是国际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但是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

毛泽东 1938 年



马克思以后的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主义研究译丛

第十五章 中国革命的形成

引 言

自公元前 2 世纪汉朝（应为公元前 3 世纪秦朝——译者注）在中华大地建立第一个统一的帝国以来，尽管不断地改朝换代，中国却一直是一个异常稳定的社会。它以荒漠、山脉和海洋为界，围构成一片自给自足、肥沃辽阔的国土；在几乎没有受到外来影响的情况下，养育了一种自成中心的、独立的文明。它的经济以高效的农业和农村手工业为主，其官方正统的儒家哲学捍卫着一个视变革为堕落的等级社会。然而，在 17 世纪把统治强加于中国的北方满清王朝，到 19

世纪，当它显得无力抵抗西方侵犯时，这种自满自足的经济、政治和思想就被打破了。从1840年的鸦片战争到1895年败于早先还不屑一顾的日本、再到1900年的对义和团起义的镇压，这诸多事变都暴露出，在西方的经济、军事压力面前，当时的中国几乎毫无防御力可言。

面对这些入侵，中国内部在思想认识上分成几派：一派认为，自己国家惟一的出路在于完整吸纳西方文化，全盘西化；另一派认为，需要的只是西方的技术，而中国的文化和制度应该保留；还有一派反对从西方输入任何东西。其中，现代化派所赢得的不过是，在1912年宣布成立民主共和国（中华民国——译者注）；而西方列强却继续在中国东海岸自行分割赢取暴利的贸易租借地，西方式的民主能复兴中国的想法从而被证明是错误的。没有了皇帝来一统国家，由各军阀把持的军事权力中心各自割据一方。这些军阀的非正规军靠榨取农民而自肥，破坏了农村的经济均衡，从而永久地废弃了帝国的官僚体系。正是从1915年到1925年“军阀统治”的混乱期间，毛泽东逐渐形成了自己的政治观点。

1893年，毛泽东出生在中国中南部的湖南省韶山冲。他的父亲是位贩卖谷子而相对富裕一点的贫农。毛泽东在13岁就离开了学校帮父亲做工；1909年不顾家里人反对到附近一所中学（湘乡东山学校——译者注）注册入学。两年后，他又转到省城长沙继续求学。在中华民国宣布共和时，他在共和派的军队里已服役了6个月；军阀统治上台后，他又重新就学。毛泽东早年的成长和求学历程到底在多大程度上对他的思想产生了影响，这显然只是一种推测。从根本上说，中国的思想要比西方思想更为经验和实用，这个事实也许影响了他的马克思主义观。对他产生影响的还有佛学和道学中的辩证法因素，这两种学说都倾向于从对立面的角度——每一个事物都包含着“阴”和“阳”的矛盾——去思考。而从更为直接的层面上说，毛泽东无疑受到了他读过的像《水浒》那样的中国古典小说的影响，这些小说都赞颂农民起义及其军事业绩。从1913年进入长沙第一师范学校学习，到五年后毕业，他已经成为一个激进的民族主义者了——虽然还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

毛泽东是在北京接触到马克思主义的，那是1918年，他在那里找到了一份图书管理员的工作。尽管在1917年以前，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还鲜为人知（当时，马克思或列宁的著作很少被翻译成中文），布尔什维克胜利地推翻了沙皇专制统治却鼓动起了许多中国知识分子：应该仿效俄国。1919年，伴随着五四运动的爆发，民族主义作为一股实际发挥作用的力量崛起了。在

这场运动中，当人们得知，腐败的政府在西方列强许诺将中国重要省份——山东（先前由德国占据）——归还给中国的情况下，还是同意把它转让给日本，就发动了大规模的游行示威和骚乱。对西方民主理念的整个破灭促使中国知识分子一步步转向马克思主义。1921年，共产党（CCP）在上海成立，毛泽东是13位到会成员之一。

从建党伊始，中国共产党就面临着一个老问题：在这场看来是民族的、共和的“资产阶级”革命中，该采取什么样的政策。1920年初，大多数革命民族主义分子都拥护孙逸仙（孙中山）先生领导的国民党，它是靠苏联的帮助、在以广州为基地的华南地区成功建立起来的。1926年初，在接任孙中山的蒋介石的指挥下，国民党发动了驱逐军阀及其西方帝国主义后台的北伐战争。中国共产党该对国民党持何种态度？弱小的中国共产党接受的是列宁主义的基本原则，该原则指出，不要信任资产阶级的政党，要与之脱离去建立独立的组织，要依靠国际范围内未受干扰的工人阶级运动中的革命潜力。在1920年举行的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列宁就倡议：“共产国际应该同殖民地和落后国家的资产阶级民主派结成临时联盟，但千万不要与之融合；甚至，还在无产阶级运动处于萌芽状态就必须无条件地保持其独立性”^[1]。然而，这并没有回答国民党的确切性质是什么，托洛茨基认为它是资产阶级的政党，斯大林则认为它是各阶级的混合体。后者的看法占据主导地位。在苏联的压力下，1923年，共产党同国民党结成了统一战线。共产党人加入到国民党内，构成其中的左翼力量。

毛泽东与农民

北伐以前，作为共产党官员的毛泽东曾在上海负责协调共产党和国民党的工作，由于对知识分子的反感和对城市生活的陌生，毫不奇怪，他做得并不很成功。在1926年回湖南前，他接受了正统的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在题为《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其突出的特点是，对农民缺乏热情——一文中，他写道：

综上所述，可知一切勾结帝国主义的军阀、官僚、买办阶级、大地主阶级以及附属于他们的一部分反动知识界，是我们的敌人。工业无产

阶级是我们革命的领导力量。一切半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是我们最接近的朋友。那动摇不定的中产阶级，其右翼可能是我们的敌人，其左翼可能是我们的朋友——但我们要时常提防他们，不要让他们扰乱了我们的阵线。^[2]

但是，到1926年9月，他已确信，革命运动的主角将由农民来扮演，起码就当时来看，由于他们既有政治上的、同时又有经济上的目标，因而比工人更为激进。作为党的公认的农民问题专家，毛泽东于1926年返回湖南。此时，北伐已经开始，开局良好，并于当年夏席卷了整个中国内地。从1926年8月到次年5月，毛泽东在湖南停留了9个月，这期间对他的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发展具有决定性的意义。他在农民中的工作对象绝大部分是佃农，而且越来越多的是佃农。他们的土地非常少，地主榨取了收成的50%，而且，通货膨胀和军阀课以重税（往往提前征收）加剧了他们的债务负担。那些破产的人就成为了军阀部队招募新兵的现成兵源了。因此，随着北伐的胜利，农民革命运动迅速发展就不足为奇了。在毛泽东的调查活动开始之前，共产党人没有明确的农村纲领；国民党的提议又非常温和，仅仅是减租而并不没收土地。

农民的中心作用在毛泽东著名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一文中得到了阐明。在这篇文章中，他解释并捍卫了湖南农会反对地主的措施。文章的开头过于理想化：

目前农民运动的兴起是一个极大的问题。很短的时间内，将有几万万农民从中国中部、南部和北部各省起来，其势如暴风骤雨，迅猛异常，无论什么大的力量都将压抑不住。他们将冲决一切束缚他们的罗网，朝着解放的路上迅跑。一切帝国主义、军阀、贪官污吏、土豪劣绅，都将被他们葬入坟墓。一切革命的党派、革命的同志，都将在他们面前受他们的检验而决定取舍。^[3]

毛泽东提到的农会正在采取的实际措施是相对温和的，并且严格遵循着共产国际的指示。但是，共产国际强调的是无产阶级的领导权，而毛泽东则宣布：“乡村中一向苦战奋斗的主要力量是贫农。从秘密时期到公开时期，贫农都在那里积极奋斗。他们最听共产党的领导。”^[4]他把农民描述为“革

命先锋”^[5]，而不提无产阶级的领导。正是这种对农民主导作用的强调，构成了其最具独创性的贡献之一，虽然只是在中国共产党逐渐控制了广大农村地区时，它在实践中的意义才显现出来。^[6]

革命的策略

共产党并没有很好地接受毛泽东的主张，原因之一是来自莫斯科的压力，莫斯科坚持要中国共产党同遭受大量农村暴动侵扰的国民党联合。不过，蒋介石已经转向右倾，因为他需要获取大企业势力在利益上的支持，为此，必要的话，他会不惜牺牲同共产党的联合。当共产党人在上海（它拥有最为集中的产业工人队伍）成功地组织了一次起义时，蒋介石就转而残酷无情地仇视他们，成百上千名中共党员被杀害，共产党被完全取缔。而斯大林无视这一灾难，仍想同已与蒋介石决裂的“左派”国民党领导人合作，这就意味着，为了不再失去国民党的支持，必须限制农民革命运动。斯大林关心的是，如何逃避对中国革命的明显失败所承担的责任；同时，面临同托洛茨基一决胜负，他自己也觉着在批判面前脆弱不堪。斯大林把国民党视为进步的革命力量，认为它绝对是反帝的，并且能完成标志着中国真正摆脱封建主义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并且，通过经济改造的办法为社会主义做准备。新生、弱小的共产党不能希求自己独自掌握政权，而应当参与到国民党中，由此结成民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农民和工人“四个阶级的联盟”。在托洛茨基看来，斯大林的观点是孟什维主义的——死板地信奉阶段论以及相信独立的资产阶级行动的可能性。与此相反，他确信，在中国，国民党就像1917年以前的俄国资产阶级，是受惠于地产收益和外国资本的，因此，在某种危急状态下，国民党必定会转戈反对工人。这恰恰在1926年就发生了。尽管托洛茨基认为社会主义革命不可能以农民为基础，尽管他质疑农村先锋队和农民游击队为基础的运动，也不相信民族主义对中国革命有多重要——这一切都表明他对1926年以后的事态缺乏洞察力，但是，他对斯大林的批判却被证明是正确的。^[7]

但是，托洛茨基的批判并未被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层所接受。迫于共产国际的压力，中国共产党领导仍遵循斯大林在1927年提出的那些毫无融贯性的政策：一方面，机会主义地与国民党联合；另一方面，继续举行武装起义，以表明1926—1927年的政策尚未失灵。在所有这些起义都不出所料地

失败之后，毛泽东同幸存下来的共产党士兵撤退到位于湖南东部边界荒凉的井冈山地区。在此，尽管遭到党的中央委员会的某些怀疑，但他还是有可能把他自己的某些土地改革的想法付诸实践。

毛泽东在1927年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尚未有关于土改的具体规划，但正如其他一些文件中所表述的那样，他的观点是非常激进的：或者是以不付地租的方式、或者是主动通过农会再予分配，凡占有30亩以上者，均应被没收。在井冈山刚站稳脚后，他马上着手实行这种激进的政策，将所有有产者划为敌人，甚至处死了其中的某些人。中央委员会对此还嫌不够，正如他所说，他们批评他“太右，烧杀太少，没有执行所谓‘使小资产变成无产，然后强迫他们革命’的政策”^[8]。1929年4月，当中国共产党的根据地从井冈山迁往环境更为适宜的赣南部地区时，毛泽东的政策改变为只没收地主财产，根据家庭的大小再行分配。当共产党壮大起来，并在1930年2月建立起江西省苏维埃时，甚至允许富农保有土地。

在这一阶段，社会和经济的改革都服从于发展壮大幸存下来的军事力量。正是红军能够生存、并壮大起来的能力才最终确保了毛泽东的观念在党内的胜利。20世纪20年代末，毛泽东对中央委员会关于城市无产阶级领导权的观念产生了怀疑。他们认为，党员应是清一色的农民或无产阶级，他们所热中的是全力以赴的斗争而不是逐渐扩大根据地。但正由于地处偏远一隅，他才免遭了过多的干涉。1929年，在接连几次武装起义失败之后，当时以李立三为鼓动性灵魂的中央委员会命令毛泽东分散其部队，理由是，城市仍然有望成为革命的信号弹，而红军所要做的无非是在农村发动群众以支援城市无产阶级。按照李立三的观点，城市是统治阶级的大脑和心脏，农村则不过是四肢而已，攻击四肢就太不积极了，心脏才是关键。因此，所有“以农村包围城市”或者“依靠红军取得城市的说法都是奇谈怪论”^[9]。不过，毛泽东还是认真地对待周恩来指出的党内无产阶级的比例从1926年的2/3下降到1929年仅有30%这一事实。他坚持认为：中国作为一个正被帝国主义列强争夺的半殖民地国家，必然导致革命阶级间纠缠不已的战争，这就意味着不能采纳俄国革命的模式。因此，李立三的政策被评价为：

单纯的流动游击政策，不能完成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任务，而朱德毛泽东式、方志敏式之有根据地的，有计划地建设政权的，深入土地革命的，扩大人民武装的路线是经由乡赤卫队、区赤卫大队、县赤卫总

队、地方红军直至正规红军这样一套办法的，政权发展是波浪式地向前扩大的，等等的政策，无疑义地是正确的。^[10]

1929年秋，莫斯科关于世界革命的政策变得更为激进了，中国共产党被迫发动了对中心城市的进攻。大概是违背自己对形势更为准确的判断，毛泽东本人也参与其中了。面对这些进攻一次次的失败，李立三成了莫斯科的替罪羊，并被莫斯科以某种理由谴责为“半托洛茨基主义”。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受莫斯科控制的党中央委员会，从上海半秘密活动状态转移到安全一些的江西根据地。此时，不仅在无产阶级领导权问题上，而且在军事问题上，党中央同毛泽东的分歧都尖锐起来。毛泽东从孙子这样的著作家中吸取了中国传统的精华，主张“我们的战略是‘以一当十’，我们的战术是‘以十当一’”^[11]。在已经成为最有权威性的章节中，毛泽东把他的战略概括如下：

分兵以发动群众，集中以应付敌人。

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

固定区域的割据，用波浪式的推进政策。强敌跟追，用盘旋式的打圈子政策。

很短的时间，很好的方法，发动很大的群众。

这种战术正如打网，要随时打开，又要随时收拢。打开以争取群众，收拢以应付敌人。三年以来，都是用的这种战术。^[12]

但是，在中央委员会看来，这种为了包围敌人而将其诱入共产党地区的政策过于保守。20世纪30年代初，粉碎国民党的围剿证明毛泽东的战略是成功的。但在1933年第五次反围剿期间，随着他在日益斯大林主义化的党内失势，与国民党主力硬碰硬的政策给党以毁灭性的打击。国民党用碉堡包围了共产党地区，对红军来说，剩下的唯一出路是突围出去，寻找避难之所。他们在1934年就是如此决策的，长途跋涉12个月，行程6000英里，跨越了最为艰难困苦的地带，终于在中国西北的延安找到一片相对安全的根据地。长征途中，在1935年3月（1月——译者注）的遵义会议上，毛泽东无可争辩地成为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者。

从1935年到1949年这些年间，共产党的势力稳步扩张。它先是与国民党结成统一战线反对日本侵略者，然后又在内战中与国民党交战。在延安根

根据地，共产党实行了温和的土地政策：地租被限制为收成的1/3；不没收土地；鼓励开荒以帮助共产党实现真正的粮食自给自足；为减少政府的财政支出，军队和党员干部参加耕作和其他生产活动。共产党零星的根据地被困困的状态意味着，军队被摆在前所未有的重要位置：

每个共产党员都应懂得这个真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我们的原则是党指挥枪，而决不容许枪指挥党。但是有了枪确实又可以造党，八路军在华北就造了一个大党。还可以造干部，造学校，造文化，造民众运动。延安的一切就是枪杆子造出来的。^[13]

由于被看作是日本侵略者最坚决的抗击者——长征在某种程度上被确认为一次抗日的远征，共产党人赢得了大量的支持。由于莫斯科的压力和日本人的入侵，才迫使共产党同国民党合作，然而，这种合作绝非实实在在，因为两党双方都意识到，内战最终会是不可避免的。

在1940年《新民主主义论》一文中，毛泽东就中国革命的前途作出概括。同列宁主义的思想——这一思想尤其为1935年后斯大林的第三国际人民阵线政策所看重——相一致，他在这篇文章中阐述了革命的阶段性，即在社会主义革命之前要进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

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必须分为两步，其第一步是民主主义的革命，其第二步是社会主义的革命，这是性质不同的两个革命过程。^[14]

但这不是旧式民主，而是一种新式的民主。

然而中国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自从一九一四年爆发第一次帝国主义世界大战和一九一七年俄国十月革命在地球六分之一的土地上建立了社会主义国家以来，起了一个变化。

在这以前，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是属于旧的世界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的范畴之内的，是属于旧的世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一部分。

在这以后，中国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却改变为属于新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的范畴，而在革命的阵线上说来，则属于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了。^[15]

由于帝国主义现象，中国作为其一部分的世界革命是一场社会主义革命，因此中国革命虽然是资产阶级的，但仍可被看作是处于无产阶级的领导之下：

这个中国革命的第一阶段（其中又分为许多小阶段），其社会性质是新式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革命，还不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的革命，但早已成了无产阶级社会主义的世界革命的一部分，现在则更成了这种世界革命的伟大的一部分，成了这种世界革命的同盟军。这个革命的第一步、第一阶段，决不是也不能建立中国资产阶级专政的资本主义的社会，而是要建立以中国无产阶级为首领的中国各个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新民主主义的社会，以完结其第一阶段。然后，再使之发展到第二阶段，以建立中国社会主义的社会。^[16]

毛泽东超越列宁，提出关于专政可以是几个革命阶级的联合专政的主张，他想强调的是中国人民作为一个整体的革命性质。而强调革命的资产阶级性质，可以使那些对社会主义缺乏热情的农民也感到满意。当他提到无产阶级时，他真正所指的是代表“尚未到场的”工人阶级的中国共产党。向社会主义的迅速过渡以及1949年以后中国的发展以无产阶级专政为核心，这些都是他当时的思想中所没有的。

与此同时，面对国民党的强大压力，伴随着共产党地区的扩大及其所带来的党员人数的增加，毛泽东着手加强党的力量，严明党的风纪，这集中体现在1942年的整风运动中。整风运动开了这类运动之先河，1966年的“文化大革命”则把这类运动推到极致。在整风运动中，毛泽东特别关心的是，党不应该成为外国模式、尤其是苏联模式的简单复制品：

成为伟大中华民族的一部分而和这个民族血肉相联的共产党员，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而代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17]

游击战争

从许多方面来看，毛泽东对当代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实践最富于独创性的贡献，是他的游击战术思想和在军事上同强大的敌人长期斗争中所采取的战略思想，他这方面最重要的著作要追溯到20世纪30年代。^[18]在这10年中，他所面临的问题是，如何指导农村地区开展反对控制着城市的国民党政府的游击战争；而后，又面临着在大部分国土被军事上强大的日本侵略者占领的情况下采取什么策略进行防御战的问题。毛泽东认为，游击队应该这样组织：尽管他们在整体上处于劣势，但通过迅速的集中，他们能以优势兵力发动局部的进攻。如果有可能，他们应该配合正规部队作战，在敌后活动，扰乱敌人的通讯联系等。最重要的是，游击队应该控制住他们可以做间歇性撤退的根据地。这些根据地应据有靠近山区、以沼泽或沙漠等为界的险要地势。在这些地区，部队自身可以种地、开展积极的生产。他们还可以帮助当地居民提高产量；可能的话，还可以组织一些基本的社会服务。这样既可避免部队成为地方的负担，又可抵制部队由于时断时续的无事可干所产生的无聊——这种闲散曾败坏了所有旧军队的精神风貌。

后来，这些战术被南斯拉夫铁托的敌后游击队、被阿尔及利亚的民族解放阵线，以及在古巴革命期间——当然，还有在印度支那——都被成功地予以运用。对这些战术作出印象至深阐明的是毛泽东的《论持久战》，这部著作以非凡的预见性勾画了抗日战争的整体发展进程。文章一开始，毛泽东就告诫人们既要放弃速胜的企图，又要反对必败的论点。日本确实在军事上和经济上都占优势，但他们从事的是非正义战争，缺少国际支持；而中国则可以依靠远远胜过日本的人力资源，在这种得到越来越多的国际承认的正义事业中，可以依靠不断增长的进步和团结的民族意识。这些因素意味着，战争将是持久的，并且要经过三个阶段：最初是以运动的游击战为主的防御阶段；然后进入相持阶段，在此期间，日本要花大力保卫它所占领的区域以便进一步扩张；最后则是中国转入正规部队进攻的阶段。这不仅是抗日战争的模式，也是后来内战的模式。对政治觉悟和道德风尚的重要性不断强调，对决定性的因素是人而不是武器的确信，这些理所当然成为整个中国革命的特征。

在中国，行政强制力和恐怖手段的使用都大大小于任何时期的苏联，这

是由于中国共产党人在思想意识的改造方面持乐观态度，这种改造主要是通过道德感化实现的。

毛泽东的哲学

同时，毛泽东还致力于奠定党的哲学基础，撰写了《实践论》、《矛盾论》两篇论文。在《实践论》中，他强调指出：“首先，马克思主义者认为人类的生产活动是最基本的实践活动，是决定其他一切活动的东西。”^[19]此外，“尤以各种形式的阶级斗争，给予人的认识发展以深刻的影响。在阶级社会中，每一个人都在一定的阶级地位中生活，各种思想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20]。他继承了马克思的传统，这种传统在卢卡奇、葛兰西和晚期列宁身上都有所体现。就马克思而言，对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的强调是最为根本的一点，而这在考茨基、早期列宁和斯大林身上却是缺乏的。《实践论》把《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和一种未经加工、归纳的自然科学方法紧密结合，否定马克思主义有任何本体论基础或者奠基性的形而上学。这一点恰好同毛泽东自己对书本知识和教条主义的反感相吻合，也契合了他从理论上对自己的政策作出辩护的愿望。延安政权尽管不符合正统的共产主义标准，但它在实践中的巨大成功证明了其思想的正确性。因为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哲学“强调理论对于实践的依赖关系，理论的基础是实践，又反过来为实践服务。判定认识或理论之是否真理，不是依主观上觉得如何而定，而是依客观上社会实践的结果如何而定。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的实践”^[21]。

在第二篇论文《矛盾论》中，毛泽东一开始就把流行的思想流派分为两种，一种是“形而上学的或庸俗进化论的宇宙观”，这种宇宙观把事物看成是“孤立的、静止的和片面的”，并“简单地从事物外部去找发展的原因”^[22]。与这种观点相反的是“唯物辩证法的世界观”，它主张：

从事物的内部、从一事物对他事物的关系去研究事物的发展，即把事物的发展看做是事物内部的必然的自己的运动，而每一事物的运动都和它的周围其他事物互相联系着和互相影响着。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不是在事物的外部而是在事物的内部，在于事物内部的矛盾性。^[23]

毛泽东把辩证法的“规律”的提法放在一边，而把矛盾的概念置于其世界观的中心。有一段论述，类似于他在《实践论》中反对过的关于所有存在物存在本体的说法，他断言：矛盾是普遍的，“存在于一切事物的发展过程中……每一事物的发展过程中存在着自始至终的矛盾运动”^[24]。这已经非常接近于建立一种本体论原则了。他批判了德波林（Deborin）及其学派作出的关于过程开始时并不存在矛盾，矛盾只存在于发展的一定阶段上的论断。

当然，毛泽东更为强调的不是矛盾的普遍性，而是它的特殊性。教条主义者“不了解应当用不同的方法去解决不同的矛盾，而只是千篇一律地使用一种自以为不可改变的公式到处硬套，这就只能使革命遭受挫折，或者将本来做得好的事情弄得很坏”^[25]，不同的矛盾要求用不同的方法去解决。例如：“俄国的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所解决的矛盾及其所用以解决矛盾的方法是根本上不相同的。”^[26]毛泽东尤其主张分析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他写道：“在复杂的事物的发展过程中，有许多的矛盾存在，其中必有一种是主要的矛盾，由于它的存在和发展规定或影响着其他矛盾的存在和发展。”^[27]这对当时实行的政策的意义是显而易见的：抗日战争是主要矛盾，反对国民党的斗争暂时是次要的。在历史唯物主义一般原理方面，毛泽东倾向于尽可能地强调政治、文化等上层建筑因素，后来，他充分利用了这些因素。他写道：

生产力、实践、经济基础，一般地表现为主要的决定的作用，谁不承认这一点，谁就不是唯物论者。然而，生产关系、理论、上层建筑这些方面，在一定条件之下，又转过来表现其为主要的决定的作用，这也是必须承认的。当着不变更生产关系，生产力就不能发展的时候，生产关系的变更就起了主要的决定的作用。……当着政治文化等等上层建筑阻碍着经济基础的发展的时候，对于政治上和文化上的革新就成为主要的决定的东西了。^[28]

毛泽东最终的观点是，任何一个矛盾中的各方面不仅是互补的——这是每一方面存在的必要条件，而且在它们各自向另一方转化时还是同一的。战争转化为和平，或者，更具体说来，“被统治的无产阶级经过革命转化为统治者，原来是统治者的资产阶级却转化为被统治者，转化到对方



原来所占的地位”^[29]。其结论是：“矛盾的斗争贯串于过程的始终，并使一过程向着他过程转化，矛盾的斗争无所不在，所以说矛盾的斗争性是无条件的、绝对的。”^[30]

[注释]

[1] 引自 A. S. Whiting, *Soviet Politics in China 1917—1924* (New York and London, 1954), p. 50.

[2] 《毛泽东选集》，2版，第1卷，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另请参见 S. Schram, ‘Mao Tse-tung and the role of the various classes in the Chinese Revolution’, in *The Polity and Economy of China* (Tokyo, 1975) pp. 225ff.

[3] 《毛泽东选集》，2版，第1卷，12~13页。

[4] 同上书，20页。

[5] 同上书，18页。

[6] 就毛泽东思想的独创性，见 B. Schwartz, *Chinese Communism and the Rise of Mao* (Cambridge, Mass., 1951) pp. 73ff. 一种相反的观点，见 K. Wittfogel, ‘The Legend of “Maoism”’, *China Quarterly*, Vols 1 and 2.

[7] 就托洛茨基对中国的评论，请进一步参见：L. Trotsky, *Problem of the Chinese Revolution* (New York, 1966) and B. Knei-Paz, *The Social and Political Thought of Leon Trotsky* (Oxford, 1978) pp. 358ff.

[8] 《毛泽东选集》，2版，第1卷，78页。

[9] 引自 B. Schwartz, *Chinese Communism and the Rise of Mao* (Cambridge, Mass., 1951) p. 139.

[10] 《毛泽东选集》，2版，第1卷，98页。

[11] 同上书，225页。

[12] 同上书，104页。

[13] 《毛泽东选集》，2版，第2卷，54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14] 同上书，665页。

[15] 同上书，667页。

[16] 同上书，671~672页。

[17] 同上书，534页。

[18] 特别是《抗日游击战争中的战略问题》和《论持久战》都可追溯到1938年。

[19] 《毛泽东选集》，2版，第1卷，282页。

[20] 同上书，283页。

- [21] 同上书，284页。
[22] 同上书，300~301页。
[23] 同上书，301页。
[24] 同上书，305页。
[25] 同上书，311页。
[26] 同上书，311页。
[27] 同上书，320页。
[28] 同上书，325~326页。
[29] 同上书，328~329页。
[30] 同上书，333页。

深入阅读材料

原著

毛泽东的基本思想体现在前四卷的《毛泽东选集》中，时间截至1957年底。还有几种一卷本的汇编，其中，最好的一种是施拉姆（Schram）的《毛泽东的政治思想》。这种汇编的必要补充材料是充分揭露1956年后事件的汇编——《未发表的毛泽东谈话与讲演录，1956—1971年》。

评论

有一篇反响强烈、极具批判性的入门文章，是多伊彻（Deutscher）的《毛泽东主义的由来与前景》。对有关背景更好的介绍性著作是费正清（Fairbank）的《美国与中国》（标题有点误导人）。

有关毛泽东的生平、思想，有两本短小精悍的述评，一本是菲茨杰拉德（Fitzgerald）的《毛泽东与中国》，另一本是斯马特（Smart）的《毛泽东》。篇幅较长的描述中，最好的要数施拉姆（Schram）的传记《毛泽东传》。威尔逊（Wilson）有一本论述较为全面的出色的选集——《历史视域中的毛泽东》，可以作为《毛泽东传》的补充。

1945年以前的中国共产主义

最为基本的材料还要算斯诺（Snow）的目击记录——《西行漫记》（又译为《红星照耀中国》）。中国共产主义的国际影响在德茵考斯（d'Encausse）和施拉姆的《马克思主义与亚洲》一书中作了叙述。一部不错的当代文献汇编是舒尔曼（Schurmann）和谢尔（Schell）的《共和中国》。菲茨杰拉德的《共产主义中国的诞生》是一本可信度高的短篇入门书。吉耶尔马兹（Guillermaz）第一卷包含有大量价值高的材料。施瓦茨（Schwartz）的《中国共产主义与毛的崛起》是由第一流的美国学者所作出的基础性研究成果。韩素音（Suyin）的《早晨的暴风雨》所作的激动人心的描述，故事情节发展到1935年。

这一年的事件恰好在威尔逊的《1935年长征》中获得了最为充分而全面的体现。综合起来看，最为可信而详尽的描述——尤其是军事方面——要数陈荣捷的著作——《毛泽东与中国革命》。当然，还可参见费正清的《美国与中国》。

参考文献

Mao Tse-tung: Texts

Mao Tse-tung, Selected Works, 5 vols (Peking, 1965—1977).

Selected Works, one volume, abridged by B. Shaw (New York, 1970).

Mao Tse-tung, Quotations (Peking, 1966).

Jerome Ch'en, Mao Papers: Anthology and Bibliography (Oxford, 1970).

Mao Tse-tung on Revolution and War, ed. M. Rejai (New York, 1970).

Mao Tse-tung: An Anthology of His Writings, ed. Anne Freemantle (New York, 1972).

Mao Tse-tung Unrehearsed, Talks and Lectures 1956—1971, ed. S. Schram (Harmondsworth, 1974).

Mao Tse-tung, A Critique of Soviet Economics (New York and London, 1977).

Stuart R. Schram, *The Political Thought of Mao Tse-tung*, 2nd edn (Harmondsworth, 1969).

Mao Tse-tung: Commentaries

Arthur Cohen, *The Communism of Mao Tse-tung* (Chicago, 1964).

—— ‘Maoism’ in M. M. Drachkovitch (ed.), *Marxism in the Modern World* (London, 1966)

P. Corrigan et al., *For Mao* (New York and London, 1979).

Isaac Deutscher, ‘Maoism: Its Origins and Outlook’, in R. Blackburn (ed.), *Revolution and Class Struggle: A Reader in Marxist Politics* (London, 1977).

C. P. Fitzgerald, *Mao Tse-tung and China*, rev. edn (London, 1977).

Leo Goodstadt, *Mao Tse-tung: The Search for Plenty* (London, 1972).

R. Howard, *Mao Tse-tung and the Chinese People* (London, 1978).

R. Payne, *Portrait of a Revolutionary: Mao Tse-tung* (New York, 1961).

L. Pye, *The Man in the Leader* (New York, 1978).

Edward E. Rice, *Mao's Way* (Berkeley, 1966).

Stuart Schram, *Mao Tse-tung* (Harmondsworth, 1966).

Ninian Smart, *Mao* (London, 1974).

Richard H. Solomon, *Mao's Revolution and the Chinese Political Culture* (Berkeley, 1971).

Stephen Uhalley, *Mao Tse-tung: A Critical Biography* (New York, 1975).

Dick Wilson (ed.), *Mao Tse-tung in the Scales of History* (Cambridge, 1977).

Chinese Communism pre-1945

Lucien Bianco, *Origins of the Chinese Revolution: 1915—1949* (Stanford, 1971).

C. Brandt, B. Schwartz and J. K. Fairbank, *A Documentary History of Chinese Communism* (Cambridge, Mass., 1952).

H. Carrère d'Encausse and S. Schram, *Marxism and Asia: An Introduction with Readings* (London, 1969).

Lionel M. Chassin, *The Communist Conquest of China: A History of the Civil War, 1945—1949* (Cambridge, Mass., 1965).

Jerome Ch'en, *Mao and the Chinese Revolution* (Oxford, 1965).

John King Fairbank,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3rd edn (Cambridge, Mass., 1972).

C. P. Fitzgerald, *The Birth of Communist China* (London, 1964).

Jacques Guillermaz, *History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1921—1949* (Folkestone, 1975).

Harold Isaacs, *The Tragedy of the Chinese Revolution* (London, 1938).

Chalmers A. Johnson, *Peasant Nationalism and Communist Power: The Emergence of Revolutionary China 1937—1945* (Stanford, 1953).

Donald M. Lowe, *The Function of China in Marx, Lenin and Mao* (Berkeley, 1966).

John E. Rue, *Mao Tse-tung in Opposition: 1927—1935* (Stanford, 1966).

Franz Schrumann and Orville Schell (eds), *Republican China: Nationalism, War and the Rise of Communism, 1911—1949* (London, 1967).

Benjamin Schwartz, *Chinese Communism and the Rise of Mao* (Cambridge, Mass., 1951).

Edgar Snow, *Journey to the Beginning* (London, 1959).

—*Red Star over China*, rev. edn (London, 1972).

Han Suyin, *The Morning Deluge: Mao Tse-tung and the Chinese Revolution 1893—1953* (London, 1972).

Dick Wilson, *The Long March, 1935: The Epic of Chinese Communism's Survival*, rev. edn (London, 1977).



第十六章 掌握政权的毛主义

经济发展的道路

1. “遗产”的继承与最初措施的执行

在推翻国民党取得胜利的前夕，中国共产党承继了处于崩溃中的经济“遗产”，惊人的通货膨胀引起币值严重暴跌，对外交往也完全中断（因为国民党的军队仍然封锁着中国东部海岸）。据统计，当时的工业生产低于战前水平，城市里存在着实实在在的饥荒威胁。当然，应付这些灾难，中国共产党有着如下的优势：可以依靠广大民众的善良意愿，他们正在经历着期盼了40余年的第一个统一的政府；有一个在多年内战中获

得了管理经验、组织完善和联系紧密的党的干部系统——这一点同苏联不同，苏联的内战发生在革命胜利之后而非革命胜利之前；中国拥有各种广泛而强大的国际联盟（这也跟苏联不一样），因此在世界舞台上不像布尔什维克的俄国那样孤立。新政权迅速采取了许多财政措施：统一并适当分配税收、主要通过规定基本商品的价格控制通货膨胀、实现收支平衡。与此同时，由于恰当地处理了工农业问题，因而基本实现了经济的恢复。与国民党联系密切的大资本企业收归国有，那些所谓的民族资产阶级控制的较小工商业则被保留、甚至被鼓励，这与列宁在布尔什维克革命后最初几个月所采取的政策是一致的。但是共产党采取的最重要的措施是1950年6月的土地法。它使得在后来二三年中实行的政策比内战期间在共产党占领区内实行的政策要温和得多。新法保证每个年满16岁的人都有一小块私有土地，一个五口之家大约可有一公顷土地。土地改革是在党的干部的指导下，由党在农村建立起来的、只限于贫下中农参加的农会的协助下，组织进行的。用于再分配的土地（总计大约占当时耕地面积的一半），是从宗教团体和地主手中没收来的。这种改革从根本上来说不是平均主义的，因为富农的土地是被保护的；但又不同于俄国新经济政策式的非平均主义：俄国的新经济政策不允许富农增加其财产。不过，这次改革基本上符合列宁和斯大林必先机械化、而后集体化的观点。毛泽东赞同这个纲领，但这个纲领的主要支持者是刘少奇，他断言：“只有当广泛使用机械化耕作，组织合作农场和对农村实行社会主义改革的条件成熟时，对富农经济的需要才能停止，达到这一点是需要时间的。”^[1]这次经济改革得到了婚姻法的支持，婚姻法的制定意在保证自由选择是每一对婚姻的基本原则。家庭对个人的封建统制，特别是父母对子女、丈夫对妻子的权威应该废止。

2. 第一个五年计划

恢复期的结束标志着1953—1957年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开始。中国经济在这些年中向社会主义迈进的速度比1949年的设想要快得多。这部分归因于，在那些年中，无论是在工业还是在农业中，计划和私有财产之间存在着不可避免的冲突；另一个原因则是朝鲜战争，它不仅给中国经济施加了沉重的负担，而且加速压缩了与政权潜在敌对的阶级的经济实力。在工业中，先是限制了民族资产阶级的利润所得，然后又没收了原本是为鼓励他们投资国家公债而给予的补偿费。大多数被剥夺者只不过仍保留着工商企业中的经理职务。实际上，到1956年底，工业的国有化已经完成。

第一个五年计划在工业中执行得非常成功，许多主要部门的产量在五年内翻了一番。苏联的援助也是成功的一个必要条件，有成千上万的苏联技术人员帮助安装机器设备、开办厂房，并为在俄国学习技术的中国技术人员提供一切培养上的便利。

在农业方面，为了抑制两极分化，别出心裁地开展了合作化和集体化运动。毛泽东指出：“大家已经看见，在最近几年中间，农村中的资本主义自发势力一天一天地在发展，新富农已经到处出现，许多富裕中农力求把自己变为富农。”^[2]富农们忙于巩固其地位、并充分拓展其优势。1952年间，为了相互帮助耕种土地，互助组成立起来了，后来又引进了半社会主义的合作社。在合作社中，根据个人或家庭最初投入的土地和资本的数目以及实际提供的劳动来分配收入。在更大规模的、完全社会主义的合作社中，土地、劳动和资本都归公共所有，收入根据完成的工作分配。到1956年底，所有农民实际上都已加入合作社，并且绝大多数加入的是完全社会主义性质的合作社——这比1953年制定的目标提前了10年。这种急躁冒进在执行中导致了某种程度的“粗制滥造”，并招致农民的某种反对。但这与20世纪30年代初苏联的规模相比，则不值一提了。这种急躁冒进之所以必然发生，基于两条理由：其一，是为促进工业而提高农业生产的需要。毛泽东对中国农村革命潜力的坚信和人胜机器的观念取向，使他终于一反刘少奇一直坚持的机械化必须先于集体化这种传统观点，而认为农业生产必须先于工业生产或者至少与工业生产同步提高；其二，是维持显著增长的人口口的需要。到20世纪50年代中期，在传统的小农经济中一切可能达到的改进显然都已达到，因此，需要迈出激进的新步伐。一定的农村合作社的基础已经显现在土地和劳动产品的公有化上，也体现在复杂的、广泛推广的大规模灌溉系统上——这些灌溉系统原本存在了许多世纪。上述两个因素使中国农业比任何其他非资本主义国家的农业都更为高效。这样，比起其同类——曾经被马克思生动地描述过的西欧个体农民，中国农民得具备更多的社会化心理。^[3]加之，在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时，就存在苏联经验，供中国公开参考：

如果我们不能在大约三个五年计划的时期内基本上解决农业合作化的问题，即农业由使用畜力农具的小规模的经营跃进到使用机器的大规模的经营，包括由国家组织的使用机器的大规模的移民垦荒在内（三个五年计划期内，准备垦荒四亿亩至五亿亩），我们就不能解决年年增长

的商品粮食和工业原料的需要同现时主要农作物一般产量很低之间的矛盾，我们的社会主义工业化事业就会遇到绝大的困难，我们就不可能完成社会主义工业化。这个问题，苏联在建设社会主义的过程中是曾经遇到了的，苏联是用有计划地领导和发展农业合作化的方法解决了，我们也只有用这个方法才能解决它。^[4]

以国民生产总值年增长8%左右和农业生产每年增长20%的发展速度，第一个五年计划取得了成功。中国正在朝着一种完全苏维埃式的计划经济体制迈进。

3. 大跃进

但是，在第一个五年计划结束时，增长率明显慢了下来。毛泽东信守着他那套经济不是渐进地、而是波浪式地发展的观点，发动了狂热的经济冒进运动，以此开始了第二个五年计划，这就是后来众所周知的所谓“大跃进”（Great Leap Forward）。虽然毛泽东在一段时期一直坚持认为，应该投资轻工业和农业，以便为重工业产品提供市场，但在1958年初他还是发动了“大跃进”。“跃进”首先是指，小规模的地方工业和农业的推进，其次指工业化部门对由此提出的需求的适应。这要靠全面动员本地剩余劳动力和发展地方能源及原材料来实现。后一方面政策的最惊人之举是，计划用遍布全国的成千上万个土法造炉来炼钢。毛泽东在一次巡视回来后写道：

在这次旅行中，我亲眼看到了群众巨大力量，在这种基础上无论完成什么样的任务都是可能的，我们必须先完成钢铁任务。在这些部门，群众已经发动起来了。然而，整个说来，国家还有些地方，有些企业，发动群众的工作还没有很好地贯彻……仍有些同志不愿意在工业领域中进行一场范围广泛的群众运动，他们把工业战线的群众运动称为“不合常规的”，并且把它贬损为“乡村工作习气”、“游击习惯”，这显然是不正确的。^[5]

这暗示了要从根本上分散经济计划，从而放弃苏联的投资模式。^[6]

与工业计划并行的是推广公社制度直接带来了农业生产的发展。公社运动旨在实现农业增长，以维持工业发展和日益增加的出口需要。像布哈林那样，毛泽东确认工业应为农业服务，推进公社是为了促进农民积累，



而不是像普列奥布拉任斯基（Preobrazhensky）和斯大林那样，为了重工业的利润而榨取农业剩余物。公社把几个大合作社结合成大约十万人的单位——不过，公社的规模大小极其不同。1958年期间，26 000个公社取代了74 000个高级社。这样一来，就可以根据公社的总体需要——推进轻工业和大规模的农业改造，譬如，灌溉——来调拨劳动力。公社所提供的餐饮、洗理和幼托等公用事业解放了大量劳动力（特别是妇女），并把农民的私有财产减少到最低程度。分配制度把按需和按劳结合起来。此外，公社成为地方政府的基层单位。

据官方资料统计，1958年间煤、钢铁和粮食的产量都增加了一倍多。事实上，“大跃进”时期所达到的生产水平，在其后的十年间都未达到过，官方的统计数据不久就倒转过来，显著下降了；在最初的狂热症“发作”中，无论目标还是结果都不切实际地带着许多幻想色彩。1959年到1961年三年间，发生了罕见的干旱、洪水等自然灾害。1960年7月，苏联的援助和技术专家一夜之间就撤回去了。尤为要紧的是，力图保持发展进度的艰难尝试到底难以为继，不得不半途而废。向集体财产制的仓促过渡引起了不满，缺乏通盘规划预示着会出现许多“瓶颈”和短缺环节。1960年到1962年间，尽管因官方的统计数字不再公开，衰退的程度难于确定，但中国的经济确实跌入到一个低谷。特别应指出的是，公社大多成了行政部门，管理着非农事业——公共设施、煤矿、化肥生产，而原来的合作社或“生产队”则越来越成为所有权和核算的基本单位，其中允许自留地，报酬与劳动付出挂钩，薪金不用实物、而用现金支付。

1962年以后，经济形势有所改善，但是为了抗击再次出现不平等，又开始酝酿1966年至1969年的“文化大革命”。对私有部门、激励机制和作为衡量经济活力指标的利润的重视，所有这一切都同刘少奇及“走资派”挂起钩来。不过，20世纪60年代初期的做法在很大程度上依然有效，“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的提法也仍旧遵循着。1969年后，在某种程度上重申了对工业的集中计划和要求钢铁、石油、汽车制造、核工业等部门稳步发展。不过，中国的中心问题是粮食问题，人口的增加使人均产量只略高于战前水平，平均消费和生活水准勉强有所增长。

阶级和矛盾

1945年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上，毛泽东在题为《论联合政府》的报告中指出：

只有经过民主主义，才能到达社会主义，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天经地义。而在中国，为民主主义奋斗的时间还是长期的。没有一个新民主主义的联合统一的国家，没有新民主主义的国家经济的发展，没有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和合作社经济的发展，没有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即新民主主义文化的发展，没有几万万人民的个性的解放和个性的发展，一句话，没有一个由共产党领导的新式的资产阶级性质的彻底的民主革命，要想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废墟上建立起社会主义社会来，那只是完全的空想。^[7]

然而，1953年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时，毛泽东就说过，向社会主义过渡实质上从1949年已经开始了。不过，这是否意味着阶级已被消灭了呢？回答是：阶级斗争在整个过渡时期依然存在^[8]，但向社会主义的过渡却可以是和平的，因为资产阶级为一方，农民和无产阶级为另一方，他们之间的矛盾是（或者至少可以是）非对抗性的。资产阶级确实经常被积极地认为是欢迎社会主义的。1937年《矛盾论》一文就坚持认为，因为矛盾是无所不在的，所以即便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矛盾也将存在。但这种观点只是在1957年题为《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才得到认真的阐述。在这篇文章中，毛泽东指出，在中国，社会主义已经取得了一定胜利，并且正处在进一步的建设过程中，但是矛盾——敌我矛盾、人民内部矛盾——依然存在。敌人包括所有反对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社会力量和集团，同他们之间的矛盾是對抗性的。而人民内部矛盾则是多种多样的：

在我国现在的条件下，所谓人民内部的矛盾，包括工人阶级内部的矛盾，农民阶级内部的矛盾，知识分子内部的矛盾，工农两个阶级之间的矛盾，工人、农民同知识分子之间的矛盾，工人阶级和其他劳动人民同民族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民族资产阶级内部的矛盾，等等。我们的

人民政府是真正代表人民利益的政府，是为人民服务的政府，但是它同人民群众之间也有一定的矛盾。这种矛盾包括国家利益、集体利益同个人利益之间的矛盾，民主同集中的矛盾，领导同被领导之间的矛盾，国家机关某些工作人员的官僚主义作风同群众之间的矛盾。这种矛盾也是人民内部的一个矛盾。^[9]

这些矛盾不一定是对抗性的：“工人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之间存在着剥削和被剥削的矛盾，这本来是对抗性的矛盾。但是在我国的具体条件下，这两个阶级的对抗性的矛盾如果处理得当，可以转变为非对抗性的矛盾。”^[10]这是因为“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同旧社会的矛盾，例如同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是根本不相同的。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表现为剧烈的对抗和冲突，表现为剧烈的阶级斗争，那种矛盾不可能由资本主义制度本身来解决。而只有社会主义革命才能够加以解决。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是另一回事，恰恰相反，它不是对抗性的矛盾，它可以经过社会主义制度本身，不断地得到解决”^[11]。

在很大程度上，同反革命的人民敌人的对抗性矛盾在共产党人夺取政权的最初暴力冲突中就已经解决了。^[12]而在农民、民族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内部的矛盾则采取一种持久的方式予以解决。“大跃进”期间，革命运动阶段论让位于“不断”或“间断”革命论。后一种革命论被用来论证采用适合于共产主义社会的公社制度的正确性。毛泽东说：“在取得一次战斗的胜利之后，我们必须立刻提出新任务。这样我们就能使干部群众保持革命热情、消除他们的自满情绪，使他们即使想对自己满足也顾不上。”^[13]后来他又说：“先进和落后是矛盾的两个极端，而‘比较’则是对立的统一……不平衡是宇宙的客观规律，事物总是从不平衡走向平衡，又从平衡走向不平衡，循环不已……而每次循环都达到一个更高的水平。不平衡永远是绝对的，平衡是暂时的，相对的。”^[14]即使共产主义也毫无例外地如此“革命”。毛泽东这种一般性的看法在20世纪60年代就提得很明确了。在此，他是这样概括他的哲学观点的：

恩格斯讲有三个规律，但在我看来，我不相信其中的两个规律……没有像否定之否定这样的事情。肯定、否定、肯定，否定……事物发展中，事件链条上的每一环节都既是肯定，又是否定……

社会主义也将被消灭，如果它不被消灭，也就不会有共产主义。

人类最终也将走向灭亡，神学谈论世界末日是悲观主义的，是为了吓唬人民。我们说人类的终结说的是将会产生出比人类更为先进的事物。^[15]

这种“不断革命”论听起来似乎同托洛茨基的观点相近，但实际上是迥异的。同托洛茨基比起来，毛泽东不得不——也必然地——在革命运动中赋予农民重要得多的角色，而托洛茨基对农民的革命潜力的看法比列宁还要悲观。因此，毛泽东拒绝采取斯大林实行的损害农民重点发展重工业的办法，而斯大林的这种做法与前面所述的托洛茨基的观点是一致的。进一步说，按照托洛茨基批评苏联做法的一贯原则，他肯定会否认，像中国共产党这样的政党能发动一场革命——且不说没有充当领导角色的无产阶级。由于1927年以城市为基地的共产党人惨遭失败和日本侵略者破坏了东部沿海地区的工业化进程，这已使共产党丧失了实实在在的工人阶级基础。1949年，尽管毛泽东把工作重心放到了城市，但伴随50年代中期中国脱离苏联发展模式，毛泽东主义的非无产阶级性更是显露无遗。当然，“无产阶级”作为一个理论参照点仍被保留下来，但更为关注的焦点却是党和农民。如同施瓦茨（Schwartz）所写的那样：“‘无产阶级’这一术语已经要求有新的内涵了。它已逐渐指涉一系列可为党和群众树立起真正集体主义行为规范的无产阶级道德品质。从很大程度说，它已同具体的阶级意义相分离。”^[16]的确，毛泽东经常笼统地谈到“群众”，他指的是较低阶层的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的集合体。“缺席”的无产阶级不能担负起对抗这些团体的领导权，因而党不得不扮演起“代理”角色。这种代理现象——党面对初衷并为非社会主义的农民阶级，扮演起无产阶级的角色——足可以说明党的专断性。^[17]

党和群众

1. 群众路线和民主集中制

从诞生时起，中国共产党就接受了列宁的民主集中制理论。允许自由的讨论，但决议一经作出，所有的人都要遵照执行。要与所有的人协商，但在党内，下级要严格服从上级。在长期的军事斗争中所实行的这种民主集中制



意味着，相对于民主倾向，党更侧重于集中。在1942年的一次讲话中，毛泽东谈到某些同志：“他们不懂得党的民主集中制，他们不知道共产党不但要民主，尤其要集中。他们忘记了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局部服从全体，全党服从中央的民主集中制。”^[18]不过，这种观点（曾始终得到了刘少奇的支持）被他的群众路线的理论缓和了。在一篇经典性的文章中，他对群众路线理论作了如下的发挥：

凡属正确的领导，必须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就是说，将群众的意见（分散的无系统的意见）集中起来（经过研究，化为集中的系统的意见），又到群众中去作宣传解释，化为群众的意见，使群众坚持下去，见之于行动，并在群众行动中考验这些意见是否正确。然后再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再到群众中坚持下去。如此无限循环，一次比一次更正确、更生动、更丰富。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19]

但是，中国的极端落后状态（这意味着首创之举必须来自党）却被毛泽东当做一种优势。他坚信人类本性的可塑性，并认为中国人民比其他绝大多数民族都更具可塑性：

中国六万万人民有两个显著的特点：一是穷、二是白。看起来这是件坏事，但实际上却是件好事。穷则思变，要干，要革命。一张白纸没有污点，好写最新最美的文字，好画最新最美的图画。^[20]

为使干部拥有赖以展开工作的领导权，密切联系群众是必备的素质。就好比一个工厂，没有原材料就不能运转一样。

没有民主，你们就不了解下面正在发生的事件，就不清楚总的形势，就不能收集到来自各方面的充分的意见，也不可能有上下级的任何沟通，上级领导机关就会依一种片面的不正确的材料作出决定。这样就很难不成为主观主义者，就不可能达成一致的理解和行动，也就不可能达到真正的集中。^[21]

然而，要是群众的首创被认为没有贯彻和体现毛泽东思想——如同“文

化大革命”中的某些情况，这种首创也不会得到认可。

2. 党的组织

在党与群众的关系中，最引为关注的一个事实是，居于高位的党的上层握有决策大权，相比之下，像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这样与党组织相对的国家机关则没有多少实权。而在党内，重要的决定由政治局常委会作出。政治局由全体中央委员会选举产生。而中央委员会只是偶尔开开会，例如1962年9月到1966年8月，中央委员会连一次会议也未召开过。有时召集起来也是为了追溯性地批准政治局已经作出、并执行了很长时间的重要决定。党的代表大会也是如此，1945年至1969年间只开过一次会。党的最高层的所有商议活动都笼罩在密不透风的神秘面纱之下，这就使得任何民主参与形式难于兑现。领导个人间的不同见解也完全不公开，比苏共高层内的“不同声音”更不为人所知。邓小平不可思议的宦海沉浮身历就是明证。农民在生产队中倒是有一些真正的自由，但作为大集体的公社的经济决策则要由党委作出。在工厂，来自下层的参与虽然也被鼓励过，但也是微乎其微，权力依然握在党的手中。工会的权限就被限定在扶助提高生产水平，它们的任何自治形式都遭到否决。这种地位与列宁1921年关于建立捍卫工人利益的组织的必要性——如有必要，还可以反对自己的国家——的观点大相径庭。另外，也不存在任何声张妇女权利的组织。

这样看来，中国共产党尚未完全摆脱20世纪30年代影响了所有共产主义政党的斯大林主义的阴影。由于党割断了同它被认为代表了无产阶级的联系，使得它与其说处于一个代表的位置，不如说是处在指挥的地位上，而这一事实进一步强化了斯大林主义的影响。毛泽东在党的等级秩序内的地位也助长了这种官僚式的集权主义。党员并不享有原初在布尔什维克内所盛行的党内民主传统。然而，正如与“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相伴而来的严重分裂所表明的那样，党并非坚如磐石。毛泽东本人绝不简单地是有独裁倾向的领导人，党内的许多同事都应当享有一定革命威望。因此，他有时还不得不采取手腕，利用这个人来反对那个人，甚至发动党外运动来推行其政治主张。毛泽东的支配地位似乎在20世纪50年代达到了顶峰。比方说，1955年，他可以公然反对中央集体的决议，一意推进集体化进程。但与他个人有关的“大跃进”的失败招致了严厉的批评，这种批评的背景则是许多中国领导人对他同苏联日益扩大的分歧深感不安。为回应当时的国防部长彭德怀对“大跃进”的批评——“政治挂帅不等于可以代替经济规律，更不等于可以

代替经济工作中具体的措施”^[22]，毛泽东指出：

由于去掉了计划，我是说，他们（计委）省却了全面的计划，简直不对需要多少煤、铁、运输作任何统计。煤和铁自己不会走路，它们需要工具运输，这一点我先前未看到，我和总理没有参与这件事，可以说我们对此并不知道。我本不应辩解，但我想辩解，因为我不是计委的头头。去年八月以前，我的主要力量集中在革命上。在经济建设到来的时候，我还完全是个门外汉，对于工业计划我什么也不懂……但是同志们，在一九五八和一九五九年中，主要责任应由我负，你们应该责备我。^[23]

在1959年8月庐山召开的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上，虽然毛泽东加重了对彭德怀的观点的谴责（与此同时，他也明显地修正了自己的观点。），但他自身的地位也大为削弱。1958年12月，他已辞去了政府首脑的职位，对党的事务的插手也大为减少，转而开始把受彭德怀的继任者林彪所控制的人民解放军视为可以利用来施展自己影响的权力基础。据说，在庐山会议召开前几个月的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甚至威胁说：“我将领导农民推翻政府。如果你们解放军不跟着我，我就组织一个红军，但我想解放军会跟随我的。”^[24]

然而，由于毛泽东的思想已被确认为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具体环境中惟一正统（合法）的解释，这种优越地位赋予他以巨大的权力（比方说，围绕着刘少奇和林彪倒台所发生的诸多事件就证实了这一点）。毛泽东思想——部分地出于其通俗易懂的文风——取代了马克思主义的其他经典理论。“文化大革命”一开始，《人民日报》就宣布：

对于毛泽东思想采取什么态度，接受还是拒绝，支持还是反对，爱还是恨，是区别真革命与假革命、革命与反革命、马克思主义与修正主义的分水岭、试金石。^[25]

毛泽东自称他只是为了抵制党内的官僚主义才鼓励对他的个人崇拜的。^[26]契合于儒家传统的是，人民在本性上被认为是善的，但他们又要求有开明的领袖把他们的福祉担负起来。照艾萨克·多伊彻（Isaac Deutscher）

的说法，“民族的历史、习俗和传统（包括儒教和道教的深刻的哲学影响），在毛泽东的政府的宗法性中、在其对群众展开工作和宣传的僧侣式作风中，以及在围绕领袖四周的神秘气氛中都得到反映”^[27]。

在中国，党对群众的态度的一些特点可以从以下两场运动——1957年的“百花齐放”运动和1966—1969年的“文化大革命”——的命运中看得更清楚，这些运动似乎（曾一度）否弃了党的家长式作风。

3. “百花齐放”运动

1956年5月，毛泽东对中国一定程度的自由化现象表示支持，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口号。实际上，伴随着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完成，农业集体化和工业国有化业已实现。国家未来的发展越来越有必要得到广大知识分子的积极合作。毛泽东说：“不让发表错误意见，结果错误意见还是存在着。而正确的意见如果是在温室里培养出来的，如果没有见过风雨，没有取得免疫力，遇到错误意见就不能打胜仗。因此，只有采取讨论的方法，批评的方法，说理的方法，才能真正发展正确的意见，克服错误的意见，才能真正解决问题。”^[28]这次运动还希望起到减少极端官僚主义的作用。

在1956年9月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上（在苏共二十大指责斯大林仅仅几个月后举行），出现了一股强大的建设性批评潮流。如批评某些集体化运动一直开展得过急，诉诸了不必要的武力；本该对群众的意愿给予更多的关注；官僚主义的滋长还得靠工人的参与予以抵制——工人进行管理的试验在北京电车公司已经开始，甚至对南斯拉夫的做法有了赞许的表示。在此期间，舆论鼓励同其他党派展开更多的合作。从形式上说，迷信领袖受到了正式的谴责。对这些批评意见，党的领导层中有很人——其中包括刘少奇——持反对态度，而毛泽东在1957年2月《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中却表示支持。这个讲话承认政府和群众之间存在着非对抗性矛盾的可能性，并且鼓励批评：“人们问：在我们国家里，马克思主义已经被大多数人承认为指导思想，那么，能不能对它加以批评呢？当然可以批评。马克思主义是一种科学真理，它是不怕批评的。如果马克思主义害怕批评，如果可以批评倒，那么马克思主义就没有用了。”^[29]

不过，由此引发的批评浪潮，特别是来自少数派党派的领袖、来自大学和一般知识分子的批评，对党的领导权敲响了警钟：出现了广泛的不稳定因素，甚至是对党的直接反对。结果是，为改革而进行的这场运动演变成了一场反右派的战役。毛泽东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在

1957年6月公开发表时，行文已作了重要的修改，尤其是对区别“毒草”与“香花”的标准作了详细说明。这些标准是：

言论和行为（一）有利于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而不是分裂人民；（二）有利于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而不是不利于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三）有利于巩固人民民主专政，而不是破坏或者削弱这个专政；（四）有利于巩固民主集中制，而不是破坏或者削弱这个制度；（五）有利于巩固共产党的领导，而不是摆脱或者削弱这种领导；（六）有利于社会主义的国际团结和全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国际团结，而不是有损于这些团结。^[30]

对这些标准制定的主旨的表述并不包含任何背谬，正如一方面“在群众中鼓励对问题的自由讨论”，但紧接着“百花齐放”运动也随之结束。

4. “文化大革命”

这样一个过程，即先是试图通过群众参与来动摇官僚主义，然后又将群众运动置于党的严格控制之下，在“文化大革命”又一次重演，而且是以一种更淋漓尽致的方式展开的。“文化大革命”最初是从1965年夏天对吴晗的《海瑞罢官》这个剧本的争论引起的。这出戏把一个16世纪批评皇帝的清官当做英雄。毛主义者认为这暗指彭德怀以及他对“大跃进”的批评。1966年6月撤销作为吴晗上级的北京市长彭真的领导职务成为这场运动的高潮。这表明，毛泽东在20世纪60年代初部分地退位之后仍然希望加强自己思想的影响，同时也表明，他对通过某些党内正常的渠道解决问题已经不信任了。“文化大革命”真正开始于1966年8月，当时在大学校园中开展了一场群众运动，意在铲除被视为是右派分子的人，进一步重申毛泽东的思想的重要性，同时抑制社会中的特殊化现象，并从根本上削减考试在社会中的作用。党组织派去指导这些运动的工作组遇到很大的困难，这一方面来自于教职员工的的不满，另一方面也来自于学生的诘难。在接连发生了更多骚乱的情况下，工作组被迫撤回。刘少奇和邓小平后来还因这次失误受到责备。

在1966年8月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上，渐为人知的是，面对刘邓的反对，毛泽东和林彪仍然坚持要恢复1958—1959年的政策。毛主义者一派获胜，作出了一个助长在党的正常渠道之外动员群众的决议。其斗争的目标是攻击那些“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31]，其手段就是发动众所周知的

红卫兵运动。

红卫兵运动是在党的上层斗争环境中发动的，但它渐渐地获得了自身的内在动力。红卫兵由一些学生组成，他们缺少老一辈共产主义者的苦难经历，因此很容易对当前政策进行批判，况且他们离开学校也不会立即给经济带来破坏。他们在北京举行大规模示威，还成群结队，长途跋涉，支援农业生产，参加农村秋收。无论走到哪里，他们都张扬群众的重要性，强调必须使群众自己感到有批判的自由、有反对一切保守势力的自由和造反的权利。所作所为的惟一准则是忠于党和毛泽东思想。

批判的首要靶子是刘少奇，他被指责为顽固派、反对苏联不坚决、过于强调“专”、总是鼓吹利润挂帅和物质刺激。刘少奇被称为“中国的赫鲁晓夫”，被描画成“文化大革命”要反对的一切东西与毛泽东思想的极端对立面的化身。

有些红卫兵运动是自发组织起来的，但要是没有党帮助安排免费交通、供给食宿等，绝大多数就不可能奏效。然而，当红卫兵攻击党员干部的办公场所、并力图让工人应召也参加到运动中来时，这场运动就开始失控了。红卫兵自身内部在策略上也产生了广泛的分歧。

毛泽东承担起了事态发展到这一阶段的责任，他对党的干部说：“对这种破坏性后果，我要负责”，但同时向他们保证，任何人都无意于打倒他们。然而，1967年1月，他又提出“夺权”的口号，从而为这场运动火上浇油。尽管引证马列的话多少有些误导人——因为毛主义者心里想的并不是用一个阶级代替另一个阶级，但这个口号确实暗含着建立新政权以代替旧政权的意味。关键性的转折出现在中国最大的工业城市上海。在这里，1966年12月关于把“文化大革命”扩展到工人中去的决议引发了大规模的骚乱，在年底爆发了一股罢工和煽动涨工资和改善工作条件的浪潮。以巴黎公社为榜样的说法在过去就存在，次年2月初，“上海人民公社”成立了。不过，当公社的领导串联到北京时，他们发现，毛泽东对他们的支持已缓和下来：

许多地方建立人民公社，并不适用于中央，中央发出一个文件说，除上海之外，任何地方都不许建立人民公社。主席的看法是，上海应该把人民公社改成革命委员会，或者市委会，或者市人民委员会。公社在镇压反革命时太软弱了。^[32]



下面是毛泽东作出同一评论时所说的另一段话：

如果全部（这些组织）都变成了公社，我们要党做什么？我们还把党放在哪里？在公社之下建立的委员会中，有些成员是党员，另一些人不是，我们要党做什么？我们把党的委员会放在什么地方？……必须有一个核心，叫什么名字都没关系，完全可以叫共产党，完全可能叫社会民主党，可以叫社会民主工党，国民党，一贯道，但在任何情况下都必须有一个党。在一个公社中必须有一个党，公社难道可以代替党吗？^[33]

毛主义者反对党组织的斗争的结果是从省一级以下建立革命委员会。这些委员会由群众代表、人民解放军的代表与“好”干部的代表组成，其任务是将高涨的群众情感导入政治目标中，同时，遏制工人的纯粹经济主义的要求。毛泽东是这样描述革（命）委（员）会的：

革命委员会的基本经验是，它具有三重性，是由革命干部的代表，军队的代表和革命群众的代表组成，形成了革命的三合一。革命委员会应实行一元化领导，削减多余的和重叠的行政机构，根据“精兵简政”的政策，组成一个与群众保持联系的革命化领导小组。^[34]

从1967年到1968年间，革委会的组建都受党中央和人民解放军的严密监控。它们是在不同的左派组织之间的冲突中产生的，这样的冲突通常引发群斗，因而只有靠军队介入才可得到控制。其结果是，军人和信得过的干部获得了凌驾于群众组织之上的优势。虽然群众组织大大有助于恢复党的行政管理的活力，但省革委的主任仍一律由军人或党的老干部担任。人民解放军在建立新政权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他们有时与红色造反派结成联盟，有时又反对他们。旧的官僚体系动摇了，而许多造反派组织又相互敌对而处于过渡状态，这就留下了权力真空，只待组织颇为紧密而又步调一致的解放军来填补。解放军几乎总扮演着缓解学生和群众运动的调解器的角色，这些运动同解放军的纪律性和秩序感是格格不入的。比方说，在武汉，军队就积极主动地镇压了一个造反派组织，该组织还获得了威震全国的中央文革委员会的支持。这种混乱局面原本只有靠周恩来的亲自干预才可平息。然而，总的说来，林彪领导下的人民解放军享有毛泽东的信任。早在1960年，

林彪就把军队作为思想纯正的样板树起来了。在1967年12月危机最严重的时刻，中央委员会决定，“所有过去关于军队不介入的指示”都宣告无效，“当无产阶级革命派尚不能控制局势的时候，就要求有人民解放军的保护，军队应当立即实行军管”^[35]。在后来的两年中，军人在省级党委中所占比例增至50%以上，这一占有比例有着重大的意义。最后，在1968年夏天，红卫兵被解散，很多学生和知识分子被下放到农村。

随着“文化大革命”的彻底结束，1969年党的“九大”重新确立了党的控制权。大会代表由上面指定而不是选举产生。新的中央委员会增加到279个委员，其中只有53人是上届中央委员会的成员，军人的比例占40%，红卫兵只有极少数几个。新党章规定，两次代表大会之间的期限增至5年，这样就使更多的权力掌握在政治局手中。毛泽东的法定继承人林彪在1971年迅速倒台，以及1976年反对“四人帮”的运动，标志着有原来的许多领导人复出——如曾在“文化大革命”中被贬黜的邓小平。邓小平的经历及其与“四人帮”的斗争表明，党内纷争的解决仅仅局限于党的机构的最高层，对于其中最赤裸裸的误传和诽谤的诸多事件，群众只是在事后才明白。

历史唯物主义

在“文化大革命”中，有一个中国式的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要素突显出来，那就是：中国人对人性和道德因素的重视。同马克思一般地突出经济的决定作用以及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依赖不同，毛主义恢复了上层建筑的地位，这与20世纪许多马克思主义形态相似，如葛兰西、斯大林主义等。中国历来就非常重视道德和政治态度，人们正是用这种观点而不是用任何其他观点来界定一个社会，并赋予它独特的特征。契合这一传统的是，1966年到1969年的事件应该描述为“文化”革命。文化革命对意识形态极为重视，不言而喻，这是一场上层建筑的斗争。向刘少奇和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人（“走资派”）发起攻击，与其说涉及特定的生产方式，不如说涉及的是思想观念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在对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的批评中，毛泽东这样写道：

斯大林这本书从头到尾没有讲到上层建筑，没有考虑到人，见物不

见人……苏联只讲生产关系，不讲上层建筑，不讲政治，不讲人民的作用，没有共产主义运动，实现共产主义是不可能的。^[36]

许多中国共产党人曾接受过这样的观点，中国只有经过长期艰苦的生产力的发展，才能为以后的社会主义文化的发展提供适当的基础。毛泽东却认为，靠加紧灌输社会主义意向就能产生思想范围内的革命，并进一步认为，这可以加快经济发展的步伐。换句话说，上层建筑的发展不仅与经济基础的发展并行不悖，而且它本身还可以成为经济基础发展的条件。这种人与革命进程的主观方面的关系，集中体现在“政治挂帅”这个毛主义的口号中。出于有必要唤醒过去数世纪囿于被动状态中的广大农民群众，使他们意识到自己的状况，从而采取一致行动，这一紧迫感又强化了上述思想倾向。

回顾 20 世纪 20 年代末毛泽东在井冈山的经历，那时的他就遭遇到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之间不一致的问题：分散的农民构成了士兵的绝大多数，因此必须对他们进行深入细致的政治教育，才能使其成为真正的红军。这就为其思想中关于阶级是一个主观概念的观点提供了某种依据。“阶级”概念更多地涉及一个人的立场、态度，而不是其社会出身。虽然党不断使用“无产阶级”这个术语，但却没有相应的阶级背景作支撑，这一事实恰好使上述观点得到了加强。党作为尚未“到场”的无产阶级的替身，必然意味着对意识形态要作出非经典马克思主义的特别强调。

这种对意识形态的强调常常以道德说教的口吻表达出来。儒家学说总是在一种一统的、不容异说的思想体系中把道德与政治联系起来。在毛主义者的文件中，道德标准同更为严肃的马克思主义范畴掺和在一起，这一特征如此醒目，正如施拉姆说过的那样：

细想一下毛在 20 世纪 50 年代提出的、今天仍被沿用的所谓“坏五类”的定义：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和右派。在这些范畴中，其中有两个是社会学意义上的、两个是政治意义上的，还有一个是道德意义上的。毛在把它们归并在一起的时候，似乎并没有觉察有任何矛盾或问题。难道他或许并不认为革命是无产阶级、农民和好人的事业？毛实际上与刘少奇共同使用了正是中国的、而且确切地就是孔子的概念，即认为把一个人的内在道德世界与他的外部行为和他的政治活动领域截然分开是不可能的。所有可以得到的证据不都表明了这一点吗？^[37]

的确，有时主观方面被置于首要地位。在写于1938年的一篇著名文章中，毛泽东说：

武器是战争的重要因素，但不是决定的因素，决定的因素是人不是物。力量对比不但是军力和经济力的对比，而且是人力和人心的对比。军力和经济力是要人去掌握的。^[38]

因此，特别在“文化大革命”期间，阶级斗争被说成发生在集体与个人利益互相斗争的个人意识里。对自我牺牲精神无休止的赞颂、对物质刺激歇斯底里的抵制，以及普遍的禁欲主义和清教徒主义也因此盛行于中国社会。

中苏论战

中苏关系总是表现为某种程度的紧张。四十年武装斗争和农民群众的发动是中国革命政权建立的序幕，这同俄国革命前的经历大不相同。苏联曾作为惟一获得成功的共产党国家，不可避免地成了中国共产党人效仿的模式。但同时，20年代末30年代初来自莫斯科的反复无常的、有时甚至是灾难性的指示开始激起中国人——特别是作为其首要受害者之一的毛泽东——对共产国际的不信任。毛泽东是在反对有共产国际支持的“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的情况下于1935年掌权的。此外，斯大林在20世纪30年代低估了中国共产党的的重要性，这恰好使中国共产党赢得了比其他共产党更多的独立自主性。

1950年2月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是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中心给予中国的正式支持，与此同时，还给予了相当可观的经济援助。在经济发展的轻重缓急及经营管理方法方面，第一个五年计划相当紧地追随了苏联这一先例。而苏联人在许多大型项目上给予了技术援助，还提供过长期贷款。这对一些实际上是白手起家的部门，如石油、电子等，以及对在苏联培训中国技术人才计划来说，是极其有利的。

由于苏共二十大谴责了斯大林及其个人崇拜，赞同和平共处，它对中苏关系发生了明显的影响。无论毛泽东对斯大林怀有多么矛盾的心理，对他个人崇拜的批判明显地触及他自身的地位。最初，中国的反应是温和的，斯大

林被说成是“一位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但同时又是一个犯过几次严重错误而没有认识到这些错误到底出在哪里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39]。就个人崇拜，中国的结论是：

马克思列宁主义承认领袖在历史上的重要作用。人民及其政党需要能够代表人民利益和意愿的杰出人物站在历史斗争的前列领导他们，否认个人、先锋和领袖的作用是完全错误的。^[40]

中国赞成莫斯科同铁托和好以及 1956 年苏联人在匈牙利的行动，甚至在 1957 年还从俄国接受了原子弹的样品。

但是，由于以 1959 年 9 月赫鲁晓夫与艾森豪威尔的戴维营会谈为标志的苏联缓和政策的发展，中苏分裂已是不可避免了。中国人对缓和的论调极其敏感，他们的革命斗争历程比苏联具有更多的国际斗争意义。总的说来，苏联的缓和政策意味着，当美国人在太平洋地区扩张其影响时，苏联恰好会减轻对美国的压力。从更为特定的意义上说，则意味着苏联人将严格限制其在台湾问题和加入联合国的问题上原本打算给予中国人的援助。苏联人在 1959 年中印边界的争端中奉行的是一种中立政策，结果使得中国人在外交上陷于孤立，他们的民族自豪感不断遭到冒犯，而且这一切似乎注定要无限期地延续下去。讲求缓和，强调和平共处，意味着中国在国际事务中的影响将减弱，因为国家往往是根据其经济财富来受评判的。如果苏联共产党按照经济实力来确定领导地位的意图实现了，中国则仍是一个非常下等的合作伙伴。毫无疑问，中国人也害怕苏联政策会导致苏联阵营中自由化的蔓延，中国自己在遭受“百花齐放”运动和“大跃进”运动相当大的失败之后，几乎再也经受不了这种自由化的折腾了。

不过，中苏分裂的更重要的根源在于对实现社会主义所持的不同模式。第一个五年计划已使中国人意识到苏联援助代价过高；而且，援助也过于集中在巨型的重工业上，而这对中国经济的其他部门来说并非关键。不仅仅因为苏联人在援助时，攥紧了拳头（毛泽东曾谈到，就这个问题同斯大林的谈判就像从轧石中取血一样），从而使得中国人感到，他们正被搁置在一种经济上的劣势地位上，而且并不能从中获取什么真正的好处。毛泽东说：“苏联的产品是笨重的、粗糙的、高价的，而且他们总是留着后手。”^[41]从 1955 年向着靠完全集体化提高农业生产的方向迈进时起，中国就开始脱离了苏联

模式（在1949年，这可是惟一可供选择的模式）了。与苏联相反，中国对农民和农村的重视程度相当于、有时更甚于重工业。继续采用苏联模式就会在城市和农村之间制造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农民毕竟是革命的创造者，不能把他们贬损为仅仅用于投资重工业发展的剩余积累的来源。所以，为了避免布哈林主义者所主张的通过农民小块土地的积累进行自然淘汰，有必要为推动农民走向社会主义而作出巨大努力。因此，中国才有了合作化、人民公社运动和“文化大革命”。而对中国的公社实验冷嘲热讽——如赫鲁晓夫所做的那样——是无益于中苏关系的健康发展的。

中苏在各自发展的道路上出现的分歧不断增长，这使得中国人民从资本主义复辟的角度来阐发自身对苏联的持续批判。把苏联当做资本主义的观点（最初是在20世纪60年代提出的）同毛泽东（而不是同刘少奇）有着特殊的关联（“文化大革命”的主旨之一就是，铲除那些想与苏联改善关系的人）。尽管这种资本主义的刻画常常只不过是一种责骂，但中国人想要表达的似乎是以下的意思：首先，斯大林以后的俄国已允许一个新的特权阶层存在。这个阶层由党的官员、公务员、知识分子等组成，这个阶层甚至被集合表述为“资产阶级专政”。这是由于恢复了作为衡量赢利率尺度的市场、物质刺激和悬殊的工资差别而得以可能。他们还在农村相应地鼓励自留地的存在。那些人还教条主义地断言阶级对立就要结束了（在这个过程中，生产关系同生产力的发展完全相适应），无产阶级专政结束了，剩下的只有“全民国家”和“全民党”。1968年苏联入侵捷克斯洛伐克之后，中国人立马就开始称苏联为“社会帝国主义”，如同称之为“资本主义”。随后，这一看法因1969年中苏边界之争而进一步加剧。

其实，在中国针对苏联的文献中，很难找到支持这些看法的真正站得住脚的分析，因为这些文献明显会招致异议。首先，讨论的大多数现象根源于20世纪30年代，因而并不能归咎于斯大林以后的一种退化。其次，马克思主义认为，划定一个社会阶级的标准是它对生产资料的关系，而不是对分配的关系。特权和悬殊的工资差别的存在似乎并不能使苏联出现一个资本积累的过程。说生产资料的国家所有是社会主义的必要的、而非充分的条件，这是一回事；而说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区别在于各种不同的人对剩余产品的分配实行不同的控制，那又是另一回事了。对苏联作“帝国主义”的描画也存在着类似的问题。在马克思和列宁的术语中，这个词指一个国家对另一个国家实行经济上的统治，这种统治是资本主义经济所必需的。苏联“帝国主

义”则更直接地是政治和军事的，而绝不属于西方世界那样的经济统治。还可以补充一点：就像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从社会主义倒回到资本主义的所谓“和平过渡”的说法，并不符合马克思主义。

中苏分裂的后果之一是，中国的外交政策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苏联是比美国更危险的敌人，这种观点（对其外交）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从20世纪70年代初开始，中国就倾向于用两个超级大国争夺世界霸权的观点、而不用传统的左派和右派的观点来看待世界。的确，中国通常采取一种适应于旧苏联的外交政策。但从70年代初看来，中国政府的对内政策越是激进，其对外政策的社会主义因素就越少。遵循林彪的经典表述，“世界的城市”（北美和西欧）将被亚非拉美等“农村”包围和征服，在60年代，中国给予过世界上许多的革命运动以大力的支援。但随着苏联是一个帝国主义国家的观点出台，中国的外交政策采取了一种新的形式。中国从道义上和经济上都支持班哥拉德施（Bangladesh）政府建立之前巴基斯坦左翼反对派军政府的武装镇压行动。1971年4月，中国还支持锡兰班达拉奈克（Bandaranaike）政府所采取的类似的措施。这种政策上的变化以尼克松总统的北京之行为显著标志，这一事件就发生在美国于海防港铺设地雷两个月后（两个月前——译者注）。北京很快就承认了智利推翻阿连德总统的军事政权，甚至给它以一定程度上的道义支持。在安哥拉内战期间，中国人支持以美国中央情报局为后台的“长枪会”，反对以莫斯科为导向的马克思主义者。这些出人意料的外交姿态只能建立在这样一个大胆的假定上——不妨作如此解释：苏联“社会帝国主义”是对全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最大威胁。

结 论

毛主义是列宁主义同中国经济的落后状态相结合，并吸收某些中国传统观念的综合产物。

毛主义的内涵包括如下几个最为典型的方面：

第一，中国旨在发展同工业相协调的农业，因此，农民并不是发展政策的牺牲品，相反，他们为实现发展目标而动员起来。中国共产党无可争议地是一个农民党，而农民构成了第三世界国家人口的绝大多数。基于此，中国能够成为大多数第三世界国家的发展样板。

第二，毛主义很强调思想意识的重要性。由于马克思主义是无产阶级的学说，因而有必要把无产阶级的或社会主义的意识灌输到农民中去。缩短资本主义阶段向社会主义阶段的过渡——无论从社会发展上，还是从思想观念上——意味着，要加快这种灌输的进程，于是就有了“文化大革命”。

第三，毛泽东在20世纪30年代形成的游击战争学说是建立在同农民的积极合作基础之上，在第三世界国家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第四，中国发展出诸多反官僚主义的斗争形式，它们就体现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并在“文化大革命”中付诸实施——尽管最终总是落于党的掌控之下。

第五，毛主义包含着对勤俭节约的清教徒式的道德说教和对公共利益的奉献、牺牲精神的张扬，而这些恰好是卢梭所感怀的。

[注释]

[1]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法》，88页，北京，法律出版社，1952。

[2] 《毛泽东文集》，1版，第六卷，43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3] 参见 K. Marx, *The Eighteenth Brumaire*, in *Selected Writings*, ed. D. McLellan (Oxford, 1977) pp. 317ff.

[4] 《毛泽东文集》，1版，第六卷，431~432页。

[5] 引自 S. Schram, *The Political Thought of Mao Tse-tung*, 2nd edn (Harmondsworth, 1969) pp. 253f.

[6] 进一步参见：“Mao Tse-tung, *A Critique of Soviet Economics* (New York and London, 1977)。

[7] 《毛泽东选集》，2版，第3卷，106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8] 然而，就毛泽东早期关于阶级行将消亡的观点，请参见 *Mao Tse-tung Unrehearsed*, ed. S. Schram (Harmondsworth, 1974) p. 269。

[9] 《毛泽东文集》，1版，第七卷，205~20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10] 同上书，206页。

[11] 同上书，213~214页。

[12] 不可能精确地确定到底有多少人在夺取共产主义的胜利中丧生了。大致的推算在13.5万与数百万不等。见 S. Schram, *Mao Tse-tung* (Harmondsworth, 1966) p. 267。

[13] Mao Tse-tung, ‘Sixty Articles in Work Methods’, quoted by S. Schram in *Mao*

Tse-tung in the Scales of History, ed. D. Wilson (Cambridge, 1977) p. 57.

[14] *Ibid.*, p. 58.

[15] Mao Tse-tung, 'Talk on Question of Philosophy', *Mao Tse-tung Unrehearsed*, ed. S. Schram (Harmondsworth, 1974) pp. 226ff.

[16] B. Schwartz, 'The Philosopher', in *Mao Tse-tung in the Scales of History*, ed. D. Wilson p. 24.

[17] 进一步参见 I. Deutscher, 'Maoism: Its Origins and Outlook' in *Revolution and Class Struggle*, ed. R. Blackburn (London, 1977)。

[18] 《毛泽东选集》，2版，第3卷，821页。

[19] 同上书，899页。

[20] *The Political Thought of Mao Tse-tung*, ed. S. Schram (New York, 1963), p. 253.

[21] *Mao Tse-tung Unrehearsed*, ed. S. Schram p. 164.

[22] *The Case of P'eng Teh-huai* (Union Research Institute, Hong Kong, 1968) p. 12.

[23] Mao Tse-tung, "Speech at the Lusan Conference", *Mao Tse-tung Unrehearsed*, pp. 142f.

[24] 引自 J. Guillermaz,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in Power 1949—1976* (Folkestone, 1976) p. 242.

[25] 引自 J. Guillermaz, *op. cit.*, p. 380.

[26] 见 S. Schram,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in *Authority, Participation and Cultural Change in China*, ed. S. Schram (Cambridge, 1973) p. 104.

[27] I. Deutscher, 'Maoism: Its Origins and Outlook' in *Revolution and Class Struggle*, ed. R. Blackburn (London, 1977), p. 213.

[28] 《毛泽东文集》，1版，第七卷，232页。

[29] 同上书，231页。

[30] 同上书，234页。

[31] 引自 L. Maitan, *Party, Army and Masses in China* (London and New York, 1976) p. 105.

[32] *Mao Tse-tung Unrehearsed*, ed. S. Schram p. 278.

[33] 引自 S. Schram, 'The Marxist', *Mao Tse-tung in the Scales of History*, ed. D. Wilson (Cambridge, 1977) p. 48.

[34] 引自 L. Maitan, *Party, Army and Masses in China* (London and New York, 1976) p. 249.

[35] Ibid. , p. 178.

[36] 引自 S. Schram, 'The Marxist', *Mao Tse-tung in the Scales of History*, ed. D. Wilson p. 57.

[37] Ibid. , p. 65.

[38] 《毛泽东选集》，2版，第2卷，469页。

[39] 引自 J. Guillermaz,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in Power 1949—1976*, p. 187.

[40] Ibid. , p. 188.

[41] *Mao Tse-tung Unrehearsed*, ed. S. Schram p. 199.

深入阅读材料

取得政权的中国共产主义

对中国共产主义的头15年的历程。舒尔曼（Schurmann）和谢尔（Schell）的《共产主义的中国》一书很好地汇集了相关的当代文献材料。共产主义在单个的农村的最初影响，在欣顿（Hinton）那本现已成为经典的《翻身》中有详尽的描述。对早年工业的叙述，可参见布鲁格（Brugger）的《中国工业企业中的民主与组织》一书。而毛泽东同苏联经济政策的分歧，可参见他本人的《对苏联经济的批判》和科里根（Corrigan）等人所著的书——《为毛辩护》——中对此的评论。韩素音（Suyin）为毛泽东所作的题为《风满楼》的传记第2卷与吉耶马茨（Guillermaz）对共产党的研究，都涉及这一时期中国共产主义的历程。舒尔曼的长篇著作——《共产主义中国的意识形态和组织》，很值得用心研读。麦克法夸尔（MacFarquhar）的《毛领导下的中国》完整地收集了《中国季刊》中的文章。

“文化大革命”

罗宾逊（Robinson）的《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和欣顿的《中国的转折点》是两本高度评价毛泽东主义的观点的导论性短篇著作。而不同的看法，可参见马伊坦（Maitan）在《中国的政党、军队与群众》中的半托洛茨基式的描述，以及哈利迪（Haliday）对马伊坦极具价值的评论——《马克思主义的分析和后革命的中国》。米尔顿和舒尔曼的《人民中国》包括了相关文献的完整汇编。经济方面的背景，在惠尔赖特（Wheelwright）与麦克法伦（MacFarlane）的《中国的社会主义之路》中有很好的说明。有关“文化大革命”，还可以参见范·欣内肯（Van Ginneken）的《林彪的沉浮》。最后，施拉姆的论文集《权威、参与与中国的文化变革》也是一个很好的汇编，编者本人写的长达100页的文字就是对“文化大革命”最好的概论性论述。

参考文献

Chinese Communism in Power

Jack Belden, *China Shakes the World* (New York, 1971).

William Brugger, *Democracy and Organisation in the Chinese Industrial Enterprise: 1948—1953* (Cambridge, 1976).

J. Chesneaux, M. Bastid and M.-C. Bergère, *China from the 1911 Revolution to Liberation* (Hassocks, Sussex, 1978).

P. Corrigan et al., *Socialist Construction and Marxist Theory* (New York and London, 1978).

Jacques Guillermaz,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in Power: 1949—1976* (Folkestone, 1976).

William Hinton, *Fanshen* (New York, 1966).

—*Iron Oxen: A Documentary of Revolution in Chinese Farming* (New York, 1971).

Christopher Howe, *Employment and Economic Growth in Urban China: 1949—1957* (Cambridge, 1971).

James Chieh Hsiung (ed.), *The Logic of 'Maoism': Critiques and Explication* (New York, 1974).

Chalmers A. Johnson, *Ideology and Politics in Contemporary China* (Seattle, 1973).

Stanley Karnow, *Mao and China: From Revolution to Revolution* (London, 1973).

Roderick MacFarquhar (ed.), *China Under Mao: Politics Takes Command* (Cambridge, Mass., 1966).

Franz Schurmann, *Ideology and Organisation in Communist China* (Berkeley 1966).

Franz Schurmann and Orville Schell (eds), *Communist China: Revolutionary Reconstruction and International Confrontation, 1949—1966* (London, 1967).

Mark Selden, *The Yen-an Way in Revolutionary China* (Cambridge, Mass., 1972).

Edgar Snow, *The Long Revolution* (New York, 1973).

Han Suyin, *Wind in the Tower: Mao Tse-tung and the Chinese Revolution, 1949—1975* (London, 1976).

Ezra Vogel, *Canton Under Communism: Programs and Politics in a Provincial Capital, 1949—1968* (New York, 1969).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Richard Baum, *Prelude to Revolution: Mao, the Party and the Peasant Question,*

1962—1966 (New York, 1975).

P. H. Chang, *Radicals and Radical Ideology in China's Cultural Revolution* (New York, 1973).

Jaap Van Ginneken, *The Rise and Fall of Lin Piao* (London, 1976).

Fred Halliday, 'Marxist Analysis and Post-Revolutionary China', *New Left Review* 100, (1976—1977).

William Hinton, *Turning Point in China: An Essay on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New York, 1972).

K. S. Karol, *The Second Chinese Revolution* (London, 1975).

Livio Maitan, *Party, Army and Masses in China: A Marxist interpretation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and its Aftermath* (London and New York, 1976).

Roderick MacFarquhar, *The Origins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1, Contradictions Among the People, 1956—1957* (Oxford, 1974).

David Milton, Nancy Milton, and Franz Schurmann (eds), *People's China: Social Experimentation, Politics, Entry into the World Scene, 1966—1972* (London, 1974).

Jan Myrdal, *China: The Revolution Continues* (London, 1973).

Joan Robinson,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in China* (London, 1969).

Stuart R. Schram (ed.), *Authority, Participation and Cultural Change in China* (Cambridge, 1973).

Edgar Snow, *Red China Today* (London, 1970).

E. L. Wheelwright and Bruce MacFarlane, *The Chinese Road to Socialism: Economics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New York, 1970).



马克思主义研究译丛

第十七章 拉丁美洲

引 言

拉丁美洲受殖民统治的时间要比中国长得多。由于直接遭受美国经济的渗透，19世纪和20世纪以反抗西班牙为主的民族解放斗争的成就被削损了。这一影响既有助于技术资本主义的迅速发展，又有助于保留由无地的雇佣劳动者所维持的大土地所有权。与此同时，大多数拉丁美洲国家长期存在着大量的手工业工人，其数量大大超过工厂的工人。最后，还出现了一个巨大的城市下层无产者群落，他们不定期地从事服务性行业，其数量比所有制造业工人（包括手工业工

人在内）还要多。

20世纪20年代，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登上了拉丁美洲的舞台。但由于工业发展水平不平衡，一般都认为马克思主义是保护相对弱小的工业无产阶级利益的，而民众则更愿意接受民粹主义或阶级合作主义思想，例如庇隆主义（Peronism）。因此，正统的共产党成了体制内部某一特定利益集团的捍卫者，而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式的革命政党。

古 巴

古巴革命就是拉丁美洲状况的一个典型代表，因为这个革命既不是工人阶级发动的，也不是共产党发动的。卡斯特罗（Castro）及其追随者们最初是从反西班牙和美国的旧式民族解放运动中获得启发的，而与社会主义并没有什么关联。起初，卡斯特罗在1953年试图推翻巴蒂斯塔（Batista），其后，他在1956年凭一小帮人成功地发动起游击战争，这一切都没有背离旧式的革命传统。卡斯特罗强调群众的支持，强调古巴必须掌握自己的命运，这些都是针对靠美国撑腰的、腐败而暴虐的巴蒂斯塔政权及其中产阶级联盟的。1956年11月发表的《七·二六运动宣言》宣称：

七·二六运动可以界定为以民主主义的、民族主义的和致力于社会正义的思想为指导的运动……所谓“民主”，七·二六运动认为杰斐逊的哲学仍然有效，并且完全认同林肯关于“民有、民治、民享的政府”的信条。^[1]

特别是，卡斯特罗没有认识到党的必要性。德布雷（Debray）曾引用过他如下的说法：

没有先锋队就没有革命；这个先锋队不必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政党，那些是想干革命的人，有权利和义务独立于这些政党把自己组织成先锋队。^[2]

但这并不否认，古巴工人阶级、而且确实是共产党，对古巴革命的成功

是必要的。甚至在最初进攻蒙卡达（Moncada）兵营时，就得到过工人阶级的大力支持。^[3]虽然起义军大部分是由激进的小资产阶级和农民等成分构成的，但它对资产阶级统治的反抗却得到了无产阶级强有力的援助。正是1959年无产阶级在那个关键时刻的总罢工使得卡斯特罗能够夺取政权。古巴共产党公开支持过1940年的巴蒂斯塔第一任政府，甚至在1952年政变以后，共产党的要员还成了巴蒂斯塔政府的成员。共产党曾把卡斯特罗的游击队当做“盲动主义者”来反对；只是在后者显然会成功的时候，它才给予公开的支持。同时，如果没有训练有素而纪律严明的共产党干部的积极参加，就不可能组建革命后的政府，并完成土地改革和群众教育的双重任务。

然而，古巴革命转向社会主义这一事实，更多的是出于外部的压力，而不是出于内在的动力。^[4]起初，古巴采取中立的外交政策和改良主义的国内政策，试图吸引私人投资。越来越多的国有化措施和农村合作社的兴办，招致了美国的抵制和封锁，因为美国错误地把这些看成是共产主义的信号。结果是促使大批古巴资产阶级移居美国，也促使古巴政治更加激进化。在美国支持的入侵猪湾行动（又称吉隆滩登陆事件——译者注）流产之后，卡斯特罗宣布古巴革命是“社会主义的”，此时，古巴的政治激进化程度达到了顶峰。

1961年7月，卡斯特罗宣告组成一个新的革命政党——社会主义革命党，并且合并了共产党——尽管在卡斯特罗的追随者与老派的共产党人之间仍然存在着紧张关系。巴西、哥伦比亚、委内瑞拉和秘鲁等国的共产党抛弃了暴力革命，从而更助长了这些分歧。与古巴的态度截然不同的是，苏联希望同上述国家加强外交和商务关系，因此支持拉丁美洲共产党抨击任何武装革命的战略。^[5]虽然巴蒂斯塔一倒台，古巴便大力强调按照苏联路线发展重工业部门，但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为了便于集中精力提高糖业生产水平，以便生产出为以后的多种经营所必需的剩余资金，古巴随即又放弃了苏联路线。古巴的许多经济计划总是过于乐观^[6]，但它在社会平等和教育方面的成就却最为引人注目。

古巴革命起源于反对殖民主义的游击战争，并认识到靠苏联的外援是靠不住的，这些曾使古巴革命比任何其他的共产主义运动（包括中国革命在内）更多地强调思想觉悟和主观因素。按照切·格瓦拉（Guevara）的说法：

一味幻想借助于资本主义遗留给我们的、用钝了的武器（作为经济细胞的商品、利润，以及作为杠杆的个人物质利益等）来实现社会主

义，很可能走入死胡同。

要建设共产主义，就必须在奠定物质基础的同时造就新人。之所以正确选择动员群众的手段如此重要，其原因就在于此。这种手段从根本上说来必须具有道德性，即不要忘记正确使用物质刺激，特别是那些带有社会性的物质刺激。^[7]

在强调共产主义道德层面的同时，他们拒绝分阶段走向共产主义社会的思想，并试图通过扩大免费公用事业来绕过商品交换的经济。

里吉斯·德布雷

切·格瓦拉的实践与里吉斯·德布雷（Regis Debray）的理论都认为，古巴的经验为拉丁美洲其他国家的革命提供了一个样板。德布雷的观点与正统共产主义者的观点形成鲜明的对照，后者坚持经典马克思主义关于分阶段发展的思想。照后者的说法，拉丁美洲正在经历一场由进步的资产阶级所领导的“民主”革命，来反对封建的土地所有者和美帝国主义。在这场“民族民主”革命成功以后，才会有社会主义革命。共产主义者的职责是参加议会和选举，以便建立由中产阶级政党领导的人民阵线政府，从而协助前一场革命取得成功。这一看法依据的是一种错误的预设，即认为在城市资本家为一方与封建地主或美帝国主义者为另一方之间，有着根本性的利害冲突。从马克思主义革命的观点看，这一战略显然不能令人满意，这就导致了马克思主义在拉丁美洲的独特发展，其表现形式就是里吉斯·德布雷的“游击中心”理论。德布雷不仅拒绝了莫斯科的模式，也不认同毛泽东的“四阶级统一战线”策略，甚至放弃了托洛茨基以混合发展和不平衡发展为出发点的不断革命论。

德布雷在其通俗的《革命中的革命？》一书中，对革命阶段问题作了如下回答：

这个问题的要害不在于革命的初期进展，而在于革命能否在资产阶级民主阶段以前、而不是在其后从实践中解决政权问题。……看来很明显，在南美洲，资产阶级民主阶段是以摧毁资产阶级国家机器为先决条件的。^[8]

而摧毁资产阶级国家机器就要求创立游击中心，即游击活动的根据地或中央。在德布雷看来，“在今天的拉丁美洲，就其后果而言，一条政治路线如果最终不能体现为明确而一贯的军事路线，它就不能被认为是革命的路线。”^[9]

革命者的根本问题是怎样推翻资本主义国家，其答案是：“通过在恰当选择的农村地区开展游击战争，或快或慢地集结起来一支机动灵活的战略力量，作为人民武装和未来社会主义国家的核心。”^[10]德布雷逐一驳斥了武装自卫战略（因为它太被动了，易受政府的镇压）、武装宣传战略（因为它只能在军事行动胜利之后而不是预先开展）和中国的游击根据地观念（因为它所需要的一些条件，诸如广大的领土、稠密的农村人口、与友好国家邻界，以及敌军兵力不足等，在拉丁美洲并不具备）。

然后，德布雷谈到了游击队与政党的关系这一核心问题。他说：“使游击小组在战略和战术上服从于一个尚未根本改变其和平时期常规组织的党，或者把游击小组作为党的活动的一个分支来看待，都势必引起一系列致命的军事错误。”^[11]只要非得与城市保持联系，游击队的领导人就势必脱离他的部队，而且不必要地冒被捕的危险。只要依赖城市，就会削弱游击队的士气，并往往遭到城市领导人的丢弃，因为后者生活在一个完全不同的环境中，遭遇的是不一样的问题。何况“山区能使资产阶级和农民成分无产阶级化，而反过来，城市则使无产阶级资产阶级化”^[12]。此外，依赖城市还会丧失掉游击活动制胜所必需的统一指挥，导致游击力量一盘散沙。

德布雷的结论是，军事从属于政治，这以在中国毛泽东的权力高于朱德、在越南胡志明的权力高于武元甲，以及俄国内战期间列宁和托洛茨基的地位为代表。而对拉丁美洲来说，这是不适宜的。因为在这里，共产党没有能够像在俄国和中国那样扎根和发展起来。因此：

在一定条件下，政治与军事不可分割，而是形成一个由人民武装构成的有机整体，其核心是游击队。作为先锋队的党自身可以以游击中心的形式而存在。游击队是尚未成熟的党。这是古巴革命提出的令人惊异的新鲜事物……人民武装将是党的核心，而不是相反。游击队是核心的政治先锋队，并且能够从它的发展中产生出一个真正的党。这就是为什么要发展政治先锋队就必须先发展游击队的原因。这也就是在当前关头为什么首要的重点要放在发展游击战争，而不是强调巩固现存的党或创

立新党的原因。这也就是为什么暴动在今天是头号政治活动的原因。〔13〕

德布雷关于游击中心的整个想法源于他对山区与平原或城市所作的对比。他把他所意想的的城市舒适生活对战士的影响估计得过头了。例如，当他说下面的话时，他对城市与山区所作的严格的二分法读来近乎于阶级二分法：

游击队与城市的领导人或其驻外代表进行联络时，就是在与“它的”资产阶级打交道。即使这个资产阶级是必要的（正如人在窒息时，人造肺是必要的一样），这种利益上的差别……也决不应被忽略。〔14〕

虽然中国出现过城市—农村相结合的路线，事实上，德布雷却颠倒了这一过程的顺序：

越南解放武装的军事金字塔是从基础上建造起来的，而在拉丁美洲……这种金字塔倾向于从顶部朝下修建——先是常备军（游击中心），然后是游击中心外围的半正规部队，最后或胜利后（古巴）则是民兵。〔15〕

德布雷的三大金科玉律——经常性的戒备、经常性的猜疑、经常性的转移——意味着把游击队同其他广大人民群众脱离开来，这与毛泽东关于农民是水、鱼在水中才能游的看法是完全对立的。

游击中心理论包含了把军事置于政治之上的取向，显得毫无主流马克思主义的特征。这是由于德布雷过高估计了拉丁美洲的社会政治结构的革命成熟水平。德布雷从来没有讲清楚，一支游击队如何必定能够发展成为群众性政治运动——而阿尔及利亚的经验却表明，它是如何可能导致一种僵化的官僚制度。这种藐视政治的倾向还不仅仅是策略上的。正如埃奎巴尔·阿迈德（Eqbal Ahmad）所写的那样：

德布雷的游击中心理论拒绝与老百姓的有机联系，其原因并非只是害怕自己遭受到政府的镇压——尽管这无疑是他立场中最引人注目的一面。这样做也不只是关系到如何取得最大限度的机动性和主动性的问



题。这让人感到有某种更深的、焦躁不安的东西，即：某种与农村人口疏远的意识（如果还不是完全不信任他们的话）；某种不受认同的推测——在拉丁美洲并不存在革命的客观条件，以及完全不相信政治过程和现有的政党是争取独立和社会革命的可能的工具。^[16]

伴随着古巴革命，自从拉丁美洲的资产阶级越来越趋于与美帝国主义结盟，为发动一场群众运动而明确声张要求的必要性就显得尤为紧迫了。再说，认为古巴革命没有党就成功了，也是一种误解。在那里，特别在奥连特（Oriente）省，群众性革命组织早就存在了。人们获得一种印象，即便没有政党，卡斯特罗分子也成功地进行了一场革命，以致他们的见解对拉丁美洲的游击战理论家们具有了吸引力，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然而，很多证据却表明，古巴革命极为特殊，因此不可能重演。首先，古巴革命在开始时的目标只是追求一个民主的、改良主义的政府；其次，当时的农民大多被机械化的资本主义大农场给无产阶级化了；再次，没有美国的干涉；最后，甚至连资产阶级也对巴蒂斯塔政权不满。像德布雷的游击中心论那样的理论，缺乏政治分析，带来的一个普遍性的后果是，把西班牙革命的伦理观同美国人对游击战技术细节的注重结合起来，而这种结合是由一种军事浪漫主义达成的。该观点又同西欧的城市恐怖主义运动（德国的巴德-迈因豪夫集团和意大利的红色旅）的关系密切。

〔注释〕

[1] Programme of the 26 July Movement, quoted in R. Scheer and M. Zeitlin, *Cuba: An American Tragedy*, rev. edn (Harmondsworth, 1964)..

[2] R. Debray, *Revolution in the Revolution?* (Harmondsworth, 1968) . pp. 96f.

[3] 详细的说明，请参见 J. Woodis, *New Theories of Revolution* (London, 1972) pp. 200ff.

[4] 对有关该论点的支持，可进一步参看 R. Scheer and M. Zeitlin, *Cuba: An American Tragedy*, *passim*.

[5] 参见 *Fidel Castro Speaks*, ed. M. Kenner and J. Petras (Harmondsworth, 1972) pp. 181ff.

[6] 参见 Cf. C. Auroi, *La Nouvelle Agriculture Cubaine* (Paris, 1975) pp. 213ff.

[7] C. Guevara, 'Man and Socialism in Cuba', in *Man and Socialism in Cuba: The Great Debate*, ed. B. Silverman (New York, 1971) pp. 342f.

[8] R. Debray, *Strategy for Revolution*, ed. R. Blackburn (London, 1970) pp. 71f.

[9] R. Debray, *Revolution in the Revolution?*, pp. 24f.

[10] Ibid., p. 25.

[11] Ibid., p. 65.

[12] Ibid., p. 75.

[13] Ibid., p. 105, 115.

[14] Ibid., p. 69.

[15] Ibid., p. 50.

[16] E. Ahmad, 'Radical but Wrong', in *Regis Debray and the Latin American Revolution* ed. L. Huberman and P. Sweezy (New York, 1969) p. 77.

深入阅读材料

古巴和拉丁美洲

有关描述对拉丁美洲的剥削的经典文献是弗兰克 (Frank) 的《资本主义与拉丁美洲的不发达现象》。佩特拉斯 (Petras) 的优秀研究著作——《拉丁美洲的政治与社会结构》可以作为该书的补充。

就古巴的背景, 参见布莱克伯恩 (Blackburn) 的近著——《奴役与帝国: 现代古巴的形成》。关于卡斯特罗, 见博纳齐亚 (Bonachea) 和瓦尔德斯 (Valdes) 编的《菲德尔·卡斯特罗选集》。肯纳尔 (Kenner) 和佩特拉斯的《卡斯特的演讲》收集了卡斯特的讲话记录。西尔弗曼 (Silverman) 的文集《古巴的人们与社会主义》重版了自 20 世纪 60 年代中期以来古巴人所进行的讨论。记录古巴群众参与活动的优秀著作是费根 (Fagen) 的《古巴政治文化的转型》, 也可参见蔡特林 (Zeitlin) 的《革命的政治与古巴的工人阶级》。奥康纳 (O'Connor) 的《古巴社会主义的起源》详尽地阐发了来自国际上的和经济上的压力。关于古巴的经济, 布尔斯丁 (Boorstin) 的《古巴的经济改造》是与这场改造有着个人纠葛的作者对古巴建国初期的研究。休伯曼 (Huberman) 与斯威慈 (Sweezy) 的《古巴的社会主义》考察了经济发展, 而弗拉吉纳尔 (Fraginal) 则提供了一项有关古巴主要产品——糖——的研究。巴尔金 (Barkin) 和马尼萨斯 (Manitzas) 提供了一部以社会主义为视角的、非常有用的论文集, 而瓦尔德斯 (Valdes) 和利尤文 (Lieuwen) 提供了一个内容广泛的参考文献。就新近的发展, 参阅佩勒兹—史塔伯勒 (Perez-Stable) 的讨论与奎尔克 (Quirk) 写的《卡斯特罗传》。

格瓦拉

最好的两部格瓦拉作品选是博纳奇亚和瓦尔德斯的《切·格瓦拉选集》(附有很好的参考文献)和杰拉西(Gerassi)的《我们必胜!——切·格瓦拉的演讲和论著》。优秀的评论有洛伊(Lowy)的《切·格瓦拉的马克思主义》。还有辛克莱尔(Sinclair)的“当代名人录”《格瓦拉》和拉夫雷特斯基(Lavretsky)的偶像化的传记《切·格瓦拉》。

德布雷

基本的读本是其精练的《革命中的革命?》。《革命战略》涵盖了有关古巴对拉丁美洲革命所提供的经验教训的各种论文。《狱中著述》以一种哲理化的方式刻画了德布雷。另参见他的修正主义著作——《武器的批判》。就评论而言,有布莱克伯恩为《革命战略》写的简短导言、有从正统共产主义的立场所作的批判——伍狄斯(Woodis)的《革命的新理论》,最好的还要算休伯曼与斯威慈的《里吉斯·德布雷与拉丁美洲革命》。

参考文献

Cuba and Latin America

Robert J. Alexander, *Trotskyism in Latin America* (Stanford, 1973).

L. A. Anguilar, *Marxism in Latin America* (New York, 1968).

David P. Barkin and Nita R. Manitzas (eds), *Cuba: The Logic of the Revolution* (New York, 1973).

Robin Blackburn, *Slavery and Empire: The Making of Modern Cuba* (London, 1978).

Edward Boorstin, *The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of Cuba* (New York, 1969).

Fidel Castro, *Selected Works of Fidel Castro*, 3 vols, ed. R. H. Bonachea and N. P. Valdes (Cambridge, Mass., 1972f.).

——*Fidel Castro Speaks*, ed. Martin Kenner and James Petras (New York, 1969).

Regis Debray, *Conversations with Allende* (London, 1972).

Theodore Draper, 'Castroism', in Drachkovitch (ed.), *Marxism in the Modern World* (London, 1966).

Richard R. Fagen, *The Transformation of Political Culture in Cuba* (Stanford, 1968).

Manuel Morino Friginals, *The Sugarmill: The Socio-Economic Complex of Sugar in Cuba* (London, 1977).

A. G. Frank, *Capitalism and Underdevelopment in Latin America*, rev. edn (New York, 1969).

- P. Freire, *The Pedagogy of the Oppressed* (New York, 1971).
- Leo Huberman and Paul M. Sweezy, *Socialism in Cuba* (New York, 1969).
- K. S. Karol, *Guerrillas in Power: The Course of the Cuban Revolution* (New York, 1970).
- Ralph Miliband, 'The Coup in Chile', in R. Blackburn (ed.), *Revolution and Class Struggle: A Reader in Marxist Politics* (London, 1977).
- James O' Connor, *The Origins of Socialism in Cuba* (Ithaca, New York, 1970).
- M. Perez-Stable, *The Cuban Revolution. Origins, Course and Legacy* (New York, 1993).
- James Petras, *Politics and Social Structure in Latin America* (New York, 1970).
- James Petras and Maurice Zeitlin, *Latin America* (London, 1968).
- R. Quirk, *Fidel Castro* (New York, 1993).
- Bertram Silverman (ed.), *Man and Socialism in Cuba: The Great Debate* (New York, 1971).
- N. Valdes and E. Lieuwen, *The Cuban Revolution: A Research Study Guide* (1959—1969) (New Mexico, 1971).
- J. Ann Zammit (ed.), *The Chilean Road to Socialism* (Brighton, 1973).
- Maurice Zeitlin, *Revolutionary Politics and the Cuban Working Class* (Princeton, N. J., 1970).

Guevara: Texts

- Che Guevara, *Reminiscences of the Cuban Revolutionary War* (New York, 1968).
- Che Guevara on Revolution: A Documentary Overview*, ed. J. Mallin (Miami, 1969).
- Che Guevara Speaks*, ed. G. Lanvan (New York, 1969).
- Che: Selected Works of Ernesto Guevara*, ed. R. E. Bonachea and N. P. Valdes (Cambridge, Mass., 1970).
- Complete Bolivian Diaries of Che Guevara and Other Captured Documents*, ed. D. James (New York, 1969).
- Diary of Che Guevara*, ed. R. Scheer (New York, 1968).
- Venceremos! The Speeches and Writings of Che Guevara*, ed. J. Gerassi (New York, 1968).

Guevara: Commentaries

- I. Lavretsky, *Ernesto Che Guevara* (Moscow, 1976).

Michel Lowy, *The Marxism of Che Guevara: Philosophy, Economics and Revolutionary Warfare* (New York, 1973).

Andrew Sinclair, *Guevara* (London and New York, 1970).

Debray: Texts

Regis Debray *A Critique of Arms*, 2 vols (London, 1977f.).

—— ‘Marxism and the National Question’ (interview), *New Leaf Review*, 105 (1977).

—— *Prison Writings* (London, 1973).

—— *Revolution in the Revolution?* (New York, 1967).

—— *Strategy for Revolution*, ed. R. Blackburn (London, 1970).

Debray: Commentaries

Leo Huberman and Paul M. Sweezy (eds), *Regis Debray and the Latin American Revolution* (New York, 1969).

Keith Reader, *Regis Debray: A Critical Introduction* (London, 1996).

Jack Woodis, *New Theories of Revolution: A Commentary on the Views of Frantz Fanon, Regis Debray and Herbert Marcuse* (London, 1972).



马克思主义研究译丛

第十八章 马克思主义与不发达现象

作为一个很简短的附言，应当提一下新近关于帝国主义和不发达问题的新马克思主义理论，这种理论主要是从拉丁美洲的经验中得到启发的。在经济领域中，他们都效法德布雷一类作家在政治领域中的做法，拒绝经典马克思主义的方法。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曾经宣告：

资产阶级除非使生产工具，既而使生产关系，从而使全部社会关系不断地革命化，否则就不能生存下去。反之，原封不动地保持旧的生产方式，却是过去的一切工业阶级生存的首要条件。生产的不断变革，一切社会关系不停的动荡，永远的不安定和变动，

这就是资产阶级时代不同于过去一切时代的地方……资产阶级……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它的商品的低廉价格，是它用来摧毁一切万里长城……的重炮。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文明制度，即变成资产者。一句话，它按照自己的面貌创造出一个世界。^[1]

他以同样的基调评论了不列颠在印度的进步性作用。只有在论及英国阻碍爱尔兰发展时，他才接近于认为，殖民资本主义产生的结果也许与在西欧获得的结果不同。与此形成对照，许多新近论述发展问题的马克思主义著作则强调，外国资本主义的渗透如何有效地“制造”出其受害者。^[2] 举个最明显的例子：显然，在任何一种关于发展问题的革命理论中，农民扮演了中心的角色。但是，在得出中国经验以前，农民一直只被看作提供剩余价值以投资于其他经济部门的源泉。例如，在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中，关注的焦点仍然是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对世界其他地区所发生的事情感兴趣，则大多说明西方工人贵族的出现或帝国主义列强之间战争的发生。即使在托洛茨基的混合发展和不平衡发展理论中，发达工业国的工人阶级也仍然占据着中心地位。在所有经典作家中，只有葛兰西在论述意大利南部问题的著作里，才严肃认真地提出了农民的不发达问题。关于帝国主义的传统见解则认为，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经济为寻求原料、寻找海外投资出路和扩大其工业品市场的必然发展。对帝国主义的后两方面假定看来已越来越（或者说，根本上）不适用了。这一事实彻底修正了许多马克思主义理论，以致某些思想家说，第三世界对于发达地区的发展已变得多余了。这种看法上的变化体现在下述事实中，即在列宁看来是进步的、民主的、阶级的民族资产阶级，而在大多数新马克思主义发展论者看来，则是反动的和寄生的阶级。对民族主义的基本地位的确认，对小资产阶级的作用的重新评价，对无产阶级的否弃 [像法农 (Fanon) 那样]，给予农民以中心地位，以及世界资源严重枯竭所带来的生态威胁，这一切都大大改变了问题的讨论情境，不同于马克思和列宁所处的时代。主张西方非工业化和第三世界农民自给自足的纲领，同经典马克思主义已无多少共同之处了。

[注释]

[1] K. Marx, *The Communist Manifesto*, in *Selected Writings*, ed. D. McLellan (Oxford, 1977) p. 224f.

[2] 在这方面，有创新力的著作是 P. 巴兰 (Baran) 的著作——《成长的政治经济学》(纽约, 1957)，请参见本书 323 页以下。

深入阅读材料

对马克思本人思想背景的说明，请参见梅洛蒂 (Melotti) 的《马克思与第三世界》和阿维纳利 (Avineri) 的论文集《卡尔·马克思论殖民主义和现代化》。对马克思主义的帝国主义理论的详细论述，见肯普 (Kemp)、萨特克利夫 (Sutcliffe) 和欧文 (Owen)、基尔南 (Kiernan) 和巴拉特—布朗 (Barratt-Brown) 的研究成果。一部优秀的、非技术性的评介是沃斯利 (Worsley) 的《第三世界》，但对这整个主题作出最好短篇介绍的是福斯特-卡特 (Foster-Carter) 的文章——“新马克思主义对发达与不发达问题的探讨”。基础性的作品有巴兰 (Baran) 的《成长的政治经济学》和弗兰克 (Frank) 的《资本主义和拉丁美洲的不发达现象》。他们的工作在阿明 (Amin) 的两部主要著作——《世界范围内的积累》和《帝国主义与不均衡发展》以及埃曼纽尔 (Emmanuel) 的《不平等交换》中得到了延续。同时也可参见阿里吉 (Arrighi) 的开创性研究——《罗得西亚的政治经济》，以及他最近的综论性著作——《帝国主义的几何学》。关于非洲，可参见法农 (Fanon) 的经典著作——《地球上的不幸者》及考特 (Cauter) 对此的评论，还有弗里德兰 (Friedland) 和罗斯伯格 (Rosberg) 合编的《非洲社会主义》、尼雷尔 (Nyerere) 的《乌贾马》与阿可 (Ake) 的《非洲的革命压力》。

参考文献

- Claude Ake, *Revolutionary Pressures in Africa* (London, 1978).
Samir Amin, *Accumulation on a World Scale* (New York, 1974).
——*Imperialism and Unequal Development* (Hassocks, Sussex, 1978).
G. Arrighi, *The Geometry of Imperialism* (London, 1978).
——*The Political Economy in Rhodesia* (The Hague, 1970).
Shlomo Avineri (ed.), *Karl Marx on Colonialism and Modernisation* (New York, 1968).
P. Baran,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Growth* (New York, 1957).
Michael Barratt-Brown, *The Economics of Imperialism* (London, 1975).



H. Bernstein, 'Modernisation Theory and the Sociological Study of Development', *Journal of Development Studies*, 7, 2 (1971).

David Caute, *Fanon* (London, 1970).

Gérard Chaliand, *Revolutions in the Third World: From 1945 to the Present* (Hassocks, 1977).

Renato Coustantino, *Neocolonial Identity and Counter-Consciousness: Essays in Cultural Decolonization*, ed. I. Meszaros (London, 1977).

A. Emmanuel, 'Myths of Development versus Myths of Underdevelopment', *New Left Review*, 85 (1974).

— *Unequal Exchange: A Study in the Imperialism of Free Trade* (London, 1972).

Frantz Fanon, *The Wretched of the Earth* (London, 1965).

Aidan Foster-Carter, 'Neo-Marxist Approaches to Development and Underdevelopment', in Emmanuel De Kadt and Gavin Williams (eds), *Sociology and Development* (London, 1974).

— 'Modes of Production Controversy', *New Left Review*, 107 (1978).

A. G. Frank, *Capitalism and Underdevelopment in Latin America*, 2nd edn (New York, 1971).

— 'The Development of Underdevelopment', *Monthly Review*, 8 (1966).

William H. Friedland and Carl G. Rosberg (eds), *African Socialism* (Stanford, 1964).

David Horowitz, *Imperialism and Revolution* (London, 1971).

Emmanuel de Kadt and G. Williams (eds), *Sociology and Development* (London, 1974).

John H. Kautsky, *Communism and the Politics of Development* (New York, 1968).

Tom Kemp, *Theories of Imperialism* (London, 1967).

V. G. Kiernan, *Marxism and Imperialism* (London, 1976).

George Lichtheim, *Imperialism* (New York, 1971).

— 'Oriental Despotism', in Lichtheim, *The Concept of Ideology* (New York, 1967).

Umberto Melotti, *Marx and the Third World* (London, 1976).

Julius Nyerere, *Ujamaa: Essays on Socialism* (Oxford, 1968).

Hugo Radice (ed.), *International Firms and Modern Imperialism* (London, 1975).

Gareth Stedman-Jones, 'The History of US Imperialism', in Robin Blackburn

(ed.), *Ideology in Social Science: Readings in Critical Social Theory* (London, 1972).

R. B. Sutcliffe and R. Owen, *Studies in the Theory of Imperialism* (London, 1972).

José Villamil (ed.), *Transnational Capitalism and National Development: Studies in the Theory of Dependence* (Hassocks, Sussex, 1978).

Peter Worsley, *The Third World* (London, 1967).

Zhongqiao Duan, *Marx's Theory of Social Formation* (Aldershot, 1996).

第五编

欧洲和美国的当代马克思主义

理论要求是否能够直接成为实践需要呢？光是思想竭力体现为现实是不够的，现实本身应当力求趋向思想。

卡尔·马克思，1844



马克思以后的马克思主义

引 言

1914年第二国际的解体以及随后20年间西欧工人阶级运动的受挫，给欧洲和美国的现代马克思主义留下了深刻的印记。这一崩溃意味着马克思主义思想的重心转移到了东方，然而，它在那里不久也因斯大林的上台而被压制下去了。本书最后一编里所考察的人物，同上一代马克思主义重要理论家不同，他们都不是政党中的重要角色。他们不是政治活动家而是学术界人士，他们在工人阶级的活动低落时期从事写作，从而相对地脱离了政治实践。因此，在他们的著作里，哲学、认识论、方法论，甚至美学比之政治学或经济学均占更大的比重。有一个时期，所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议会制民主已变得日常规范化，并且其经济也获得了长时期的空前增长，于是，在许多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中间，滋蔓着一种逆来顺受的悲观主义情绪——这一悲观主义情绪并没有因意识到苏联官僚主义的压迫性而有所缓减。从地缘上讲，马克思主义的思想集中于德国、法国和意大利这几个存在共产主义大党的国家。马克思是从哲学开始，然后转向经济学的，而典型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想家们却反其道而行之；甚至在某些情况下，试图用一种先于马克思本人的哲学——比方说，阿尔都塞（Althusser）著作中的斯宾诺莎，或者柯莱蒂（Lucio Colletti）著作中的康德——来补充马克思主义。



第十九章 法兰克福学派

法兰克福学派与政治

没有什么比法兰克福学派的论著更能说明这种思想情形的变化。20世纪20年代，欧洲主要的思想家——卢卡奇、科尔施，以及葛兰西——全都积极参与政治，法兰克福学派则相反，它不归属于任何正式的政治党派。在一名富裕粮商的巨额捐款的赞助下，社会研究所于1923年在法兰克福宣告成立，它为法兰克福学派的工作奠定了组织基础。希特勒的崛起意味着研究所成员（他们几乎都是犹太人）侨居异乡，最后，该所于1936年重建于纽约。直到大战以后，它才迁

回德国。1930年马克斯·霍克海姆（Max Horkheimer）担任了所长以后，具有法兰克福学派独特风格的典型观念才得以诞生。最早的所长是维也纳人卡尔·格吕恩堡（Carl Grünberg），他起初是一名社会主义思想史学家，具有奥地利马克思主义的背景。他曾编辑《社会主义和工人运动历史档案》，该杂志曾为研究所许多最初的出版物提供了园地。

虽然这些出版物包括了卢卡奇和科尔施撰写的文章，但大部分作品主要还是立足于第二国际多少带有机械性的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研究著作。卡尔·维特福格尔（Karl Wittfogel）对中国的经济和社会作了实证主义的分析；弗兰茨·博尔克瑙（Franz Borkenau）研究了资产阶级世界观的产生；亨利克·格罗斯曼（Henryk Grossmann）以详尽的分析为资本主义超额积累必将导致利润率下降和资本主义制度崩溃的观点作了辩护。^[1]这三个人都是共产党员，以赞赏的眼光看待苏联，并致力于分析资产阶级社会的社会经济基础。由于1930年霍克海姆被选为所长，这个所的政策有了一个显著的转变。从政治上说，该所成员倾向于既反对社会民主党人的改良主义，也反对以莫斯科为导向的共产主义日益僵化的教条。他们不带任何政治党派之见，把注意力首先集中于资产阶级社会的文化上层建筑，从而力图重新考察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基础。

由于既对西方也对苏联感到失望，霍克海姆及其最亲密的合作者西奥多·阿多尔诺（Theodor Adorno），从20世纪20年代的委员会共产主义者（如科尔施、特别是卢卡奇，他们重新发现了马克思主义思想中哲学的一面）那里受到了一定程度的鼓舞。法兰克福学派的很多著作，把论述的中心放在物化概念上，这也是《历史和阶级意识》一书的核心所在。而卢卡奇对整体性概念的强调则帮助法兰克福学派纠正了相对忽视上层建筑因素的现象。但是，他们的著作更多地还是重申马克思主义中黑格尔的一面。例如，在霍克海姆看来，黑格尔包容一切唯心主义具有寂静教派的政治含义，他最终倾向于把主观与客观、精神与物质等之间的矛盾归结为某种根本的同一性，这便削弱了思维的批判性，使真正改变世界几乎变得不可能。另外，法兰克福学派不仅注意复兴马克思主义传统中的某些成分，还有志于把像精神分析学这类最初是非马克思主义的学科融进马克思主义。甚至在哲学领域里，霍克海姆（与法兰克福的大多数人一样）早期既受到叔本华（Schopenhauer）、康德（Kant）等唯心主义哲学家的影响，也受到尼采（Nietzsche）、狄尔泰（Dilthey）和柏格森（Bergson）等晚近的思想家“非理性主义”的影响，

他把非理性看成是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愈来愈压抑个体的抽象一致性的抗议。尽管法西斯主义者在20世纪30年代为了替其非理性目的辩护而歪曲了这些思想家，但这些思想家却对人类生活中的主观和心理诸方面给予了极具价值的关注，这些人性的方面似乎因为垄断资本主义的技术心理日益渗透入社会而被抹杀。当然，霍克海姆不赞成他们忽视现实的物质方面，因为无论法兰克福学派对马克思作出多大的修正，他们绝不否定马克思关于经济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起决定性作用的观点。但是，他们显然没有做到的是，把他们在经济学中感兴趣的东西融入对整个社会的分析中去。

这个缺陷就反映在他们的政治态度上。20世纪30年代初期，研究所成员至少在观念上信奉政治实践。他们虽然没有一个社会变革的特定纲领，但整个地热烈赞同无产阶级的事业，并坚定地强调实践的重要性。他们相信，他们的工作有助于阐明在社会中起“反动”作用的对抗力量，从而提高被剥削者的（阶级）觉悟，并为他们提供从事解放斗争的武器。霍克海姆对这一立场作了最有力的阐述。他写道：

如果理论家及其具体研究的对象被认为与被压迫阶级形成了能动的一致，以致他对社会矛盾的解释不仅仅是对具体历史状况的表述，而且是激发历史内部发生变化的一种推动力，那么他便真正尽到了职责。阶级中的先进成分与讲出有关阶级真相的个人之间的冲突过程，就像最先进成分连同其理论家与该阶级的其他成分之间的冲突过程那样，可理解为一个相互作用的过程。在这一过程里，伴随着有激励作用、但也需要有纪律约束的追求解放——甚至有进攻性——的力量的到来，（阶级）觉悟趋于成熟。^[2]

这个观点与列宁主义的观点不同。在列宁主义的观点里，知识分子和先锋队的领导完全是一回事。即便如此，在同工人阶级政治组织建立有意义的联系上，法兰克福学派却显然失败了。霍克海姆认为，工人委员会制度是1919年在德国最新创立的范例，它展示了走向新社会的道路。他写道：

新社会的各种形态都是在其自身变革的过程中首先被发现的。按照其先驱者的意图，作为理论观念的工人委员会制度是想展示出迈向新社会的道路。这一理论观念是从实践中产生的。它可以追溯到1871年和

1905年等事件。革命总有一种传统延续下来为理论提供依据。^[3]

霍克海姆对罗莎·卢森堡的思想和活动的钦佩，也表达了这样的观点。然而，该研究所强调对社会作整体性分析，也就妨碍了对具体政治问题的关注。譬如，他们没有与科尔施保持沟通，而科尔施是一位最接近他们的总体观点的政治活动家。总而言之，他们没有愿意接受其理论的听众。他们对斯大林主义的绝望，也意味着德国共产党对他们来说同样是不能接受的。正如马尔库塞后来写道：

领导的决策越来越脱离无产阶级的阶级利益。领导的决策不再把无产阶级设定为革命的动力，而是把自身强加领导于无产阶级和其他下层民众中。^[4]

甚至布兰德勒（Brandler）领导下的奥地利共产党反对派，在他们看来也是不能接受的，因为无论这一派怎样严厉批评共产国际的官僚主义集权制，它仍然赞许斯大林主义。法西斯主义的崛起和研究所迁移到美国，加剧了上述不接受的倾向。在美国，该学派完全脱离了革命工人阶级的活动，这就更加滋长了政治上的悲观主义和无可奈何的情绪。霍克海姆在《理性的衰落》中写道：

那么，难道如上述所说那样，行动主义、尤其是政治行动主义，才是完成使命的惟一途径吗？我不敢肯定。这个时代并不要求为行动增加任何刺激。哲学决不能变为宣传，即使是出于可能是最好的动机。^[5]

惟有马尔库塞继续倡导从富裕社会中解放出来的必要性，而霍克海姆和阿多尔诺最终完全放弃了对革命前景的展望。

批判理论

法兰克福学派喜欢把他们的观点标示为“批判理论”。虽然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同样反对被它视为过分唯心主义的现象学，但它主要针对的还



是实证主义。实证主义在资本主义兴起时期是一种进步的力量，晚近却已变成物化的一个根源和对现状的一种消极认可力量。对实证主义的批判有时甚至扩及马克思自身的著作，因为他们认为，马克思在社会分析中很少关注上层建筑方面的社会支配作用。因而法兰克福学派对精神分析学的兴趣越来越大，并集中关注人的个性方面，而这些光靠追逐经济福利是不能实现的。

1937年，霍克海姆发表了一篇题为《传统理论和批判理论》的文章，对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观作了最出色的概括。霍克海姆一开始就提出“什么是理论”的问题。他的答案是：“对大多数研究者来说，理论是某一学科全部主张的总和，这些主张相互联系得如此紧密，以致其中只有几大主张是基本的，其余的都由此衍生而出。”^[6]这几大基本主张在笛卡儿（Descarte）那里是通过演绎得出的，在约翰·穆勒（J. S. Mill）那里是通过归纳得出的，而在当时的经验主义社会学中，上述研究方式也显而易见，即试图“把对社会现象的描述竭力上升为对它们的详尽比较，然后方可形成总的概念”^[7]。无论基本的原理是经由挑选或直观得来，还是仅属约定而成，在概念化形成的理性认识与被纳入此种知识范畴之下的事实之间，毕竟存在着同样的区别。在这种传统理论看来，“个别客观事实的出现、概念系统之实际运用于掌握事实，以及这些概念系统在教育中的作用，这些都被看作是完全外在于理论思维自身的东西”^[8]。

可是，批判理论则摒弃这些二分模式，认为它们是一种“异化”，从而造成价值与研究（以及作为研究内容的事实——译者注）、认识与行动之间的分离。思维着的人总是其研究对象的一部分，无论把知识分子看成“自由漂浮”（超然）于社会之上〔像曼海姆（Mannheim）那样〕，还是把他看成完全归附于社会之中（像庸俗马克思主义那样），都是错误的。因此，批判理论的观点是：

不只是一要消灭这种或那种弊端，因为批判理论把这些弊端看成是与社会体系的组成方式必然相联系的。虽然批判理论本身也是从社会体制内产生出来的，但无论按自觉的意图、还是按客观意义来说，其目的都不是让体系中的任何因素更好地发挥作用。相反，批判理论对较好的、有用的、适当的、生产性的和有价值的等诸如此类的范畴本身持怀疑态度，因为这些范畴既是在现存秩序下来理解的。它拒绝把它们当成非人力所及的非科学的先决条件。个人通常只能接受其生存被赋予的基本条

件，并竭力使这些条件臻于完备而已。^[9]

与这种传统观点相反的是：

在唯物主义的概念框架内，所包含的基本活动是社会劳动，这种劳动中同阶级相关的形式在人类的各种反应方式中，包括理论上，都打上了烙印。理性对形成认识和认识对象的过程所加的干预，或者使这类过程受意识的支配，都不是发生在一个纯粹理智的世界里，而是与争取某种实际生存方式的斗争相契合的。^[10]

在这一事业中，批判理论把自己看成整个西方哲学传统的继承者。在马克思看来，要废除的不是哲学，而是它的科学主义式的退化。霍克海姆和阿多尔诺在《启蒙的辩证法》中，对这一哲学传统作了广泛的论述，他们把该书的主题确定为“启蒙的自我毁灭”^[11]，以此来探讨这样一种背谬：“启蒙始终是为了将人们从恐惧中解放出来，并确立起人自身的权威；但是被充分启蒙了的世界却遍布获胜后的灾祸。”^[12]他们这本书的核心是对两类理性的对比。第一类理性意在发掘将人从外部压抑和强制中解放出来的手段即价值理性——译者注；另一类则是工具理性，它对自然界发挥技术控制的作用，其主要动力来自18世纪的启蒙运动，而从其新近的表现来看，此类理性已经蜕变为极权主义：

对启蒙运动来说，任何不符合算计和实用规则的东西，都是不可信的。只要能不受任何外来压力的干扰而发展，启蒙就不会停顿。在发展过程中，它看待自身的人权概念，完全像看待旧的一般性概念一样。它所遇到的一切精神阻力只能增强它的力量。这就是说，启蒙甚至在神话世界中仍能辨清自己。不管阻力可能求助于什么样的神话，单凭在对抗过程中这些神话成为争论的理由这一点，这些神话就该承认原想驳斥启蒙的那种消解理性原则。可见，启蒙是极权主义的。^[13]

这一态势发展到登峰造极，就在现代“文化工业”中表露出来。因为在前资本主义秩序的束缚崩解之后，启蒙并没有创造一种多样化的解放的文化，事实上却已造就了它的反面，因为连娱乐本身也被工业化了：

商业与娱乐本然的亲缘关系表现在后者的特殊意义上，也就在于它能为社会辩护。感到愉悦就意味着认同（这个社会）。而要做到愉悦，就只有与整个社会的进程相隔绝，只有超然世外，只有“脱（失）敏（感）”，并从一开始便盲目地放弃每一件工作本无可逃避的权利主张——而就以偏赅全的局限性而言，不管这样做多么毫无意义。愉悦总是意味着不思量任何事情，忘掉痛苦——即使痛苦暴露无遗。从根本上说，那是无济于事的。那是逃避，此种逃避不是一般所说的逃避丑恶的现实，而是逃避最后残存的对抗思想。娱乐所能允诺提供的解放，只不过是摆脱思想、摆脱否决的自由罢了。^[14]

就内涵的意思而言，马克思的思想也包含有工具理性的成分，因为马克思强调劳动（《传统理论和批判理论》一书对此作了积极的评论），强调自然界是人类开发的对象，便使他同样陷入了启蒙运动的传统内。因此，在法兰克福学派那里，阶级斗争和政治经济学已退居第二位，而让位于对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的堕落方式作出更为广泛的探讨。

精神分析学的影响和法西斯主义研究

法兰克福学派在批判启蒙运动传统时，拓展了批判资本主义社会的理论基础。而他们在力图吸收精神分析学的见解时，却又使这一理论基础变得狭隘起来。法兰克福学派援引恩格斯的话说：

我们最初是把重点放在从作为基础的经济事实中探索出政治观念、法权观念和其他思想观念以及由这些观念所制约的行动，而当时是应当这样做的。但是我们这样做的时候为了内容而忽略了形式方面，即这些观念是由什么样的方式和方法产生的。^[15]

在分析大众文化普及的同时，他们逐渐关注的另一个“上层建筑”问题是权威的本质和发展。这一考察的中心环节是对精神分析学的、尤其是对弗洛伊德的认识。尽管托洛茨基曾经对精神分析学表现过兴趣，但如果就此认为弗洛伊德的思想及其对社会变革持保守的悲观主义态度（法兰克福学派后

来也持这种态度）同马克思主义有什么关联，这种见解在20世纪20年代可算是新奇的了。艾里希·弗洛姆（Erich Fromm）对弗洛伊德作了详尽的研究，但后来便脱离了法兰克福学派，也离开了正统弗洛伊德主义。但弗洛伊德对法兰克福学派思想的主要影响，却表现在该派的两部研究权威的著作中，即《权威与家庭的研究》和更为有名的《权威化人格》。法兰克福学派一贯从事的是经验主义的研究，而精神分析学说服了他们，使他们把家庭当做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一个基本环节。

在《权威与家庭的研究》中，自我的削弱和继而由社会力量充当超自我的角色，被理解为晚期资产阶级社会中家庭衰落的一种功能。在更为外露的《权威化人格》一书中，目的“不仅仅是要描述偏见，而是要解释偏见，从而有助于根除它”^[16]。该书探讨的主题是霍克海姆所描述的权威化人格，这种人格包含如下因素：

向传统的价值观机械地投降；盲从于权威，同时又盲目仇视一切敌手和外来户；反内省；僵硬陈旧的思维老套；推崇迷信；对人性半说教半冷嘲热讽式的蔑视；自我投射。^[17]

虽然该研究所采用的是美国的统计技术，但他们摈弃那种包含有可能被证实和证伪的假设的方法论。他们试图揭露产生偏见的社会学根源，在此，他们认为，采用交谈式的深度采访具有同统计资料同等的重要性。然而，由于强调的是宽容而不是革命，这种含而不露的价值观与其说是马克思主义的，不如说是自由主义的。虽然没有否认非理性的社会方面，但整个研究工作的倾向是心理学的，而不是社会政治学上的。

在法兰克福学派关于法西斯主义的讨论中，重要的是心理学方面。这种讨论往往强调产生权威与暴力的社会心理机制，从而忽视了对经济基础作细微的考察。法兰克福学派看到了资本主义与法西斯主义之间一种直接的关联，即资本主义经济逐渐向垄断的方向演进，由此，自由主义也向极权主义演化。霍克海姆说过一句名言：“不愿对资本主义说长道短的人，也必然对法西斯主义保持沉默。”^[18]法兰克福学派由于忽视了宪制自由主义国家与法西斯国家之间在公民权、法律保障等形式上的真正区别，因而往往强调自由主义与法西斯主义之间的连续性。例如，马尔库塞就写道：

自由主义国家向绝对极权国家的转变发生在单一社会秩序的框架内。鉴于经济基础上的同一性，我们可以说，是自由主义本身“产生”了绝对极权国家，来作为其在更发达的发展阶段上的自我完善。^[19]

这种看法把纳粹主义视为非理性统治趋势发展到了登峰造极的结果，这一发展趋势就内在于对工具理性和技术合理化的日益强调中，而这种强调是西方自由主义启蒙运动传统的遗产。

对这一看法持重大异议者是弗兰茨·纽曼（Franz Neumann）。在其经典著作《巨兽》里，他对他的同行们关于权威化人格和法西斯心理中施虐和受虐狂因素的研究不太在意。纽曼一开始就不同意弗雷德里克·波洛克（Frederick Pollock）的下述观点，即认为纳粹主义是一种新制度，在这种制度下，私人资本积累不再是推动力。在波洛克看来，国家社会主义不再是一种交换经济，因为政治挂帅已经达到这样的地步，以致私有财产不再是其基础。与此相反，纽曼则强调，经济困难产生于魏玛德国不断增长的卡特尔化；以及为了“增强垄断的地位和促使所有商业的活动完全融入到工业组织的网络中”^[20]，因而有必要实行国家干预。他写道：“今日德国经济有两个重要的显著特征：即它既是垄断的经济，又是计划的经济。它是一种由极权主义国家严密组织的私人资本主义经济。我们给它一个描述得最为体贴的名称：‘极权垄断资本主义’。”^[21]从纳粹经济立法中获益的人，大都是旧垄断资本主义的受益者。获取利润的动机仍然是最基本的，它恰恰需要极权主义政权的支持。与霍克海姆不同的是，纽曼从阶级的角度来分析纳粹国家，把它的政治看成是“接受和强化德国社会中支配性的阶级体系”^[22]，他还使用大量详细的观察材料来论证这个观点。

美 学

法兰克福学派最显赫的成就在美学领域。他们在美国的经历——在那里，通过大众文化的传播而不是使用恐怖手段实现了社会达成一致的目标——增进了他们对文化的兴趣。在他们看来，大众文化与法西斯主义的共同之处，就在于利用或创造个人的需要来逐渐取消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之间的差别，以利于支撑一种特殊的统治制度。在看待艺术上，法兰克福学派不

同于列宁主义传统，后者评判艺术和文学主要是以它们在阶级斗争问题上所展现出的态度来确定。法兰克福学派继承了恩格斯的传统（实际上也是马克思本人的传统，马克思最喜爱的作家竟然是莎士比亚和保皇主义者巴尔扎克），认为一部作品的社会洞察力比作者的政治态度更为重要。卢卡奇论述19世纪资产阶级小说的大部分著作，都受到了这一观点的启示——虽然卢卡奇拒绝大多数“现代”艺术形式，使他有别于对当代艺术形式极感兴趣的法兰克福学派。作为马克思主义者，法兰克福学派强调作家和读者都有社会的局限性，但他们赋予艺术以一种比在列宁主义传统中更为自主的作用。从艺术的否定方面看，艺术是对主导性现状的抗议，就其暗示更多充满人性的价值看，它超越了社会。相反，他们把大众文化看作“肯定性的”文化来加以批判。就“肯定性”一词，马尔库塞给了如下的定义：

肯定性文化是指资产阶级时代的文化，在其发展进程中，它会脱离心灵和精神世界的文明而成为一个独立的价值王国，也就是说，它要优越于文明。它的决定性特征是，维护一个普遍强制性的、永远更为理想和更有价值的、必须无条件加以肯定的世界；这个世界根本无涉于日常要为生存而斗争的现实世界，它可以不改变现状而通过每个人自身“从内部”来实现。^[23]

不过，对肯定性的大众文化的反对，并非要主张文化精英论。他们对任何把艺术与物质需求相分离的文化禁欲主义，都是坚决反对的。大众文化的问题在于它并不真是大众化的。与其说是人民创造了它，不如说它是强加给人民的，是为统治的利益和潜在的极权主义服务的。^[24]

在这个领域内，法兰克福学派最有才华的批评家是阿多尔诺。他早年就感兴趣的主要文化领域是音乐。阿多尔诺认为，大多数现代音乐都是以市场为导向，迎合大众需求的。与此相对照的是，其他种类的音乐处境艰难，但并不因此而是反动的，相反，阿多尔诺却推崇舍恩贝格（Schönberg），他的无调音乐表现了当代社会的不和谐：

此时此刻，音乐仅仅能在其结构中表现社会矛盾，而正是这一矛盾，是音乐的孤立处境所要归罪的东西之一。音乐愈是能通过其本身深刻地表现这些矛盾的力量和在社会中把这些矛盾加以解决的必要性，而

且，音乐愈是能在自身的语言和形式的矛盾中准确地表现现实中的苦痛，并通过表现苦痛的音乐语言着力号召变革，它便愈能获取最佳的成效。^[25]

这表明，他反对像斯特拉温斯基（Stravinsky）这类的作曲家。斯特拉温斯基仅仅是用前资产阶级的音乐适应于现代社会。阿多尔诺对爵士音乐持一种特别的轻蔑态度，把它看成是朝商品化发展的音乐形式，只能唆使人顺服他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命运。

法兰克福学派的另一个主要文化批评家是瓦尔特·本杰明（Walter Benjamin）。他同布莱希特（Brecht）关系密切，而且他的许多著作的主旨在于对布莱希特作品进行理论性的探讨。他还特地讨论了“离间效应”（alienation effect），以此向读者提供一种阅读机制，使读者有批判地与布莱希特的作品保持距离，以防止被他的作品同化。本杰明喜欢在语言中寓以深刻的意义，他的多数作品都被赋予救世之道这样的主题。对艺术批量复制所产生的社会效应，他比阿多尔诺要乐观。^[26]

马尔库塞

赫伯特·马尔库塞（Herbert Marcuse）是法兰克福学派最著名的代表，也是其中惟一没有放弃自己早年革命观点的创始成员。在加入研究所之前，他已经试图把马克思主义与海德格尔式的存在主义结合起来。他也对在1932年发表的马克思早期作品，尤其对《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关于异化劳动的分析表示过欢迎。异化劳动分析始终是马尔库塞思想的一大焦点。整个20世纪30年代，他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其中包含了他的后期作品的思想萌芽。但是他这一时期的主要著作，题名为《理性与革命》，是关于黑格尔研究的。这是介绍批判理论家观点的第一部英文版著作。像霍克海姆那样，马尔库塞意在强调黑格尔思想中的理性成分。为此，他希望对黑格尔提出一种与众不同的解读，它既不同于纳粹分子的，又不同于斯大林主义者的。纳粹分子把黑格尔视为有组织的国家非理性浪漫主义的先驱，而斯大林主义者则把黑格尔视为一个反动的贵族思想家。马尔库塞把黑格尔思想中所内涵的激进主义与诸如孔德（Comte）等许多实证主义继承者们的保守思想加以比

较。撇开黑格尔思想中神学的各个方面，马尔库塞力求揭示黑格尔与马克思之间有一种潜在的连续性。黑格尔是德国第一位获取到如下见解的思想家：

以抽象而定额的劳动制度为基础、并立足于以商品交换来整合需求之上的特定社会秩序，没有能力维护和建立一个理性共同体。这种秩序基本上仍然是一种无政府主义和非理性的秩序，是要受盲目的经济机制的支配的。^[27]

虽然黑格尔主张以强权国家对付无政府主义状态，这一主张很容易被引入歧途，但他毕竟把哲学推向了社会实践的境界：

因此，哲学的最后的巅峰同时就是它的隐退。哲学一旦从纯理念的笼罩中解放出来，也就从它与现实的对抗中解放了出来。这意味着它不再是哲学了。但是，这也不能因此就认为，思想必须遵从于现行的秩序。批判的思维不会止息，而是采取一种新的形式。理性的努力让位于社会理论和社会实践。^[28]

按照马尔库塞的解释，从黑格尔到马克思的转化是向不同类型的真理转化，它不能用哲学的术语来解释，因为“马克思的理论中一切哲学概念是社会的和经济的范畴，而黑格尔的社会的和经济的范畴全是哲学概念”。^[29]黑格尔已经强调劳动的范畴，然而把强调哲学上的劳动改为强调异化了的劳动者的劳动却是马克思。在此，马尔库塞进一步阐述了马克思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某些段落，触及他将持续关注的一些问题。他写道，马克思早期著作中的这些惊人表述：

全都包含有黑格尔的“扬弃”（Aufhebung）一词，以至于扬弃也具有了这样的含义，即重新赋予其真实的形式以一种内容。但是，马克思所预见的未来劳动方式迥然不同于现行的方式，以至于他拿不定主意是否使用“劳动”这同一个词，同样地来指称资本主义社会与共产主义社会的物质过程。但归根到底，他使用“劳动”一词，是指资本主义所实际理解的含义，即在商品生产中创造剩余价值或“产生资本”的活动。另一些活动不是“生产性劳动”，因此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劳动。可

见，劳动意味着从事劳动的个人决不会有自由和全面发展，显然，在这种形势下，个人的解放同时就是劳动的否定。^[30]

不过，马尔库塞声称，伴随着哲学转向社会实践，“理性的观念已经被幸福的观念所取代了”^[31]。这样看来，他确实超越了马克思本人。

幸福概念及其在当代社会中遭受的挫败，是马尔库塞第二部主要著作《爱欲与文明》所要探讨的核心。这部著作所产生的影响力给人造成这样的印象，似乎弗洛伊德的理论同马克思的理论的确可以调和一致。该书的主旨具有意味深长的政治性：

本文使用心理学范畴，是因为它们已经成为了政治的范畴。以心理学为一方和以政治、社会哲学为另一方，其间的传统分界线，已经成为过时的了。这是由于现时代人类的条件改变了：以前自主的和可验证的心理过程，正被国家中个体的职能所吸收（通过他的公共性或社会性的存在）。^[32]

马尔库塞反对那些着重从当代社会框架内部进行治疗的弗洛伊德修正主义者。在他看来，这些修正主义者仅仅是这样一种特殊的典型，这些人只为了真正遵奉式的**实践**而忽视了理论，他们之所为正如他已经在《理性与革命》中批判过的黑格尔的实证主义后继者们所做的。但是，与霍克海姆和阿多尔诺从对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的分析中得出悲观主义的结论相反，马尔库塞对通向解放的心理障碍的研究，使他走向了一种乌托邦式的激进主义。

马尔库塞不同于威尔海姆·赖希（Wilhelm Reich，马尔库塞对他极少关注），他拥护弗洛伊德晚近的理论。他坚持认为，弗洛伊德的本能论完全是唯物主义的，并认为他对死的本能的看法能够洞穿现代社会的矛盾性。但是马尔库塞不是悲观主义者，在他看来，死的本能目标在于一种涅槃，即达到一种无（情）欲的状态。情欲产生于紧张，而紧张状态是阶级社会所特有的流行病。如果这种紧张可以缓解，那么死的本能力量也必定能够减弱。抑制死的本能和增进爱欲，只有在提倡多方式的性满足和普遍的“里比多”（性）释放的社会中才能达到。这包含废除一夫一妻制的性器官主权至上论。马尔库塞摒弃弗洛伊德关于无压抑的文明是不可能的观点。在当代社会中，快乐原则与现实原则的冲突取决于社会对劳动的组织，而社会对劳动的组织

则通过马尔库塞所谓的“履行原则”促使本能服从于现实。然而，这一履行原则只存在于一个为匮乏强制力所支配的社会。随着技术的进步，这种压抑日渐成为“多余的”了。这就为一个不再立足于履行原则的社会开辟了道路。这个社会将能够通过废除异化劳动来消灭多余的压抑。马尔库塞以一种乌托邦的情怀，预见到一个新社会，在其中，劳动将被某种有美感的游戏所取代，这种审美游戏般的劳动最终将消灭死的本能力量。这样，马尔库塞以“本能压抑”概念补充了（有时看来，几乎是取代了）马克思的经济剥削概念。

在马尔库塞最有影响力的著作《单向度的人》里，《爱欲与文明》的上述主题被置于更为广阔的社会背景之下。同时，《爱欲与文明》中的乐观主义则让位于一种深沉的悲观主义。^[33]马尔库塞对发达工业社会的判断，以及他的许多独特的分析，与霍克海姆和阿多尔诺在《启蒙的辩证法》中的表述完全一致。《单向度的人》标志着传统的马克思主义观产生了一个根本性的转变。尽管马尔库塞同意资本家与无产者仍然是工业社会中基本的阶级，但是：

资本主义的发展已经改变了这两个阶级的结构和作用，以至于它们都变得不再是历史变革的动力了。在当代社会的最发达的国家和地区，在保留和改善现行制度上存在的凌驾一切的利益，把先前的敌对双方统一到了一起。技术的进步达到了确保共产主义社会不断成长和不断凝聚的程度，而质变这一概念本身，在非爆发性演变的现实主义观念面前退却了。^[34]

基于“自由主义国家向完全极权主义国家的转变发生在同一社会秩序结构内部”这一早期观点^[35]，马尔库塞断言，发达工业社会是极权主义的：

因为“极权主义”不仅是社会的一种恐怖主义的政治协调，也是一种非恐怖主义的经济—技术协调。后一种协调是由既得利益通过操纵需求而发生作用的，因而防止了反整个社会的有效反对派的出现。助长极权主义的不仅是政府或政党的具体统治形式，而且是具体的生产与分配制度，这种制度完全可以与“多元主义”的政党、报纸和“抵消力量”等兼容共存。^[36]

这种极权主义之所以更为牢靠，是因为它似乎没有自觉的经济和政治倾向性。^[37]技术社会似乎满足了人们的需求，因此留不下任何异议空间。马尔库塞试图区别真假需求，但人们的实际需求目前尚且不能确定，因为：

归根到底，需求何者为真、何者为假的问题，必须由个人自行回答，但最终只有取决于他们是否能、并在何时能自由地作出回答。^[38]

这显然没有解决一个已全面控制其成员的意识和社会如何可能发生变化的问题，而《单向度的人》的大部分篇幅都用来揭示这种控制的普遍性。构成现今社会的特征的是：

通过消灭高层次文化（它构成了现实的另一个向度）中各种对立的、异己的和超越性因素，来消除文化与社会现实之间的对抗。^[39]

在艺术领域里，社会的物质进步已经产生出“一种和谐的多元主义，其中最矛盾的作品与事实真相相互不相关地和平共存”^[40]。在性的问题上，也已经产生了一种“习以为常的混杂现象”：

性与工作和社交融合在一起，因此使性更容易得到（受控制的）满足。技术进步和更舒适的生活容许性的各个方面有系统地纳入商品生产和交换的领域。^[41]

甚至语言本身也正在逐渐地变成为一个封闭式体系，以至于这种体系排除了对立在语言上的表述。

面临这样一种社会，还有变革的希望吗？马尔库塞在其著作的开头便讲道，他在两个矛盾的假设之间摇摆不定：第一个是，发达的工业社会在可预见的未来有能力遏制质变；第二个是，存在着打破这种遏制和使社会突变的种种力量和倾向。《单向度的人》通篇强调的是第一种倾向。第二种倾向出现的可能性，仅仅在该书的结尾才极其简要地提到。这第二种倾向将不得不有赖于那些生存在“民主进程”之外的人们，即“受社会排斥和不受欢迎的下层人、其他种族和肤色的被剥削者和被压迫者，以及失业者和不能被雇佣的人们”^[42]。但马尔库塞认为，这后一种倾向可能仅仅是一种“偶发事件”：

这种机会就是，历史的两个极端——最先进的人性意识和最受剥削的力量——可能发生的再度偶合。这无非是一种机遇。然而，批判社会的理论并不拥有可以弥合现在和未来之间的差距的概念，因为这种理论既没有把握前景、也没有显示成功，它始终是否定性的。^[43]

在所有法兰克福学派的成员中，马尔库塞的经验主义色彩是最少的。同时自相矛盾的是，他又是该学派最清晰和最系统的阐述者。他仍然信奉为他的同僚们所抛弃的激进主义，这就使他在马克思主义传统中持续地享有一席之地。

哈贝马斯

在法兰克福学派“第二代”中，给人印象最深刻的无疑是于尔根·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截至目前看，他著作的涉及面极其广博。就像他的前辈那样，他不仅讨论方法论问题和作为控制手段的自然科学理性模式的使用问题，而且关注于把对历史唯物主义的传统解释与更为现代的诠释学及系统论原理结合起来。依据霍克海姆和阿多尔诺在《启蒙的辩证法》中的成果，哈贝马斯考察了使理性从一种解放（人的）工具转变为统治（人的）工具的哲学前提。马克思倾向于把自然科学作为其社会理论的一种模式来使用，从而弱化了哲学的作用，但在霍克海姆和阿多尔诺（以及哈贝马斯）看来，如果马克思主义理论重新恢复哲学的维度以反对一切形式的科学主义，它就只能继续是批判性的。哈贝马斯同意这样的说法，即马克思在其经验主义的资本主义经济理论与对革命实践的批判性评价之间，存在一个未予化解的二元对立，因为马克思的理论范畴有时是还原论的，甚至是实证主义的。但是，哈贝马斯不希望再采取后期法兰克福学派那种悲观主义的文化批判，以免仍被指责为重蹈青年黑格尔主义的覆辙。^[44]他试图在《知识与人类兴趣》中通过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表述来达到这一点。像霍克海姆和阿多尔诺一样，他不愿否认作为基本的人类活动范畴的劳动，但他认为，在马克思那里暗含了劳动与互动的区分劳动是作用于外部世界的有目的的理性活动；而互动则包含的是主体之间的交往。虽然这两个领域（在某种程度上与经典马克思主义对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区分相对应）是社会进化中相互关联的方

面，却又是彼此独立的，每一个方面都有它自己的认知方式和理性评判标准：即在工具性的活动领域里，要求扩大技术的控制；在文化发展领域里，要求扩大不受歪曲和支配的交往形式。哈贝马斯还试图为理想中的交往提供一种理论框架，他宣称“在今天，语言问题已经取代了传统的意识问题”^[45]。哈贝马斯断言，只要技术性社会的政策受制于公众的控制，那么，它就必然是理性的社会。但是，争论和意见的发表必须不受到操纵和控制。真正的言谈行为首先在于必须有一个发表言论的理想环境作为前提，在此言谈情境中，好的论据的力量本身就能决定问题的是非曲直。而要做到这一点，除非社会的所有成员都有一种平等的机会参与讨论；这就涉及社会转型的问题，即必须使社会向其所有成员都能具备交往能力这一品性方向转向。因此在任何一种言论活动中，本身都内涵着社会解放的终极目标。但必须承认，就如何实现这种社会，哈贝马斯远未作出明确的解答。

如果说哈贝马斯在《知识与人类兴趣》中提出的“交往力”论是“上层建筑的”，那么他在其迄今最为重要的著作《合法性危机》中则考察了各个层次社会解放的契机。以往的历史包括一系列社会形态，其中每一种社会形态都“取决于一种基本的组织原则，而这一原则又以抽象的形式确定了社会状况变迁的可能性”^[46]。哈贝马斯采用类似于马克思所用过的术语，简要地分析了自由资本主义，例如，其中所包含的社会生产与私人积累之间的基本矛盾。为了弄清晚期资本主义是否也是那样，哈贝马斯把当代社会固有的危机作了类型学的概括：经济危机、理性危机、合法性危机和原动力危机。在哈贝马斯看来，经济危机在晚期资本主义中不是不可避免的。而国家为防止经济危机而采取的步骤又内在地造成了理性危机。晚期资本主义所固有的利益冲突和对国家干预提出的矛盾要求，必然意味着国家的援助在分配上是机能失调的。这反过来又产生出合法性的危机，因为国家干预意味着开启了调控与（自由）选择之间的矛盾问题。唯一的解决办法是收买最大的政党，或者创立一种新的合法化的意识形态。此外，政府干预的日益增长会压缩私人活动的领域，而这一活动领域恰恰是资产阶级社会的动力，因此便产生了原动力危机。哈贝马斯在总结他的观点时宣称：

经过政府的这样一种反应性规避行动，经济危机便转入政治制度内，通过这一方式，合法性的供给可以补偿理性的亏损，而增强组织机构的合理性又可以弥补确已出现的合法性亏欠。这里产生了一系列的危机趋

势，从发生学的观点看，这些趋势都体现出危机现象自下向上转移的等级序列。但是从政府危机处理的角度来看，这些危机现象是由一定限度内的可相互替换性而区别开来的。这些限度，一方面取决于财政上可提供的价值量（在危机理论中，价值量的短缺是不可能有效预测的），另一方面则取决于源自社会文化体系的原动力。因此，稀缺的资源、稀缺的价值与稀缺的意义之间的替换关系，对于危机的预告有决定性的意义。^[47]

在《合法性危机》的第三章和最后一章中，哈贝马斯认为，除非求助于一套新的准则——它包含他先前所讨论过的交往力以及恰当的社会经济组织，否则就无法解决这些彼此交错的危机。至于哈贝马斯的近期著作，其内容超出了本书的题旨范围，相关书目请见下面的“参考文献”。

【注释】

[1] 进一步参见第13章。

[2] M. Horkheimer, *Critical Theory: Selected Essays* (New York, 1972), p. 215.

[3] M. Horkheimer, 'The Authoritarian State' in A. Arato and E. Gebhardt (eds), *The Essential Frankfurt School Reader* (New York, 1978) p. 104.

[4] H. Marcuse, *Soviet Marxism* (New York, 1958) p. 106.

[5] M. Horkheimer, *The Eclipse of Reason* (New York, 1947) p. 184.

[6] M. Horkheimer, *Critical Theory: Selected Essays* (New York, 1972), p. 188.

[7] Ibid., p. 192.

[8] Ibid., p. 208.

[9] Ibid., p. 207.

[10] Ibid., p. 245.

[11] M. Horkheimer and T. Adorno, *Dialectic of Enlightenment* (New York, 1972; London, 1973) p. xiii.

[12] Ibid., p. 3.

[13] Ibid., p. 6.

[14] Ibid., p. 144. 对这一问题稍有不同的见解的，请参见 A. Sohn-Rethel, *Intellectual and Manual Labour: A Critique of Epistemology* (London, 1978)。

[15] Engels to Mehring, in K. Marx and F. Engels, *Selected Correspondence* (Moscow, 1965) p. 459.

- [16] T. Adorno et al., *The Authoritarian Personality* (New York, 1950) vol. 1, p. vii.
- [17] M. Horkheimer, 'The Lessons of Fascism', in *Tensions That Cause War*, ed. H. Cantril (Urbana, 1950) p. 230.
- [18] M. Horkheimer, 'Die Juden und Europa', *Zeitschrift für Sozialforschung*, vol. 8 (1939) p. 115.
- [19] H. Marcuse, *Negations* (London and Boston, 1968) p. 19.
- [20] F. Neumann, *Behemoth: The Structure and Practice of National Socialism 1933—1944*, rev. edn (New York, 1944) p. 260.
- [21] *Ibid.*, p. 261.
- [22] *Ibid.*, p. 366.
- [23] H. Marcuse, 'The Affirmative Character of Culture', in *Negations* (London and Boston, 1968) p. 95.
- [24] 对这一观点最为详尽的表述, 参见 M. Horkheimer and T. Adorno, *Dialectic of Enlightenment*。
- [25] T. Adorno, 'Zur gesellschaftlichen Lage der Musik', *Zeitschrift für Sozialforschung*, vol. 1 (1932) p. 106.
- [26] 进一步参见 E. Jameson's *Marxism and Form* (Princeton, N. J., 1971) 的第二章, 从总体上看, 詹姆斯这本书是近期来对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最杰出的贡献。
- [27] H. Marcuse, *Reason and Revolution: Hegel and the Rise of Social Theory*, 2nd edn (London, 1954) p. 60.
- [28] *Ibid.*, p. 28.
- [29] *Ibid.*, p. 258.
- [30] *Ibid.*, p. 293.
- [31] *Ibid.* 关于这一观点, 可进一步参见他载入《否定性》一书中论快乐主义的文章, 第 159 页以下。
- [32] H. Marcuse, *Eros and Civilization* (London, 1969) p. 21.
- [33] 这种悲观主义在马尔库塞晚近的一些声明中被收回了。比方说, 参见 *Essay on Liberation* (London and Boston, 1969)。
- [34] H. Marcuse, *One-Dimensional Man: Studies in the Ideology of Advanced Industrial Society*, 2nd edn (London, 1968) p. 11.
- [35] H. Marcuse, *Negations* (London and Boston, 1968) p. 19.
- [36] H. Marcuse, *One-Dimensional Man*, p. 20.
- [37] 尽管《单向度的人》主要关注的是美国, 但马尔库塞先前也发表了对苏联类似的悲观主义分析。见他的 *Soviet Marxism* (New York, 1958)。

[38] Ibid. , p. 22.

[39] Ibid. , p. 58.

[40] Ibid. , p. 61.

[41] Ibid. , p. 71.

[42] Ibid. , p. 201.

[43] Ibid.

[44] 比方说, 参见 A. MacIntyre, *Marcuse* (London and New York, 1970) pp. 22, 40, 61.

[45] J. Habermas, *Zur Logik der Sozialwissenschaften* (Frankfurt, 1970), 引自 T. McCarthy 为 *Legitimation Crisis* (London, 1976) 写的“序言”。

[46] J. Habermas, *Legitimation Crisis*, p. 7.

[47] Ibid. , p. 93.

深入阅读材料

西方马克思主义：概述

最具启发性的入门书是安德森 (Anderson) 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探讨》。最杰出 (尽管有些晦涩难懂) 的著作是詹姆逊 (Jameson) 集中探讨美学的《马克思主义与形式》，还可参见麦金尼斯 (McInnes) 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以及分别由布莱克本 (Blackburn)、霍华德 (Howard) 与克拉雷 (Klare) 和“新左派评论”组织编写的论文集。安德森的短篇著作《历史唯物主义寻踪》通篇引人入胜。从传统内部来考察，可参见杰伊 (Jay) 的《马克思主义与整体性》与凯尔纳 (Kellner) 与雅各比 (Jacoby) 的著作。从批判角度考察的是由梅奎尔 (Merquior) 的《西方马克思主义》。

法兰克福学派：原著

有两部综合性的文集，一部是康纳顿 (Connerton) 的《批判社会学》，一部是阿拉托 (Arato) 和格布哈特 (Gebhardt) 的《法兰克福学派的基本读本》。詹姆逊有一部关于更为专业化的文集《美学与政治学》。由阿多尔诺和其他人合写的《德国社会学的实证主义争论》为当代状况提供了很好的背景分析。

法兰克福学派：评论

最好的导读性著作是杰伊的《辩证法的想像》，它论述全面和丰富，以施罗耶 (Schroyer) 更具思辨性的《统治批判》作补充。从更为原教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视角对法兰克福学派所展开的批判，可参见泰伯恩 (Therborn) 的文章和斯莱特 (Slater) 的《法兰克福学派的起源和意义》。对法兰克福学派最新的评述，可见维格豪斯 (Wiggerhaus) 的历史巨著。

阿多尔诺与霍克海姆

阿多尔诺作为一个论文家的才华，可以从他的两个论文集《多棱镜》与《最低限度的伦常》得到展示。他对当代社会提出的控诉，可参见他的《启蒙的辩证法》；他对心理学的研究，可见于《极权化人格》；而他的哲学反思，可见于他的《否定的辩证法》。对阿多尔诺的评价见巴克-莫尔斯（Buck-Morss）的《否定的辩证法的起源》与罗斯（Rose）的《令人伤感的科学》，还可参见詹姆逊的《马克思主义与形式》的第五章。

至于霍克海姆，可参见他的《理性的衰落》和带有阿罗诺维茨（Aronowitz）所写“序言”的论文集《批判理论》。还可见于霍华德的《马克思的遗产》中第五章。

马尔库塞

马尔库塞最易为人接受的著作是《单向度的人》。有关马尔库塞力图把马克思同弗洛伊德结合起来，见他的《爱欲与文明》。黑格尔的思想背景包含在他的《理性与革命》中。论文集《否定性》，包含了从20世纪30年代到60年代所写的论文，它也许为马尔库塞的思想提供了最为全面的介绍。马尔库塞的著作最完整的目录可以在马克斯（Marks）的《马尔库塞的意义》中找到，该书是一部短小的入门书。对他极具批判性的抽象分析，可见于麦金泰尔（MacIntyre）的《马尔库塞》。马蒂克（Mattick）的《马尔库塞批判》和伍迪斯（Woodis）的《革命新理论》都是从马克思主义的视角所展开的批判。另外，还可参见《批判性解释》，这是由布赖内斯（Breines）所编辑的论文系列。

其他

关于本杰明（Benjamin），见他题为《启示：尝试与反思》的论文集，也可见于他的巨著《德国悲剧的起源》。对他的评论，见于后书中由斯泰纳（Steiner）所写“导言”、阿伦特（Arendt）和詹姆逊（Jameson）所写的文章。而弗洛姆（Fromm）的著作，特别见于《自由的恐惧》和《健全的社会》和由沙尔（Schaar）所写的评论。至于哈贝马斯，见于他的主要著作《知识与人类兴趣》、《合法性危机》、《交往行为理论》的两卷，以及《在事实与规范之间》。更流行的是乌斯怀特（Outhwaite）极具价值的《哈贝马斯读本》。对他的评论，见麦卡锡（McCarthy）的《哈贝马斯的批判理论》和怀特（White）的《哈贝马斯的近作》，还可见于后者所编的《对哈贝马斯的剑桥学派解读》。最好的导读书是乌斯怀特的《哈贝马斯：批判性导读》。

参考文献

Western Marxism in General

Perry Anderson, *Considerations on Western Marxism* (London, 1976).

—*In the Tracks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 (London, 1983).

Robin Blackburn (ed.), *Ideology in Social Science* (London, 1972).

David Caute, *The Fellow-Travelers* (London, 1977).

D. Howard and K. Klare (ed.), *The Unknown Dimension: Post-Leninist Marxism* (New York, 1972).

Russell Jacoby, *Dialectic of Defeat: Contours of Western Marxism* (Cambridge, 1981).

Martin Jay, *Marxism and Totality: The Adventures of a Concept from Lukács to Habermas* (Berkeley, 1984).

Kouglas Kellner, *Critical Theory, Marxism and Modernity* (Cambridge, 1990).

Nicolas Lobkowitz (ed.), *Marx and the Western World* (London, 1967).

Neil McInnes, *The Western Marxists* (London, 1972).

J. E. Merquior, *Western Marxism* (London, 1986).

New Left Review (eds.), *Western Marxism: A Critical Reader* (London, 1977).

The Frankfurt School: General Texts

Theodor W. Adorno et al., *The Positivist Dispute in German Sociology* (London, 1976).

Andrew Arato and Eike Gebhardt (eds), *The Essential Frankfurt School Reader* (London, 1978).

Paul Connerton (ed.), *Critical Sociology: Selected Readings of Adorno, Habermas, Benjamin, Horkheimer, Marcuse and Neumann* (London, 1976).

Frederic Jameson (ed.), *Aesthetics and Politics: Adorno, Benjamin, Bloch, Brecht, and Lukács* (London, 1978).

The Frankfurt School: General Commentaries

Donald Fleming and Bernard Bailyn (eds), *The Intellectual Migration: Europe and America, 1930—1960* (Cambridge, Mass., 1969).

F. Jameson, *Marxism and Form* (Princeton, 1971).

Martin Jay, *The Dialectical Imagination: A History of the Frankfurt School and the Institute of Social Research, 1923—1950* (London, 1973).

George Lichtheim, 'From Marx to Hegel: Reflections on Georg Lukács, T. W. Adorno, and Herbert Marcuse', *Tri-Quarterly*, 12 (spring, 1968).

J. Orr, 'German Social Theory and the Hidden Face of Technology', *Archives européennes de sociologie*, 15 (1974).

A. Quinton, 'Critical Theory', *Encounter*, 10 (1974).

Paul Robinson, *The Freudian Left* (New York, 1969).



Trent Schroyer, *The Critique of Domination: The Origins and Development of Critical Theory* (New York, 1973).

— ‘The Politics of Epistemology: A Marxist Perspective on the Current Debates in German Sociology’,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ociology* 1, 4 (winter 1971—1972).

Phil Slater, *Origin and Significance of the Frankfurt School: A Marxist Perspective* (London, 1977).

Göran Therborn, ‘Frankfurt Marxism: A Critique’, *New Left Review*, 63 (1970), and New Left Review (eds), *Western Marxism: A Critical Reader* (London, 1977).

Albrecht Wellmer, *Critical Theory of Society* (New York, 1971).

Rolf Wiggerhaus, *The Frankfurt School: Its History, Theories and Political Significance* (Cambridge, 1994).

Adorno and Horkheimer: Texts

Theodor W. Adorno et al., *The Authoritarian Personality* (New York, 1950).

— (with M. Horkheimer), *Dialectic of Enlightenment* (New York, 1972; London, 1973).

— *Minima Moralia: Reflections from Damaged Life* (London, 1974).

— *Negative Dialectics* (London, 1973).

— *Prisms* (London, 1967).

Max Horkheimer, *Eclipse of Reason* (New York, 1947).

— *Critical Theory: Selected Essays* (New York, 1972).

Adorno and Horkheimer: Commentaries

Susan Buck-Morss, *The Origin of Negative Dialectics* (New York and Hassocks, 1978).

D. Howard, *The Marxian Legacy* (London and New York, 1977) ch. 5.

Frederic Jameson, ‘T. W. Adorno or Historical Tropes’, *Salmagundi*, 5 (spring 1967).

Gillian Rose, *The Melancholy Science: An Introduction to the Thought of Adorno* (London, 1979).

Marcuse: Texts

Herbert Marcuse, *Counterrevolution and Revolt* (London, 1972).

— R. P. Wolff and B. Moore, *A Critique of Pure Tolerance* (London, 1969).

- Eros and Civilization: A Philosophical Inquiry into Freud* (London, 1969).
- An Essay on Liberation* (London and Boston, 1969).
- Negations: Essays in Critical Theory* (London and Boston, 1968).
- One-Dimensional Man: Studies in the Ideology of Advanced Industrial Society* (Boston, 1964).
- Reason and Revolution: Hegel and the Rise of Social Theory*, 2nd edn (London, 1964).
- Soviet Marxism: A Critical Analysis* (New York, 1958).
- Studies in Critical Philosophy* (London, 1972).

Marcuse: Commentaries

- Paul Breines (ed.), *Critical Interruptions: New Left Perspectives on Herbert Marcuse* (New York, 1970).
- J. Cohen, 'Critical Theory: The Philosophy of Marcuse', *New Left Review*, 57 (1969).
- Alasdair MacIntyre, *Marcuse* (London and New York, 1970)
- Robert W. Marks, *The Meaning of Marcuse* (New York, 1970) .
- Paul Mattick, *Critique of Marcuse: One-dimensional Man in Class Society* (London, 1972).
- P. Sedgwick, 'Natural Science and Human Theory: A Critique of Herbert Marcuse', *Socialist Register* (London, 1966).
- J. Woodis, *New Theories of Revolution* (London, 1974).

Others

- H. Arendt, 'Walter Benjamin, 1892—1940', in *Men in Dark Times* (London, 1970).
- Walter Benjamin, *Illuminations: Essays and Reflections*, ed. H. Arendt (New York, 1968).
- The Origins of German Tragic Drama* (New York and London, 1977).
- Reflections* (London, 1978).
- F. Dallmayr, 'Habermas: Knowledge and Human Interests and its Aftermath', *Philosophy of the Social Science*, 2 (1972).
- G. Floistadt, 'Social Concepts of Action: Notes on Habermas' Proposal for a Social Theory of Action', *Inquiry*, 13 (1970).
- Erich Fromm, *Being and Having* (London, 1978).
- Beyond the Chains of Illusion: My Encounter with Marx and Freud* (New York,



1962).

—*The Crisis of Psychoanalysis: Essays on Freud, Marx and Social Psychology* (London, 1973).

—*The Fear of Freedom* (London, 1942).

—*Man for Himself* (New York, 1947).

—*Marx's Concept of Man* (New York, 1961).

—*The Sane Society* (New York, 1955).

Jürgen Habermas, *Between Facts and Norms: Contributions to a Discourse Theory of Law and Democracy* (Cambridge, 1995).

—*Knowledge and Human Interests* (London, 1972).

—*Legitimation Crisis*, ed. T. McCarthy (London, 1976).

—*The Theory of Communicative Action*, 2 vols (Boston, 1984, 1987).

—*Theory and Practice* (Boston, 1973).

—*Towards a Rational Society: Student Protest, Science and Politics* (London, 1972).

H. Stuart Hughes, 'Franz Neumann between Marxism and Liberal Democracy', in D. Fleming and B. Bailyn (eds), *The Intellectual Migration: Europe and America, 1930—1960* (Cambridge, Mass., 1969).

Frederic Jameson 'Walter Benjamin; or Nostalgia', *Salmagundi*, 10/11 (fall 1969—winter 1970).

Thomas McCarthy, *The Critical Theory of Jürgen Habermas*, 2nd edn (Cambridge, 1982).

Franz Neumann, *Behemoth: The Structure and Practice of National Socialism, 1933—1944*, rev. edn (New York, 1944).

—*The Democratic and Authoritarian State: Essays in Political and Legal Theory* (New York, 1957).

William Outhwaite, *Habermas: A Critical Introduction* (London, 1994).

Friedrich Pollock, *The Economic and Social Consequences of Automation* (Oxford, 1957).

John H. Schaar, *Escape From Authority: The Perspectives of Erich Fromm* (New York, 1961).

T. Schroyer, 'The Dialectical Foundations of Critical Theory: J. Habermas' "Meta-theoretical Investigations"' . *Telos*, 12 (1972).

— 'Marx and Habermas', *Continuum*, 8 (1970).

A. Sohn-Rethel, *Intellectual and Manual Labour: A Critique of Epistemology*



(London, 1978).

Stephen White (ed.), *The Cambridge Comparison to Habermas* (Cambridge, 1995).

—*The Recent Work of Jürgen Habermas: Reason, Justice and Modernity* (Cambridge, 1988).

Karl August Wittfogel, *Oriental Despotism: A Comparative Study of Total Power* (New Haven, 1957).



马克思主义研究译丛

第二十章 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

引 言

与德国的情况不同，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马克思主义才开始成为法国知识界一支重要的（思想）力量。由于法国天然具有许多社会主义的传统，加之共产主义在打败法西斯主义的过程中发挥了突出的作用而赢得了巨大的声誉（相形之下，与第三共和国相联系的自由主义则名誉扫地），以及许多外国知识分子发现巴黎是流亡者适宜的场所而纷至沓来，因此，法国的马克思主义获得了极大的丰富。这就为形形色色的马克思主义思想的蓬勃发展提供了舞台。而在战后法

国，对黑格尔兴趣的增长与出版马克思早期著作所产生的影响，助长了马克思主义的“存在主义”形态的出现。战争的经历摧毁了人们对深深植根于法国哲学传统之中清晰分析的理性主义的信心。黑格尔以及他的历史哲学、异化概念和辩证法、精神现象学等，似乎使人们对新近的体验有了更深入的理解，而黑格尔本人的哲学看来成了最进步思想的渊源。正如梅洛—庞蒂（Merleau-Ponty）所言：

上一世纪（19世纪——译者注）所有伟大的哲学思想，包括马克思与尼采的哲学、现象学、德国存在主义和精神分析学，都能在黑格尔那里找到源头；正是黑格尔开始尝试去探索非理性主义，并把它纳入到一种扩充了的理性中去，而这仍旧是本世纪（20世纪——译者注）的一项任务。^[1]

通过亚历山大·科热韦（Alexandre Kojève）和让·依波利特（Jean Hyppolite）的著作，法国的马克思主义者接触到了黑格尔。从1933年到1939年，科热韦曾在巴黎高等教育实习学校讲授黑格尔^[2]，在他的听众中，有许多人是战后有影响的思想家。在科热韦才华横溢而又别具一格的描述中，黑格尔是作为一位革命的社会理论家出现的，他的《现象学》一书的核心，是他关于主人和奴隶的辩证法：劳动是基本的人类活动；在劳动者为在劳动过程中得到认同而进行的斗争中，他们注定会把自身目前的奴隶地位转变为自由社会的主人地位。因此，理性并不是某些抽象的和永恒的范畴，而是不断进化的人类意识，这种人类意识在不断自我超越的过程中置身于、并遍布于世界之中。显然，这与马尔库塞在《理性与革命》中对黑格尔所作的马克思化的解释很相似。

如果说科热韦的解释有点过于个性化，那么让·依波利特则翻译出《现象学》，并发表了一篇内容详尽的评论，因而他的阐释紧扣黑格尔的实际文本。在依波利特的解释中，其核心是集中说明了关于不幸意识的观念——在这种精神状态中，人觉悟到了理想，但又发现它是不可能实现的。在依波利特看来，黑格尔业已表明，人的这种自我分离是人通往自我确认的道路上必然的一步，这条道路是由不断辩证地克服“异化”而构成的。依波利特还把人们的眼光投注到黑格尔早期在耶拿的著作上，在这些著作中，黑格尔集中关注了早期资产阶级社会的各种矛盾，特别是异化劳动。

科热韦和依波利特对黑格尔所作的激进阐述，有助于马克思的早期著作在战后最初几年中被迅速地吸收到法国马克思主义的传统中去。而要完成这种吸收，又不得不同法国共产党相对抗，因为直到20世纪50年代中期，法国共产党的知识分子无论在政治上、还是在哲学上，都受到荒谬可笑的斯大林主义的禁锢。在政治上，法国共产党不得不服从莫斯科的利益，在国内政策方面往往推行一条保守主义路线；在哲学上，除了重复斯大林制定的辩证唯物主义的规律，便无所作为。马克思早期著作、特别是《经济学—哲学手稿》的译介，却给人留下这样的印象，它似乎提供了一种完全不同的马克思主义形式，这种形式的马克思主义可以同现象学、人格主义和存在主义等日渐流行的哲学展开富有成效的对话。一般来说，马克思的早期著作之所以吸引人，在于他描绘出了这样一幅图景：多才多艺的个人在与其同伴的合作生产过程中自由自在地发展其个性。而现实中技术力量的增长和人在社会中受摆布的可能性越来越大，促使当时许多的评论家承继了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社会中人的异化的观点，并得出结论，认为马克思是存在主义张扬者的一分子。在这些思想家看来，高度发达社会的复杂性本身，使得马克思的这一分析的意义比在19世纪所能预期的更为重大。就这样，在斯大林主义统治下丧失了的异化和实践等概念，被法国人重新发现了，并在南斯拉夫、捷克斯洛伐克和其他东欧国家中引起了广泛的反响。^[3]在解读青年马克思的同时，法国的社会理论家们也返回到“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一批独创的理论家——卢卡奇（他的《历史与阶级意识》洞察到了《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许多内容）、科尔施和整个法兰克福学派中去。特别具有影响力的是，卢卡奇的学生卢西恩·戈德曼（Lucien Goldmann）的著作，他的文学批评强调阶级意识的适应性：

有代表性的伟大著作家，是那些能以或多或少融贯的方式表达出这样一种世界观的人，这种世界观同一个阶级可能的觉悟最大限度地相一致。对哲学家、作家和艺术家来说，情况尤为如此。^[4]

任何对马克思主义感兴趣的法国人，曾经都不得不以某些方式同法国共产党达成妥协，而党内臃肿僵化的气氛笼罩了整个知识界。许多最杰出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家都是从党内涌现出来的，只是在他们的思想变得激进冒险时方才被开除出党。两个典型的例子就可说明这一趋势。罗歇·加罗蒂

(Roger Garaudy) 是战后 20 年中党内最显要的知识分子，也是党的政治局成员。直到 20 世纪 60 年代早期，他的著作还充满着斯大林主义的传统，以至于把马克思主义看成是一种实证主义的、科学的唯物主义。直到 1962 年法国共产党（相当迟地）公开批评斯大林主义以后，加罗蒂才开始对忽视实践概念而只强调反映的认识论，以及老一套的辩证法定律等表示质疑。具有重大意义的是，在批评斯大林的同时，加罗蒂写了一本论述黑格尔的书和一部对马克思有独创性研究的著作。加罗蒂采取的新立场在《20 世纪的马克思主义》一书中得到了最好的表述，他写道：

第二十次代表大会非但没有毁灭我们的希望和信念，反而带来相反的结果，它使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第三次繁荣成为可能。然而，过于匆忙地把这一页翻过去，从而忽视了揭露罪恶的全部根源；或者不正确地归咎责任；或者不能对造成以往盲目性的原因作深入分析，都不能使这个新的开端成为可能。^[5]

按照加罗蒂的说法，要达到“这个新的开端”，只能通过表明：

马克思主义按其自身的原则，本身就包含着发展和更新的无限可能性……为了达到这一目标，必须大力强调（也许还得矫枉过正，因为马克思主义要求同一种根深蒂固的习惯方式决裂）辩证地超越的一面，包括与它过去所蕴涵的一切实行彻底的决裂和中断。^[6]

书中特别长的一节专门写马克思主义和宗教。许多进步的天主教徒早就对青年马克思感兴趣（工人—教士运动开始于 1944 年）。在 20 世纪 60 年代掀起的生气勃勃的马克思主义者与天主教徒之间的对话中，加罗蒂发挥了领导作用。^[7]然而，加罗蒂的观点最终越出了即便是改造过的马克思主义也不能容许的界限，他于 1970 年被开除出共产党。

亨利·列斐伏尔 (Henri Lefebvre) 是一位比加罗蒂还要独特得多的思想家。早在 1934 年，他就出版了马克思著作的选集，包括《巴黎手稿》中的许多文章。他在很容易引起误解的“辩证唯物主义”标题下写了一篇介绍马克思、至今仍堪称杰作文章。列斐伏尔立足于彻底的人道主义，立足于把实践看作是人与自然间的辩证关系、是人借以克服与其对立的自然而实现



自身的手段，把同异化的人相对立的“完整的人”（“整体性的人”）这一概念放在他整个解释领域的最前沿：

完整的人同时是生成活动中的主体和客体。他是与客体对立而又超越于这一对立的活跃着的主体。他是被分解成各个局部活动、各个散落的意志而又超越于这种分割的主体。他是行动的主体，也是行动的最终客体和产物（即便它看起来产生的是外在客体）。完整的人是能动的主-客体，他首先被撕裂、被肢解并束缚于必然性与抽象性之中。通过这一撕裂，他走向自由；他成为自然，但却是自由的。他像自然那样成为一个整体，却又把自然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完整的人是“消除了异化”的人。^[8]

列斐伏尔最有独创性、也是最重要的著作是《现代世界的日常生活》。在这本书中，他力图通过实地考察日常生活来论证异化现象。由于本书指出，即使在无产阶级革命成功以后，异化仍将存在；而且革命后的共产主义社会也并不能摆脱当前困扰着资本主义社会的许多问题，因而尤其激怒了正统的共产主义者。列斐伏尔在《日常生活》第二卷和他 20 世纪 60 年代的许多著作中，看到了现代文明的各种缺陷。他区分了愿望和要求，并坚持认为，社会主义的任何真正的进步都必须由它对日常生活的影响来检验。异化包括电视的冲击力、密集的居住环境，以及拒绝集体活动，凡此种种对社会主义提出了同对资本主义一样多的问题。这个“管制消费的官僚社会”与马克思描述的社会大相径庭，无论是早期资产阶级社会中充满自信心的个人，还是无产阶级革命运动中的反对派，都不复存在。列斐伏尔对现代性的分析与马尔库塞的分析有若干相似之处。但马尔库塞（乃至整个法兰克福学派）是诉诸精神分析学去说明消费主义的作用的，而列斐伏尔则通过语言学去解释它：伴随消费私有化的是，手势被信号所代替，符号被形象所代替，这种替换剥夺了个人沟通的任何可能性，更谈不上“总体化”其经验了。^[9]

萨 特

如同法兰克福学派，存在主义对现代技术把人当做物来处置这一日益增

强的趋势表示抗议。力图把存在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结合起来的理论努力，在让-保罗·萨特（Jean-Paul Sartre）的著作中得到了最好的阐明。萨特在他的存在主义宣言中声称：

人只是存在着。这并不是说，他只是他所自我构想去存在的那样，而是说，他就是他所意愿的那样存在着，就像他在已经存在着之后自己所想像的，也一如他被抛入存在之后所愿意去存在的那样。人无非是他自我成就出来的东西。^[10]

在大战期间写成的《存在与虚无》一书中，萨特最为详尽地阐发了上述观点。该书大量地吸取了胡塞尔（Husserl）的现象学和海德格尔的存在主义，它把自由看作人类生存的核心范畴：

人的自由先于人的本质，并使后者成为可能：人类的本质空悬于他的自由之中。而我们称之为自由的东西不可能与“人类现实”的存在区分开来。人并不是首先存在，以便随后成为自由的：在人“存在”（“是”）与他“是自由的”之间，没有什么区别。^[11]

虽然这样一种关于人类存在的描述完全是非唯物主义的、与历史无关的，因而同马克思主义相去甚远，但是，萨特在战后最初期却开始接近马克思主义。在《唯物主义与革命》（1946年）一书中，他抨击斯大林的《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是形而上学和实证主义的唯物主义，并且再次强调“有可能超脱某种具体的情境以便对它有所展望……这就是我们所说的自由。从未有过哪一种唯物主义能够说明它”^[12]。同时，他称赞青年马克思（作为恩格斯的对立面），并概述了马克思后期著作中的一个主要论题：

除了压制自由，人们决不能压制任何其他的东西；但是除非自由以某种方式适应于这种压制，也就是说，除非把某物的呈现交托给自己的对立面，人们是决不能压制自由的。革命运动及其谋划也可以从这样的角度来理解，即：革命会使社会经历某种形式的暴力，而自由在这种暴力中被让渡给同此暴力相互认可的另一种暴力状态。^[13]

如果说在《唯物主义与革命》一书中，萨特发现共产主义的哲学是令人沮丧的，那么在1952年受朝鲜战争刺激而写的《共产主义者与和平》一文中，他却发现共产主义的政治是进步的，并主张工人应绝对服从于党，因为这是他们未来自由的惟一保证。这一“极端布尔什维克”的立场使萨特与他从前的伙伴梅洛-庞蒂分道扬镳，后者在萨特靠近马克思主义时，却脱离了马克思主义。然而，在其主要著作《现象学和知觉》中，梅洛-庞蒂强调人类的互动性和主客体的辩证统一，以此来反对作为忠实的笛卡儿主义者的萨特把主客体根本分开的做法。他写道：“甚至在最近期，继续把萨特同马克思主义区分开来的东西是萨特关于‘我思’（cogito）的哲学。”^[14]

在最为严肃认真地同马克思主义达成和解的重要著作《辩证理性批判》（第一卷已在1960年出版）中^[15]，萨特试图对梅洛-庞蒂的批评予以回应。乍一看，萨特对马克思主义持如此令人吃惊的肯定态度。在《辩证理性批判》很重要的第一部分（最初以“方法研究”为题，发表于1957年）中，萨特从近代欧洲思想史的简要概述入手，它始自笛卡儿和洛克时期，经康德和黑格尔，延续到20世纪，其中最进步的哲学表达是马克思主义。但马克思主义本身有它的困境：

赋予马克思主义以力量和丰富性的是这样一个事实，即它试图最彻底地从历史进程的全部去阐明历史进程。但是近20年来，它所投射出的阴影反而使历史变得含混不清了，这是因为它不再与历史一道生存下来，是因为它企图以一种官僚式的保守主义，把变化归结为同一。^[16]

尽管如此，但是：

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力远未枯竭，它还很年轻，几乎还处在幼年期：它好像才刚刚开始生发出来。因而，它仍然是我们时代的哲学。我们尚不可超越它，因为我们并未超越产生它的那些社会历史条件。^[17]

萨特无保留地采用了马克思的如下表述：“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18]存在主义可能做的事（萨特仍然自认是个存在主义者）是恢复认识论的辩证方面，而这正是“马克思主义的薄弱点”。恢复认识论的辩证方面就要避免把认识看作简单地对外部

实在的观察，或者说对外部实在的反映——萨特认为，这两种看法都是同马克思把认识看作实践的原初见解相对立的。

继而，萨特试图确立自己的立场，同他所认为的恩格斯和加罗蒂这类作者所持的立场相对立。在后者看来，意识相对于社会经济基础的关系是受某些明确的原则限定的。萨特求全责备地认为当代马克思主义“缺少启发式的探究”。他说，对庸俗马克思主义来说，瓦莱里（Valéry）不过是个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而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则往往能够说明这样的事实，即：并非每一个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都是瓦莱里。^[19]萨特总结说：

我们指责当代马克思主义把人类生活的一切具体规定性委诸于偶然性因素而加以抛弃，指责它除了抽象的普遍性骨架，再也没有留下什么历史总体化的东西。结果是，它完全失去了人之所以为人的意义；它只有靠荒谬的巴甫洛夫（Pavlov）派心理学来填补这一缺陷。^[20]

因而，萨特的目标是，用下述方法来建立一种具体的人学，在这一方法中，社会学和心理学不是“同床异梦”，而是在真正辩证的马克思主义框架内合而为一。这并不涉及（如在萨特某些早期著作中曾存在过的那样）第三条道路或唯心主义的人道主义，因为关键在于，“不是在第三条道路或唯心主义的人道主义名义下抛弃马克思主义，而是把人恢复到马克思主义中去（在其中，重新争得人的位置）”^[21]。

在《方法研究》的最后一节，萨特确立起这样一种方法，试图以此来阐发马克思的说法，即：人们创造着他们自己的历史，但只是在预先制约着他们的条件下进行创造。这是一种前瞻—逆溯法 progressive-regressive method，萨特把它也称作辩证理性，以同分析理性相对立。以某人打开一扇窗户为例，观察者可以通过逆溯地（例如，意识到房间太热）和前瞻地（理解到想放新鲜空气进来的意图）来解读这个动作。这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和存在主义”的方法：

它承认目的是存在的——不管这些目的在哪里出现，它限定自身只是表明，其中的某些目的可能在历史的总体化进程中被抵消。这就是真正马克思主义的和存在主义的立场。从客观制约到客观化发展的辩证运动，可以使我们意识到：人们活动的目的并不是附加于行为本身之上的

不可思议的实体；目的只是体现了从当前通往未来的行为中所蕴涵的对既定的东西的超越和保持。既然目的构成人的行为及该行为内部矛盾之统一的辩证规律，那它也就是客观化本身。^[22]

正是在这一认识背景下，萨特才能够确定存在主义在马克思主义框架内所起的细微、却很关键的作用：

存在主义将试图通过间接认识（也就是说，如同我们所看到的那样，通过逆溯地表明种种存在体制的语言）来阐明某些特定的马克思主义知识，并且使得在马克思主义的框架内产生一种真正全面的认识，这种认识将在社会领域里重新发现人，并且在人的实践中（或者不如说，在人的筹划中，即人把自身抛入特定的社会情境所规定的社会可能性中）去探求人。这样一来，存在主义就会表现为知识之外的一个认识体系片段。等到马克思主义思想真的把人的尺度（也就是说，存在的筹划）作为人类学知识的基础来看待时，存在主义就再没有存在的理由了。^[23]

在概括了方法论原理以后，萨特开始切入《辩证理性批判》的正题，他再次提出了辩证法问题，把教条式的辩证法与批判的辩证法加以对照。萨特坚持认为，后者必须从个人出发：

如果我们不再想把辩证法变成一种神律、一种形而上学的天命，那就应该从个人出发，而不是从某种超个人的整体出发。于是我们遭遇到了一个新的矛盾：辩证法是关于总体化的规律，这种总体化创造了若干种集体、若干种社会以及历史（即各种实际存在的事物），也就是说，这些现实存在把自身强加于个人；但同时，它们又必然是由千百万个人的行为构成的。我们必须指出下述情况何以成为可能：总体化既是一种合力，虽然不是消极的平均值；又是一种统摄力，虽然不是超验的天命。我们还必须指出，总体化何以能不断地使纷繁复杂的杂多与单一性达到统一。^[24]

人类活动趋于“总体化”的这一性质是一个活跃的过程，它与定型了的、比方说一幅画或一台机器那样已完成其统一体的实在是相对立的。因

此，一方面，总体性是分析理性的对象；而另一方面，总体化则只有通过辩证理性才能得到理解。由于“辩证法是一种总体化进程中的活动，它惟一的规律是那些总体化发展中所派生出的规则”^[25]。对辩证法的这种解读必然导致对辩证唯物主义和自然辩证法的否定，萨特把它们追溯到恩格斯，并用他在《唯物主义与革命》一书中曾经用过的术语对它们展开批判。^[26]在题为“从个人实践到惰性实践”的冗长一节中，萨特描述了个人间最初的社会关系出现的方式。萨特从下述原理出发，即“辩证法研究的最重要发现是，正如物以人为‘中介’那样，在同样程度上，人也以物为‘中介’”，把物质匮乏这一概念置于这种中介关系的中心位置。^[27]为此，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指明了一种事实根据，只要社会关系的变革和技术的进步尚未把人类从匮乏状态中摆脱出来，我们就无法超越这种事实根据”^[28]。萨特引证了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结尾处关于自由王国和必然王国对立的著名命题，而后，他宣称：“一旦对每一个人来说都有了超出为生计而生产的真正自由的空间，到那时，马克思主义就不再适用了；一种自由的哲学将取而代之。”^[29]在萨特看来，匮乏是“任何社会中每一种人类关系物化的基本而抽象的基质”^[30]。就萨特所描述的对抗性社会关系而言，他的匮乏社会近乎霍布斯式的自然社会。因为：

在纯粹的相互关系中，与我不同的他者也同样是人。但在受到匮乏限制的相互关系中，只要这同样的人表现为截然不同的他者，他对我们来说就是一个非人——也就是说，是威胁我们生死的人。^[31]

萨特否认了恩格斯关于原始社会存在和谐的看法：

因为如果没有既从外部又从内部对人予以否定的持久因素，就不可能理解历史进程。在人的存在本身之中，便有一种把他人置于死地或被他人置于死地的永恒的可能性，换言之，即匮乏这样的持久可能性。^[32]

但自然界从来不是完全消极被动的。当人们作用于它时，它会无意识地作出反应。萨特举例说，一个中国农民为了扩大其耕地面积而把田地里的树木砍倒，结果却发现，（由于邻居也照此行事）他的田地如今被无法阻挡的洪水冲毁了。这就是“惰性实践”的力量，即一种异化状态。在这种异化状态

中，无数个人实践的结果逃脱了实践者的控制，并使他们的谋划归于失败。

在社会领域里，惰性实践是由与群体相对立的序列来体现的。比如，在公共汽车排队人群那样的序列中，个体的人排列着，只是公共汽车这一惰性目标才把它们统一起来。赖以区别他们的惟一特征是他们在同一条队列上的不同位置，因而，他们之间并没有任何相互沟通的机制。一个阶级也是一个序列，因为辩证法的研究“向我们表明，阶级在惰性实践领域的层面上是一个集合，阶级的存在是强加于构成这一集合体的杂多之上的一种序列状态的法令”^[33]。《辩证理性批判》的其余部分则描述了这样一些辩证规律，它们支配着群体从序列中产生出来，又从融合性群体（fused group）逐步蜕化为法定性群体（statutory groups），最后成为制度化的群体（institutionalised groups）。制度化的群体从外部操纵一个序列集合体，并转而成为序列状态本身。正如戈尔茨（Gorz）所写的那样：

追随这一历程，则辩证的经验使得所有实践的整体如何从个人实践中产生出来以及它们互相转化的问题变得易于理解了，只要是其中的任何单独一方对另一方都并没有任何历史上的优先权。序列、集合体、融合的群体、法定的群体、制度化的群体等等并不是历史发展逐次经历的阶段，而是在基本形式上的体系内（不完全的总体性和总体化）存在着、冲突着，并结合起来。历史就是这样一个总体化的过程。^[34]

作为一个融合性群体的例子，萨特描述了分散的个人是怎样联合起来去攻打巴士底狱的。一旦他们的直接目标达到了，这个群体就开始按照群体自身来了解自身，并企图靠效忠誓言来保存自身——这是限制其自身自由的第一步。随之而来的是通过压力（包括运用恐怖手段）把个人保持在群体之内，在群体（组织）内划分任务，并最终出现权威。而与此相关联的是，个人被纳入序列中而处于依从和无权的状态：

个体实践的局限性最终就在于，即注定导致序列消融在一个生动而错综复杂的共同体中，使个体在空间和时间的发展上受到有组织的个人无法逾越的法规的限制。并且，群体在其自身以外，即在它本想借以自行约束的无组织的外在性的某些被动性规定中，去发现它自己的存在。当异化用惰性实践领域来代替个人的自由实践领域时，群体便在对抗性

异化中形成；但它并不比个人更能逃避异化，相反，它由此陷于序列的消极被动状态内。^[35]

尽管萨特的批判并不直接地以历史为根据（在此，与黑格尔的现象学并没有什么不同；而且，萨特的批判与黑格尔的现象学有极为相似之处，其中包括两者都把斯大林与拿破仑相提并论），但它却深受到法国革命、古巴革命、阿尔及利亚革命、而首先是俄国革命的影响。在萨特看来，布尔什维克革命乃在于：

对自保永存的集团的专政，它以无产阶级并未授予于它的无产阶级代表的名义，向正处于灭亡过程中的资本家阶级、农民阶级、乃至工人阶级本身行使统治的权力。^[36]

进一步说：

无产阶级专政（作为经工人阶级总体化而成的真正的权力行使）之所以从未出现过，其原因就在于，这个想法本身是荒谬的，是在积极的、自主的群体与消极被动的序列之间作粗鄙妥协。^[37]

但萨特并不因此就放弃阶级斗争的观念，或者放弃他所着意强调的这一观念的重要性。任何关于资本主义经济会自行崩溃的说法，都将“最终把人贬低为纯属反辩证法的惰性实践的要素”^[38]。在一个表明自己的研究事业之未竟性的总结中，萨特写道：

批判考察的逆溯运动已经证明，把各种形式的能动的多样性互相结合起来的实践结构和辩证关系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一方面，我们仍然处于同步共时的总体化的水平上，还没有深入到实践时序化（temporalisation）的历时性深度；另一方面，逆溯运动最终带来了一个问题：也就是说，它不得不采取复合的前瞻方式来完成，其目标是发起兼具共时性和历时性的双重运动。通过这种双重性的运动，历史不断地使自己总体化。^[39]

文体晦涩曲折和材料安排欠妥当，使得萨特的《辩证理性批判》很不好懂。它的长处在于卓越的心理洞察力和现象学的描述——这两方面也都是萨特以往著作的特点。当然，他是否已成功地把二者结合成一种具有生命力的马克思主义形式，还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缺乏有经验可凭的历史参照（例如，在论匮乏的那一节中）、强调从个人出发^[40]、对人作本体论的界定——特别是关于人的本体论界定似乎仍持人与自然对立的二元论，这种残余不能不使人联想到笛卡儿主义，凡此种种，都很难同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相容。

论辩派和“新工人阶级”的理论家

萨特惊人的综合力依然带有某种思辨性，而在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法国人对马克思主义两次大的修正，所遵循的却是经验主义的和社会学的方法。萨特是作为一个存在主义者来探讨马克思主义的，而“论辩派”（Arguments）集团和“新工人阶级”（New Working Class）的理论家们却是一些从存在主义那里寻求灵感的前共产党员。其中，“论辩派”集团以《论辩》评论杂志为中心，它受到法兰克福学派和勒斐伏尔著作的影响，探究马克思关于取消哲学的观点是否恰当；并且还探讨：在一个像重视劳动一样重视休闲、像重视政治与经济那样重视文化上层建筑的社会中，异化的本性是什么。“论辩派”集团的主要思想家是科斯塔斯·阿克赛洛斯（Kostas Axelos）。他在其最重要的著作《卡尔·马克思思想中的异化、实践和技术》中认为，马克思的异化概念过分局限于劳动过程，因而不能处理先进技术中固有的异化问题——不管这种先进技术是按资本主义方式还是按社会主义方式组织起来的。在阿克赛洛斯看来，自我创造除了生产劳动外，还有其他的方面。在对马克思的第一个《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作出引人注目的重新表述时，阿克赛洛斯把他的观点归纳如下：

所有的（包括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思想是：对象、实在、物质只有被置于生产对象、物质现实和劳动资料的形式下，才可以理解；它们就这样被有效地把握，但这些东西缺少根基和视界。这就是为什么另一面由唯心主义哲学以形而上学方式（即与素朴

的或精致的实在论相对立的方式）加以发展了。自然地，唯心主义哲学既不知道、也不承认我们称之为实在的世界：它是各种形式、各种力量，以及已构成的、具体化的和已固定了的世界的脆弱点的总和；同时，它也是正处于构成中而开放未决的世界的存在方式——这是同一个惟一的世界的另一面。马克思思想使感性对象高于观念对象，但他并没有把人的活动本身当做未定的活动来把握。于是，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和《哲学的贫困》中，他同样把物质生活看作惟一真实的人类生活，而思想和诗只是在具有条件的、意识形态的形式中才被把握。^[41]

经济学的异化概念没法解决技术社会中的问题，对此，论辩派集团的其他成员，如富热罗拉（Fougeyrollas）、莫林（Morin）和沙特莱（Chatelet）作出了进一步探讨。^[42]属于“是社会主义还是野蛮”（*Socialisme ou Barbarie*）集团的前托派作家如克劳德·莱福（Claude Lefort）和科尼利厄斯·卡斯托里亚迪斯（Cornelius Castoriadis）等，则以更为激进的情绪分析了现代官僚化问题。^[43]

“新工人阶级”的理论家则更符合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安德烈·高兹（André Gorz）和塞奇·马勒（Serge Mallet）等作家既否认发达资本主义条件下工人阶级革命觉悟必然消失的自由主义观，也抛弃了在共产党那里对无产阶级几十年一贯的僵化定义，从而试图重新为阶级斗争划定界限。作为萨特的门徒，高兹在他的《劳工战略》一书中力求表明，革命运动再也不能心安理得地把其基础建立在非悲惨化和经济剥削等概念之上了。生活水平的提高和自动化的采用意味着白领脑力劳动者的重要性在增强，而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压迫则只需用着力于工人自我创造力上的异化概念便能完全化解。于是乎，为工人自治而斗争的纲领就能够从内部削弱资本主义企业的基础，并克服因改良与革命之间的对立而引起的政治障碍。高兹的这一分析得到了马勒的支持，后者论证道^[44]，迄今为止，发达资本主义的那些高度熟练的脑力劳动者和技术工人并未被看作是无产阶级的核心部分，相反，他们恰恰构成了无产阶级的革命先锋队。这些年轻的工业骨干既不受传统的行业分工的限制，也不受庞大的工会官僚主义的控制，加上有足够收入作保障的物质地位，就能够发挥他们举足轻重的地位来重建社会的社会经济基础。这种看法在1968年的“五月事件”中得到了充分的证实。

〔注释〕

- [1] M. Merleau-Ponty, *Sense and Non-Sense* (Evanston, Ill., 1964) p. 63.
- [2] A. Kojève, *Introduction to the Reading of Hegel* (New York, 1969).
- [3] 参阅本书第十章。
- [4] L. Goldmann, *The Human Sciences and Philosophy* (London, 1969) p. 59.
- [5] R. Garaudy, *Marxism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London, 1970) p. 18.
- [6] *Ibid.*, p. 211.
- [7] 关于这方面的概述, 见 P. Hebblethwaite, *The Christian-Marxist Dialogue and Beyond* (London, 1977)。
- [8] H. Lefebvre, *Dialectical Materialism* (New York and London, 1968) pp. 162f.
- [9] 关于这一问题, 见 Lefebvre, *Le Langage et la société* (Paris, 1966), *Position: contre les technocrates* (Paris, 1967) and *Everyday Life in the Modern World* (London, 1971)。
- [10] J.-P. Sartre, *Existentialism and Humanism*, ed. P. Mairet (New York, 1948) p. 28.
- [11] J.-P. Sartre, *Being and Nothingness* (New York, 1966) p. 30.
- [12] J.-P. Sartre, 'Materialism and Revolution', *Literary and Philosophical Essays* (New York, 1967), pp. 235ff.
- [13] *Ibid.*, p. 251.
- [14] M. Merleau-Ponty, *Adventures of the Dialectic* (Evanston, Ill., 1973) p. 158.
- [15] 关于第二卷的内容, 见 R. Aronson, J.-P. Sartre: the Politics of the Imagination (New York, 1979), 以及题为“一国社会主义”的文章, 其摘要发表在 *New Left Review*, 100 (1977)。
- [16] J.-P. Sartre, *Search for a Method* (New York, 1968) p. 29.
- [17] *Ibid.*, p. 30.
- [18] K. Marx, Preface to *A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 in *Selected Writings*, ed. D. McLellan (Oxford and New York, 1977) p. 389.
- [19] 参见 J.-P. Sartre, *Search for a Method* (New York, 1968) pp. 53ff. 如何在实际中做到这一点, 详见萨特在完成了《辩证理性批判》转向对福楼拜 (Flaubert) 的分析。
- [20] *Ibid.*, p. 82f.
- [21] *Ibid.*, p. 83.
- [22] *Ibid.*, p. 158f.
- [23] *Ibid.*, p. 181.

- [24] J. -P. Sartre, *Critique of Dialectical Reason* (New York and London, 1976) p. 36. 另可参见该书第 47-48 页上冗长而晦涩的脚注。
- [25] Ibid. , p. 47.
- [26] Ibid. , pp. 26ff.
- [27] Ibid. , p. 79.
- [28] J. -P. Sartre, *Search for a Method*, p. 34.
- [29] Ibid.
- [30] Ibid. , p. 132.
- [31] J. -P. Sartre, *Critique of Dialectical Reason*, pp. 131f.
- [32] Ibid. , p. 148.
- [33] Ibid. , p. 306.
- [34] A. Gorz, 'Sartre and Marx', in *New Left Review* (eds), *Western Marxism; A Critical Reader* (London, 1977) p. 195.
- [35] J. -P. Sartre, *Critique of Dialectical Reason*, p. 668.
- [36] Ibid. , p. 661.
- [37] Ibid. , p. 662. 可进一步参阅他发表在《社会主义年鉴》(1970) 上的文章“群众、自发性与政党”。
- [38] Ibid. , p. 788.
- [39] Ibid. , pp. 817f.
- [40] 在此, 可进一步参看阿伦森 (R. Aronson) 的批评性文章, 'The Individualist Social Theory of J. -P. Sartre', in *Western Marxism; A Critical Reader* (London, 1977).
- [41] K. Axelos, *Vers la pensée planétaire* (Paris, 1964) p. 172. 引自 M. Poster, *Existential Marxism in Post-War France* (Princeton, N. J. , 1975) p. 225.
- [42] 参见参考文献中所引著作。
- [43] 进一步参见 D. Howard, *The Marxian Legacy* (London, 1977) pp. 222ff.
- [44] S. Mallet, *La Nouvelle Classe ouvrière* (Paris, 1963).

深入阅读材料

概述

有三本好书, 它们是休斯 (Hughes) 的《被阻塞的路》, 这本书提供的是相关的思想背景; 考特 (Caute) 的《共产主义与法国知识分子》, 它考察的是政党的作用; 利希特海姆 (Lichtheim) 内容广泛的《当代法国的马克思主义》。新近的发展, 见波斯特

(Poster) 的优秀评论《战后法国的存在主义马克思主义》。

萨特：原著

萨特的主要著作是《辩证理性批判》，新近已有英译本。遗憾的是，这个版本未包括重要的导论性文章，它最初是以“方法研究”为题发表于1963年的。萨特两部具有价值的论文集是《文学与哲学随笔》和《在存在主义与马克思主义之间》。

萨特：评论

对萨特的马克思主义的探讨意味着对《辩证理性批判》的探讨，相关的最好的介绍也许是德桑 (Desan) 的《让-保罗·萨特的马克思主义》，该书对《辩证理性批判》作了紧扣原文的分析。对萨特的政治观最全面阐述的是阿伦森 (Aronson) 富有同情感的批判性著作《让-保罗·萨特：想像的政治学》。持更为强硬路线的马克思主义方法，见基奥蒂 (Chiodi) 的《萨特与马克思主义》。高兹 (Gorz) 的文章“萨特和马克思”把《辩证理性批判》作为马克思主义的来捍卫。利希特海默的《萨特、马克思主义与历史》对《辩证理性批判》作出了更为客观、公正的评论。就萨特的政治观的发展，见索迪 (Thody) 的《让-保罗·萨特的文学和政治研究》的第四部分。对《辩证理性批判》相对简洁的评论，包含在霍华德 (Howard) 的《马克思的遗产》的第七章、波斯特 (Poster) 的《战后法国的存在主义马克思主义》的第七章。相关的背景材料，见奥达雅尼克 (Odajnyk) 的《马克思主义与存在主义》。对萨特的文学和哲学见解较政治见解更为侧重的短篇介绍，见格林纳 (Greene)、沃诺克 (Warnock) 和丹托 (Danto) 所著的书，当然，最好的是默多克 (Murdoch) 的书。至于对历史-政治背景最好的介绍，见丘特 (Judt) 的《马克思主义与法国左派》的后半部分。

其他

关于梅洛-庞蒂，见三个译本，反斯大林主义的著作《人道主义与恐怖》、《感觉和非感觉》的第二部分、当然最重要的是《辩证法的冒险》。关于对他的评论，见班南 (Bannan) 的《梅洛-庞蒂的哲学》和拉比尔 (Rabil) 的《梅洛-庞蒂：社会领域中的存在主义》，还可参见霍华德的《马克思的遗产》的第八章。加罗蒂 (Garaudy)、古德曼 (Goldman)、高兹和列斐伏尔 (Lefebvre) 的著作都已翻译过来，详见下面的参考文献。关于对他们的评论，见波斯特的评论性著作，它附有一个详尽的参考书目，另外，还有沃齐亚卡 (Lodziak) 和塔特曼 (Tatman) 对高兹的讨论。

参考文献

General

David Caute, *Communism and the French Intellectuals* (London, 1964).

H. Stuart Hughes, *The Obstructed Path: French Social Thought, 1930—1960*

(New York, 1968).

Tony Judt, *Marxism and the French Left: Studies in Labour and Politics 1830—1981* (Oxford, 1986).

George Lichtheim, *Marxism in Modern France* (London, 1966).

Mark Poster, *Existential Marxism in Post-War France: From Sartre to Althusser* (Princeton, N. J., 1975).

Sartre: Texts

Jean-Paul Sartre, *Being and Nothingness* (New York, 1966).

—*Between Existentialism and Marxism* (London, 1974).

—*The Communists and the Peace* (New York, 1968).

—*Critique of Dialectical Reason* (New York and London, 1976).

—*The Ghost of Stalin* (New York, 1968).

—*Literary and Philosophical Essays* (New York, 1967).

—*Sartre in the Seventies: Interviews and Essays* (London, 1978).

—*Search for a Method* (New York, 1968).

— ‘Socialism in One Country’, *New Left Review*, 100 (1976—1977).

Sartre: Commentaries

R. M. Alberes, *Jean-Paul Sartre: Philosopher Without Faith* (London, 1964).

Ronald Aronson, ‘The Individualist Social Theory of Jean-Paul Sartre’, *New Left Review* (eds), *Western Marxism: A Critical Reader* (London, 1977).

—*Jean-Paul Sartre: The Politics of the Imagination* (London, 1979).

Pietro Chiodi, *Sartre and Marxism* (Hassocks, Sussex, 1976).

Maurice Cranston, *Sartre* (London, 1962).

Arthur C. Danto, *Jean-Paul Sartre* (London, 1975).

Wilfred Desan, *The Marxism of Jean-Paul Sartre* (New York, 1965).

Andre Gorz, ‘Sartre and Marx’, *New Left Review* (eds), *Western Marxism: A Critical Reader* (London, 1977).

Norman N. Green, *Jean-Paul Sartre: The Existentialist Ethic* (Ann Arbor, 1960).

Marjorie Greene, *Sartre* (New York, 1973).

Klaus Hartmann, *Sartre's Ontology: A Study of Being and Nothingness in the Light of Hegel's Logic* (Evanston, Ill., 1966).

D. Howard, *The Marxian Legacy* (London, 1977) ch. 7.

Rene Lafarge, *Jean-Paul Sartre: His Philosophy* (Indiana, 1970).

R. D. Laing and D. Cooper, *Reason and Violence: A Decade of Sartre's Philosophy* (New York, 1964).

George Lichtheim, 'Sartre, Marxism and History', *History and Theory*, III, 2 (1963—1964).

Iris Murdoch, *Sartre: Romantic Rationalist* (London, 1953).

Walter Odajnyk, *Marxism and Existentialism* (New York, 1965).

James Shewiden, *Sartre: The Radical Conversion* (Athens, Ohio, 1969).

Philip Thody, *Jean-Paul Sartre: A Literary and Political Study* (New York, 1961).

Mary Warnock, *The Philosophy of Sartre* (London, 1965).

Othres

Raymond Aron, *Marxism and the Existentialists* (New York, 1969).

—*The Opium of the Intellectuals* (London, 1957).

John F. Bannan, *The Philosophy of Merleau-Ponty* (New York, 1967).

Michael Foucault, *The Archaeology of Knowledge and the Discourse on Language* (New York, 1973).

Roger Garaudy, *Marxism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London, 1970).

Lucien Goldmann, *The Human Sciences and Philosophy* (London, 1969).

André Gorz, *Socialism and Revolution* (London, 1973).

—*Strategy for Labour* (New York, 1967).

Jean Hyppolite, *Studies on Marx and Hegel* (London, 1969).

Dominique Lecourt, *Marxism and Epistemology* (London, 1975).

Henri Lefebvre, *Dialectical Materialism* (New York and London, 1968).

—*The Sociology of Marx* (London, 1968).

—*The Survival of Capitalism* (London, 1976).

Conrad Lodziak and Jeremy Tatman, *André Gorz: A Critical Introduction* (London, 1997).

Maurice Merleau-Ponty, *Adventures of the Dialectic* (Evanston, Ill., 1973).

—*Humanism and Terror* (Boston, 1969).

—*Sense and Non-Sense* (Evanston, Ill., 1964).

Albert Rabil, *Merleau-Ponty: Existentialist of the Social World* (New York, 1967).



第二十一章 德拉-沃尔佩学派

面对正统马克思主义的不断僵化和日益增长的技术影响，某些马克思主义著作家试图通过吸收存在主义思想，来重新发现人性的、主体性的方面。而另一些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想家对马克思主义所提出的解释，却与黑格尔式的存在主义者所提出的解释根本对立。例如，在意大利，德拉-沃尔佩（Della Volpe）及其追随者们就拒绝把马克思解读成黑格尔派的任何企图。主要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从事写作的德拉-沃尔佩认为，黑格尔利用从抽象到具体、又复归到抽象的辩证法，混淆了概念过程与现实过程。相反，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则与一种以科学逻辑为基础的认识论有关，这种认识论从具体到抽象、

又复归到具体，这一过程类似于伽利略的假设—演绎法。在政治上，德拉-沃尔佩强调马克思受惠于卢梭，并主张在向社会主义过渡的社会中，需要有平等主义的形式上的法律保证。过渡性社会废除了资产阶级一切形式的法制和代议制机构，必然要冒转向专横暴政的危险。德拉-沃尔佩的这些主旨被他的弟子鲁西奥·柯莱蒂（Lucio Colletti）予以进一步发挥。后者像前者一样，强调卢梭对资本主义国家中市民与资产阶级的分离所开展的批判的重要性，强调了卢梭所发展的、作为巴黎公社的直接先导的人民民主概念的重要性。在哲学领域，柯莱蒂主要反对法兰克福学派，因为他们既否定唯物主义，也否定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但是，柯莱蒂同样也反对恩格斯和列宁的辩证唯物主义，认为他们简单地抄袭了黑格尔关于物的辩证法的说法，从而否定了任何真正的唯物主义。因为“没有无矛盾原理，唯物主义实际上是不可想像的；相反，‘物的辩证法’却否定这一原理”^[1]。与此形成对照的是，柯莱蒂只保留了思维领域中的辩证法（主张现实是无矛盾的）。他同时强调“异化”命题是马克思的核心，并把康德视为“能够帮助我们建立起唯物主义认识论的一位伟大的现代思想家”^[2]。

〔注释〕

[1] L. Colletti, *Marxism and Hegel* (New York and London, 1973) p. 192.

[2] L. Colletti, 'A Political and Philosophical Interview' *New Left Review*, 86 (1974) p. 10.

深入阅读材料

最好的介绍性读本 是弗雷泽（Fraser）的《加尔瓦诺·德拉-沃尔佩思想介绍》。德拉-沃尔佩本人的主要著作是《鉴赏力批判》，如同他的《卢梭与马克思》，都有英文本。至于柯莱蒂，特别请参阅他的论文集《马克思主义和黑格尔》与《从卢梭到列宁》。

参考文献

L. Colletti, *From Rousseau to Lenin* (New York and London, 1972).

—*Marxism and Hegel* (New York and London, 1973).



- J. Fraser, *An Introduction to the Thought of Galvano Della Volpe* (London, 1977).
Galvano Della Volpe, *Critique of Taste* (London and New York, 1978).
—*Rousseau and Marx* (London, 1980).



第二十二章 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

同样是反对黑格尔式的马克思主义，但影响要大得多的是 20 世纪 60 年代中期在法国兴起的结构主义式的马克思主义。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试图把马克思主义思想与发达工业社会中明显的组织化和消极性（由于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自身各自都丧失了对自身使命的自信心而产生的）调和起来。一般而言，结构主义起源于索绪尔（Saussure）或雅科布森（Jacobson）的语言学研究，他们研究的是作为语言的基础的一般性结构，而不是其具体的发展。列维-斯特劳斯（Lévi-Strauss）用“结构”概念来说明原始社会，而拉康（Lacan）和福科（Foucault）在心理学和认识论方面也是如此。在这些思想家看

来，我们要理解人类社会，最重要的不是作为主体的人的有意识的活动，而是作为这些有意识活动的先决条件的无意识的结构。既然结构主义在20世纪60年代有这么大的影响，那么出现用结构主义来解读马克思的现象就不足为奇了。这个学派的重要人物是路易斯·阿尔都塞（Louis Althusser）。他是法国哲学家，于1960年前后便开始详尽地阐发他的观点。阿尔都塞既不赞成青年卢卡奇、萨特和葛兰西把人作为历史主体加以强调的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也反对被他视为传统的辩证唯物主义所固有的那种简单化的经济主义。

阿尔都塞是从如何解释马克思这一问题出发的。在他看来，马克思的著作不是一个连贯的整体，但其中确实包含有一种科学的历史观。当然，必须认清其理论上的“脱漏”及早期思维方式中的残余等，方可把这种历史观分析地抽取出来。要做到这一点，最根本的一条是，要对一些相关概念以及它们的相互关系作出精确的界定。这是一项哲学任务。阿尔都塞的基本问题是：“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它的存在是否有理论依据？如果这种理论依据在原则上确实存在的话，那么怎样才能规定它的特性？”^[1]要回答这些问题，《资本论》是基本的文本，而阿尔都塞旨在发掘、揭示《资本论》中所固有的哲学思想。对这一努力，具有决定意义的是，他意识到，马克思的著作所包含的不止是某一个论域。阿尔都塞否定了马克思早期著作中的人道主义，并在青年马克思和成熟的马克思二者之间发现了一种他称之为“认识论的断裂”epistemological break现象。“认识论的断裂”这一概念是从法国哲学家加斯通·巴赫拉（Gaston Bachelard）那里借用来的，它类似于同一时期的托马斯·库恩（Thomas Kuhn）所制定的科学范式观。根据阿尔都塞的看法，马克思的早期著作和后期著作包含着两个不同的“问题域”（problematic）。所谓问题域，就是“特定的论题间所构成的客观内在的关联系统，即决定所给定的答案的问题体系”^[2]。马克思早期带有黑格尔色彩的著作，着重阐述异化和类存在的概念，从而展示了一个关于主体的意识形态的问题域；只是在他的后期著作中才包含着能容纳一门科学基础的另一问题域。但这一前后期间的断裂在马克思的原著中并不明显。某些早先的意识形态概念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甚至在《资本论》中始终存在：

《资本论》第一卷问世时（1867年），黑格尔影响的痕迹依然存在。

只是到后来，这些痕迹才完全消失：《哥达纲领批判》（1875年）和

《评瓦格纳〈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旁注》(1882年)最终完全消除了任何黑格尔影响的痕迹。^[3]

因此,阅读马克思的著作需要用征兆式(symptomatic)的读法。简单而直截了当地把握其文本含义是不可能的。正如吉拉斯(Geras)所写的:

问题域在确定其领域内所应包括的内容时,也就必然决定了它相应排斥的内容。因此,被排斥的概念(缺失部分、空白点)和没有充分提出的问题(半无言处、脱漏)或根本没有提出的问题(无言处),便与那些被提出的概念和问题一样,构成了问题域的一部分。由于这个原因,人们对原文中明确的论述简单地从字面来理解或直接地阅读,就很难掌握它。相反,要掌握它就必须通过“征兆”读法,即把明确的论述与那些欠缺部分、空白点和无言处结合起来读。后者构成另一种“未曾明言的论述”,它们就是潜藏在原文中未被人意识到的问题域的许多征兆。就像一切认识那样,正确地理解和实践着的读法不是静观,而是理论性的劳作和生产。^[4]

这同弗洛伊德的无意识理论有着明显的类似之处。

这种征兆读法产生了什么呢?它包含了对人道主义和对阿尔都塞视其为人道主义之必然结果的经验主义的否定。经验主义把主体和客体、抽象和具体对立起来,认为世界能够直接被把握,这种见解没有明确地把概念与其对象加以区分。在经验主义看来,“认知就是从真实客体中抽象出它的本质,于是主体对这种本质的占有就被称作知识”^[5]。经验主义把“一定的主体与一定的客体”对立起来,“并把由主体所抽象出的客体的本质称为知识,因此对客体的知识也就是客体本身的一部分”^[6]。与此相反,阿尔都塞——显然带着新康德派的色彩——把哲学的任务视为创造概念,认为概念是认知的前提。他主张严格区分思维的对象和真正的对象(客体)。他写道:

认知作用于其“对象”……不是作用于真实的客体,而是作用于特定的原始材料。后者按其严格的意义来说,构成了它的“对象”(即认知的对象)。这一对象甚至在认知的原初形式中也有别于真正的客体。^[7]

认知作用于其对象是实践的一种特殊形式，即理论性实践：

就实践而言，我一般指的是任何将明确给定的原料转化为规定的产品的过程。这一转化是某种确定的人类劳动、使用某些确定的（“生产”）工具完成的。在任何这样的实践中，决定性的要素（或因素）既不是原料也不是产品，而是狭义的实践，即在一种特定的结构内，使人、工具和使用这些工具的某一技术方法同时在这一转化过程中发挥作用的劳动本身。^[8]

这种理论实践由三个要素组成，阿尔都塞称之为三个“通则”。第一个“通则”是属于某一学科的原料，即该学科的思想 and 概念，它们部分是科学的，部分是意识形态的；第二个“通则”是加工上述原料的理论性生产工具，即形成某一学科问题域的成套概念框架；第三个“通则”是这样加工出来的产品，即思维中的具体，它提供了对现实的具体物的认识。^[9]马克思主义哲学——辩证唯物主义——就是关于这一理论实践的理论。

这一认识论应用于社会的结果，便是历史唯物主义科学。阿尔都塞严格地区分思维的对象和真实的客体，也就相应地拒绝了黑格尔的整体性概念，在这一整体性概念中，全部的要素只不过是内在本质的现象表现。例如，罗马的本质表现于罗马的法律和政治方面等。在阿尔都塞看来，与这个简单的方法相反，马克思所做的就是阐发出作为一个整体的社会概念：

这个社会的统一性是由某种特殊类型的复杂性构成的，而复杂性表现出的状况，按照恩格斯的说法，我们可以非常范式化地归结为三个方面：经济、政治和意识形态。^[10]

其中每一表现的方面，作为一种单独的结构，都统一于诸结构的结构之中，而因果关系本身也是结构性的：

结果不是在结构之外的，不是预先存在的客体或因素，也不是结构在其中为打上自己的印记而占据的空间。相反，这意味着结构寓于其结果之中，或以斯宾诺莎主义对“因果关系”这个词的理解，原因寓于其结果之中。这也就意味着结构的整个存在是由它的结果构成的。简言之，

结构仅仅是其特有因素的特定组合，在其结果之外不存在任何结构。^[11]

每个层次都有其自己特有的时间，都有属于自身的发展节律。阿尔都塞把处于某一特定时间内诸方面或诸层次之间复杂的、不平衡的相互关联称为“关节点”，而每一关键环节据说是“反向决定”的，即其中每一个层次都有助于决定结构、并被结构所决定，因而，决定关系往往是复杂的。于是，阿尔都塞摈弃了这样的观念，即认为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只存在着简单的矛盾。当然，每个层次的决定作用并不是对等的，因为它们自主性都只有相对的，而经济总是起最终决定作用的。阿尔都塞在起主导作用的方面与被决定的方面之间划了一条界线。例如在封建时期，政治是主导方面，但政治起主导作用这个事实本身又是由经济所决定的。^[12]基于总有一种主导性因素存在，阿尔都塞便把这一结构称为主导结构。但经济对于这个主导结构的决定作用，绝不能从作为一个整体的结构中脱离出来：

经济的辩证法从来不在纯粹状态中起作用。在历史上，人们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现象，即上层建筑等等在发挥其作用后便毕恭毕敬地靠边站了；或者说，在沿着通向辩证法的皇家大道大踏步前进的经济陛下面前，这些方面会随这种纯经济现象的到来而烟消云散。事实上，“最终”的单独时刻是始终不会到来的。^[13]

作为一个整体的结构是松散的，因为它的诸因素并不像黑格尔认为的那样，源于一个单一的本质或核心。

从结构性因果关系的概念，又可以得出历史是“一个没有主体的过程”这一概念。历史不是人类主宰自然的单一直线式发展或同质性的过程：

马克思主义哲学要成为辩证唯物主义的哲学，就必须同作为起源、本质和原因的唯心主义“主体”范畴决裂，这个“主体”以其内在性对外部“客体”的一切决定作用负责，因为对于外在的“客体”来说，这种内在性便被说成是“主体”。^[14]

在黑格尔那里，这个主体就是绝对。按照阿尔都塞的说法，马克思在早期著作中所作的一切，就是用人的本质的观念取代作为历史主体的绝对。只

是到1845—1846年间，马克思才开始看到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15]。并且，他不借助主体这个范畴，而只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等概念就能解释历史了。这样解释历史，类似于阿尔都塞式的文本解读法：这两人都拥有一种结构，但从根本上说，都没有主体。关于这一点，阿尔都塞作了如下强有力的表述：

生产关系的结构决定着从事生产的人所占据的**地位**和所承担的**职能**，只要这些人是某种职能的“载体”（承载者），他们便充其量只能是处于那种地位的人。因此，真正的“主体”（从过程的构成性主体这一意义来说）不是占据那种地位或承担那种职能的人（尽管他们在一切外表上具有朴素人类学“所规定”的“明显特性”），即不是“具体的个人”或“真正的人”，而是**对这些地位和职能的确认和分配**。真正的“主体”是**这些地位和职能的确定者和分配者，即生产关系**（以及政治的和意识形态的社会关系）。但是，正因为这些只是“关系”，它们就不能在**主体**范畴内予以思考了。^[16]

阿尔都塞对历史的这种解读法既有别于他所说的“历史主义”，即把人看作历史的能动主体的思想倾向（萨特的《辩证理性批判》是其突出的例子），也有别于马克思早期著作中的（意识形态的）人道主义，相反，他提出一种（科学的）理论性的反人道主义。

阿尔都塞对马克思的阐述，特别是其中关于问题域概念和坚持科学有相对自主性的主张，对于各种类型的还原主义和各种极端形式的黑格尔派马克思主义都是一剂很好的解毒药。尽管如此，阿尔都塞的理论却在三个方面遭到了批评。第一，阿尔都塞主张辩证唯物主义是一门科学；但他并没有提出科学性的鉴定标准，那么，我们怎么知道这门科学的知识是真实的知识呢？由于他否定了经验主义，也就排除了任何求助于“真实的客体”的做法。第二，阿尔都塞宣称意识形态是虚幻的领域；但仍坚持意识形态并不限于在阶级社会中存在，它也将在共产主义社会中存在。第三，由于把作为马克思主义科学的辩证唯物主义与社会生产条件的影响隔离开来，使之存在于社会形态之外，并最终成为知识分子杰出人物的独占物，也使它同工人阶级的革命活动脱离了联系，这就不可能为理论与实践的关系提供一个令人满意的说明，因而成了阿尔都塞的马克思主义最薄弱的环节。批评者们很容易就指



出，尽管阿尔都塞的理论看似超脱了阶级斗争，但他对意识形态和科学的相反见解事实上却是用来为党和官僚政治的存在作辩护的，因为科学知识必然只对少数人开放，而即使到了共产主义社会，群众也将不得不与意识形态打交道。阿尔都塞对斯大林主义的态度一直是温和的，因为他认为，斯大林主义只是一种“偏差”和上层建筑方面的错误。例如在《保卫马克思》一书中，他写道：

每一件被说成是“个人崇拜”的事情，所指涉的恰恰是上层建筑领域，因而只是国家机构和意识形态的领域；而且，它大都只涉及这一领域。从马克思主义理论中，我们就知道，这一领域具有“相对独立性”（这种相对独立性十分简单地从理论上说明了，在影响上层建筑犯错误的时期中，社会主义的基础结构何以能够在未受到重大损害的情况下得到发展）。^[17]

阿尔都塞能够对斯大林主义提出的惟一批评只能是“一种具体的批评，它存在于各种事实中，存在于斗争中、路线上和实践中，以及关于中国革命的原则和形式中”^[18]。这些批评使阿尔都塞对自己的立场多少作出了一点修正，他不得不承认，把哲学等同于科学是一个“理论上的”偏差，从而使哲学脱离了阶级斗争。^[19]

正因为阿尔都塞是个极尽学究“理论主义家”（theoreticist），其著作也是高度学理化的。他的追随者们试图将他的思想着重应用于两个主要领域：当代政治和历史研究。在早期著作中，阿尔都塞对国家问题几乎没说过什么。在“意识形态和意识形态的国家机器”这篇论文中^[20]，阿尔都塞在国家的镇压机器与工会、教会、学校等国家的意识形态机器这二者之间作出了区别，并且分析了后者作为阶级斗争的重要场所的作用。当然，把阿尔都塞的思想应用于阶级和国家的努力主要体现在尼科斯·普兰查斯（Nicos Poulantzas）的著作中。普兰查斯的著作仍具高度的理论性，它着重阐明了分析国家和阶级的恰当的问题域。在《政权和社会阶级》中，普兰查斯试图反对对当代国家作经济主义的解读，反对把国家简单地看作是垄断资本的工具（这是正统共产主义的看法）。他还试图分析了当代国家相对于经济的自主性。国家的作用是“社会形态各层次之间的一个内聚因素……是全球均衡体系的一个调节因素”^[21]。这样，当代资本主义国家就是一个阶级国家，在这

个阶级国家中，不管资本家阶级的代表在政权等方面可能占有什么职位，国家职能所维护的社会形态只是在各个层次都由资本家阶级支配的形态。其结果是马克思主义与结构功能主义的一种混合，其中的主要困难仍然是如何解释结构的变化。在《当代资本主义中的阶级》一书中，普兰查斯遵循阿尔都塞的路线，他的分析严格避免涉及意识，并拒绝任何形式的经济还原论。他描述了当代社会中结构是如何决定着各阶级的，即在社会的劳动分工中各阶级的客观地位再生产的方式。这种再生产不只存在于经济领域内，而且存在于政治和意识形态领域内，对此，普兰查斯在与经济主义进行的斗争中作了充分强调。他特别关注的是，独特而程式化地采用经济、政治和意识形态上的标准，把工人阶级仅仅定义在生产劳动者身上，从而并把它与成为白领管理工作者的“新工人阶级”区分开来。^[22]

更为成功的是，一些作家，如雷伊（Rey）、特雷（Terray）、梅拉苏（Meillassoux）和戈德列尔（Godelier）^[23]，把阿尔都塞的概念应用到历史学，特别是应用到“新的经济人类学”上去，由此，他们讨论了生产方式和社会形态之间的关系以及发展理论所带来的诸多后果。^[24]

[注释]

[1] L. Althusser, *For Marx* (London and New York, 1970) p. 31.

[2] *Ibid.*, p. 67.

[3] L. Althusser, *Lenin and Philosophy* (London, 1971) p. 90.

[4] N. Geras, 'Althusser's Marxism: An Account and Assessment', in *New Left Review* (eds), *Western Marxism: A Critical Reader* (London, 1977) pp. 244f.

[5] L. Althusser and E. Balibar, *Reading Capital* (London, 1970) pp. 35f.

[6] L. Althusser, *For Marx* (London and New York, 1970) p. 251.

[7] L. Althusser and E. Balibar, *Reading Capital*, p. 43.

[8] L. Althusser, *For Marx*, p. 166.

[9] *Ibid.*, pp. 183ff. 在此，阿尔都塞自认为在阐发马克思在1857年《〈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手稿）第三节中的见解。

[10] *Ibid.*, p. 232.

[11] L. Althusser and E. Balibar, *Reading Capital*, pp. 188f.

[12] 参见巴里巴（Balibar）在《读〈资本论〉》第216页以下对这一问题的详述。

[13] L. Althusser, *For Marx*, p. 113.

- [14] L. Althusser, *Essays in Self-Criticism* (London, 1976), p. 96.
- [15] K. Marx, 'Theses on Feuerbach', in *Selected Writings*, ed. D. McLellan (Oxford and New York, 1977) p. 157.
- [16] L. Althusser and E. Balibar, *Reading Capital*, p. 180.
- [17] L. Althusser, *For Marx*, p. 240.
- [18] L. Althusser, *Essays in Self-Criticism*, p. 92.
- [19] *Ibid.*, pp. 105ff.
- [20] L. Althusser, *Lenin and Philosophy* (London, 1971) pp. 135ff.
- [21] N. Poulantzas, *Political Power and Social Classes* (London, 1973) pp. 44f.
- [22] 见评论 E. O. Wright, in *Class, Crisis and the State* (New York and London, 1978) ch. 2.
- [23] 其相关著作见参考文献。
- [24] 进一步参见 A Foster-Carter, 'The Modes of Production Controversy', *New Left Review*, vol. 107 (1978).

深入阅读材料

阿尔都塞：原著

阿尔都塞最早期的文章收集在《保卫马克思》中，而后是他最基本的著作——《读〈资本论〉》。这些文献可以论文集《列宁与哲学》和《政治与历史》作为辅助阅读材料。还可参见他新近的《自我批评论文集》，其中载有与约翰·刘易斯 (John Lewis) 的论战，以及由埃利奥特 (Elliott) 所编辑的《读物》一书。

阿尔都塞：评论

有一部足可成书的长篇评论，见卡里尼科斯 (Callinicos) 的“阿尔都塞的马克思主义”。具有类似同情感和洞察力的评论有赫拉斯 (Geras) 的同名文章。沃尔顿 (Walton) 和加姆布 (Gamble) 的《从异化到剩余价值》的第五章更具批判性，格鲁克曼斯 (Glucksmann) 的文章“一种口技表演式的结构主义”也带如此大的批判性。对他进行辩护的文献有，安德森 (Anderson) 和布莱克伯恩 (Blackburn) 在《未知的方面》中的文章。由本顿 (Benton) 和埃利奥特分别所写的著作包含有字斟句酌、细致入微的探讨。另外，还可参见麦卡尼 (McCarney) 写的极端尖锐的文章。

其他

有关阿尔都塞的弟子，特别值得一读的是普兰查斯的著作——《政权与社会阶级》和《当代资本主义的阶级》。还可参阅他有关法西斯主义和地中海地区专政等方面的经验性著作。在米利班德 (Miliband) 的文章中有对普兰查斯的国家观的批评，在赖特

(Wright) 的书中有对他的阶级观的批评。而约瑟夫 (Jessop) 则对他的政治思想作了详尽的研究。

参考文献

Althusser: Texts

Louis Althusser, *Essays in Self-Criticism* (London, 1976).

—*For Marx* (London and New York, 1970).

—*Lenin and Philosophy and Other Essays* (London, 1971).

— ‘On the Twenty-Second Congress of the French Communist Party’, *New Left Review*, 104 (1977).

—*Politics and History* (London, 1972).

—and Etienne Balibar, *Reading Capital* (London, 1970).

Etienne Balibar, *The Dictatorship of the Proletariat* (London, 1977).

— ‘Irrationalism and Marxism’, *New Left Review*, 107 (1978).

—*The Althusser Reader*, ed. G. Elliott (Cambridge, 1994).

Althusser: Commentaries

P. Anderson and R. Blackburn, ‘Louis Althusser and the Struggle for Marxism’, in D. Howard and K. Klare (eds), *The Unknown Dimension* (New York, 1972).

Ted Benton, *The Rise and Fall of Structural Marxism* (New York, 1984).

Alex Callinicos, *Althusser's Marxism* (London, 1976).

Simon Clarke, *One-Dimensional Marxism: Althusser and the Politics of Class* (London, 1980).

Gregory Elliott, *Althusser: The Detour of Theory* (London, 1987).

Norman Geras, ‘Althusser's Marxism: An Account and Assessment’, *New Left Review*, 71 (1972), and *New Left Review* (eds), *Western Marxism: A Critical Reader* (London, 1977).

Valentino Gerratana, ‘Althusser and Stalinism’, *New Left Review*, 101—102 (1977).

A. Glucksmann, ‘A Ventriloquist Structuralism’, in *Western Marxism: A Critical Reader* (New York and London, 1977).

P. Hirst, ‘Althusser and Philosophy’, *Theoretical Practice*, 2 (1971).

M. Macchiocchi, *Letters from Inside the Italian Communist Party to Louis Althusser* (London, 1973).

Others

S. Clarke, 'Marxism, Sociology and Poulantzas's Theory of the State', *Capital and Class*, 2 (1977).

Bob Jessop, *Nicos Poulantzas: Marxist Theory and Political Strategy* (New York, 1985).

Joseph McCarney, 'For and Against Althusser', *New Left Review*, 176 (1989).

R. Miliband, 'The Capitalist State: Reply to Nicos Poulantzas', *New Left Review*, 59 (1970).

Nicos Poulantzas, 'The Capitalist State: A Reply to Miliband and Laclau', *New Left Review*, 95 (1976).

—*Classes in Contemporary Capitalism* (London, 1975).

—*The Crisis of the Dictatorships: Portugal, Greece, and Spain* (London, 1976).

—*Political Power and Social Classes* (London, 1973).

Steven Smith, *Reading Althusser: An Essay on Structural Marxism* (Ithaca, 1984).

E. Wright, *Class, Crisis and the State* (New York and London, 1978) ch. 2.



第二十三章 英国的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在英国生活和工作了 30 年以上，这一事实无助于他的思想在英国左派中的传播。在 1880 年以前，除了极少数人，大多数不懂德语和法语的人都没有接触过马克思的学说。直到 1881 年，在英国为复活宪章派的思想，建立了社会民主联盟。该联盟原本并非是一个正式的马克思主义组织，但其领袖 H. M. 海因德曼 (Hyndman) 在读了《资本论》以后，信奉了马克思的思想，并在其《全民享有的英国》(*England for All*) 中对马克思的思想作了大量的宣传。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社会民主联盟一直是英国主要的马克思主义组织，但其积极分子似乎从未达到 1 000 人以上。1893 年，凯尔·哈迪

(Keir Hardie) 及其朋友们建立了独立工党。该党避讳革命和阶级对抗的思想，代表了一种伦理的而不墨守成规地看待社会主义的态度。后来，在英国职工大会的鼓动下，于1900年从工人代表委员会中产生出新的工党，它在战前的岁月里获得了长足的发展。但是，与其他加入第二国际的工人政党不同的是，它在观点上是坚决反马克思主义的。

俄国布尔什维克胜利时，英国有三个主要的马克思主义组织——尽管同工党相比，这三个组织全都微不足道。其中最大的英国社会主义党，是1911年由社会民主联盟连同独立工党中的持不同政见者合并而成的。英国社会主义工党是其美国同名组织在英国的翻版，并按其主要发言人爱尔兰马克思主义者詹姆斯·康诺利 (James Connolly)、克莱德派领袖约翰·麦克莱恩 (John Maclean) 和 J. T. 墨菲 (Murphy) 的解释，宣传德·利昂 (de Leon) 的产业工联主义。三个组织中最小的是工人社会主义联盟，它是由西尔维娅·潘克赫斯特 (Sylvia Pankhurst) 创建的，在伦敦东区势力特别强大。所有这三个组织都向英国共产党陆续提供成员，后者在1920年建立后，成为了英国主要的马克思主义组织。

与欧洲其他共产党不同，英国共产党不是从社会民主党分裂出来的多数派中形成的，于是，共产党曾力求同工党合并，但遭到拒绝。共产党人对工党的这种态度本来出于矛盾的心情：一方面，他们声称工党的改良主义是对工人阶级的背叛，但同时另一方面又不得不追随莫斯科的统战路线，去充当工党的左翼。20世纪30年代，尽管发生了波及面广的产业动荡和国民内阁的垮台，共产党并没有怎么获得发展。然而，大量知识分子的涌入辅佐了共产党，因为他们把共产主义看作他们表达反法西斯主义崛起的最好方式。像诗人奥登 (Auden)、戴伊·刘易斯 (Day Lewis) 和斯彭德 (Spender) 等宣布，他们信奉无产阶级的事业。1936年创立的高兰茨 (Gollancz) “左翼书社”，得到了拉斯基 (Laski) 和斯特雷奇 (Strachey) 等有才华的马克思主义倡导者的合作。但是，战前英国惟一一位真正具有原创性的马克思主义者也许要数克里斯托弗·考德威尔 (Christopher Caudwell) 了，可惜他在西班牙内战中殒命而中断了写作。在他的两部主要著作——《幻觉与现实》和《垂死文化研究》中，考德威尔研究了文学的社会作用，著作虽然篇章结构显得凌乱，却富有启发性的洞见。

然而，自1956年以来，马克思主义不再等同于小规模英国共产党的正统思想了。随着中苏关系破裂和卡斯特罗在古巴的胜利，即便是正统的共

产主义也处在大分化之中。更重要的是，马克思主义思想对20世纪60年代中期不断壮大的大学生队伍的影响与日俱增。其主要标志是1960年《新左派评论》的创刊。在过去的20多年里，它一直是英国左派知识分子的核心刊物。但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兴趣并未带来共产党员人数的增加。共产党的规模依然很小，在《走向社会主义的英国道路》中，它遵循了一个远非革命的纲领，并试图使工党向左转。然而，它毕竟依旧是真正扎根于工人运动中的唯一的马克思主义组织。这种情况意味着，在英国，革命左派几乎是托洛茨基主义者的同义语。就这一点，从最大的团体——社会主义工人党（正式称之为国际社会党人），经由更具理论色彩的国际马克思主义小组，直到像工人革命党这样的极端倾向组织，概莫能外。

然而，尽管在英国还没有基础广泛的马克思主义政治运动，但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却作出了重大的贡献。这些贡献集中在英国知识分子历来所关注的几大兴奋点上，即这三大领域：文学、历史学和经济学。

在文学方面，很长时间以来，占统治地位的人物一直是雷蒙德·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在《文化与社会》和《漫长的革命》等著作中，他考察了英国公众生活中不同文化价值观在历史上的相互作用。最近，威廉斯得出了一种他描述为“文化唯物主义”的观点，并将其定义为“一种把文化当做（社会的和物质的）生产过程的理论，当做特殊实践的理论；和把‘文学艺术’当做物质生产资料（从作为物质的‘实践意识’的语言，到写作的具体知识和具体形式，直到机械的和电子的信息系统）的社会性使用的理论”^[1]。在威廉斯的著作中，内含的一个观点是：工人阶级的文化一向是、并且仍将是民主的和社会主义价值观的真正体现者。这同《新左派评论》的编辑不同，那些人一直关心的却是如何造就一个具有领导权的社会主义知识界。

在历史学方面，领导时代潮流的是那些曾经或时下同共产党保持密切联系的作家，这其中包括写了有关英国内战著作的克里斯托弗·希尔（Christopher Hill）和《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一书的作者E. P. 汤普森（Thompson）。从更深的理论观点来看，佩里·安德森（Perry Anderson）和汤姆·奈恩（Tom Nairn）都阐发了这样一个命题，即：英国经济和政治混乱源自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的不彻底性，在这些革命中，资本家随时随地准备同贵族妥协。在讨论中，从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过渡这一一般性的理论问题，也占有相当突出的地位。^[2]



但是在英国，知识分子作出最大努力的方面也许在经济学。自1960年斯拉法（Sraffa）的《用商品生产商品》出版以来，人们感受到的是，这是对马克思作出的强有力的新李嘉图学派式解释。该派作者着重研究的是交换和流通领域，而不是生产领域，由此，他们抛弃了价值理论，并试图用纯量的要素，如生产价格和市场价格，来阐发出马克思的思想。因而，他们也抛弃了马克思对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所作的区分，进而认为，经济危机是由在交换领域的分配上的阶级斗争引起的。与此同时，还有这样一些作者，他们随之重新确认了区分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以及坚持利润率下降趋势论这两方面的重要性，从而为传统马克思主义的价值理论作了精辟而强有力的辩护。在这一经济学领域中，最重要的进展也许是《资本和阶级》杂志的创刊，它是由社会主义经济学家联合会创办的，它独特地以讨论政治和经济学之间的关联作为探讨的重点。

[注释]

[1] R. Williams, 'Notes on British Marxism since the War', *New Left Review*, 100 (1976—1977) pp. 88f.

[2] 比方说，参见 R. 希尔顿（R. Hilton）主编的论文集 *The Transition from Feudalism to Capitalism* (London, 1978)。

深入阅读材料

有关英国左翼的起源，见比尔（Beer）的奠基性著作《英国社会主义史》。有关社会民主联盟，见楚佐基（Tsuzuki）写的海因德曼传记和卡普（Kapp）写的爱琳纳·马克思的生平的第二卷。就共产党的起源，见肯德尔（Kendall）的优秀著作《英国的革命运动》。还有在查利诺（Challinor）的《英国布尔什维主义的起源》中用托（托洛茨基）派观点所作的阐述。关于共产党的早期活动，见麦克法兰（Macfarlane）不偏不倚的介绍《英国共产党》和克鲁格曼（Klugman）冗长的辩解。塞奇威克（Sedgwick）和威廉斯（Williams）所写的文章对战后马克思主义作了简短的、但可信度高的描述。威德格里（Widgery）的长篇文选《英国1956—1968的左派》是从托派立场来编辑的。对当代经济论争的优秀指南是法恩与哈里斯（Fine and Harris）所写的文章。约瑟夫（Jessop）的《资本主义国家》对近来所有的著作作了深入的讨论。斯克鲁顿（Scruton）的《新左派思想家》提供了尖锐的论争，而英格利斯（Inglis）的威廉斯传记则对这段历史时期给予

了很好的评论。安德森的著作还处在不断公布之中。就最近关于分析的马克思主义和市场社会主义的著作,见下一章的参考文献。

参考文献

History

Perry Anderson, *English Questions* (London, 1992).

— ‘The Origins of the Present Crisis’, in *Towards Socialism* (London, 1965).

Max Beer, *History of British Socialism*, 2 vols (London, 1919—1921).

Raymond Challinor, *The Origins of British Bolshevism* (London, 1977).

Henry Collins and Chimen Abramsky, *Karl Marx and the British Labour Movement* (London, 1965).

John Bruce Glasier, *William Morris and the Early Days of the Socialist Movement* (London, 1921).

S. R. Graubard, *British Labour and the Russian Revolution: 1917—1924* (Cambridge, Mass., 1956).

Keir Hardie, *From Pit to Parliament* (London, 1913).

—*Hardie's Speeches and Writings: 1885—1915*, ed. Emrys Hughes (London, 1928).

Bob Holton, *British Syndicalism, 1900—1914: Myths and Realities* (London, 1976).

H. M. Hyndman, *England For All: The Historical Basis of Socialism in England* (Hassocks, Sussex, 1977).

—*The Record of an Adventurous Life* (London, 1911).

Fred Inglis, *Raymond Williams* (London, 1996).

Yvonne Kapp, *Eleanor Marx*, vol. II *The Crowded Years, 1884—1898* (London, 1976).

Walter Kendall, *The Revolutionary Movement in Britain, 1900—1921: The Origins of British Communism* (London, 1969).

J. Klugman, *History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Great Britain* (London, 1968ff.).

David Kynaston, *King Labour: The British Working Class, 1850—1914* (London, 1977).

Harold J. Laski, *Communism* (London, 1932).

L. J. Macfarlane, *The British Communist Party* (London, 1966).



Norman and Jean MacKenzie, *The Fabians* (New York, 1977).

Paul Meier, *William Morris: The Marxist Dreamer*, 2 vols (Hassocks, Sussex, 1978).

Francis Mulhern, *The Moment of 'Scrutiny'* (London, 1978).

Tom Nairn, 'The English Working Class', in Robin Blackburn (ed.), *Ideology in Social Science: Readings in Critical Social Theory* (London, 1972).

Henry Pelling, *The Origins of the Labour Party: 1800—1900* (London, 1954).

Stanley Pierson, *Marxism and the Origins of British Socialism: The Struggle for a New Consciousness* (Ithaca, N. Y., 1973).

Peter Sedgwick, 'Varieties of Socialist Thought', *Protest and Discontent*, ed. B. Crick and W. Robson (Harmondsworth, 1970).

E. P. Thompson, *William Morris: Romantic to Revolutionary* (London, 1977).

C. Tsuzuki, *H. M. Hyndman and British Socialism* (Oxford, 1961).

Stephen White, *British and the Bolshevik Revolution* (London, 1979).

David Widgery, *The Left in Britain, 1956—1968* (London, 1976).

Raymond Williams, 'Notes on British Marxism since the War', *New Left Review*, 100 (1976—1977).

Michael Woodhouse and Brian Pearce, *Communism in Britain* (London, 1975).

Alex Zwendling, *Orwell and the Left* (New Haven, 1974).

Theory

B. Fine and L. Harris, 'Controversial Issues in Marxist Economic Theory', *Socialist Register*, 1976.

A. Glyn and R. Sutcliffe, *British Capitalism, Workers and the Profit Squeeze* (Harmondsworth, 1972).

I. Gough, 'Marx's Theory of Productive and Unproductive Labour', *New Left Review*, 76 (1972).

G. Hodgson, 'The Theory of the Falling Rate of Profit', *New Left Review*, 84 (1974).

E. Hobsbawm, *Introduction to Karl Marx, Pre-capitalist Economic Formations* (London, 1964).

Bob Jessop, *The Capitalist State* (Oxford, 1982).

Ralph Miliband, *Parliamentary Socialism* (London, 1973).

—*The State in Capitalist Society* (London, 1973).

Tom Nairn, *The Break-up of Britain* (London, 1977).

Roger Scruton, *Thinkers of the New Left* (Harlow, 1985).

Ian Steedman, *Marx After Sraffa* (London, 1978).

E. P. Thompson, *The Making of the English Working Class* (London, 1963).

—*The Poverty of Theory* (London, 197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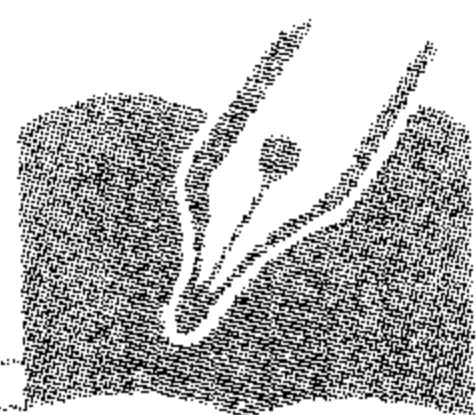
R. Williams, *Culture and Society* (London, 1958).

—*The Long Revolution* (London, 1961).

—*Marxism and Literature* (Oxford, 1977).

—*Politics and Letters* (London, 1978).

D. Yaffe, 'The Marxian Theory of Crisis, Capital and the State', *Economy and Society*, 2 (1973).



马克思主义研究译丛

第二十四章 马克思主义在美国

历史

1. 马克思和恩格斯

马克思和恩格斯终其一生都显示出对美国的极大兴趣。19世纪50年代初，马克思曾经认真地考虑过移居美国，并担任《纽约每日论坛报》最受尊崇的外籍撰稿人长达十年之久；恩格斯则于1888年访问过新英格兰。在马克思看来，美国体现了“资产阶级社会的最现代的存在形式”^[1]，由于那里没有封建的历史，“同以往一切国家的形成不同，这个国家自始就归属于资产阶级社会……它不可能把自身伪装成目的”^[2]。

其结果是，在这个社会中：

虽然已有阶级存在，但它们还没有完全固定下来，在流动不息中，它们不断更新自身的成分，并且彼此交流其成员；其次，在那里，现代的生产资料不仅不与滞留的人口过剩现象相冲突，反而弥补了头脑和人手方面的相对缺乏；最后，在那里，应该为自身开辟新世界的物质生产所具有的狂热而充满青春活力的进展，既没有给予人们时间、也没有给予机会来铲除旧世界的幽灵。^[3]

甚至在19世纪中叶，马克思就已预见到美国经济的巨大发展。在这一发展过程中，加利福尼亚金矿的发现和随之而来的人口西迁、铁路系统令人难以置信的扩展，以及“美国佬的不知疲倦的干劲”^[4]，使北美大陆的南半部成了“世界商业的支撑点”^[5]。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南北战争作了详尽的分析，他们认为，内战的结果为无产阶级本着“在黑人的劳动打上屈辱烙印的地方，白人的劳动也不能得到解放”^[6]的原则进行斗争扫清了道路。奴隶制的废除和工业的巨大增长，特别是经过1873—1878年的长期危机之后，为“建立一个严肃的工人政党”提供了可能性^[7]，虽然马克思早已预言过，这个党最初会采取亲资本主义的激进主义形式。^[8]

2. 魏德迈和左尔格

事实上，马克思主义最初向美国移植，在马克思逝世以前就开始了。这主要是欧洲1848年革命失败后，熟练的产业工人移居到美国的结果。由于当时大多数移民为德国血统，因此，无论对东部相对较小的有组织的劳工组织，还是对西部人民党的农民运动，他们都没产生什么影响。第一次移民浪潮中的卓越人物是马克思的朋友约瑟夫·魏德迈（Joseph Weydemeyer），他是出现在美国的第一位马克思主义者。1853年，他和几位朋友在纽约市成立了为时短暂的“美国工人同盟”。这是一个介于政党与工会之间的混合组织，其宗旨是在社会主义的基础上为直接改善工人的生存状况而进行鼓动。此后，作为新闻记者和县审计员，魏德迈活跃在伊利诺伊州和密苏里州，并在南北战争中作战，后来在1866年病逝。当时，由于“美国工人同盟”的存在，第一国际在美国的影响大致局限于德裔美国人中。到1870年，第一国际在美国已有几个支部，统一于以弗里德里希·左尔格（Frederick Sorge）为通讯书记的中央委员会之下。由于始终停留在一些外围活动上，

第一国际在 1872 年把总部迁到纽约后，仅维持了四年。左尔格所关心的是，如何保守第一国际的马克思主义原则。为此，他主张，在无产阶级的觉悟尚未发展到能为建立政党而奠定可靠的基础之前，为工人阶级所提出的要求而进行鼓动是第一位的。这样，他就同两类人同时发生了冲突；一类人是把教育当做无产阶级摆脱苦难的主要药方；另一种人则全神贯注于争取妇女选举、参政权的事业——特别致力于雄心勃勃的维多利亚·伍德赫尔（Victoria Woodhull）方案。第一国际解散以后，左尔格便从活跃的政治生涯中隐退了。

3. 北美社会主义工党和德·利昂

紧接着第一国际的解散，在费城召开了一次有左尔格和魏德迈的儿子奥托（Otto）参加的会议，在会上成立了北美社会主义工党。然而，在 19 世纪 80 年代，社会主义工党试图效法强大的德国社会民主党搞选举运动，却未获成功。尽管工会活动已高涨起来，并最终导致在 1886 年建立了美国劳工联合会，但党的事业还是止步不前。特别是在 19 世纪 80 年代中期，理想主义的、基本上是改良主义的劳动骑士团如雨后春笋般出现，这些组织领导了为 8 小时工作日进行的鼓动行动，并加入了新的独立工党，这个政党于 1886 年提名亨利·乔治（Henry George）为该党竞选人参加纽约市长选举。乔治是风靡一时的《进步与贫困》一书（写于 1879 年）的作者，他主张实行单一税制，在这项制度下，地租将用于公共事业——这项措施同土地改革和个体小商户的休戚相关要超过对产业资本主义的关切。^[9]

几乎清一色由德国新移民组成的社会主义工党，在丹尼尔·德·利昂（Daniel De Leon）加入之前，未能取得任何进展。德·利昂具有犹太人和加勒比人的血统，曾就读于荷兰，后执教于哥伦比亚。他起初是乔治的热烈支持者，而后是贝拉米（Bellamy）的合作化与集体化国家主义的积极拥护者，再后来，于 1890 年参加社会主义工党。德·利昂作为社会主义工党的党报《人民报》（在美国惟一一份公开宣称是马克思主义的英文报纸）的主编，从 1890 年起到 1914 年逝世之前，一直是社会主义工党的首要代言人，也是当时在美国最有发言权和最不妥协的马克思主义辩护者。

德·利昂坚决反对社会主义工党的马克思主义同土地改革的民粹主义运动（美国传统的激进主义形式）相调和、也反对同中产阶级的乌托邦主义（曾使上一辈人感到焦虑不堪）相妥协。德·利昂关注的首要问题是社会主义工党与新生的工会运动的关系。他采取的第一大战略是“从内部打开缺

口”的战略，这原本是他在19世纪90年代中期未能成功地接管劳动骑士团时所放弃的策略。尤为重要的是，1894年，美国劳工联合会拒绝接受著名的“第十条政纲”，该纲领提出：“所有生产资料 and 消费资料归全体人民集体所有”（第十一条政纲都来源于英国独立工党的纲领）。在萨缪尔·冈珀斯（Samuel Gompers，他最初深受马克思的影响）的领导下^[10]，起码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美国劳工联合会推行一种“十足的工联主义”哲学，即避免卷入一切政治活动，并鼓吹一种自由放任的经济学。由于德·利昂建立了一个同美国劳工联合会相对抗、尽管存活时间不长的社会主义贸易和劳工同盟，美国劳工联合会便更加反对德·利昂所倡导的社会主义了。

德·利昂对在美国有可能争取社会主义所抱的乐观态度，促使他更强烈地反对不过问政治的工联主义。尽管由于发现德国社会民主党有改良主义倾向而有些幻灭感，但他认为，在美国实行妥协更不可容忍。在1904年第二国际阿姆斯特丹代表大会上，他宣称：

当封建主义被清扫到一边而资本主义肆无忌惮地挥舞着权杖，就像目前在美国这样——从这一刻起，进行革命的场地便已准备就绪了；更要紧的是，从这一刻起，改良也就成了陷阱与骗局。^[11]

因此，经济的发展已经使得美国争取社会主义比任何一个别的国家条件更为成熟：“别的国家尚未有成熟到可以实行马克思的革命策略”^[12]。

德·利昂的强硬立场导致社会主义工党在1899年分裂。当时，认为对现存工会应采取更舒缓的态度的大多数党员都离开了党，并建立了社会党。社会党在选举上更为成功，这促使德·利昂重新强调革命工会的活动。他认为，尽管工人遭受相对贫困化和绝对贫困化的苦难，但他们却仍会追随保守的工会领导人，于是在1905年，他参与建立了世界工人国际（IWW）。这是一个源于西北部移民伐木工人和矿工的运动，按马克斯·伊斯特曼（Max Eastman）的说法，它是“美国有史以来惟一真正无产阶级的革命组织”^[13]。德·利昂的理论是，劳工运动暂时分为建设性的和破坏性的两翼。属破坏性一翼的社会主义工党的任务是一种过渡性的任务，即为了废除国家而掌握国家（就像马克思一样，德·利昂坚决相信，在美国有可能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属建设性一翼的世界工人国际的任务则是永远具有建设性的，即控制、保存和扩大生产资料。政治运动必然使阶级斗争无法妥协，而经济运动却可

以是比较渐进的。然而，到了1908年，德·利昂被开除出世界工人国际，这是由于后者已有工团主义的倾向，并且相信应采取直接的行动、甚至毁坏机器的行动，从而同马克思主义者发生了冲突。从此，德·利昂便结束了他的政治生涯。在逝世前一年，在总结其工作的主旨时，他写道：

产业工联主义致力于把工人阶级统一到政治领域和产业部门中来——之所以要统一到产业部门中来，是因为，如果没有工人阶级有组织的有机联合，革命行动是不可能的；之所以要统一到政治领域中来，是因为没有别的领域可以寄托革命目的，而对革命目的若没有觉悟，联合就只是一种不牢固的结合。^[14]

4. 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

在20世纪初，社会党在人数上压倒了社会主义工党。到1912年，社会党党员已经增长到10万以上，该党主席尤金·德布斯（Eugene Debs）又在同一年作为总统候选人赢得了几近100万张选票。作为种族多元主义者，社会党从欧洲社会主义在当时所享有的威望中受益，在它根本改变了土地国有化政策以后，又从民粹派成员的纷纷归顺中获取到了好处。与社会主义工党不同，社会党只略微受到一些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它在意识形态方面极其庞杂，其内部有三种主要倾向：维克多·伯杰（Victor Berger）领导的右派，由中西部的市政改良者组成；以东海岸为基地的中间派，由1899年脱离社会主义工党的莫里斯·希尔奎特（Morris Hillquit）所领导；以及从西部获取力量的左派，由思想上最接近德·利昂的社会党领袖德布斯和世界工人国际领袖比尔·海伍德（Bill Haywood）领导——尽管后来在社会党通过了反对毁坏行动的决议后，海伍德于1912年被驱逐出党。与此同时，社会党内产生了一大批理论家，他们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美国的普及，比方说，翻译了《资本论》的欧内斯特·昂特曼（Ernest Untermann）、写了《卡尔·马克思的理论体系》一书的路易斯·鲍丁（Louis Boudin）（他的书甚至在今天读来仍能获益匪浅），以及曾担任党的理论刊物《国际社会主义评论》主编的A. M. 西蒙斯（Simons）。临近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前几年，出现了一个“抒情左派”的短暂繁荣时期，在当时，社会主义思想与各种各样的艺术形式融合在一起，“格林威治村”（纽约市内美国作家、艺术家和历史学家等的聚居区——译者注）应运而生，《新评论》则从马克思主义的视角开始对女

性主义和黑人问题展开敏锐的讨论。然而，随着美国的参战，反战的社会主义者相继遭到镇压，中断了这场文艺复兴运动。

由于约翰·里德（John Reed）在其著作《震撼世界的十天》中，对1917年布尔什维克的胜利作了广泛宣扬，因此这场胜利被绝大多数的社会主义者当做一场凯旋来欢呼——尽管后来布尔什维克政权日益走向独裁，由此带来了急转直下的幻灭感。1919年第三国际建立以后，由于其大多数成员来自各地讲外语的联合会，亲布尔什维克分子脱离了社会党，并组成了由路易斯·弗雷纳（Louis Fraina）和查尔斯·鲁登堡（Charles Ruthenberg）领导的共产党。另外还有一个小小的共产主义工人党，主要由土生土长的美国人所组成，以本杰明·吉特洛（Benjamin Gitlow）和约翰·里德为领导。这两个党都因当时美国实施战时叛乱治罪法而被迫转入地下。当他们在1921年又崭露头角时，列宁的“向右转”方针指示他们从事选举活动，并在现存的工会运动中开展工作。^[15]但即便完全摆脱了来自斯大林主义梦魇般的压力，它们也无法在美国取得任何进展，因为在那里，泰勒制和生产流水线正排挤各种手工业，大规模的消费品生产使得传统的种族激进主义走向衰落。

20世纪20年代后期，由于在对待苏联事件的方针上发生了内部分裂，共产党进一步遭到削弱。1929年，由杰伊·洛夫斯通（Jay Lovestone）和伯特伦·沃尔夫（Bertram Wolfe）领导的“右翼”反对派被驱逐出党。他们与布哈林的思想 and 政策合流，认为美国是一个不能立即被马克思列宁主义同化的“例外”，并强调了美国帝国主义在缓和群众的革命热情方面所产生的效应。早在一年前，“左翼”反对派曾被驱逐出党，这些托洛茨基的追随者们组成了两个团体：一个是马克斯·沙赫特曼（Max Schachtman）领导的工人党（即后来的独立社会主义同盟），它后来又同托洛茨基决裂，最终于1958年解散；另一个是詹姆斯·坎农（James Cannon）领导的社会主义工人党，它坚持不懈地宣传托洛茨基的观点。非共产主义左派〔它是由A.J. 马斯特（Muste）于1934年建立的独立而激进的美国工人党〕的分裂引发了一场轰轰烈烈的马克思主义大论战，论战以《现代季刊》和《党人评论》为中心，卷入这场论战的知识分子有詹姆斯·伯纳姆（Burnham）、悉尼·胡克（Sidney Hook）、伯特伦·沃尔夫（Bertram Wolfe）和马克斯·伊斯特曼（Eastman）等人。然而，在20世纪30年代中后期取得最大进展的恰恰是共产党。社会党当时在其新领袖诺曼·托马斯（Norman Thomas）的领导之下，特别由于罗斯福新政的影响，在整个30年代已衰落下去。社会主义工党则仍然是个小派别。惟独朝

气蓬勃、政见明确的共产党以一个虽然不大却很坚强的反法西斯堡垒的形象展现在世人面前，它把自身的影响扩展到新成立的产业组织联盟，并在其自身行列中赢得了广大土生土长的工人，还吸引了数量可观的文学界知识分子。到1943年，它几近拥有10万之众的党员。然而，该党最后还是抛弃了1934年以来就担任其领袖的厄尔·白劳德（Earl Browder）的调和观点，并于1945年把他开除出党。新的领导人威廉·福斯特（William Z. Foster）驳斥了白劳德所提倡的和平共存及其关于民族利益的说法。这一强硬路线使共产党在美国社会中陷于孤立的境地，并进一步导致了它的衰落。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影响、战后的经济繁荣和麦卡锡主义者的疯狂活动，把马克思主义带入到一个停滞和解体期，这一时期从1940年一直持续到1960年。^[16]

5. 新左派

20世纪60年代初期，马克思主义的复兴呈现出完全不同的面貌。这个“新左派”在许多方面看起来像20世纪初期的“抒情左派”。激进主义在20世纪60年代的复兴是由美国日益卷入越南战争而促成的。但是，虽然越南战争起了催化剂的作用，而新左派的崛起毕竟是国内发展的必然结果。哈林顿（Harrington）在《另一个美国》中揭露了美国白人工人的普遍贫困和苦难；而南方的民权运动也终于使广大的全美国人清楚地了解到黑人所遭受的社会与政治歧视。战时的需要促成了妇女大规模地长期就业，这使得女权运动有可能广泛地开展起来，而女权运动一向就是美国激进传统中的一部分。^[17]从一开始，这个新左派同马克思主义的关系就带有某种矛盾性。就传统而言，马克思主义一直被看成是对工人阶级的现实状况和愿望的理论性表述，而工人阶级被视为（至少在潜在意义上）全体人口中的大多数。然而在美国（这里的形势与英国有所不同），马克思主义同工人阶级并没有天然的有机联系，因而，其新左派形式往往成了所有被压迫的少数人抗议的一种手段。老左派的传统马克思主义者拒绝接受新左派的怀疑论人道主义，以及它的道德观、个人主义、唯心主义与模糊的存在主义姿态，这种姿态更多地与无政府主义相关联，而同马克思主义以阶级为基础的社会、政治分析相去甚远。新左派日益增长的反工业化的生态学偏见（尤其是因同情第三世界而产生的），在老左派看来，不仅是不切实际的，而且是反动的。新左派所鼓吹的不拘习俗的生活方式，如吸毒和性解放等，被看成是严重偏离严肃的政治责任感的精神涣散。

基于成分庞杂的少数派基础，新左派的理论自然也是十分折中的，它熔

无政府主义、甘地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于一炉。新左派有学生基础，因为它的主要组织是“争取民主社会学生会”（SDS），这是“争取工业民主学生联盟”在1959年取的新名字。虽然“争取民主社会学生会”起初要求的是学生在大学里拥有更多的权利（例如，1964年伯克利大学的自由讲演运动），但这些要求很快就演变成政治性的了。商业社会的需要对美国大学的影响如此强大，以至于对大学体制的任何挑战都势必带有某种反资本主义的含义。而且，“争取民主社会学生会”还提出了自己的“新工人阶级”理论（这种理论前面曾经提到过）：学生在知识工厂里接受训练以便适应发达资本主义的官僚体系的要求，在这种发达的资本主义中，他们将像19世纪的产业无产阶级那样，受剥削，并被异化；但与此同时，他们又对自身这种遭遇有了彻底的觉悟，从而使他们能够更有效地进行反抗。

在这方面，C·赖特·米尔斯（Wright Mills）对新左派的影响也许超过了马克思。的确，正是赖特·米尔斯使“新左派”一词在美国广为传播。在他最有影响的书《权力精英》（1956年版）中，赖特·米尔斯摒弃了统治阶级的概念，而代之以“群体精英”的说法。虽然他批评多元主义是不可靠的（基于政府、产业和军队方面的精英们是互相牵制），却并不像任何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必定所做的那样，一定会去驳斥多元主义本身。他对政治—军事机构作用的阐述并没有直接联系到经济基础，并且否定这样一种思想，即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工人阶级是“历史的主宰，或者甚至是最重要的主宰力量，尽管真正给人以印象深刻的历史证据与这一期望是相反的。我认为，这样一种劳工形而上学是从维多利亚时期的马克思主义那里传下来的遗产，现在已经完全不符合现实了”^[18]。就马克思主义对早期新左派的影响而言，其表现形式是埃里希·弗洛姆（Erich Fromm）所诠释的、从青年马克思那里抽取出来的异化概念。^[19]“争取民主社会学生会”的基本文献——由汤姆·海登（Tom Hayden）于1962年起草的《休伦港声明》——摒弃了共产主义，认为共产主义“不论从哪一种意义来说，都未能实现它所声明的、领导一场全世界范围内的人类解放运动的意图”^[20]，《休伦港声明》还宣称，“作为人道主义者，马克思可以告诉我们很多东西，但他的概念工具是过时的，他所描绘的终极图景是难以置信的”^[21]。相反，赫伯特·马尔库塞（Herbert Marcuse）的著作则使得这种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更具影响力。

但是，这一折中主义并没有持续多久。正如它的历史学家所写的那样，

“争取民主社会学生会的三个 R：从改良（Reform）开始，曾走向反抗（Resistance），现又非正式地以革命（Revolution）而告终”^[22]。“争取民主社会学生会”在意识形态上的开放性本身，便意味着这一运动缺乏共同的目标，从而导致自身极易被坚决、果断的少数人所接替。何况，人们已日益明显地感觉到，标志“争取民主社会学生会”诞生时身份的含糊的人道主义抗议，这种抗议不可能对付诸如像帝国主义那样复杂的现象；同时，人们也感到，严肃的激进主义最终将不得不以某种形式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实践为归宿。共产党及其年轻的“杜波依斯（DuBois）俱乐部”一翼，在 20 世纪 60 年代初期开始复兴，但取得最重大进展的还是马克思主义中的托（托洛茨基）派和毛（毛泽东）派，它们尤其注重借助青年运动。老托派的社会主义工人党缔造了青年社会主义联盟——这是直到 20 世纪 70 年代初为止最活跃的（也许还是最大的）左翼组织，这个工人党还强调了工人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意识问题。但从美国日益卷入越南战争中得到好处最多的是毛派的进步工党，该党强调反帝的暴力活动。这两派都同断然自称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黑人民族主义者和黑豹党人结盟。在“争取民主社会学生会”灾难性的 1969 年大会上，进步工党取得了控制权，新左派也就濒临没落。一些拒绝进步工党路线的人走向了各自的极端主义，他们组成一些短暂的游击小组，如革命青年运动和天气预报者等。在作出从越南撤军的决定和大学校园内恢复相对平静之后，左派活动分子的积极性便整个低落了——虽然 1974 年开始的经济危机曾使它有过有限的复苏，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他们重申了更全面地理解资本主义制度的动力和经典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基础的重要性。

6. 马克思主义在美国未获成功的原因

以上简短的概述提出了一个明显的疑问，这个疑问成了沃纳·松巴特（Werner Sombart）于 1906 年出版的《为什么美国没有社会主义？》一书的标题。一个显而易见的因素是，美国与欧洲不同，没有封建的历史。美国人争取民主的斗争并不是在根深蒂固的社会特权背景下进行的。事实上，正是美国政治体制的开放性有助于把劳工的要求容纳进来。这同欧洲恰恰构成了鲜明的对照。在欧洲，由于工人阶级被排斥在政治进程之外，不得不凝聚成一股团结一致的社会主义力量，以便表达自己的民主诉求。正如德-托克维尔（de Tocqueville）所言，美国人是“生而自由”的；既然美国的创立本身就是因无法忍受欧洲的东西而作出的一种反应，那么，就其本质而言，这

种自由是消极性（免于……限制的——译者注）的——它信奉的就是个人主义，而不是共产主义。再一个因素是，美国相对地同因战争而引起的欧洲剧烈动荡隔离开来。但这还算不上是充分的答案，因为美国迅速发展起来的工业已产生出一个工人阶级，按马克思主义观点看来，这个阶级似乎易于接受社会主义思想，就像德国人曾经表现过的那样。

新拓荒地区的存在无疑是个至关重要的因素。向西部移民——不管迁移之地究竟有多远——的可能性却影响了许多城市移民。在松巴特写作的时代，美国基本上还是个农业国，激进的抗议集中表现在小农场主的民粹主义的反对立场上，他们反对垄断工业的利益和东部的银行业，并倡导政府控制铁路、放宽信贷条件和直接选举参议院。虽然他们的许多要求可以看作反资本主义的，但是他们反对经济集中化和倚重财产私有的民粹派立场，却更多地立足于传统的新教道德而不是任何社会主义原则。鉴于政治激进主义是与对工人阶级没有明显偏好的民粹派主张相关联的，早期的工会运动为了维护自己的独立性，从一开始就充满了反对卷入政治的倾向和执著于更多世俗事务的坚定决心。当然，更为直接的是，新拓荒地区的存在限制了劳动力的供给（因而也限制了失业），并减缓了都市的成长进程。

与土地问题具有同等重要的是移民的影响。种族分化妨碍了工人阶级的统一，而连续的移民浪潮构筑了一种等级体系。最新近到达的、特别是来自南欧和东欧的移民处于底层，而从早期定居的熟练工人中则滋生出工人贵族。甚至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外来移民急剧减少的情况下，国内非熟练劳力从农村流入城市，便意味着在农村社区养成的个人主义和不思进取的态度随之渗入到产业劳动大军中去了。等到有组织的工人作为一支真正的力量出现在政治舞台上的时候，他们又可能被同化到罗斯福新政的改良主义政策中去。那么，哪怕是假定松巴特关于当时美国工人富裕的看法是准确的，他对自己所提出的问题的回答，即社会主义已“奠立在成堆的烤牛排和苹果馅饼上”^[23]，也绝不是美国没有马克思主义的主要原因。

理 论

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期间，在美国，尤其是在学术界，出现了一次最为举世瞩目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兴趣大回潮。这一现象最明显的表现，不

仅在于出版了若干以马克思主义为论题的书籍，还在于创办了一系列专题刊物，这些刊物的标题通常都冠以“激进”字样，都或多或少对其论题提出某种马克思主义的见解，以与“老字号”的刊物相抗衡。^[24]不足为奇，美国人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最突出的贡献，是在对发达资本主义社会及其与帝国主义的关系的分析上。要对这些新近的理论贡献作一描述，必然带有很大的选择性，但无论如何，下面三个领域是最为突出的，即：新左派关于当代美国社会性质的理论、以马克思主义观点对美国历史的编撰，而最重要的是，对美国资本主义的经济学研究。

1. 新左派

随着马克思早期著作以及埃里希·弗洛姆等人对这些著作的评论相继面世^[25]，马克思的思想不再只与苏联式的共产主义联系在一起，人们开始广泛接受这样一种观点，即认为马克思的异化概念对20世纪就像对19世纪那样适用——甚至或许更为贴切。马克斯·霍克海姆在《理性的衰落》（1949年版）中，已经批判地考察了美国社会中的社会自由主义和政治自由主义。但正是法兰克福学派的另一个产物——马尔库塞的《单向度的人》——成了20世纪60年代中期新左派思想的一个缩影。^[26]在马尔库塞看来，当代美国是这样一种最为典型的社会，在这种社会中，“在一个压迫性的整体支配之下，自由可以被转变成强有力的统治工具”^[27]。马尔库塞的看法是：

发达工业社会的显著特征是，在它维持并宽宥富裕社会的破坏力和镇压职能的同时，它也有力地窒息了那些要求解放——也包括不受那些可容忍的、有回报的和令人舒心之物的约束——的需要。在这里，社会的控制强迫人们被高度浪费性的生产和消费所支配，必须麻木不仁地去干已非真正之所必需的工作，必须去缓和和延长这种麻木不仁状态的娱乐方式，必须去维持种种骗人的自由，如按操纵价格进行的竞争自由、置于自我审查机制下的出版自由，以及在注册商标和冒牌货之间的选择自由。^[28]

他特别推崇赖特·米尔斯（Wright Mills）、万斯·帕卡德（Vance Packard）和威廉·H·怀特（William H. Whyte）等人，因为他们的研究为他的分析提供了现实的基础。但新左派过于广泛的兴趣意味着他们的马克思主义是发散型的，这种马克思主义试图把诸如性别歧视和种族歧视之类繁

杂的问题都通通纳入其理论框架内。^[29]

2. 美国史

激进的美国历史学家们对美国社会所谓的自由主义也进行了详尽的研究。这一学派的老前辈是20世纪50年代威斯康星大学特别具有影响力的威廉·A·威廉斯（William A. Williams）。他最为关心的是外交政策及其对美国国内社会关系的影响。比威廉斯更独特的是加布里埃尔·科尔科（Gabriel Kolko）的著作。在《保守主义的胜利》一书（1963年版）中，科尔科考察了1900年到1916年这段时期，他认为当时的政府的目标是“把经济同更大的政治与社会领域以这样一种方式组织起来，它让各股份公司在一个可使其长期获取合理利润的、可预测的、安全的环境中运作”^[30]。于是，许多被自由主义者视为对大企业“前进式”抑制的改革，实际上只不过是，“在预设了社会总福利要通过满足企业的具体目标来最大限度地实现”，对商业和工业的处境予以政治上的合理化。^[31]因此，以企业精英的形式表现出来的“保守主义的胜利”，就是倾力去维护企业的现有利益。科尔科的见解与赖特·米尔斯的共通之处不亚于与马克思之间的共鸣。这些见解在詹姆斯·温斯坦（James Weinstein）的《自由主义国家中的企业理念》一书（1968年版）中得到了详尽的阐发。温斯坦把企业的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看作美国最发达的实业部门的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形态是大公司和金融机构的领导人与政府联手创造出来的，其目的是把劳工、小农场主和商人都统一到一个整体的国家内。

3. 经济学

然而，迄今为止，美国人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最有独创性的贡献还是在政治经济学方面。综合多方面看，其中最重要的贡献是保罗·巴兰（Paul Baran）的《成长的政治经济学》（1957年版）。从一开始，巴兰就对以往经济理论中的意识形态成分作了一番阐述，接着，他就提出了中心论题：经济剩余在发达资本主义中的作用。这里，他把实际剩余（社会现时产出与其现时消费之间的差额）与潜在剩余区分开来，后者是指“在一定的自然环境和技術环境下，借助于可资利用的生产资源，所能够生产出来的产出与可看作是基本的消费之间的差额”^[32]。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潜在剩余大于实际剩余，这出于以下四方面的原因：

一是社会的过度消费（主要表现在高收入群体，但在某些像美国这

样的国家中，也表现在所谓的中产阶级身上)；二是非生产性工人的存在使社会减少了产量；三是由于现存生产机构组织的不合理、不经济而降低了产量；四是由于资本主义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和有效需求不足所引起的失业也使产量得不到提高。^[33]

随后，巴兰回顾了决定资本主义从竞争型资本主义演变成垄断资本主义的各种因素，并得出这样的见解，即认为，一度起进步作用的垄断，现已成为倒退的力量。在考察了补救生产过剩问题的凯恩斯主义的传统做法以后（他多少赞同把这些做法作为短期的权宜之计），巴兰得出的结论是，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剩余只能被军费支出所耗尽，其必然结果则是导致帝国主义，以及日益增长的战争可能性。

在该书最重要的一节中，巴兰宣称，世界上大多数地区之所以不发达，是垄断资本主义动力发挥的直接结果，它妨碍了不发达地区的资本原始积累，并扼杀了那里的幼稚型产业：

虽然商品流通的扩大、大多数农民和小手工业者的贫困化，以及与西方技术的接触，为资本主义发展提供了强大的推动力，但这种发展被迫脱离了其正常的路线，受到扭曲和残损，以适应西方帝国主义的目的。^[34]

印度和日本的例子都说明了这一点。印度的落后是由于它被纳入到西方资本主义体系内，而日本的进步则由于它的孤立（独立）状态。巴兰驳斥了那种认为外来投资最终可能在财政或社会方面有利于第三世界的看法，因为外来投资在不发达地区造成的不同类型的国家（直接殖民地型的、买办型的、“新政”型的），在体制上都不可能为了他们社会的利益而利用上大量的潜在剩余。最后，经济发展只有在一场社会革命之后才有可能实现，到那时，才会有计划地使用经济剩余，就如同苏联把重点放在优先发展重工业上。

巴兰的著作在许多方面保持了经典马克思主义的传统。他把他的思想建立在列宁论帝国主义和工人贵族的著作、卢森堡的资本主义积累理论，以及托洛茨基关于不均衡发展概念之上。他最新颖、独到之处在于，他以以下的观点把上述思想传统同世界发展的问题联系起来，即认为西方的发展直接以不发达国家为代价。这种观点对现代发展理论学派产生了巨大的影响^[35]，

甚至形形色色的作家，如安德烈·冈德·弗兰克（André Gunder Frank）和格瓦拉都承认受惠于巴兰的影响。这也标志着马克思主义思想中侧重点的改变，即视发达资本主义的典型状态为停滞而非危机，并把注意力转移到第三世界，认为第三世界的未来发展不只是卖力地步西方的后尘。

巴兰和保罗·斯威齐（Paul Sweezy）于1965年合著出版的《垄断资本》一书，把巴兰在《成长的政治经济学》中论述过的关于剩余的思想，同斯威齐在《资本主义发展的理论》（1942年版）中提出的资本主义危机起因于消费不足的思想结合起来。这是关于美国经济的给人以最深刻印象的马克思主义总看法。该书的论述围绕着一个中心论题展开，即“垄断资本主义条件下剩余的产生和吸收”^[36]。垄断资本主义的兴起导致了竞争的消除、风险的消失和大公司相互间彼此宽容（自己活也让别人活）的态度，这一切意味着经典马克思主义关于利润率趋于下降的规律（在巴兰和斯威齐看来，这一规律是以竞争体制为先决条件的）对分析当代资本主义已不再适用了。他们写道：

因此，剩余增长的规律代替了利润下降规律。我们绝不是否定或修正政治经济学的一条久负盛誉的定理。我们只不过是要阐明这样一个毋庸置疑的事实，即：自该定理确定以来，资本主义的经济体制已经历了根本的变革。在资本主义从竞争到垄断这一体制变革中，最本质的东西在这种定理的替代中获得了它的理论表现。^[37]

就这样，巴兰和斯威齐把资本主义的危机归因于剩余价值的实现，而不再归结为剩余价值的生产。

不断增长的剩余在消费、投资、乃至在单纯的浪费中找到了某种出路。然而，调查研究表明，消费虽然在绝对数字上是上升的，但从与剩余增长的比例来看，它却是下降的。无论国内的还是国外的投资，从作为吸收剩余所需要的数量来说，其提高总是趋向于超过总收入，这就使投资失去了意义。现代公司在推销上所作的巨大努力，如广告、包装、为更新换代而人为废弃商品等等，吸收了一定数量的剩余，但毕竟也有个极限：

不管怎样绕弯子，也无法回避这样一个结论：垄断资本主义是自相矛盾的制度。它总是要产生越来越多的剩余，却无法提供所必需的消费

和投资出路，来吸收不断增长的剩余，从而使这个制度和谐运转起来。既然不可能被吸收的剩余不会再被生产出来，那么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垄断资本主义经济的常态就是停滞。^[38]

政府在吸收剩余方面发挥着更大的作用，但是政府对剩余的使用却严格取决于垄断资本主义社会的性质，并且，对剩余的使用变得越来越不合理，越来越带有破坏性。教育制度与大资本的需求密不可分，它是为了给大资本的不同部门提供合适的人才而组织起来的。政府在多种多样的汽车设备上的巨大消耗就是这一状况的一个缩影。然而，最突出、也最危险的是，由军事部门来吸收掉这些剩余部分，以及由此对美国人的生活方式整个地产生的影响。

巴兰和斯威齐合写的这部著作受到了持更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立场的作者们的批评，在这些批评者中，最杰出的思想家是比利时的托洛茨基主义者欧内斯特·曼德尔（Ernest Mandel），他的巨著《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理论》是对上述主题所作出的最全面的概论。在后来的著作中，曼德尔还批评巴兰和斯威齐只是从市场和实际效益的角度看待（有很多见解是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中借用来的）垄断资本主义的危机，而没有深入到马克思对生产过程的价值分析的基础中去，因而只是在表象层面上进行推理。在曼德尔看来，是资本的积累过程决定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进程。资本集中化的趋势既导致了垄断，又导致了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即花在厂房设备和原材料方面的费用超过工资方面）。虽然市场体制可能改变，但基本的问题仍然是如何提高剥削率，使生产和积累仍然有利可图。所以，巴兰和斯威齐的错误在于，他们没有考虑到至关重要的利润率。曼德尔自己对当代资本主义的分析包含在他的重要著作——《晚期资本主义》中，其中，他提出了“长波周期”理论，以此来解释资本主义的发展，并试图表明，当代资本主义为何正处于这样一个周期的末尾，因而无法保持剩余价值率。

巴兰和斯威齐的这本书写于 20 世纪 50 年代后期和 60 年代前期，即当时美国的繁荣期。而在越南的失败和国际竞争的加剧，使得保罗·马蒂克（Paul Mattick）在《马克思和凯恩斯》（1970 年版）一书中强调了国家在处理剩余时会遭遇到的固有限制。这个论题在詹姆斯·奥康纳（James O'Connor）的近作《国家的财政危机》（1973 年版）中也得到了发挥。奥康纳与新近的德国学派^[39]一样，认为国家的权力关系是复杂的、半自主的，

不能将它归结为对资本家利益的表达。他要阐发一种新的理论，来说明为什么对经济领域的国家干预不断增多。为此，他把经济划分为竞争部门、垄断部门和国有部门，并表明，为什么经济中的垄断部门和竞争部门是互为需要的，而这二者又都需要国家的干预——因为这两者有时具有矛盾性。奥康纳的主要论点是，从长远看，国家不可能增加足够的税收去满足这三个部门所有的政治需要；而国家又必须是令人满意的社会福利的供应者，以确保自身的合法性。为了达到这一目标，国家就把越来越多的生产成本社会化。国家的职能是通过投资诸如道路等事务，为竞争性行业的隐性剩余劳动力承担像学校教育、医疗保健和其他福利方面的费用，从而把私人资本的费用社会化，最终实现社会的积累。可见，基于国家不是某一特定阶级的工具、而是用于协调各阶级之间的政治冲突的，它是相对自主的。国家干预的增长以及竞相争取国家的偏袒，导致了资本主义所有各方组织机构都认可的国家的权威。国家维护了社会的阶级体系，因为它被看成是独立于阶级体系的。然而，在奥康纳看来，在国家的经济积累功能与政治合法化功能之间存在着某种内在的矛盾，这种矛盾源于不断增长的生产力的社会性与利润（在某些情况下，是政治权力）的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

与奥康纳宽广的政治—经济视角形成对照的是，哈利·布雷弗曼（Harry Braverman）的《劳动与垄断资本》（1974年版）通过大量的历史细节最为详尽地考察了垄断资本对劳动过程产生的作用。布雷弗曼所展示的作品同巴兰和斯威齐的《垄断资本》框架完全和谐一致，所不同的是，不像后者，他强调了工人阶级在推翻资本主义中的作用，并对剩余持有一种更传统的马克思主义观念。布雷弗曼的目标是，考察工人阶级的结构及其是如何发生变化的。在其近期的研究中，他的分析一开始就提出了一种明显的矛盾现象：

一方面有人强调，作为科技革命和“自动化”所产生的结果，现代劳动一般都要求有越来越高层次的教育和训练，要求付出更多的智力和精神努力。而另一方面，对产业劳动和办公劳动条件的日益不满似乎又同上述见解相矛盾。因为据说（有时甚至是在别的场合支持第一种见解的那些人所言），劳动越来越被细分为一些细微的小操作，以至于不能使具有现代教育水平的人保持兴趣或施展才华；这些小操作越来越不需要多少技术和训练素养；加之，对劳动的“漫不经心”和“官僚主义化”，这使得劳动的现代趋势正异化着越来越多的劳动人口。^[40]

布雷弗曼倾向于第二种见解，他抨击了“新工人阶级”的理论家们。^[41]他声称，只要整体性地研究了工人阶级，就会看到，“新”职业在工人阶级中的增长速度并不比在其他阶层中快。

为了支持这种论断，布雷弗曼把它建立在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中对劳动过程的讨论基础之上。布雷弗曼否定了在第二国际的理论家中和苏联都很流行的一种看法，即认为：资本主义所发展起来的工艺和管理技能是超越于阶级利益之上的。以泰勒制为例，布雷弗曼极其详细地描述了它在经营理念与操作实践之间背道而驰的发展，这种分裂是生产过程实行资本主义管理的要害所在，并仍然起着同以往一样大的影响——所谓扩大就业的措施不过是骗人的遮羞布。在该书的第二部分，布雷弗曼追溯了技术革新和管理技能的发展，以及这二者在劳动过程中的作用——科学对异化劳动日益增长的控制。在第三部分中，布雷弗曼描绘了现代资本主义的进展和资本在各产业部门间的转移，这种转移关涉现代企业的兴起；他还描绘了市场关系的普遍化和不断增长的国家干预。第四部分追述了职员系统与服务部门的成长历程，在布雷弗曼看来，就其监督生产过程的作用而言，这两个部门的工作人员也像任何车间中最下层的工人那样被“泰勒制化”了。由于自动化机械装置的增加，报酬待遇相对较好的技工人数在减少，这意味着低工资的办公人员和服务人员构成了现代的“劳动后备军”。因为，实际上：

所谓雇员或白领工人问题，尽管曾使前几辈的马克思主义者深感困惑，尽管被反马克思主义者欢呼为否认“无产阶级化”命题的铁证，但现今却在办公职业的两极分化和大量的雇佣劳动者人数单方面增长的情况下，被明白无误地澄清了。这种向庞大的非无产阶级的“中产阶级”发展的表面趋势，最终转化成—一个庞大的新型无产阶级队伍的诞生。^[42]

在第五部分中，布雷弗曼考察了社会中间阶层，即低级行政官员和管理人员等的模糊的阶级地位，否认生产劳动与非生产劳动之间的区分对阶级分析有任何重要性（因为二者是如此错综复杂地结合在一起）。最后，他还否定了机械化和教育导致了熟练工人的增加，相反却认为，一般的机械操作工和普通的服务部门工作人员都只需要很少的一点训练素养。

布雷弗曼把他的著作说成是论述“自在的”阶级而不是“自为的”阶级的。值得注意的是，他不谈阶级斗争这一主题，也不涉及政治和意识形态上

的因素，而这些问题在诸如普兰查斯（Poulantzas）这样的作家的著作中却占据那样突出的地位。布雷弗曼的这种做法归因于他接受了巴兰和斯威齐关于资本绝对地统治了劳动的见解，因此，他全盘否定了增加就业的计划和工人参与管理的要求。比方说，就后者，他写道：

工厂民主这个概念，只是建立在强制推行一种形式上的议会制机制，比如选举厂长、对生产和其他决策用投票的方式表决等基础之上，只是靠现存的生产组织形式，因而是虚妄的。不把必需的技能知识返交给工人群众，不对劳动组织进行改造——总而言之，只要没有新的、真正的集体生产方式，工厂和办公室里的投票就改变不了下述事实，即工人仍像从前那样依靠“专家”，只能在专家当中进行选择，或投票赞成由他们提出的别的人选。^[43]

而且，布雷弗曼的书同普兰查斯的著作形成了对照，其特点是具有丰富而细致的观察，别忘了，他本人做过多年的金属制造工人。他那种强烈的人道主义精神、那种直率的风格和对经验研究的熟练程度，使得他对20世纪劳动退化的论述无愧为马克思本人思想的继续。

4. 市场社会主义与分析的马克思主义

下面，继续探讨经济方面的话题。最近，有一部关于市场社会主义的文献，极具趣味性。该部著作可追溯到20世纪30年代那场高度理论化的讨论。当时，这场讨论是在诸如冯·米泽斯（Von Mises）和兰格（Lange）等作家之间，就社会主义条件下经济流通的可能性展开的。^[44]赋予这一话题以实际推动力的是，在20世纪60年代与70年代期间，东欧国家在增进市场作用方面所作出的一系列努力。^[45]然而，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看，这些努力并没有太多地促动马克思自身的原理的发展。尽管就市场社会主义克服了劳资之间的对立而言，它是社会主义的，但它没有把重点放在经济平等上。马克思对市场并不友好：按需分配、而不是按（功）劳分配，是他的共产主义社会的原则。他就市场社会主义所能说出的最中听的话，也无非是：它代表了这样一个社会，“从各个方面，无论从经济上、道德上，还是从文化上来说，这个社会仍然带有它所脱胎而出的旧社会的胎记”^[46]。可见，从马克思的角度看，不妨说，市场社会主义是目前人类社会所能达到的最好（或者说，更好一点的）水平。但是，作为终极目标，参照人类的动机和潜能，它



还极其缺乏效率、极为不公平、极端不成熟。

在盎格鲁-撒克逊国家和地区，从马克思主义的传统内部所生发出的最有趣的理论是被称作“分析的”或“理性选择”的马克思主义。这是时代精神、尤其是撒切尔/里根执政期间泛滥的个人主义的产物。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科学家运用了像博弈论和普通均衡论等新经济学中所采纳过的方法论。通过一种严格意义上的方法论个人主义框架，埃尔斯特（Elster）和罗默（Roemer）的著作特地对马克思进行了重新解读。他们认为，为了解释社会现象，有必要表明理性的个体能够自由地选择行为方式，其行为所造成的将是有待解释的现象。起码可以说，他们所持的观点是一种背谬（没有人像萨特那样尽力地把他的存在主义同马克思主义的原理调和起来）。不足为怪的是，这样一来，马克思（的思想）就所剩无几了。^[47]

[注释]

[1] K. Marx, *Introduction to Grundrisse, Selected Writings*, ed. D. McLellan (New York and Oxford, 1977) p. 355. 另见马克思在《论犹太人问题》（纽约和牛津1977年版，第39页以下）一书中把美国宪法视为古典自由主义的典型的评论。

[2] K. Marx, *Grundrisse*, ed. M. Nicolaus (New York and London, 1973) p. 884.

[3] K. Marx, 'The Eighteenth Brumaire of Louis Bonaparte', *MESW*, vol. 1, p. 255. 另可参见其他材料，比方说，K. Marx, 'Results of the Immediate Process of Production', Appendix to *Capital*, vol. I, trans. B. Fowkes (New York and London, 1976) p. 1014.

[4] K. Marx, F. Engels, *Werke* (Berlin, 1957ffh.) vol. 7, p. 221.

[5] Ibid.

[6] K. Marx, *Capital*, vol. I (Moscow, 1954) p. 301.

[7] Marx to Engels, *Werke*, vol. 34, p. 59. 另见麦克莱伦编的《选集》第583页对《共产党宣言》俄文版前言所作的评论。

[8] 参见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克里格（Kriege）的评论，*Collected Works* (New York and London, 1976) vol. 6, pp. 41ff.

[9] 参见马克思给左尔格的信中对乔治（George）的评论，*MEW*, vol. 35, p. 199.

[10] S. Gompers, *Seventy Years of Life and Labour* (London, 1925) vol. I, pp. 83ff. 还可进一步参见下面著作的前半部分，S. Kaufman, *Samuel Gompers and the Origin of the AFL* (Westport, 1973)。

[11] D. De Leon, *Flashlights of the Amsterdam Congress* (New York, 1929)

p. 193.

[12] 引自 D. Herreshof, *The Origins of American Marxism* (New York, 1967) p. 136. 就德利昂认为美国的革命成熟程度要高于法国的观点, 见他所作的脚注, A. Bebel, *Woman Under Socialism* (New York, 1971) pp. 372f.

[13] M. Eastman, *Love and Revolution: My Journey through an Epoch* (New York, 1964) p. 126.

[14] D. De Leon, *Daily People*, 20 Jan 1913, 引自 S. Hook, *Marx and the Marxists* (Princeton, N. J., 1955) p. 176.

[15] 参见本书第八章第二节的内容。

[16] 尤可参见 J. Starobin, *American Communism in Crisis, 1943—1957* (Cambridge, Mass., 1972) 第三部分。

[17] 有一种前卫的研究, 见 B. Friedan, *The Feminine Mystique* (New York, 1963)。

[18] C. Wright Mills, *The Power Elite* (London, 1956) p. 212.

[19] E. Fromm, *Marx's Concept of Man* (New York, 1962)。

[20] 引自 A. Adelson, *SDS* (New York, 1972) p. 208.

[21] N. Young, *An Infantile Disorder?* (London, 1977) p. 138.

[22] A. Adelson, *SDS* (New York, 1972) p. 203.

[23] W. Sombart, *Socialism and the Social Movement* (London, 1909) p. 276.

[24] 在这些作品中, 最为引人注目的是由激进政治经济学联盟在安阿伯 (Ann Arbor) 出版的《评论》。

[25] 尤可参见 *Socialist Humanism*, ed. E. Fromm (New York, 1967)。

[26] 关于马尔库塞, 参见本书第十九章第五节的内容。

[27] H. Marcuse, *One-Dimensional Man* (London, 1968) p. 23.

[28] Ibid.

[29] 比方说, 参见 S. Firestone, *The Dialectic of Sex* (New York, 1970) 与 June 1970 number (vol. 4) of *Radical America*, devoted to C. L. R. James.

[30] G. Kolko, *The Triumph of Conservatism: A Reinterpretation of American History, 1900—1916* (Glencoe, Ill., 1963) p. 3.

[31] Ibid.

[32] P. Baran,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Growth* (Harmondsworth, 1973) p. 133.

[33] Ibid., p. 134.

[34] Ibid., p. 276.

[35] 参见本书第十八章。

[36] P. Baran and P. Sweezy, *Monopoly Capital* (Harmondsworth, 1966) p. 21.

[37] Ibid., p. 80.

[38] Ibid., p. 113.

[39] 尤可参见阿尔特瓦特 (Altvater) 的著作, 载 *State and Capital*, ed. J. Holloway and S. Picciotto (London, 1978)。

[40] H. Braverman, *Labour and Monopoly Capital* (New York, 1974) pp. 3f.

[41] 参见第二十章第三节内容。

[42] H. Braverman, *Labour and Monopoly Capital*, p. 355.

[43] Ibid., p. 445.

[44] 这方面有很好的描述, 见 D. Lavoie, *Rivalry and Central Planning: The Socialist Calculation Debate Reconsidered* (Cambridge, 1985)。

[45] W. Bruse and K. Laski, *From Marx to the Market: Socialism in Search of an Economic System* (Oxford, 1989)。

[46] K. Marx, *Selected Writings*, ed. D. McLellan (Oxford, 1977) p. 568. 这种“共产主义社会的低级阶段”并不包含市场, 但在伦理道德观上同市场社会主义有很大的相似性。

[47] 比方说, 表现在 J. Elster, *Making Sense of Marx* (Cambridge, 1985)。

深入阅读材料

最简明扼要的介绍是迪金斯 (Diggins) 的《20 世纪的美国左派》。还可参阅布尔 (Buhle) 的文章“走向新马克思主义”。贝尔 (Bell) 的《美国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短小精悍, 充满了火药味。关于德利昂与社会主义工党, 见赫雷肖夫 (Herreshof) 的《美国马克思主义的起源》。关于共产党的产生及其早期活动, 由德雷珀 (Draper) 写的两本书是上乘之作。至于共产党后来的发展, 见斯塔罗宾 (Starobin) 的《危机中的美国共产主义》。香农 (Shannon) 写的社会党历史全面透彻, 信息容量大。就新左派, 最好的导读性著作是西奥多里 (Theodori) 的文集。关于“争取民主社会学生会” (SDS), 见塞尔 (Sale) 所作的卓越研究。就当代困境, 参见雅各比 (Jacoby) 的文章。布尔 (Buhle) 的《美国的马克思主义》是一部优秀的评介性读物。

关于市场社会主义, 见迪瓦恩 (Devine) 的《民主与经济计划》、米勒 (Miller) 的《市场、国家与社区》(在视角上最接近马克思) 与施韦卡特 (Schweikart) 的《反对资本主义》。

关于分析的马克思主义, 见以下的参考文献。在实践中, 分析的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好例证是罗默 (Roemer) 的《自由地丧失》, 它以一种非专业语言对阶级和剥削作了分析。两部优秀的导读读物是迈耶 (Mayer) 的《分析的马克思主义》与由卡弗 (Carv-

er) 和托马斯 (Thomas) 所编辑、标题为《理性选择的马克思主义》的论文集。

参考文献

History

Daniel Bell, *Marxian Socialism in the United States* (Princeton, 1952).

Paul Buhle, 'Marxism in the United States', in *Towards a New Marxism*, eds. B. Grahl and P. Piccone (St. Louis, Miss., 1973).

—*Marxism in the USA* (New York, 1987).

James Cannon, *The First Ten Years of American Communism* (New York, 1962).

—*The History of American Trotskyism* (New York, 1944).

—*The Struggle for a Proletarian Party* (New York, 1943).

John R. Commons, *History of Labour in the United States*, 2 vols (New York, 1921).

J. Diggins, *The American Left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New York, 1973).

Theodore Draper, *The Roots of American Communism* (New York, 1957).

—*American Communism and Soviet Russia: The Formative Period* (New York, 1960).

Max Eastman, *Love and Revolution: My Journey through an Epoch* (New York, 1964).

Donald D. Egbert and Stow Persons, *Socialism and American Life* (Princeton, 1952).

Philip Foner, *The Bolshevik Revolution: Its Impact on America, Radicals, Liberals and Labour* (New York, 1967).

Albert Fried (ed.), *Socialism in America: From the Shakers to the Third International, A Documentary History* (New York, 1970).

Ray Ginger, *Eugene V. Debs: A Biography* (New York, 1970).

Benjamin Gitlow, *I Confess: The Truth about American Communism* (New York, 1929).

Vivian Gornich, *The Romance of American Communism* (New York, 1978).

D. Herreshof, *The Origins of American Communism* (New York, 1967).

Morris Hillquit, *History of Socialism in the United States* (London, 1906).

Russell Jacoby, 'The Politics of Objectivity: Notes on the U. S. Left', *Telos*, 34 (1977—1978).



Harry W. Laidler, *Socialism in the United States* (New York, 1952).

Christopher Lasch, *The Agony of the American Left* (New York, 1968).

John H. M. Laslett, *Labour and the Left: Study of Socialist and Radical Influences in the American Labor Movement, 1881—1924* (New York, 1970).

Staughton Lynd, *Intellectual Origins of American Radicalism* (New York, 1969).

Constance Myers, *The Prophet's Army: Trotskyism in America, 1928—1941* (Westport, 1977).

Howard H. Quint, *The Forging of American Socialism* (New York, 1962).

Kirkpatrick Sale, *SDS* (New York, 1973).

David A. Shannon, *The Socialist Party of America: A History* (New York, 1967).

Werner Sombart, *Why is there no Socialism in the United States?*, trans. P. M. Hocking, Foreword by M. Harrington (London, 1976).

Joseph Starobin, *American Communism in Crisis: 1943—1957* (Cambridge, Mass., 1972).

Massimo Theodori (ed.), *The New Left: A Documentary History* (New York, 1969).

Tim Wolkfarth, *The History of American Trotskyism* (New York, 1968).

Nigel Young, *An Infantile Disorder? The Crisis and Decline of the New Left* (London, 1977).

Theory

Paul A. Baran,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Growth*, 2nd edn (New York, 1962).

P. Baran and P. Sweezy, *Monopoly Capital* (New York, 1966).

Harry Braverman, *Labour and Monopoly Capital* (New York, 1974).

Rod Coombs, 'Labor and Monopoly Capital', *New Left Review*, 107 (1978).

Michael Harrington, *Socialism* (New York, 1972).

—*The Twilight of Capitalism* (New York, 1976).

Gabriel Kolko, *The Triumph of Conservatism: A Reinterpretation of American History, 1900—1916* (Glencoe, Ill., 1963).

H. Marcuse, *One-Dimensional Man* (Boston, 1964).

C. Nelson and L. Grossberg (eds), *Marxism and the Interpretation of Culture* (London, 1988).

J. O'Connor, *The Fiscal Crisis of the State* (New York, 1973).

Paul M. Sweezy, *The Theory of Capitalist Development: Principles of Marxian Political Economy* (New York, 1942).

Paul M. Sweezy and Charles Bettelheim, *On the Transition to Socialism* (New York, 1971).

James Weinstein, *The Corporate Ideal in the Liberal State: 1900—1918* (Boston, 1968).

—*The Decline of Socialism in America: 1912—1925* (New York, 1969).

William Appleman Williams, *The Great Evasion: An Essay on the Contemporary Relevance of Karl Marx and on the Wisdom of Admitting the Heretic into the Dialogue about America's Future* (New York, 1968).

Market Socialism and Analytical Marxism

Alan Carling, 'Rational Choice Marxism', *New Left Review*, 162 (1986).

Terrell Carver and Paul Thomas, *Rational Choice Marxism* (London, 1995).

G. A. Cohen, *Self-Ownership, Freedom and Equality* (Cambridge, 1995).

P. Devine, *Democracy and Economic Planning* (Cambridge, 1988).

Jon Elster, *Making Sense of Marx* (Cambridge, 1985).

Andrew Levine et al., 'Marxism and Methodological Individualism', *New Left Review*, 123 (1980).

Tom Mayer, *Analytical Marxism* (London, 1994).

David Miller, *Market, State and Community* (Oxford, 1989).

Richard Miller, *Analyzing Marx: Morality, Power and History* (Princeton, N. J., 1984).

Alec Nove, *The Economics of Feasible Socialism* (London, 1983).

R. G. Peffer, *Marxism, Morality and Social Justice* (Princeton, N. J., 1990).

John Roemer (ed.), *Analytical Marxism* (Cambridge, 1986).

John Roemer, *Free to Lose: An Introduction to Marxist Economic Philosophy* (London, 1988)

David Schweikart, *Against Capitalism* (Cambridge, 1993).

Tony Smith, *Dialectical Social Theory and its Critics: From Hegel to Analytical Marxism and Postmodernism* (New York, 1993).

Ellen Wood, 'Rational Choice Marxism: Is the Game Worth the Candle?' *New Left Review*, 177 (1989).

Eric Wright et al., *The Debate on Classes* (London, 1989).

—*Reconstructing Marxism: Essays on Explanation and the Theory of History* (New York, 1992).



结 论

上述概览足以显示出马克思主义思想在 20 世纪所蕴涵的多样性。在经济学上，核心的问题是资本主义如何崩溃，以及何时崩溃。社会民主党领导人，如恩格斯、倍倍尔、考茨基等，对马克思关于利润率下降的说法解读得多少有些肤浅，这致使他们得出了这样的见解，以为资本主义的崩溃已迫在眉睫，并会自动发生——至少从无产阶级无须积极干预这一层意思来说是如此。而卢森堡（还有列宁）论帝国主义的著作从经济学的角度，更是对资本主义的崩溃作了精练的阐述——尽管其他经济学家（比方说，希法亭）的著作则认为，帝国主义的出现恰恰可以作为认定资本主义的灭亡远非迫在眉睫的一个理由。

伴随着布尔什维克革命的胜利，直到那时极少为人所关注的经济过渡——即从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问题跃居了首位。由于对战时共产主义和新经济政策有着不同经历，在布哈林和托洛茨基之间爆发了一场思想争论，布哈林认为，农业的逐步发展会为工业提供扩大的市场；托洛茨基则认为，必须采取更强有力的措施，把农民的剩余转为对重工业的直接投资。后者就是斯大林最终采取的政策，而且采取的是极为残暴的方式。毛泽东抛弃了苏联的这套做法，把农业置于主导地位，并强调生产关系比生产力重要。

当社会主义在东方正处于建设（或者被错建）期间，资本主义制度在西方也恢复了活力，这使得人们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兴趣下降了。这一下降趋势直到20世纪70年代才扭转过来，这一过程尤其体现在盎格鲁-撒克逊世界。这既是因为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的危机有所发展，也是出于人们对世界不平等和发展问题的严重关切。

在政治学方面，当时展开的争论集中在处理党与无产阶级的关系以及在工人阶级中发展革命意识上。甚至连那些似乎相信资本主义会半自动崩溃的人（考茨基和卢森堡以不同的方式相信这一点），也要么热中于发展党组织（考茨基），要么热中于群众罢工之类的策略（卢森堡）。但是，由于西方工人阶级中的广大阶层（包括工会的领导层）日益趋向改良主义，社会也没有出现明显的两极分化，因此，列宁关于“先锋”党必须向工人阶级灌输革命意识的思想便变得有吸引力了。随着1917年革命的胜利，党是工人阶级觉悟的体现者（卢卡奇论证了这一点）这一列宁主义模式完全占据了支配地位。在斯大林统治下的苏联，这种观念被用来发动自上而下的暴力革命。在中国，共产党自我宣称代表了大抵并不存在的无产阶级的意识，也同样有脱离人民的倾向——尽管它作出了像“文化大革命”这样的努力，力图对这一倾向予以克服。在西方，像科尔施和委员会共产主义者们这样一些人，曾执著地致力于工人的自我解放事业，也对原有的信念产生了幻灭。同样，法兰克福学派和结构主义者都表现出对工人阶级的革命潜力丧失了信心。只有葛兰西成为了惟一一位把对上层建筑的浓厚兴趣和积极投身政治活动集于一身的思想家。

在哲学上，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发展同时是多维度的。恩格斯曾说，德国工人阶级是被黑格尔所扼要概括的德国古典哲学的继承者。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争论一直围绕着两个互相关联的问题展开：一个是马克思主义在什么意义上（如果是的话）是一门科学；另一个是它从黑格尔那里所承袭下来的到底

是什么样的东西。有趣的是，这些问题的答案关涉上述经济学和政治学上的不同观点。例如，认为马克思主义是某种类似于自然科学的科学、因而对黑格尔少有兴趣的那些人，不肯认真考虑工人阶级是自我解放的思想。他们要么像考茨基那样，把自我解放归之于达尔文主义的进化过程，要么像列宁有时、斯大林经常性地所做的那样，把解放的任务委诸于党或（领袖）个人（这后一过程为中国共产党所重蹈，这鉴于中国农民“一穷二白”的国情）。认为马克思主义是某种超越科学的学问的那些人，特别强调个人的主观能动性，这在卢卡奇、科尔施和早期法兰克福学派那里都有所表现。然而，当革命的前景在西方暗淡下来，许多马克思主义者便重新关注起哲学，并几乎把它作为目的本身，或者把注意力转向诸如美学之类远离政治的课题上。的确，衡量过去一个世纪以来，马克思主义思想到底走出了多远，有一个尺度，那就是当前在其中从事最引人关注的理论研究的两个领域，即特别针对第三世界的发展研究与美学研究。可见，马克思主义本身的多样性表明，马克思的遗产中所固有的多重含混性确实已被他的追随者们充分地阐发出来了。

那么，处在世纪之交，马克思主义的前景如何？许多人想到了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的崩溃，认为这意味着马克思主义的终结，甚至是历史本身的终结。^[1]一些则认为，既然真正的社会主义只能产生于充分发达了的资本主义世界，那么按照马克思主义的正统原理，苏联本身就是一种偏离了正常轨道的非常态。^[2]因此，1989年及其后续的年份内所发生的一系列革命，无非是继布尔什维克党人所制造的迂回路线之后，对历史的一种复归，回复到马克思业已划定的轨道上来。而无论如何，现在回过头来审视这一个世纪以来对马克思的解释，越来越清楚的是，在马克思主义中，何者还活着？何者已经死了？有三个方面，人们不禁要把它们送入“太平间”；而另有两个方面，似乎仍然有相当大的生命力。

在属于走向死亡的范畴内，首要的、也最明显的一点是，知识体系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它从形而上学的、哲学的角度对世界作出通盘的解释。也就是说，在辩证唯物主义这一指示下，从传统的意义上，这种马克思主义被苏联所说教，并刻写在无数本陈腐不堪的教科书上。^[3]在此，辩证唯物主义规律支配了一切，从质量互变到下一场革命日期的确定，概莫能外。这种无所不包的形而上学，就建立在对世界粗鄙的唯物主义解释之上，它并不太为大多数会思想的人当一回事。然而，它又确实存在，就像一种颇为简单化的宗教，被广为宣传，并在一定程度上或许被成百上千万的人们所接受。马克

思主义的这一面早已没什么有效性可言了。

其次，从更为严格的政治意义上讲，近来所发生的事件已向我们表明，起码在工业化国家，至少从中短期看，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是没有前途的。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强调两个观点，它们是列宁从上一个世纪（19世纪——译者注）继承下来的，被他并入到马克思主义的经典理论中，并付诸实践。这其中的一个观点是关于作为先锋队的党的，它认为，这个政党能够把所要倡导和践履的思想建立在非工人阶级自身所能产生的理论之上，这个政党能够拥有工人阶级自身的规划和政策，这个政党之所以是先锋队，是基于它比工人先进，它代表了工人未来的利益，而工人并不知道自身真正的利益所在。列宁的第二个新观点是帝国主义论。该理论依据变化着的资本主义扩展需要，解释了工业化的西方向非洲和亚洲的扩展。上述两个方面，即政党与帝国主义的观点，被列宁并入到19世纪的马克思主义内，它们作为两个理由，恰好说明了为什么如果在世界的某一个地方，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尤其是后者）仍能存活的话，那该地方一定是非洲、亚洲和南美洲的原因。这是因为先锋队党的观念在过去数十年来一直诉诸于这些国家的精英分子，这些精英分子希望运用自身的精英身份与地位来使自己的国家现代化，并赶超发达的西方国家。而帝国主义观念理所当然地向这些国家解释了，为什么它们处于自我发觉到的危险境地，也就是说，他们为什么会被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所剥削？这两方面共同意味着，尽管列宁主义在欧洲和北美没有可期待的前景，但在欠发达世界中的遭遇要好得多（大受欢迎）。

第三点是经济学上的，即认为，指令性经济或者说高度集中、高度计划型经济体制能够（至少在当前的发展水平上）提供社会和经济问题的解决方案。这一观念已经表明只是一种空洞的承诺。当然，并不否认，就苏联而言，这些类型相似的指令性经济确实在某些领域促进了社会的巨大发展，如把第一颗卫星送上太空、在20世纪30年代至50年代以举世瞩目的增长率提高了国民生产总值，还有创造了一个在许多重要方面都肯定要比西方国家平等的社会。^[4]（伴随这些指令性体制的消失而来的是，对它们程度不一的怀旧，这种留恋证明是可以理解的。）然而，在东欧的苏联式社会里，它们的专制主义水平事实上在目前生产力发展水平上如此缺乏效率；它们对自己的公民如此缺乏吸引力，这一切都无异于表明了这种马克思主义的终结。这三大因素，即效率因素、集权主义政治关系因素与群众中普遍的不满情绪因素，往往意味着这种国家主义形态的马克思主义不再有生命力了。

当然，马克思主义并不能规约为上述三方面，因而，这三方面的衰退并不意味着作为一个整体的马克思主义现今已跟不上潮流，变得毫无是处了。要是回顾一下过去数十年来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不难看出，几乎还没有一派思想（从最广义的意义上理解）活动不受惠于它。从中美洲、南美洲的自由神学^[5]，到过去几十年对英语世界编史工作的几大经典贡献^[6]，再到某些文艺批评领域^[7]，所有这些学科同马克思主义的卓有成效的互动，是引人注目的。更准确地说，这里存在两三个这样的领域，它们仍同马克思主义的传统密切相关。第一个领域是马克思本人所称为的唯物史观（唯物主义历史观）。这个观念认为，如果你想理解历史上所发生的一切，那么最好的出发点是考察那个社会生产中的经济关系，并力图把所有其他的事物都同这种经济关系联系起来。当然，这只是一个非常一般性的出发点。作为一种历史观，它似乎合情合理地勾勒出了一幅地图，你可以在上面对不同的事物作出定位。作为对历史的一种解读，或者说，作为考察历史的一种方式，它所能阐明的是：你首先要考察的是，在任何一个社会中的人们是如何为满足他们的物质需求而处世的。正是在获得物质满足的基础上，人们才谈得上从事其他的活动，包括政治活动、构建司法体系、绘画或祷告等。在我看来，在今天对待文化的这种唯物主义态度仍然像过去一样有效。与此相反，过去数十年内风行的是，史学家们在某种唯心主义与最愤世嫉俗的个人主义之间作剧烈的摇摆，前者往往近乎无一例外地诉诸思想观念上的变化去解释历史活动，后者则从个体的自我利益的角度去分析历史的演变。不同于唯心主义或个人主义的历史书写法，看待历史事物的马克思主义方法，总的看来，还是活生生的。当然，这种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也存在一些困难：一般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历史观，其困难在于，它不太善于预测，马克思原初所阐明的东西倾向于认为，西方资本主义将是短命的。而我本人也相信，从道德和精神上说，作为组织社会的方法的资本主义或许已经破产了；但“不幸”的是，从经济上讲，它肯定没有破产，而恰恰是经济和物质生活领域，马克思主义自称是优先看重的。（倘若你要探问马克思主义的伦理和精神，我相信，你从中能找到可能的答案^[8]，但这些方面自然又不是大多数马克思主义传统中的显要面。）事实上，正如西蒙娜·韦尔（Simone Weil）所言：“对资本主义压迫机制的马克思主义的分析是极好的，确实，这种分析如此卓越，以至于很难看出，这种压迫为何应该被终结”^[9]。在这方面，我认为她比马克思的大多数追随者要更具洞察力。

唯物史观的另一个困难日益突显出来，那就是：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整个威力在于它指向了生产力——人们所拥有的工具和手段——与他们自我组织起来的方式，并把它们当做未来历史进步的载体。大量的马克思主义传统所固有的观点是，正是生产力的增长将把人类带入一个新的、更好的社会，而这一点又恰好是唯物史观（如同西蒙娜·韦尔所指出的^[10]）可以同资本主义共享的地方。我们经常忘记，自由资本主义同马克思主义都是同一社会的产物，它们共享这个社会的许多前提条件。而任何一种资本主义形式也宣称，如果你让市场力量自由发展的话，那么我们所有的人都次第受惠，最终全都过上更好的日子。这种观点同马克思主义共享同一种自信心，那就是：生产力的无拘无束的发展最终能够解决我们所面临的所有问题。显然，这种观点已经遭到严肃的质疑；特别是在过去10—15年间，对生产力发展前景的这种信念所带来的生态上的恶果，实际上让每一个人都感同身受。^[11]

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所面临的第三个困境是，它把经济因素强调为决定性因素。如果你想要找出某一个倾向于最能体现马克思主义的分析方法特征的东西，那就是（以最简化的方式来表述）：经济因素是最重要的因素，其重要性超过政治、法律、宗教等一切东西。如今，这一分析方法也从三个方面遭受严重的压力。第一方面显而易见的是，民族主义的持续致“病”性。按照《共产党宣言》的说法，全世界的工人是没有祖国的。全世界的工人被认为跨越了国界，正团结成同一个阶级。然而，20世纪所爆发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及后续的历史事件都宣告了这种乐观主义破产了，如今的民族主义仍像以往那样势力强劲。^[12]第二方面的困难是，宗教的持久韧性。本来，在马克思主义看来，宗教是一种失效了的力量。然而，宗教非但没有从世界视域内消失，而且，如果你读报或收听新闻，并在此时此刻思量一下这个世界，你会发觉，其实这个世界充斥了宗教的成分——所带来的无论是好、（我往往担心）是坏。在此又一次出现了这样一个领域，在其中，对马克思主义生发不出一一种中（长）期的期待。^[13]第三个——也许是最基本的一个——困难是，要是考察社会的经济因素，往往就会从民众所属的阶级角度对他们进行分类，一如马克思主义所做的那样；一般而论，至少会由此来解释他们的态度和行为。然而，除阶级划分外，还有可供选择的划分社会人群的其他方法；而且，这些替代性方法似乎比阶级划分法更具有解释力。显然，其中的一种替代性方案是种族的。真正的划分是在黑人与白人之间、而不是在工人与资本家之间进行。还有一种也许是刚才提及的民族划分。当然，更为深远

的是，人类社会最实质的划分应该是性别的划分，而不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划分。正是男人与女人之间的差异和斗争以及前者对后者的剥削，才是贯穿整个历史的一根基线。在过去几十年，在马克思主义中，最有趣的著作是围绕不同形态的马克思主义与不同形态的女性主义之间的互动展开的。分别由朱丽叶·米切尔（Juliet Mitchell）与米歇尔·巴雷特（Michele Barrett）所写的书探究了“何者为奠基性的辩证法”这一问题：是劳动的辩证法，还是性的辩证法？亦或是这两者通过父权制概念交织在一起？^[14]（应该说，恰好在这一领域，以恩格斯关于《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这部著作作为典型，马克思主义传统实际上早已作出了某种具有历史开创性的工作。）

可见，马克思对历史的解释的确面临着许多难题，如缺乏预见性；过分热衷于生产力的增长而相应地缺乏对环境问题的相对关注；除经济因素外，比较忽视诸如民族主义、宗教等其他因素。还有，马克思的阶级理论，不管它多么强调一些人对另一些人的经济剥削，也还是把注意力从性别和种族的不平等上移开了，而这些不平等似乎对人们的社会、政治活动产生了非常强烈的影响。当然，马克思主义传统的威力确实在于它对物质力量、对经济的强调上；在于马克思所坚持的，如果真想变革社会，而且是以某种我们大多数人可能都会认可的最称心的方式进行，那么就不能不从我们社会的物质资源分配的意义上，对经济予以充分的考虑。^[15]而任何仅仅倚赖于道德说教、法律规章或单独扩大政治权利的变革不太可能深入到问题的实质中去，因为在马克思主义看来，绝大多数问题产生的根基是经济上的，尤其在于社会中的多数人缺乏经济力量，以及资本主义所生产、再生产出来的分裂和堕落现象。无论是了解国家的运作，还是理解这些运作合法化的方式，最根本的一点是要看重经济。绝非偶然的是，在20世纪，正是在关于国家运作及其合法化方式这两个研究领域内，马克思的西方追随者们享有盛名。

除了唯物主义历史观，马克思主义的第二个优势领域是，它考察社会、政治观念的根源的方式。由这种考察方式产生出一种意识形态批判，该批判发出这样的疑问：观念从何而来，又为谁服务？在这个领域，马克思被称为同尼采与弗洛伊德并立的“三大怀疑大师之一”。对“怀疑大师”这一称谓，可从这种意义上来理解，这三大思想家都对我们说：“千万不要把人们——无论是个人，还是社会群体——所作的自我描述当真，还有东西在底下，而且是更为根本的东西被它们掩盖起来了，这种掩盖或是有意识的，或是无意

识的。”正是在对社会批判理论的阐扬中，马克思主义的诸多思想才可能达致其鼎盛状态。就这三位怀疑大师而言，弗洛伊德的个人主义色彩太浓，以至没有对社会、政治现象作出解释，而对这些现象的更大量的解释恰恰是我们所要寻求的。至于尼采，至少在他当今的追随者的著作中，表现得太相对主义和无政府主义了，因而没法作为可靠的向导。而在这方面，马克思或许表现得最佳。有两本很优秀的书，写的是最扑朔迷离而又无处不在的后现代主义观念，它们分别由哈维（Harvey）和詹姆逊所撰写。而绝非偶然的是，它们都是从马克思主义的视角来阐发的。^[16]就意识形态，马克思所表述出来的是，如果你接受了像人权或国家利益这样的普遍概念，以及每一类的政治家乐于表达的所有措辞（当然，有些措辞出现得比其他的措辞要频繁！），那么，你就会发觉，这些概念实际上有助于让社会中某一严格限定的、特定的人受惠——意识形态掩盖了社会权力和福利的不均等分配。一般而论，如果说这些福利并没有完全排斥在大众〔这些人还无力替人“买单”（供奉人），更谈不上让别人“买单”（被人供奉）了〕之外，那也是被高度等级、级差化地分配的。马克思及其信徒们不善于编织轰动一时的新“曲目”，但他（们）会有助于你弄明白，为什么你总想去听金版的经典老“歌”。

〔注释〕

[1] 参阅福山（Fukayama）的著作，尤见 *The End of History, and the Last Man*（Harmondsworth, 1992）。

[2] Callinicos, *Is There a Future for Marxism?*（London, 1982），以及布莱克本（Blackburn）所主编的论文集；另外，还有安德森（Anderson）在他的著作 *Zones of Engagement*（London, 1992）的最后一章所作的谨慎、公允的结论。

[3] 最经典的文本是 *The History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the Soviet Union*（*Short Course*）（Moscow, 1935）。

[4] 对此所作的公正评论，见 M. Ellman, *Socialist Planning*, 2nd edn（Cambridge, 1989）。

[5] 比方说，A. Fierro, *The Militant Gospel*（London, 1977）。

[6] 见希尔（C. Hill）、汤普森（E. Thompson）与霍布斯鲍姆（E. Hobsbawm）的著作。

[7] 比方说，T. Eagleton, *The Ideology of the Aesthetic*（Oxford, 1990）。

[8] 比方说，见 D. McLellan and S. Sayers（eds）, *Socialism and Morality*（Lon-

don, 1990) 中的讨论。

[9] S. Weil, *Oppression and Liberty* (London, 1988) p. 58.

[10] 参见 D. McLellan, *Simone Weil: Utopian Pessimist* (New York, 1990) pp. 67ff.

[11] 近来, 就马克思主义与环境问题的关系的探讨, 尤见 R. Grundmann, *Marxism and Ecology* (New York, 1991)。

[12] E. Hobsbawm, *Nations and Nationalism Since 1780: Programme, Myth, Reality* (Cambridge, 1990)。

[13] 进一步参见 D. McLellan, *Marxism and Religion* (New York, 1986) pp. 157ff.

[14] J. Mitchell, *Women's Estate* (Harmondsworth, 1971); M. Barrett, *The Marxist/Feminist Encounter* (New York, 1990); Lisa Vogel, *Marxism and the Oppression of Women* (London, 1983)。

[15] 从历史的角度对这一观点所作的强有力的辩护, Z. Duan, *Marx's Theory of the Social Formation* (Aldershot, 1995)。另外还可参见埃伦·伍德 (Ellen Wood) 的观点, 载于论文集 *Capitalism Versus Democracy* (Cambridge, 1995)。

[16] D. Harvey, *The Condition of Postmodernity* (Oxford, 1990) and F. Jameson, *Post modernism, or, The Cultural Logic of Late Capitalism* (Berkeley, 1991)。马克思的意识形态概念所激发的思想反响可从这部新近出版的权威著作中表达出来: J. Torrance, *Karl Marx's Theory of Ideas* (Cambridge, 1995)。

参考文献

Walter Adamson, *Marx and the Disillusionment of Marxism* (Berkeley, 1985)。

Terence Ball and James Farr (eds), *After Marx* (Cambridge, 1984)。

Ted Benton, 'Marxism and Natural Limits: An Ecological Critique and Reconstruction', *New Left Review*, vol. 178 (1989)。

Axel van der Berg, *The Immanent Utopia: From Marxism on the State to the State of Marxism* (Princeton, N. J., 1988)。

Robin Blackburn (ed.), *After the Fall: The Failure of Communism and the Future* (London, 1991)。

Robin Blackburn, 'Fin de Siècle: Socialism after the Crash', in R. Blackburn, *After the Fall* (London, 1991)。

Alex Callinicos, *The Revenge of History: Marxism and the East European Revolu-*

tions (Cambridge, 1991).

Alex Callinicos, *Is There a Future for Marxism?* (London, 1982).

David Campbell, *The Failure of Marxism: The Concept of Inversion in Marx's Critique of Capitalism* (Aldershot, 1996).

Gøsta Esping-Anderson, *Politics against Markets: The Social Democratic Road to Power* (Princeton, N. J., 1985).

Roger Gottlieb, *Marxism, 1844—1990: Origins, Betrayal, Rebirth* (London, 1992).

Reiner Grundmann, *Marxism and Ecology* (New York, 1991).

Richard Heilbroner, *Marxism: For and Against* (New York, 1980).

James O' Connor, 'Capitalism, Nature, Socialism: A Theoretical Introduction', *Capitalism, Nature, Socialism*, vol. 1 (1988).

Ken Post, *Regaining Marxism* (London, 1996).

Edward Reiss, *Marx: A Clear Guide* (London, 1997).

Lydia Sargeant (ed.), *The Unhappy Marriage of Marxism and Feminism* (London, 1981).

Gary Teeple, *Globalization and the Decline of Social Reform* (Atlantic Highlands, 1995).

Lise Vogel, *Marxism and the Oppression of Women* (London, 1983).

Suke Wolton (ed.), *Marxism, Mysticism and Modern Theory* (London, 1996).

Ellen Meiksins Wood, *Capitalism versus Democracy* (Cambridge, 1995).



大事年表

(下表中有些日期是约略估测的)

	历史事件	理论发展
	马克思逝世；社会民主联盟成立	倍倍尔：《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妇女》 普列汉诺夫：《社会主义与政治斗争》
1884		
1885	费边社成立	普列汉诺夫：《我们的意见分歧》
1886		
1887	独立工党形成	
1888		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
1889	第二国际成立	
1890		
1891	社会民主党爱尔福特代表大会	《爱尔福特纲领》
1892		
1893		
1894	俄国尼古拉二世继位	普列汉诺夫：《论一元论历史观的发展》
1895	恩格斯逝世；中日战争	恩格斯：《〈法兰西阶级斗争〉导言》
1896		
1897		
1898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成立	
1899	社会民主党代表大会抵制伯恩施坦	列宁：《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 伯恩施坦：《渐进的社会主义》 考茨基：《农民问题》
1900	英国工党成立；中国义和拳起义	卢森堡：《社会改良还是革命》
1901	美国社会主义党成立	
1902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 布尔什维克与孟什维克分裂	列宁：《怎么办？》
1903		
1904	俄日战争	
1905	俄国革命；（德国）社会民主党耶拿 代表大会	

- | | | |
|------|----------------------------|---|
| 1906 | | 考茨基：《伦理学》
卢森堡：《群众罢工》
托洛茨基：《回顾与展望》 |
| 1907 | 国际斯图亚特代表大会 | 鲍威尔：《民族问题》 |
| 1908 | | 普列汉诺夫：《马克思主义的基本问题》
列宁：《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 |
| 1909 | | 考茨基：《取得政权的道路》 |
| 1910 | | 希法亭：《金融资本》 |
| 1911 | | |
| 1912 | 中国宣布成立共和国 | |
| 1913 | | 卢森堡：《资本的积累》
斯大林：《民族问题》 |
| 1914 |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 | |
| 1915 | | 列宁：《哲学笔记》
布哈林：《帝国主义与世界经济》 |
| 1916 | | 列宁：《帝国主义论》 |
| 1917 | 俄国二月革命与十月革命；美国参战 | 列宁：《国家与革命》 |
| 1918 | 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条约 | |
| 1919 | 德国革命夭折 | 布哈林和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共产主义入门》 |
| 1920 | 凡尔赛和约 | |
| 1921 | 喀琅施塔得叛乱；新经济政策开始实施 | 布哈林：《历史唯物主义》 |
| 1922 | | |
| 1923 |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成立；法西斯主义在意大利获胜 | 托洛茨基：《新路线》
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
柯尔施：《马克思主义与哲学》 |
| 1924 | 列宁逝世；蒋介石北伐 | 斯大林：《论列宁主义的基础》 |
| 1925 | | |
| 1926 | | 葛兰西：《论南方问题》 |
| 1927 | 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被开除出党 | 毛泽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 |
| 1928 | | |
| 1929 | 托洛茨基被驱逐出俄国
经济大萧条开始 | 葛兰西：《狱中札记》（直到1935年） |
| 1930 | 俄国农业集体化 | |
| 1931 | | |

- 1932
- 1933 希特勒上台
- 1934
- 1935 (中国工农红军) 长征 卢卡奇:《欧洲现实主义研究》
- 1936
- 1937 托洛茨基:《被背叛了的革命》
毛泽东:《实践论》、《矛盾论》
- 1938 斯大林:《论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
- 1939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
- 1940 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
- 1941 马尔库塞:《理性与革命》
- 1942 斯大林格勒保卫战 斯威齐:《资本主义发展的理论》
- 1943
- 1944
- 1945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
- 1946
- 1947 卢卡奇:《历史的新篇章》
阿多尔诺与霍克海姆:《启蒙的辩证法》
- 1948 南斯拉夫与苏联决裂
- 1949 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布成立 斯大林:《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学问题》
阿多尔诺等人:《权威化人格》
- 1950 朝鲜战争
- 1951 美国麦卡锡主义
- 1952 斯大林:《苏联的经济问题》
萨特:《共产党人与和平》
- 1953 斯大林逝世
- 1954
- 1955 马尔库塞:《爱欲与文明》
- 1956 苏共 20 大谴责斯大林
苏联入侵匈牙利
- 1957 巴兰:《增长的政治经济学》
萨特:《方法论研究》
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
- 1958 中国发动“大跃进”
- 1959 古巴革命



1960	中苏关系破裂	萨特:《辩证理性批判》
1961		
1962	古巴导弹危机	
1963		
1964	赫鲁晓夫下台	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 陶里亚蒂的《声明》
1965		阿尔都塞:《捍卫马克思》 格瓦拉:《古巴的人民与社会主义》
1966	(中国)“文化大革命”开始	巴兰和斯威齐:《垄断资本》
1967		德布雷:《革命中的革命》
1968	苏联入侵捷克斯洛伐克; 巴黎五月事件	阿尔都塞:《解读〈资本论〉》
1969		弗兰克:《资本主义与拉丁美洲不发达国家》
1970		
1971	林彪坠亡	
1972	美国从越南撤军	
1973	智利阿连德政府被推翻	阿尔都塞:《自我批判文集》 奥康纳:《财政危机》
1974		布莱弗曼:《劳动与垄断资本》
1975		
1976	毛泽东逝世	
1977		
1978		科恩:《卡尔·马克思的历史理论》
1991	苏联解体	
1997	邓小平逝世	

马克思主义谱系

(下列定位只有大致的精确度)

